



# 許家屯 留下的 秘密

有些話，我死後才能公開  
有些話，我死也不會說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 內容簡介

2016年6月29日，許家屯以百歲高齡在洛杉磯溘然長逝。人們在追思他的同時，也惋惜他的去世帶走了中共大量機密。不過，在這本由許家屯本人撰寫的回憶文章、與許家屯有密切來往者撰寫的紀念文章整合而成的著作中，仍然透露了諸多外界鮮知的內情。

許家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主掌福州市，後成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與中共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有過接觸，與楊尚昆、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更有密切交往。在本書中，許家屯對諸多中共領導人作了回憶與點評。

在年屆退休之際，許家屯意外被鄧小平點將，出任地下紅色港督。他表現出靈活的政治技巧和開明作風，主動拜會香港左中右人物，包括著名的政治反對派、反共文人和巨商，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香港人心。他幫助眾多港商渡過經濟危機，其中包括後來成為第一任香港特首的董建華；他與港商李嘉誠、中共元老王震一起，推動海南建省，使之成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

作為中共港澳工委書記，他在香港、澳門為中共布下了眾多防備各種變化的棋子。同時，他直接受命於當時主掌對台工作的楊尚昆，策劃了針對台灣的絕密行動。

1989年學運期間，許家屯受命於無法見到鄧小平的趙紫陽，通過與楊尚昆溝通，希望影響鄧小平的決策。隨後，他遭到江澤民、李鵬的秋後算帳，危急之中獲得曾慶紅傳來的信息，在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父子義助之下，成功從深圳經香港到達美國旅遊休息。

在此期間，許家屯得以比較自由地回憶一生的從政經歷。在中共1949年之後的歷史中，僅此一例。也因此，本書具有的價值非同一般。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此頁空白

《真相》系列 102

# 許家屯留下的秘密

明鏡出版社  
mirrorbooks.com

Xu Jiatun Liuxia de Mimi

by Xu, Jiatun et al

Published in 2016 by Mirror Books

©Chinese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 s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63032-897-9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Phone: (516) 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mailto: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 102

書名: 許家屯留下的秘密

作者: 許家屯等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高伐林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http://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mailto: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mailto: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twitter.com/MingJingNews](https://twitter.com/MingJingNews)

[facebook.com/MingJingNews](https://facebook.com/MingJingNews)

意見、稿件聯絡: [news@mirrormediagroup.com](mailto:news@mirrormediagroup.com)

訂戶、廣告聯絡: [info@mirrormediagroup.com](mailto:info@mirrormediagroup.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 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63032-897-9

定價: HK159 NT538

版次: 2016 年

---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謹獻給

開明政治家許家屯先生在天之靈

# 目錄

---

- 9 代序: 良知的代價與榮耀 (何頻)
- 14 許家屯生平
- 22 第一輯 孤獨中的悲壯
- 許家屯在美國安詳去世
  - 許家屯子女: 我們敬愛的父親走了
  - 《紐約時報》訃聞: 許家屯
  - 父親晚年的孤獨給人悲壯的力量
  - 他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信仰
  - 一個八零後眼中的許家屯
  - 从石板路起步的百年探索
  - 初心不改的“老布爾什維克”
  - 即使出走也不失忠誠
  - 許家屯和西康路
  - 人間再無許家屯
  - 遵循《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好官
  - 持義居異國, 故里一心存



## 82 第二輯 私人秘密和國家秘密

沉默的許家屯

許家屯出走細節

許家屯如何秘密出逃？

許家屯的私人秘密和政治秘密

隱居美國思考什麼？

回憶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

告別人世之前的長談

他想念故土戰友，故土戰友也想念他

一百歲的清醒頭腦

吳仁寶臨終：叫他回來

星雲大師：期待他回國給中國加分

## 258 第三輯 香港統戰和海南推手

重溫許家屯故事，解讀香港當前亂局

我“賣國”？——一七年香港工作回憶

“一國兩制”，就是要有反對派

妥協和讓步有利於香港安定

中共在香港九七後應透明化、公開化

最壞的情況是北京暗中插手香港事務

查濟民對中共的兩個建議

重點統戰對象：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

不尋常的朋友：與包玉剛的交往

與香港奇跡中的奇才李嘉誠相處

海南和梁湘

建立海南特區的三位推手

## 409 第四輯 革命初心與政治領袖

差點當上了一名作家

“放下你的鞭子”抗日找黨

我與顧逸萍一同走進抗戰隊伍

真假黨員從頭說

文革中周恩來向我交代任務

防止“四人幫”餘黨兵變的佈署

崇拜華國鋒的“池魚之災”

像周恩來那樣迴避故里

中國兩大亨：王光英和榮毅仁

新聞界霸主胡喬木其實是政客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車之鑒

無奈和悲情：悼尚昆老人

項南之冤

江澤民的政治報告

說的與做的：江澤民不許下屬批條子

趙紫陽的公開信

中共的民主改革

## 524 編者後記

# 代序：良知的代價與榮耀

——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

我們今天來悼念許家屯先生，不僅僅只是追思許家屯先生，也是證明我們的道德勇氣與許家屯先生同在。人的一生總是需要付出很多代價，最沈重的代價往往是良知的證明。但是人類能夠不斷進化和走向文明，是一些傑出的人，比常人更堅強地守住了良知的底線。許家屯先生之所以受到眾人的尊重，之所以有這麼多人在他晚年關心他，之所以這麼多人痛惜他的離去，是他代我們付出了更多的代價。

良心總是脆弱的，偉大的良心也有常人的痛。我一直不理解，至今也不能理解，在今天全球同村的時代，許家屯先生為什麼來到了無數的人求之不得的自由世界，卻還渴望回到那使他遭受不公的祖國？但是，從他的沈默中，從他的長嘆中，讓我能感受到，他甚至不惜讓自己受辱，也要求落葉歸根，他的心一直為此在流血。我甚至一度懷疑，他是否有些為自己曾經的勇氣而後悔？

即使他如此，我也不會失去對他的敬重。因為他是在擁有權勢的時候，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而他希望回到祖國的時候，已是

風燭殘年，除了他的心，他什麼都沒有了。我能接受他的任何改變。但是，前年，我在從聖地亞哥回到洛杉磯的車上問他：如果時間倒流到 1989 年，你會調整你的決定嗎？他毫不猶豫地說：我當然不會支持鎮壓！

我也當即說，“許家屯同志，就憑這一點，歷史上有你的地位！”我當時的評價太低了，老爺子，我今天毫無誇張地說，你在歷史上留下的是偉大的地位！

這不是偉大是什麼？你與趙紫陽先生、梁湘先生三位中共的高級官員，擁有任何人、任何言論都無法摧毀的特殊的輝煌地位！我也毫不懷疑地說，不用一萬年，不用一百年，不用五十年，甚至不用二十年，更隆重地對許家屯、對梁湘、對趙紫陽的追思、紀念活動，將會在祖國舉行！如果我的預言錯了，是天公不公，是吾輩不力，是我們對不起你們！

我與許家屯先生交往 20 多年，大到世界局勢、科技發展，中到中國事務，小到家庭瑣事，幾乎無話不談，談到無話可說，談到兩個人最後發現是牛頭對馬嘴，這輩子誰也說服不了誰。他甚至在背後講我的壞話：“何頻人不錯，就是太反動！”我也在背後說他的壞話：“以許家屯的經驗、天才、悟性、洞察力，他本可以站得更高。”但是，我們誰也下不了決心了斷這段忘年之交——道不同，理不同，情在！

所以，最近十多年，我來看老爺子時，常常從東部帶來不同的朋友，這些朋友比我有學問、也厚道，他們比我更讓老爺子高興，我心裡也就滿足了。今年 5 月份，老爺子一度病危，我帶了一位與他



何頻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

思想接近的朋友專程從東部來見他，他果然高興極了，我也讓他有了一個快樂的誤解，以為我的思想不那麼反動了。

也許因此，6月23日，他把衣服穿整齊等我再來。可他實在支撐不住了，開始昏睡不再下床。然而，25日，我和他痛愛的家人們，聽到了他生命最後的聲音，他關心的是怎樣資助家鄉貧困的學生。我說他的書快要出版了，他說，等半個月一個月身體好了，再來修改。

他的兒子跪在床前，撫摸著父親的臉，他是那麼地享受。以我的了解，許家屯先生與眾多中共高官一樣，過度的工作壓力，使他們與家人呆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然而，許家屯的晚年不是被公務

服務而是得到家人的親心照料，尤其是他生前最後時間裡，眾多子孫在身邊陪伴他，甚至有非常可愛的、第四代小孫女拉著他的手，他老人家是多麼幸福！

當時，我內心一直在掙扎，要不要編一個美麗的謊言，告訴他：習近平批准他回國了！我終究沒有這個膽量。我對老爺子最大的歉疚，便是我沒能讓老爺子最大的心願得到實現。

在過去十幾年間，我窮盡我的一切關係，通過有門路、有聲望的民間人士，也通過有權勢的官員，一次又一次討論老爺子回國安居，至少是回國看一下的可能性。很多次，回應是正面的，因為老爺子沒有謠言中的經濟腐敗問題，也沒有參與或支持政治組織反對中共，而老爺子在香港的巨大聲譽，他的回國可以使中共收穫好評。然而，有最高權力者擔心得罪江澤民、李鵬，也有最高權力者顧忌政治連鎖反應，使很多朋友的居中努力都沒有結果。

今年5月份，一度最接近可能。因為相當高級別的官員，透過朋友表示願意安排老爺子回國，甚至探問很多細節，包括老人是否能上飛機、是否需安排專機。然而，到了最後，得到的最高指示卻是：向許家屯表達善意，可以回國安葬。

雖然我早就對這個體制不抱任何希望，但這個答覆還是使我沮喪到了極點。我不敢向老爺子提及此事，我不想在他愉快享受天倫之樂的時間裡，內心再度泣血。對他略有點安慰的是，北京的善意的確有所表達，五月份，一個五人小組專門來看望了老爺子，並詢問了有什麼意願。

一位百歲老人能有什麼意願？他除了已經享受到的天倫之樂，

便是葉落歸根! 老爺子, 你的這個願望沒有能在生前實現, 是你的遺憾, 也是你的榮耀, 這是你為了良知付出代價的最好證明! 這不是鮮紅的大公章, 這是你用你的心你用你的血照耀了中國的文明進化之路。

所以, 我們今天來這裡向你告別, 還有幾百萬香港人在懷念你, 幾千萬甚至幾億中國人內心存有對你的敬意。

所以, 良知不只是付出代價, 更可以收穫榮耀。許家屯先生, 我們痛惜你的遠去, 我們也欣慰你的內心不再泣血, 而是安息!

許家屯先生, 我們數十年忘年之交終結於此刻, 我們不能再為世俗政治而爭吵。但是, 歷史開始了。我希望你在天堂改變說法: 何頻思想雖然很反動, 寫我的悼詞還可以!

(2016年7月11日洛杉磯)

何頻

## 許家屯生平

許家屯，原名許元文，1916年3月生於祖籍江蘇省如皋縣李堡鎮，曾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港澳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許家屯年輕時即已向往革命，曾與後來成為他夫人的顧逸萍等人共同參與進步文學團體“春泥社”，發表作品，宣傳抗日救國。1938年4月許家屯加入中共，曾被



卸任解放軍軍職的年輕許家屯。

派往第五戰區李宗仁所部從事兵運，之後任江蘇省東灌沐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部部長、中共地下黨如西縣委書記、泰州縣委書記、蘇中區第三地方委員會書記。國共內戰中任華東野戰軍第11



縱隊第 33 旅副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第 29 軍第 87 師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許家屯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1954 年 10 月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1956 年 3 月起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7 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革中許家屯受到衝擊，1967 年 1 月下放五七幹校勞動。1970 年 12 月復出，重新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並任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革結束後，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許家屯在江蘇工作期間，在全國率先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扶持先進典型，使江蘇成為全國觀摩學習的對象。包括時任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在內的各省領導人均曾前往取經；他的工作能力和開放胸襟，也得到鄧小平、胡耀邦的賞識。

1983 年，許家屯在年過退休年限之際，被中央派往香港，成為香港回歸前中共在港的最高代表。他在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任內，致力於糾正左傾錯誤，廣泛團結各界人士，參與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詮釋中共的“一國兩制”，使中共在港人心中的形象大為改觀，促進人心回歸，從而為後來香港平順回歸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許家屯是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1985 年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許家屯在中共高級官員中，最早明確、系統地提出“學習資本主義”。他撰寫的《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覺建設社會主義》一文，發表於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引起廣泛重視。無可避免地，許家屯的開明作風和思想，為當時中共當內一些極左人士所不容，



許家屯百歲壽辰。

遭到各種攻擊。尤其是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接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周南，百般抹殺他的功績，莫名構陷，無所不用其極。許家屯在人身安全面臨威脅的情況下，於 1990 年 4 月下旬，經友人安排前往美國旅行休息，之後一直旅居洛杉磯地區，直至以百歲高齡辭世。許家屯一直恪守其對中共的承諾，從不透露他所掌握的黨內機密，不忘維護中共的形象。

旅居美國 26 年間，許家屯在家人精心照顧下，過著平靜的生活，對外界針對他的惡意誹謗淡然處之。他仍然關注中國的改革、

建設與兩岸關係，關注香港平穩回歸和保持繁榮，同時思考人類如何汲取歷史教訓，開拓世界前途。此期間，他的著作《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和《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出版，對後人研究相關問題極具價值。

許家屯先後多次向中央有關領導人要求回國定居，葉落歸根，也得到過一些領導人的積極回應。但遺憾的是，最終未能實現這一願望。許家屯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凌晨在洛杉磯家中安詳離世，享年 101 歲。



毛澤東視察江蘇，許世友（右）和許家屯陪同。



許家屯（右）與鄧小平、卓琳夫婦。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江蘇省革委會領導成員合影。中為許世友，右二為許家屯。



許家屯陪同葉劍英觀看少年兒童表演。



許家屯(前右一)陪同胡耀邦(前右三)參觀。



胡耀邦(左一)與許家屯在一起交談。



鄧穎超(左)與許家屯交談。



1985年7月5日,許家屯與彭真在一起。



許家屯(左)與楊尚昆。



1988年2月13日，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左一）與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家副主席王震在一起。



改革開放之初，趙紫陽主政四川時率領黨政幹部到江蘇來取經，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家屯（右二）陪同。



許家屯顯然與江澤民話不投機。



前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視察棉花試驗田。



許家屯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許家屯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時出席外事活動。



許家屯(左)同香港富商李嘉誠交談。



香港中華總商會餞別許家屯退休，許家屯致辭感謝。

第一輯  
孤獨中的悲壯



## 許家屯在美國安詳去世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先生，今天，2016年6月29日凌晨0時12分，在美國洛杉磯家中安詳辭世，享壽101歲，多位子女和親屬隨侍在側。

許家屯先生曾長期在江蘇省擔任領導職務，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起，在全國率先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成為全國觀摩學習的對象，包括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在內的各省領導人前往取經；他的工作能力和開放思想，也得到鄧小平、胡耀邦的賞識，在年過退休年齡之後，被派往香港，擔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

許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間，糾正左傾錯誤，促進人心回歸，廣泛團結各界人士，詮釋中共的一國兩制，使中共在香港的形象大為改觀，為後來香港平順回歸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許家屯在中共高級官員中間，最早明確、系統地提出學習資本主義，撰寫《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覺建設社會主義》一文，發表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上。

但是許家屯先生的開明作風和思想，遭到了當時中共一些極左人士的圍攻，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接管他的職務的周

南，抹殺他的功績，對他莫名構陷，在人身安全面臨威脅的情況下，1990年4月下旬，經友人安排許家屯前往美國旅行休息。

許家屯在美國期間，仍然關注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關注香港平穩回歸和保持繁榮，思考人類教訓，展望世界前途。著有《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和《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

明鏡媒體多次採訪過許家屯，了解到他在過去26年旅居洛杉磯期間，一直恪守對中國政府的承諾，拒絕透露他所掌握的黨內機密，在家人的精心照顧之下，過著平靜的生活，對外界針對他的惡意的流言蜚語，淡然處之。

許家屯多次向中央有關領導人要求回國，葉落歸根，也得到一些領導人的積極回應。但是遺憾的是，最終沒有能實現這一多年願望。

《明鏡郵報》記者 高伐林，明鏡新聞網

# 許家屯子女： 我們敬愛的父親走了

我們敬愛的父親許家屯，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 0 時 12 分在美國南加州家中安詳辭世，享年 101 歲。

他老人家臨終之際，多名親密朋友和我們一起隨侍在側。

父親不久前曾和我們及部分親朋好友歡度百歲生日。近來數月因身體不適曾入院就醫，但一直神志清醒，思路敏銳，關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和世界各地局勢，懷念家鄉故土。我們兄弟姐妹來美探視他，彼此都非常愉悅。

父親 1990 年來美旅遊休息以後，一直得到眾多好友和社會各界包括新聞界的關心、支持與愛護。他心存感激，不斷提及。我們在此以全家名義，謹表最深謝意。

我們將擇日為父親舉行家庭追思會，具體事宜均由陳馬克 (Mark Chen) 先生全權負責，電話 626-284-4570。

明鏡新聞網

## 《紐約時報》訃聞：許家屯

反對軍隊在 1989 年鎮壓天安門廣場一帶的民主示威活動，並於次年逃往美國的共產黨高官許家屯，6 月 29 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奇諾崗去世，享年 100 歲。

家人透露他死於腎臟和心臟衰竭。

和他的生平一樣，許家屯的去世也充滿政治意味。作為對其 1990 年出逃的懲罰，他被開除黨籍。其子許建在洛杉磯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許家屯回國的願望一直未被批准。他的家人大多留

在中國，包括其妻顧逸萍。



海外中文新聞媒體網站上的照片顯示，一些著名的中國政治家族獻了花圈，包括趙紫陽的家人。作為自由派的前總理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許家屯有

良好的關係。

但中國國內未正式通報許家屯的去世。《財新週刊》的網站刊登了一則消息，但隨後便被撤下。

在一篇悼詞中，身在紐約的明鏡集團出版人何頻表示，中共領導人拒絕了許家屯生前回國的請求，但傳話表示他可以回國安葬。

許建稱，許家屯出生於 1916 年 3 月 10 日，兄弟姐妹共五人，父親是一名基層政府官員，母親一直居家。

許家屯於 1938 年加入共產黨，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擔任公職。10 年後，他加入華東野戰軍，擔任師政委。1949 年的革命結束後，他成為中共在江蘇省會南京的官員。

許家屯的妻子於 2004 年在南京去世，兩人有五女三子，九名孫子孫女，還有幾名曾孫。

和許多官員一樣，他在文革期間飽受磨難，但後來當上了江蘇省委書記，並因幫助創辦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當地企業而聞名。

許家的朋友金建一說，上世紀 80 年代初，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提議，讓已經到了退休年齡的許家屯繼續主持工作。金建一的父親是香港一份親北京的報紙——《文匯報》的總編輯，同時也是許家屯的政治盟友。

金建一說，但江蘇的其他一些官員表示反對，結果許家屯在 1983 年被任命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當時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這一任命讓北京方面在那裡有了一個代言人。

在香港，許家屯曾告訴當地電視新聞記者陳潤芝，他和有著各種不同背景的人吃過飯，其中包括反共人士和企業界大亨，逐漸意

識到人們對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有多擔心。

許多中國官員的觀點與此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香港人急於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

和趙紫陽一樣，許家屯希望以和平的方案應對 1989 年的民主運動，並公開表達對支持抗議的香港市民的讚許。然而，數以百計——也許是數以千計——的中國抗議者遇難。時年 73 歲的許家屯提出了退休申請。

然而，金建一說，他被免除了職務，放在新華社辦公室裡的私人文件也受到了審查。

此後，他待在與香港毗鄰的深圳等待命運的裁決。1990 年 4 月的一天，金建一說他在“外出散步”的時候越過邊境去了香港，並從那裡前往美國。

許家屯明確告知美國官員，他不會以機密信息換取庇護。

“他們在他那裡一無所獲，”金建一說，“為他提供庇護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

“他堅守秘密的原因，一是他出國時曾經對中共承諾不泄密，二是希望保護他留在國內的家人，”何頻說。

“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出於一個共產黨員的信仰，”何頻說，“他一直相信共產黨的理想是對的，只是犯過錯誤。”

狄雨霏 (Didi Kirsten Tatlow), 《紐約時報》中文網

# 父親晚年的孤獨 給人悲壯的力量

——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

**編者按：**2016年7月11日中午，許家屯追思會在美國南加州柯維納(Covina)草木蔥蘢的森林草地墓園(Forest Lawn)舉行。近百位來自美國、中國和香港的親屬和友人，齊聚一堂，緬懷這位老人。許家屯的兒子許建等親友在會上發言如下。



許家屯的兒子許建在追思會上發言。(明鏡記者高伐林攝)

尊敬的各位親友，各位來賓：

首先，我代表我們全家，衷心感謝大家今天來到這裡，與我們一起追思過去，悼念我的父親。感謝你們和我們一起分擔悲痛，與我敬愛的父親做最後的告別。

我的父親 1916 年出生於江蘇省如皋縣李堡鎮，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 0 時 12 分安詳離世，享年 101 歲。

親愛的父親，我們相信您沒有走遠，相信您還可以感知蔓延於在場每個人心中的悲痛。此時此刻，深深愛戴您的兒女都在您的身邊，關心您的親人、朋友也都來到這裡為您送行，和我們一起再一次回顧曾經共同度過的艱難的、幸福的歲月。

迴首浮生心已倦，欲解負累期百年。

父親早年投筆從戎，從那一刻起，他就以中華民族的復興事業為己任，坎坎坷坷，轟轟烈烈。

父親經歷過民族戰爭的殘酷，品嚐過事業成功的喜悅，感受過俗世人生的沈浮。

父親以“疾草”自詡，不與大樹爭高低，不與鮮花比香艷，只是默默地儘著本分。

父親沒有奢望，沒有索取，甚至很少憤怒。

父親是佼佼者，偶爾稍稍伸展修長的身軀，從不理會暗處投來的嫉妒目光。

父親勇敢而無私，也許歡樂，也許痛苦，他總是將豐富的情感默默的埋藏在心靈的深處。



父親的一生都是那樣的努力。世界給過他很少的愛，他卻付出了全部的愛，世界給過他太多的遺憾，他卻竭力修飾美化著世界。

父親的晚年或許有些寂寞，但他把這種寂寞當成一種休憩、一種積蓄、一種沈醉、一種享受。

父親的晚年或許有些孤獨，但這種孤獨也會給人一種悲壯——一種以身殉道式的悲壯，令人極為感動，在催人淚下的同時令人感到一種風雷激蕩式的力量。

父親一生胸懷坦蕩，待人寬厚，作風民主，敢於堅持，從未因人生中的成功順利而忘乎所以，也從未因人生中的困頓失意而沮喪言棄。

作為父親，他對我們始終滿懷著火一般的激情，海一般的關愛，蜜一般的溫柔，春一般的慈祥。

親愛的父親，您的一生是歷經坎坷飽嚙風雨的一生，也是多姿多彩波瀾壯闊的一生，在一個世紀的歲月裡，您譜寫下了太多太多的光彩奪目的動人篇章。

令我們無比感動的是，百年的人生之路直到生命盡頭之時，堅定而純粹的信念仍然是我父親唯一的追求和永恒的精神支柱。即使在生命最後的一刻，我的父親也始終保持著對痛苦的克制和對生命的敬仰。

父愛如山，巍巍厚重，父愛似海，遼闊寬廣。

父親的叮嚀與關愛，我們歷歷在目，父親的教誨與訓誡，我們銘記在心。父親用博大深沈的愛，鋪墊著我們的人生之路，教導著我們要執著和堅強。

即使在今天，親愛的父親，您也不會與我們分離，因為精神力量的延續，才是人類存在最偉大的意義。您的兒女都會繼承您正直、自強、奮發的品行，會延續您清白為人，踏實處事，認真付出的作風。您的睿智通達，如同暗夜明燈，將一路啟迪、引導著我們，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一百年的風雨歷程，遊子身已倦怠。該走的路都已經走完，所有的執念也已經放下，從此往後，真正的自由得以安享，公義的冠冕將為您存留。

鍾山暮紫，巍巍蒼茫，崢嶸一別，唯話清涼。

親愛的父親，願您從此安享人世百年間剛直堅韌的豐厚回報！願您從此不再有任何的痛苦和辛勞！您的音容笑貌，您的不屈精神將永遠存留在我們子孫後代的心中！

在父親人生最後的時光裡，那麼多的親朋好友多次前來探望，給予父親巨大的安慰和精神力量，你們使我的父親享受到了人世間最難能可貴的情誼。請允許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全家向你們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親愛的父親，您一路走好。

許建

# 他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信仰

## ——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

今天是一個悲傷的日子，更是我餘生難忘的日子。因為從我少年時代就認識、相交超過了半個世紀的許伯伯終於永遠地和我們告別了！

雖然我們都知道人的壽命是有限的，自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人生總是要有告別的一天；雖然我們知道對於他的年齡而言，這應



金建一是原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兒子，父子都與許家屯關係密切。  
(明鏡記者高伐林攝)

該算是喜喪；但是想到已經百歲的許伯伯在兩個月前還是那樣中氣十足、和我們談笑風生，想到他第一次出院後的第二天把我叫去說要成立一個讀書會，我總覺得要和他告別的那天還很遠、很遠。所以今天當他駕鶴西去，魂歸故土，我們覺得突然，心裡還是萬般的不捨，很難接受這個現實！完全沒有做好要和他告別的思想準備，一時間簡直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腦子裡空蕩蕩的！

許伯伯和我父親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父親的上級領導。我和許伯伯的兒子許閩從中學的同學，到一同下鄉插隊的知青。我們是上下兩代人的交情，我在他家裡住過很長的時間。

當年許伯伯和我父親在工作上或者對一些問題上的理念上常有分歧，大家據理力爭、互不相讓，有時候我父親急得面紅耳赤，許伯伯則笑而不語。我父親從不逢迎拍馬，許伯伯也從不以上壓下。在外人眼裡，按今天的官場常態，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世俗的交情，但是他們兩個卻是可以生死托付的知己，當中沒有絲毫涉及功利的關係，這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他們的友誼看上去似乎水波不興，平平淡淡，其實內裡波瀾洶湧。

記得 2004 年我父親病危之際，許伯伯趕來探視。我在醫院樓下等他。他剛打開車門看到我就已經熱淚盈眶，走進病房後見到昏迷中的父親，他顫聲喊道；老金！你一定要醒過來，我還要等你來打麻將呢！就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讓我們在場的兄妹們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也許是天人感應，在許伯伯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裡，也是我們



金建一夫婦和妹妹，為許伯伯和父親在天之靈重逢而欣慰。（明鏡記者高伐林攝）

來往最密切的時期。我領著不少在美國的江蘇老鄉來看望他，陪他喝故鄉的洋河酒，和他一起回憶家鄉的點點滴滴。此時，許伯伯表現出驚人的記憶力，也充分表露出他內心對故土的關切之情。他自始至終堅持自己的信仰，一生都在努力思考如何實現他為之奮鬥終身的理想，直至到臨終前幾天。我非常欽佩這個有堅定信仰而不口是心非的老人！

今天我們夫婦受我母親的委託——因為她已經 96 歲高齡，從她住的地方到這裡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所以不能親自來送別許伯伯——要在這裡代表我們金家的全體成員（我妹妹今天也來了，許

伯伯曾出席她的婚禮); 在這裡和許伯伯做最後的告別, 並向許伯伯的子女親屬致以我們最深切的慰問! 祝願許伯伯一路走好, 祝願許伯伯和我父親兩個老朋友的在天之靈在闊別了 12 年之後又再重逢, 繼續討論、爭論、打麻將……

許伯伯安息吧! 許伯伯千古!

金建一

# 一個“八零後”眼中的 許家屯

——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

在過去的數年中，我有幸陪老人一起度過了許多時光，可能是我的江蘇口音能讓老人回憶他的家鄉，也可能是我和老人相談投機，老人把我當他自己家的晚輩來疼愛，如今斯人已去，老人的教誨卻猶在耳邊，我想我有責任跟大家說一說，我，一個“八零後”眼裡的許家屯。

我眼中的許家屯可以用兩個關鍵詞來形容，“深沈”和“忠誠”！

深沈，是說老人對於他的國家的深沈的愛。老人和他的祖國一起走過了一個世紀的風雨，在他的國家國難當頭、生死存亡之際，正值青年的許家屯毅然投筆從戎、抗日救亡；當他的國家百廢待興、步履蹣跚之時，中年的許家屯艱苦奮鬥、孜孜不倦；當他的國家對前進方向迷茫的關頭，老人不計個人得失，敢為人先；而在他的黨犯錯誤的時候，老人堅持正義、固守良心，被迫在古稀之年遠

走他國二十餘年；而當今天，在中國這片老人和他的同志們奮鬥終生，用汗水、心血、青春、生命澆灌的土地上正在開出最美的花的時候，老人卻在異國他鄉，悄然離世。

老人曾經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回到他的祖國，看看祖國這二十多年來巨大的發展，坐一坐高鐵，真真切切地看一看，他為之奮鬥一生的國家終於國富民強，重新成為傲視世界的雄獅！而他並沒有這樣的機會，我想這是老人這一生最大的遺憾吧，但又是這份遺憾，讓老人那份跨越了百年時間、萬里空間的對祖國的愛，顯得更加深沈！老人的一生從沒有辜負過他的祖國，所以我更相信千千萬萬和我一樣的他的祖國的後輩，也一定不會辜負老人對祖國明天殷切的希望，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繼續努力奮鬥，至死不息！

而老人對於他信仰的忠誠，又可以從老人的一句話裡充分得到印證。在和老人剛相識的時候，我問老人：“共產主義在現實中有可能實現嗎？”老人這樣回答我：“共產主義就是追尋人類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事業，一百年達不到就兩百年，兩百年不行就三百



張力在許家屯追思會上發言。（明鏡記者高伐林攝）



年，共產主義者就是人類追尋真理的殉道者！”說到這的時候，老人眼圈通紅，身體因為激動微微顫抖。這句話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因為它並不是教科書式的口號，而是一個為這個理想奮鬥了終生，又在晚年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不能落葉歸根、甚至要在異國他鄉了卻殘生的老人，在堅定地訴說他對他信仰的自豪與忠誠。

那天晚上，我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有一種真理的追隨者，無論他們受到怎樣的污衊和攻擊，當你接近他們的時，依然會被他們的崇高與無私深深折服！

我想許家屯並不是因為他曾經的位高權重、叱吒風雲而偉大，甚至也不全是因為他的種種政績功勞而偉大，但正是他這種對於他祖國深沈的愛和對於他的信仰絕對的忠誠，讓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我由衷地相信：未來的某一天，當中華民族完成偉大復興的那天，我一



許家屯家中懸掛千家駒書贈的書法作品，錄高適詩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定會再去老人的故鄉，去他的墓旁，對長眠在故鄉懷抱裡的老人說一句：“如今盛世，如你所願”！

最後，我想用老人書房裡一幅書法為老人送行：“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我相信在許家屯的前路上，一定有他的同志，他的領袖，他的黨和中華民族古往今來千千萬萬和他一樣的愛國者們！

張力

## 从石板路起步的百年探索

2016年6月25日早晨，我和明鏡集團總裁何頻接到電話，說昏迷數日的許家屯剛剛清醒過來，指名要見何頻和我。我們兩人立即離開洛杉磯市中心附近一個會場，驅車前往座落在洛杉磯東郊 Chino Hills，趕到許老床前。他的小兒子許建拉著他的手說：

“李堡小學助學基金的事您放心，已經安排好了。”許老微笑說好。許建問還有什麼事情要交代？許老說：“沒什麼交代了。”何頻說：“您身體恢復了，我們再商量您出書的事。”他說：“等我休息半個月一個月。”他還想見另外一位朋友李大明，我告訴他大明路遠一時趕不過來，但很掛念許伯伯。許老嘆了口氣說：“你們是好人啊！”

### “石板路不拆了”

見他應答正常但聲音微弱，我決定給老人一點小刺激。我對著他的耳朵，一個字一個字說：“剛看到新聞，您老家李堡的石板路不拆了，要保護起來。”他突然叫了聲“好”，聲音清晰洪亮。我不由暗暗鬆了口氣，因為我深深知道家鄉李堡以及鎮子內石板路在他



許老與老梁。

心中的位置。

許老 1916 年在江蘇如皋縣李堡鎮出生，雖然李堡早已改屬海安縣，但他終生聲稱自己是如皋人。聽他描述過多次，我對鎮子裡的石板路也了解不少，知道南北

大街東西大街交叉處是最繁榮的地段，知道東西大街部分路段彎曲、有幾個位置的石板下面有空洞，更知道東街頭盡處再走一小段，就到他家當時租住的東嶽廟。他父親做事的警察局，他自己就讀的李堡小學，也在這附近。這段石板路正是他百年人生之路的起點，難怪他刻骨銘心。

因為家道中落，他小學剛畢業就隨父母到揚州，從此遠別李堡。國共內戰初期，他在作戰途中經過李堡。中共建政後他雖然長期在江蘇任職，但受周恩來影響，有意迴避家鄉，只在一次下鄉途中在李堡短暫停留，見河川城郭都不復舊時風貌，石板路東嶽廟也無從尋覓，隨即匆匆離去，然而李堡長在他心底。就在 25 日清晨，他醒過來開口就問：“我現在是在香港，還是在如皋李堡？”

過去十多年間，我常有機會與許老聊天。我稱他許伯伯，他叫我“老梁”。久而久之，“老梁”成了許伯伯和相關親友對我的專用稱呼。蒙他信任，我幫他整理過一些文字，包括他對往事的回憶和

對世界局勢的思考。聽了將近三百小時的錄音，加上數不清的竟日長談，我不僅習慣了他的蘇北口音，也逐漸熟悉了他波瀾壯闊的生平。為了核對有關地名和空間分佈，我打印出許多地圖，有蘇中各縣地圖，郭村戰鬥、黃橋戰鬥、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態勢圖，進軍福建路線圖，直到蘇北水利工程圖，等等，厚厚一沓。看著這批地圖，如同看到許老留在大地的深深足跡。

也許在許多人眼中，許老到香港前一直順風順水，20歲出頭就擔任縣委書記，不到40歲就出任南京市委書記。在他之前擔任同一職務的依次是劉伯承、粟裕、柯慶施，還有老資格正省級幹部惠浴宇。在南京市委書記任上，他因大膽與學生對話平息風波，獲毛澤東當面表揚，不久後升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此時他剛40歲。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他被任命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成為重要的地方領導人，後來又以67歲的高齡身膺重寄前往香港，應對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而事實上，從1942年到1952年這十年間，許老經歷過三起三落。

### 十年間三起三落

他1942年在如西縣縣委書記任上，突然被批評犯了“地主路線”錯誤，降職為分區農工抗日救國團團長，但不久後復職任泰縣縣委書記，這年年底又升任三地委副書記。

1946年下半年共軍主力由粟裕率領轉移到蘇北、魯南後，蘇中地區的主要城鎮被國軍占領。時任一地委副書記的許老，在地委、

分區主要領導率大部分武裝撤退到東台縣時，被指定任南縣工委書記，帶領一個加強營在泰州、如皋、泰興、靖江一帶堅持。面臨對手的強大兵力和嚴密的封鎖，許老創造性地提出“避洋擊土”方針，即避開國軍主力，打擊被稱為“土頑”的還鄉團。他靠偵聽電台掌握動向，率部每夜行軍“跳格子”，避開國軍的掃蕩，還兩次長途奔襲，打擊盧港、周莊頭兩地還鄉團。艱苦轉戰數月後他帶部隊到外線休整，突然又遭批判，說他放棄原地鬥爭。結果他被調到主力11縱隊第31旅任政治部主任，變相降職，不過不久後升任師政治委員。

他第三次挨整發生在1952年，當時他任福州市委書記，正在領導展開“三反五反”運動，卻突然遭大會批判，說他“貪污”、“與省委分庭抗禮”。後來他“貪污”的罪名雖然得以澄清，但還是遭降為省委工業部副部長，直至1954年調任南京。

三次遭批判，事前都毫無徵兆，而挨批降職後，每次都很快復職並且獲擢升，許老晚年提及這段經歷仍然覺得不可思議。我曾經提出一個假設：許老頭腦靈活，做事充滿激情，老上司葉飛上將曾誇他“生龍活虎”。許老赴美旅遊休息後葉飛出版回憶錄，仍不避嫌疑稱讚許“有工作能力”。主意多敢做事的人，遇到惜才的上司脫穎而出的機會自然多，然而遇到循規蹈矩的上司挨批的可能性也大。早年如此，香港歲月更如此。勇於任事、大膽拍板的許家屯，在習慣於“外事無小事”的外交部、港澳辦一眾官員眼中簡直是另類，不挨整才怪。

聽到我這番話，許老點頭認可，說自己個性中有“英雄主義”，

失敗成功都與此有關。所謂“英雄主義”，在中共話語系統中定義為“個人英雄主義”，其實就是高於常人的膽略和銳氣，往往在艱難複雜的環境中凸顯。許老當年敢赤手空拳組織抗日武裝，敢在敵後穿插周旋，1949年身為師政委敢於主動率領先鋒營渡過長江天險，盡顯英雄本色。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敢於推動鄉鎮辦企業、成功打造蘇南模式，到香港後力排眾議打開局面，直到以73歲高齡決定赴美旅行休息，支撐他的依然是“英雄主義”。正是靠過人的勇氣，他在歷史上寫下不可磨滅的一筆。

### 我害得老人痛得不可開交

我跟許老來往較多這十多年，是他絢爛歸於平淡的時光，昔日的功業已遠去，勇氣的鋒芒已收斂。在許多人眼裡，他如同一位開朗慈祥的鄰家老人。平時一起餐聚，他總是叮囑要多點肉菜，因為我兒子能吃肉。結帳時他不忘吩咐多給小費，哪怕偶爾服務不盡人意也如此。在他面前，我總忍不住調皮本色，時常開一些出格的玩笑逗他。

2007年許老在家中摔倒，左手腕骨折，肺部被折斷的肋骨刺傷。我與李大明十分擔憂，去醫院探視他幾次。老人的生命力真是頑強，不多幾日就基本康復出院。我們一到他住宅，他就迫不及待問：“你猜我打了麻藥之後夢見什麼？”我未經大腦回答：“夢見毛主席了。”他哈哈大笑，扯動未癒合的傷口，痛得不可開交，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他一手按著傷處，一手輕拍我手臂示意沒事，繼

續大笑，笑完後才描述他當時的幻覺。

還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說許老 1977 年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以濃重的蘇北口音讀出“硬骨頭六連”幾個字時，引發全場大笑，於是我請他說給我們聽聽。老人忸怩良久，終於未能拒絕我們一再央求，慢慢說出那五個字。從此學他說“硬骨頭六連”成了我們餐桌上的保留節目，他聽了只是笑，有人學得太離譜他還糾正一下。

## 他信仰的共產主義

與許老接觸多的朋友都知道，許老的魅力遠不限於他的隨和、寬容、樂觀、健談。他過人的記憶力時時令人驚嘆，而他的求知慾望與探索精神，直到他目力喪失聽力衰退的暮年，依然綻放奪目光彩。每次與他交談，我都必須全神貫注，隨時準備回答他的提問。他的問題包羅萬象，從孔孟之道的核心、易經與道德經哲學的異同，到民主與共和的區別、美國印第安人人口的變化，上一分鐘問什麼是“叢林法則”，下一分鐘就要解釋對衝基金。我經常被考住，只好隨身帶電腦，即時查詢再回答。許老問這些問題並非獵奇，而是為了印證他正在思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幾年他一直不停思考探索，構思一篇大文章，試圖總結 20 世紀以來戰爭與和平的經驗教訓，找出融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優點的方式，提出人類和平發展的思路。

許老終身信仰共產主義，不時招來或明或暗的批評。然而依我看，他信仰的共產主義，未必與批評者心目中的定義相同。許老



說過，他記得文化大革命前傳達過毛澤東與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紀要。蒙哥馬利問毛，共產主義後面有沒有其他主義。毛回答說，有其他主義，但是什麼主義我不知道。許老激賞毛的回答，認為毛作為共產黨領導人敢於說共產主義還要被其他社會制度取代，真是高瞻遠矚，超越歷史。無獨有偶，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中，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句話：“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可見當時中共黨內開明派高級幹部，對共產主義的認識有所深化。對許老而言，信仰共產主義，無非是他堅持不懈為人類前途思考探索的動力。

### 五年計劃要改成兩年計劃

今年5月8日許老乘車到我家，說他估計自己時日無多，原先訂的五年計劃要改成兩年計劃，盡量多表達想法，以早日成文，這番話令我動容。一星期後他因腎衰竭影響心臟而送入院搶救，數日後出院，23日又約我長談。何頻和另外一位朋友專程從紐約前來探視許老，25日上午我陪他們抵達許宅時，老人已經穿戴整齊等候許久。那天許老談興很濃，說話依然中氣十足，思維清晰而有條理，繼續展開他上次未談完的戰爭和平主題。談到世界進入智能時代，他引用不久前阿法狗戰勝圍棋高手作例證，折射他一直關注時代進步。午餐時他陪大家喝了一杯江蘇的美酒“夢之藍”，我告訴他，網路上有人呼籲保留李堡的石板路，他讓我有進一步消息就告訴他。



老梁專程去許家屯的家鄉江蘇李堡鎮，拍下了石板路今天的景象。（老梁攝）

我去年初曾到江蘇一遊，其間專門去了李堡。踏在許老細細描述過的石板路上，找到他出生地東嶽廟的遺址，我拍了一組照片，回美後請他看。雖然他限於目力無法看清照片，但聽我講述石板路的現狀時興奮不已。他說他就讀李堡小學期間就喜歡看報紙，關注時事、憂國憂民的習慣一直不變。說他的百年探索始於李堡石板路，絕非虛言。

6月28日深夜我得到消息，許老的生命體徵逐漸消失。儘管何頻兄事先告誡過大家，老人高齡安詳辭世是喜喪，我們不要用眼淚為老爺子送行，但我想到再也沒有機會聽許伯伯暢談，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大笑，禁不住悲從中來。午夜剛過，噩耗傳來。我想，許伯伯落葉歸根的願望生前未能實現，此刻他已獲自由的靈魂想必重返故鄉李堡，徜徉在他魂牽夢繞的石板路上。

老梁，《明報月刊》

## 初心不改的 “老布爾什維克”

洛杉磯的七月，正值風和日麗、令人愉悅的度假佳期，但在東郊柯維納的森林草坪紀念園，在那座名為“心靈憩所”（Sanctuary of Inspiration）的弔唁大廳，莊嚴沉重的氣氛卻使人感受到深秋般的悲涼。備受尊崇的世紀人瑞許家屯走完了漫長的人生旅途，此刻就安臥在鮮花簇擁的靈柩中。我肅立棺前，凝望老人宛如酣睡般的面容、輕撫他身上那件熟悉的紫紅色唐裝絲綿外套，想到這便是永恆的訣別，禁不住淚如泉湧。廿多年來與他的親密接觸、從中獲得的教益與啟迪，點點滴滴，盡在心頭。

從 1994 年開始，我經由著名史學大師黎東方教授引見，有幸與許家屯相識。之後便以中文媒體記者的身份，先後百餘次探訪這位傳奇人物，或陪他周遊各地：從聖地亞哥到墨西哥，從海濱社區到內陸小鎮……我先是獵奇般地“挖”獨家、“掘”秘聞，繼而卻被他的凜然氣節與博大襟懷所折服，終於成為他的忠實聽眾與忘年之交，去領教他的新語宏論，分享他對時局、對歷史的精闢分析。回頭細想，老爺子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正是他人活百載，初心不改，

抱定信念去憧憬未來。

“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唐高適詩）許家屯1990年為避禍出走美國，以“旅行休息”的名義寓居洛杉磯，但地球另一邊的神州故國，無時無刻



2013年李大明採訪許家屯時留影。（歐偉建攝）

不讓他夢牽魂縈。胡錦濤在總書記任上打開兩岸關係的僵局，他擊節讚賞，撰文推崇；四川汶川大地震死傷枕藉，他獨對熒屏，默哀垂淚；香港回歸後屢生波折，他發表評論，激濁揚清。總之，他雖身處萬里之外，卻鮮有投閒置散之日，讀報刊、看電視，照樣是每日的功課。約朋友前去傾談國內國際諸般大事，每每慷慨激昂，竟日不歇。最後幾年視力聽力均告減退，他就將電視機音量調到最大，“聽”CCTV的新聞播報。

許家屯曾多次聲明，他出走海外是不滿當時領導人背棄傳統、敗壞黨綱，同時為自己爭得公開辯護的權利。對他22歲就加入的共產黨、對他身居高位、服務畢生的國家，依然深愛逾恆。雖然被褫奪了黨籍與官職，他照舊以共產主義為信仰，並以此規範自我。

因此，他謹言慎行，不但避免接觸海外異議團體與西方情治部門，而且嚴格保守他曾經掌握的國家機密，唯恐被人利用，貽害民族復興大業。他多次對好奇的探詢者表示：“對不起了，有些事情只能爛在肚子裡。”直到彌留之際，也未透露這些機密的片言隻字。

2005年，適值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我請他憶述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之際，他所在的新四軍蘇中根據地有何反應。他告訴我，當時延安的中共中央第一時間電令旗下的八路軍、新四軍迅速奪取日寇的武器與資材，“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他通過根據地的電台收聽到上述指令，馬上集合部隊，展開行動，一舉收復江蘇多座縣城，從日偽軍手中繳獲大批戰利品，成績可觀。可是，當我據此寫成一篇報導，交他過目，他經過深思熟慮，竟然扣下，不准發表。因為他認為所寫雖是事實，但會予人“共軍搶地盤”的印象，可能影響中共在台灣民眾中的聲望，不利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故不發為妙。

許家屯在中共體制為官多年，未到“而立”就擔任地下黨縣委書記、地委書記，31歲指揮“華野”（華東野戰軍）一個旅，未幾升任解放軍的師政委。中共建國後，仕途依舊順暢：33歲出掌福州市委，38歲擔任南京市委書記，40歲進入江蘇省委常委會。文革中難免“靠邊站”、下放勞動，但很快復出，61歲官拜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成為真正的“封疆大吏”。1983年，67歲的許家屯超過退休“紅線”，卻被鄧小平欽點，赴香港接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對外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如此官運亨通，靠的當然是忠誠的政治信念、豐富的工作經驗

與過人的博聞強記。這是“一斛涼州”的奸佞之徒所無法描畫的鴻圖。政治信念已如上述，至於工作經驗，我在陪同他走訪美墨邊境中也有有趣的體會。我們路過墨西哥的一片農田，他只需捋一把麥穗，就估計出畝產幾何。若無長期深入鄉間、腳踏實地的生活積累，何來這般“神算”？享譽全國的“新農村建設一面旗幟”——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就是許家屯在省委書記任內扶持的先進典型。難怪華西村黨委書記、全國勞動模範吳仁寶晚年訪美，也要不懼謠言、不避嫌疑，專程到洛杉磯拜訪許家屯。

許家屯整整活了一個世紀，至少到 99 歲時，仍處在頭腦完全清醒的狀態中。他的眼、耳、腿腳在期頤之年不免功能減退，唯有大腦一直保持“正常運轉”，記性奇佳。比如，某次見面他借給你一本書或一份文件，下次見面會問你“看完了沒有”。還有一次，他與我等幾位晚輩討論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對撥亂反正的貢獻，談及當年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在座的每個人搜索枯腸，都想不起此人的姓名。許家屯一邊繼續交談，一邊開動腦筋回憶，大約 20 分鐘過後，他輕拍桌子，喜形於色地說：“想起來了，他叫馮文彬！”

還有一次，我特意將採訪許家屯的地點安排到聖地亞哥東郊的溫泉度假村，在林蔭深處的百年小屋聽他講述新四軍蘇中根據地的創建經過，並邀他的私人助理李海倫以及一位為他治療的女中醫作伴。談到深夜時，大家不約而同哼唱起當年的《新四軍軍歌》，但我這個晚輩唱完頭兩句“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孤軍奮鬥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勳”，就記不得下面的詞與曲了，唯獨已屆耄耋之年的許家屯能夠一字不漏，從頭唱到尾。

可見戰爭年代金戈鐵馬的歲月，永存在他的胸臆中。正是這些信念、天賦與歷練，成就了一位標準的中共高幹，一位如假包換的“老布爾什維克”。

26年的光陰倏忽消逝，許家屯的思鄉之情與日俱增。近幾年，他開始透過不同管道，向北京高層提出回國定居、落葉歸根的請求。習近平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回國之事一度有如曙光乍現，許家屯為此興奮不已。他不顧年高體弱，特地安排了一次紐約與台灣之旅，以測試自己能否勝任長途飛行。2015年3月，他過99歲生日時，我們為他在北聖地亞哥的“御品酒家”舉辦一次簡樸的壽宴，席間他滿懷熱望地許諾，一旦獲准回國，將帶我們去陽澄湖品嚐大閘蟹、去揚州享用正宗的獅子頭……我當時為他拍攝了一張含笑吃壽麵的照片，此後竟被無數媒體反覆轉載，幾成“經典”。

令人扼腕的是，這番蒞鱸之思始終只停留在想象中，世紀老人許家屯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磯寓所溘然長逝。正可謂思鄉歸不得，“日近長安遠”。

許家屯病篤期間，我曾多次前往探望。他表達



許家屯吃壽麵。(李大明攝)

了“出院後開一個記者會”，向大眾回顧自己一生的願望，並徵詢自由撰稿人梁國雄兄與我能否做他的“特別發言人”。我們當即應允，請他放心。但之後不久，他就陷入昏迷狀態。據家人介紹，老人最後一次從昏迷中醒來，張嘴就打聽三位最熟悉的媒體人來了沒有。他提到的三人，就是美國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梁國雄兄與我。

斯人已逝，風範長留。忝為忘年交之一，我自會將“老爺子”的音容笑貌與淳淳教誨銘記在心。將來祖國的首都若能為許家屯補辦悼念活動，我定不辭遠行，在他靈前再哼唱《新四軍軍歌》，再致上最深的敬意。

李大明，《明報月刊》



## 即使出走也不失忠誠

出走美國的前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今年 6 月 29 日在美國逝世，終於可以完成葉落歸根的心願。據悉，北京允許許家屯的骨灰可以送回中國。這位被開除了黨籍的中共忠誠老黨員，早年出走時承諾只是請假旅遊，26 年後完成了這漫長的海外旅程要回到祖國了。

許家屯的骨灰已經安放在美國家中，等待起程回國。子女們正在許家屯老家江蘇如皋為他整理安息之處。許家屯的太太也安葬在此，他終於可以與分隔數十年的太太“團聚”了。

因為和前總書記趙紫陽一樣，肯定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許家屯需避走美國“旅遊休息”。他向鄧小平、楊尚昆請假，說是旅遊休假，一走就是 26 年。在我和他十多次的訪談中，晚年許家屯唯一的心願就是葉落歸根，這種願望非常強烈。在他病重期間，北京得到消息，派出五人代表前往表達善意，也表達了可以葉落歸根的中央意見。沒有想到的是，真的是到許家屯“葉落”後才能歸“根”。

## 生前很關心香港事務

即使人在國外，不在其位，許家屯生前還是很關心香港事務。2012年採訪許家屯，正值特首選舉，問他唐英年、梁振英之爭，他會支持誰，他很認真的說，我不會說，不想給香港添亂。其實他自有想法，自有觀點，真的是不想影響香港。

去年年初到美國訪問許家屯，談到占中後的香港，他表示，現在在香港阻力也很大，這是國際性的阻力，所以我說：“現在（中央政府）處理的很好。”（紀：那梁振英呢？您覺得？）許家屯說：“梁振英無所謂，主要是中央的政府，他只是奉命，我看這個人本事不大，我在的時候就沒有看中他。我在香港的時候就沒有看中他，我挑選人的時候沒有他。”

但上面他對梁振英的評論，文章刊出時被他刪掉了，原因也是不想添亂。

問到許家屯，他挑選人的標準是什麼？許說：中生代，第一條就是要能幹，要老實，不是什麼愛國愛黨的意思，但是要對共產黨沒有惡感，比較能夠聽話。都是比較普通的標準，沒有什麼馬列主義，從馬列主義去要求這些人，相差太遠，不可能。“你要從香港實際出發，毛澤東講的，到一個地方，要深悉民意，要看這個地方的人民喜歡什麼東西。要適應他們，首先要適應，然後才可以做工作，你不適應，怎麼能做工作？所以，要合流，我當時提出來，‘出污泥，合流，不合污’。”



香港著名媒體人紀碩鳴前來拜訪，許家屯暢所欲言。

### 北京派人到許家屯家探望

據悉，北京來人在他病情少許好轉出院後，到許家屯的家探望，問老人有何要求，他卻閉口不講要求，而是大談“道德經”，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葉落歸根本來就是人性，是道德。

這位 1938 年入黨的老革命早已經被開除出黨，但他臨終前還認定這個組織，在病重送往醫院時告訴親友，將他的病況告知北京中辦，希望讓總書記習近平知道。對許家屯來說，雖然在非常時期“申請”外出旅遊，但還是遭到開除黨籍處理，不過許家屯仍然忠誠於這個黨。

他多次對我表示，並不後悔所做的一切，“我也不會明哲保身，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不能完全從公出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但公與私發生矛盾時，私服從公還能做到的。”許家屯後來被開除了黨籍，但他沒有放棄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信仰，自認“還是一個非黨的馬克思主義者”。

長期養成的黨性原則讓他一直堅守着自己的底線。有北京來人願意將他的意願帶給高層，他表達了落葉歸根的想法，並保證低調行事，也不要求恢復黨籍，原因竟然是“畢竟我出來後也拿過人家的錢”。

### 回憶錄獲 35 萬美金稿費

許家屯出走時倉卒，身上僅帶 1 萬港幣，機票也是兒子幫買的，後來是新聞人陸鏗幫忙聯絡寫文章在《信報》發表，許家屯感謝《信報》老板林行止，第一篇文章就給了兩萬美元稿費，以後寫書，獲得 35 萬美金的稿費，解決了他的生活問題。很多人聽了許家屯的故事表示，像他這樣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現在很少，出走的腐敗官員，哪個不是數千萬，數億的。有誰出走，還像他那樣給中央寫信請假的？一走之後，人都找不到。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也是經再三斟酌，他多次對我說，都想來探聽他知道秘密，“但有些東西不能講，要保密，作為革命者，我沒有放棄理想。有些講出來會影響大局，我講出來，不是為當局添麻煩嗎？而且，我不僅要考慮北京，我要替中國革命考慮，為中華民族考慮，我出來已經添了亂。”

他說自己的《回憶錄》是充滿了情感和理想的，認為可以公開，可以講的才講，不該講的堅決不講。“共產黨在香港的情報組織，有哪些人，你能講嗎？我在香港，大陸所有的情政組織我是一手抓的，是統一領導的。但我不能講，講了不是亂了套？”問他，梁振英

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笑而不答。

回憶錄中很多問題沒有觸及到。許家屯對我說，保留很多，而且有些東西今後也不宜講的。說是沒有什麼東西不能講的，我看，世界上不能講的東西多了，我這裡就有很多。

### 解開達賴喇嘛的一個謎

曾經多次採訪達賴喇嘛，有一個謎一直無解。1954年，年輕的達賴喇嘛來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並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他離開北京的前一晚，國家主席毛澤東深夜11點把他叫到他的住處，穿着睡衣拉着達賴喇嘛的手說，非常喜歡他，以後有任何事情可直接向主席報告，一定會第一時間回覆他。

1959年，解放軍要進西藏，達賴喇嘛連續給毛澤東發了三封電報都沒有回音，直至他往南準備逃走時還停留了10多天等待毛澤東的回音，一直無果，最後被迫離境出走到印度。

許家屯告訴我，1954年他曾經在南京接待過達賴喇嘛。1959年，就在達賴喇嘛在西藏南部等待毛澤東的回覆時，南京接到了北京的文件，要求各地不得阻止達賴喇嘛，讓他離境，離開中國。原來，毛澤東並不想留下達賴喇嘛，所以根本不會給他回覆。許家屯說，如果再見到達賴喇嘛，會勸說他擁護祖國，不要搞分裂。

不是共產黨員，許家屯對黨同樣忠誠。

紀碩鳴，《超訊》月刊

## 許家屯和西康路

重返南京西康路，從頭至尾走了兩遍，覺得又短又窄。這個民國首都的核心路線，這條原國民黨大佬的貴府道，這個江蘇省委機關的幹部街，不再是當年那寬大幽靜的大道，道邊停滿了車子，那些我們經常攀爬的法國梧桐樹，已是粗壯如缸，揮臂遮天，一個省委機關幼兒園孩子對西康路的感受已一去不返。



西康路停滿了車，已經喧鬧嘈雜，這是許家屯每天上班的路，也是我們每天上學的路。

西康路的東頭，右拐就是江蘇路，再北拐就是許家屯原來的家。現在這棟灰頭土臉的宅子活像戰後的碉堡，靜靜地躺在樹棵裡，破舊不堪。

許家屯對我來說又親近又遙遠，親近是因為據說我就出生在他們家的平房裡，遙遠是因為自他老人家去香港工作就再也沒見過他。父親當年是許家屯擔任南京市委書記、省委書記時的秘書，他說，因為我的出生，省委管理局給了我們家分配了南京靈隱路 13 號的兩間房子，這些漂亮的房子都是國民黨的高官留下的庭院，院內有花園、假山、地下室。

歲月不留人，父親卻走在了許家屯的前面。就在父親的遺物裡，還有幾張許家屯年輕的照片，我在美國的時候就想將這些照片還給他老人家，因為人們會從這位 90 老人年輕的照片中看到故鄉的影子。

這張年輕的許家屯是拍攝於福建，下角壓著“福州市總工會”的鋼印，照片的背面有父親的親筆註釋。父親說許家屯和彭沖都是從福州來江蘇，許家屯是由福建回到故鄉，彭沖是由故鄉來到江蘇。他們曾經是 29 軍的師首長，是葉飛和馬天水的部下——怪不得他到北京開會後總愛去大會堂的委員長辦公室。

許家屯回到故鄉後，就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父親就是在那個時候成為許家屯的機要秘書。50 年代末，毛澤東到江蘇視察，父親按照許家屯的指示看守電話值班。期間，毛澤東接見大家，當許家屯介紹工作人員到父親時，父親幸福地上前握住毛澤東的大手，哭出了聲，眼淚不住地流淌。父親在多少年後回憶這段往

事時，依然激動如初。父親說，我們家祖上是雇農，小的時候和村裡的孩子一起玩耍，撿了塊泥團砸中樹上的鳥兒，地主的孩子說“你們家沒有地，你連撿到泥團都是我家的，所以打下的鳥兒也是我們家的”。就是這句小夥伴刻骨銘心的譏諷讓父親參加了革命。所以，當身材矮小的父親，在仰視毛主席的時候，想到自己世代的苦役和毛主席的恩德，怎能抑制澎湃的心潮！父親告訴我，自己的小手被巨人寬大的手緊握，一股暖流頓湧心頭，直感到是在和神握手。只聽毛澤東親切地說：“都很年輕嘛，是兒童團的吧！”在場的人都笑了。“兒童團”這是父親一生最最自豪的稱呼。

我兩周歲的時候，據說在門口玩耍，看到家對面琅琊路小學放學的孩子，便隨之走出家門，一直向中山碼頭走去，失蹤了4個多小時，最終母親在三牌樓附近的派出所裡將我找到。許家屯得知母親當時懷著即將生產的弟弟，挺著大肚子，騎著自行車沿街尋找，立即吩咐父親和其他工作人員分頭去找，在公安局、派出所的幫助下，很快得到我的線索，在聽父親說到兩歲半的孩子徒步十里路後，大家都說：這麼小就自己走這麼遠，真是革命的後代！以後許家屯見到父親時還問：那個差點走丟的孩子怎麼樣了？當時的父親說：上完大學後進到北京部委機關，現在在中南海裡工作。父親說這孩子可是我們家祖祖輩輩第一個大學生呀！許家屯會意地說道：要好好培養。

文革時我們住到了西康路。那天父親突然被辦公廳的造反派同事帶走，當夜下著大雨，我們在睡夢中被大人的爭執吵醒，我跑到父母的房間，看見幾個穿著軍雨衣的人正在翻看父親的筆記



本，隨後統統扔進身後的麻袋裡，母親在和他們理論。他們如同在打掃衛生，將書櫃裡的書籍扒拉到地上，埋頭尋找著秘密。我握緊拳頭，大聲問：為什麼拿我們家東西？那個低著的腦袋從牙縫中擠出“這是組織上的事”，母親趕緊用身體把我擋住。一年後，我作為“反革命”家屬參加了幹校宣傳隊，我是最小的成員。到五七幹校巡迴演出，終於在養豬場見到父親。看到父親已經缺掉兩顆門牙，我熱淚盈眶，以為是造反派打的，父親哈哈大笑，“孩子，這是解除隔離後會餐時讓骨頭給硌掉的，沒事，是紀念~”後來父親就帶著兩顆假牙去見馬克思了，在我的心底，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是這樣？到第四天演出，下邊坐了好多熟悉的伯伯阿姨，我的一曲《紅燈記》唱段“謝謝媽”，博得許多掌聲，許家屯說“小公雞會叫了”。

1978年華主席同意在當年可適當招收小兵，以照顧幹部子弟。我所在的29中學，一個晚上就走了一半學生，西康路上幾乎家家有參軍的，因為這裡軍區和省委的孩子太多了。這些13至15歲的孩子在深夜集合送往新兵連，我先去了廣州，準備被派往55軍參加新兵集訓，但由於這項政策執行差錯，我們很多同學在一個月後，穿著沒有領章帽徽的的確良軍裝羞愧地回到家裡，而留在部隊的同學中有兩個在來年的中越戰爭中犧牲。事後父親告訴我，這事幸好許家屯沒幫忙說話，不然你就退不回來了，回不來就要上前線。

許家屯很快繼彭沖後成為省委第一書記，這時父親去工業部門任職，也常去許家串門。許家屯共有八個孩子，一頭一尾是兒

子，他的長子許甸也常來我們家，可能是他和父親年齡相近，又在農村長大。1976年我母親被迫害致死的那年，許甸來安慰我父親，追悼會那天，許家屯和夫人顧逸萍送了個大花圈，為在場人震驚，其時許家屯正任省委書記，母親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因此也老實了許多。

那年下半年唐山地震，西康路的居民們都在馬路上搭起防震棚，那時許家屯就住在江蘇路上的老房子裡，每天他上班多數是走路，多是從西康路我們家前的人行道上走過，他和其他的省委書記不同，上班手上不拿毛選語錄之類，每當他匆匆走過，路邊總有人會議論省裡又開會了。冬天的時候，他往往喜歡披著軍大衣，敞著扣子快步急行。從某種意義上說，許家屯是工農幹部，父親說許家屯身上有衝勁，許家屯在工作困難的時候會拿出他渡江作戰的勁頭，平時也會講起他參與大軍渡江的故事。我想他是那種聰明好學、順應潮流的工農幹部，他的蘇北鄉音很重，記得有年在五台山體育場宣讀“硬骨頭六連”命名時，“硬骨頭六連”的讀法實在讓人捧腹大笑。

我就一直住在省委邊上的西康路，我們兒時的小彈弓不知打出多少小石子，再也不會有富人譏諷我們撿別人家的石子，這些公家的小石子後來都鋪成為西康路林蔭的馬路。我無意中上過的琅琊路小學、29中學後來竟都成為省裡的重點學校。

因為在國務院機關工作的緣故，許家屯到“宮裡”來匯報工作我大多知道，有時還在國務院某樓道裡撞上。公元1989年春天，他曾經來京找過中央，還有，在人民大會堂的某委員長辦公室

用紅機子給那國家特大領導打電話，那無奈無望的形色、無畏的執著至今讓人難忘。

有趣的是，突然有一天許家屯在香港時的外事秘書成了我的同事，他是因為許家屯出走被“處理”。因為他和我父親正好是許家屯一頭一尾的秘書，我們就親如一家，看到那些靠污蔑、打擊許家屯得官升官的人，已經見怪不怪了，因為那些一肚子男盜女娼的退役太監，也只能靠拿許家屯的個人私生活說事才能發泄內心的肮髒。

如今，我們作為翻身人家的後生學子，重歸西康路，感恩至盡頭，迷失在過去，惆悵不如初。

肖寒，新浪博客

## 人間再無許家屯

作別 101 歲仙逝的老友許家屯，明白在他已經是喜壽，從歲數上算起來，他比他的政敵活得長久多了。這也導致在他公祭前一天的親屬告別聚會中，場面沒有那麼悲戚。

對政爭，我了無興趣，說得俗白一點，哪派得利也都是某圈子內幾個人，最多幾十個人的私事，波及到再嘍囉的哪一堆也絕不惠及於我。故此，我的追悼，專為友情。

這一天也是我和老爺子的貼身秘書 Helen 好幾年分別後的第一次見面。近年來知道她跑國內比較多，也就約略疏於聯繫。好在她的微信一直在。

許老在去世前幾個星期出現過一次病危，那時候我就曾專門致電 Helen 細問病況，得知許老的身體最終算是虛驚一場，只短暫住了幾天醫院就回家療養了，也就放下心來，哪知沒過多久，卻等來了突如其來的噩耗。

再次致電 Helen 的時候，她說著說著就會哽咽難言，26 年的風霜雨雪，一朝離散，痛徹心扉。

所謂 Helen，正是被傳說成“許家屯情婦”的單勤。她的名字

曾為單琴，但文革等等動蕩中被來回改過幾次，最終落實為“單勤”。

單勤出身軍幹家庭，自己也曾是軍人，既舉止幹練，也性情溫慧。多年來，對許老所謂“紅粉知己”的揶揄一直隱隱在耳，在當今中國，遑論高位官宦有著擇不清理不順的婚外野史，就是普羅大眾，除了一介了不得的窮酸，私生活也基本上翻騰不得，這麼說吧，問問你自己，就知道答案了。那麼，在這個層面上指摘他人的陰差陽錯，是否過於虛偽？

Helen 人生的立面，就在這重重譏諷中度過了幾乎全部的大好年華。

髮小樂律師曉明之父官當四處，北京、南京、上海都呆過，在北京的時候他家跟我家重合，我雖與他年齡相差不少，卻也將就勉強挨個“小夥伴”的邊。而樂叔在南京軍區任職的時候，樂律師又正好和 Helen 構成玩伴關係。

他比 Helen 年紀小了幾歲，卻具備對資深美女的鑒賞資歷，他



樂曉明律師和 Helen，是南京兒時的玩伴。

說他們當年一夥半大孩子都對那些歲月的 Helen 容貌之美讚譽有加，追憶中說 Helen 那時候就已經膚色新潮，人稱“黑牡丹”，是南京軍隊子弟中遠近有名的美人。

這些淵源其實都是我後來盤點清楚的，作為一個在洛杉磯辦報多年的“老地頭”，許老和 Helen 抵洛未幾，我們就結識了。

記得有次和 Helen 兒時的玩伴樂律師一同到許家去，吃飯的時候我面前的筷子有著少見的根部多道彎樣式，那是顯而易見的家常筷子，烏木製作、用得有些起毛，當時忙於寒暄，未曾第一時間評價筷子。

飯菜擺齊，賓主動手，這時節低頭剛想就筷子的造型先評價一番，卻見不知何時我面前的筷子已經變成一次性的那種平淡。

這其實也是我家的做派，是不給客人使用家常筷子的，這既是彼此尊重，也是彼此衛生。

由此，知道許老的晚年，其實穩定踏實。

唯一的不踏實在於許宅位於奇諾崗某高爾夫球場周邊，熟知高爾夫球場種種的我，有時候就很擔心場內飛球直抵房內，事實上高球場周邊住宅受到臭手亂打威脅的事故真的頻有發生。

臨到許老人生之末的最後幾年，Helen 看護得根本就是寸步不離，她告訴我，“我連出門買菜都提心吊膽，生怕老爺子自己在家裡摔一跤”。

世間情感，升華之後自然而然得讓人感動。

Helen 在我面前一直稱呼許老為“老爺”二字的，這種叫法隨意而直白，也讓德高望重的真實歷歷在目。

許老經歷極為不俗，生平再述雖是贅言卻也必須。

許家屯，江蘇如皋人，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政後，曾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1983年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屬中共黨內開明和改革派人士，1989年因支持“六四事件”中的學生而前往美國“旅遊休息”，開始了長達26年的流亡生涯，2016年6月29日病逝於洛杉磯家中，享年101歲。

更巧的是，我的最正牌髮小一家和許家屯其人也有極大關聯，此次知道我要去弔唁許老，該家長子給我發來長長留言，目光流轉於來自千里之外老鄰居的字裡行間，覺得天下確實太小。

留言中，髮小傾訴如下：

“謝謝你參加他的儀式！他曾是我父親的上級。戰爭年代行軍時他倆常並排走，輪流念小說。有一本小說是我爸在渡江前借的，叫《基督山恩仇記》，他們一邊走一邊念。這本小說據說留在了南京軍區。金門之戰後29軍撤消了，許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我父親去福州軍區，從此分開。但我媽轉業後在福州大根區委，還屬許的下級。許去香港後得知我父親工作不順，曾發調令讓我爸去香港。因中組部內部已有爭論，把這事搞黃了，後來再未相見。當年我媽參加過調查會，聽取許報告香港工委情況，深知上層鬥爭激烈，矛盾極大。現在這些老人都走了，不勝唏噓。你參加紀念許的儀式，令我不勝感激！請帶上我的心。”

許家屯的祭奠分兩天，第一天是親友祭奠，第二天才是公祭。

私密祭奠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凝視許老的時機，當獨自一人面對

許老的時候，內心止不住流淚不已，我向來不屑專門仰視輝煌，只知道自已認真前來告別的，是住在我鄰城的忠厚長輩，也是和我有著各處暗合的慈祥故人。

脫離了高職的許老平素無疑是寂寥的，去他家裡，看到的許老都處於一種很多言說卻無人可言的局面。他是個運籌帷幄深奧事件大半生的人，猛然賦閑在家且與決策脫鉤，有些時空錯位。平素的他永遠面帶微笑，這常常讓人忘記他曾經權傾一世，想想看吧，當年的他在江蘇、他在香港，一言九鼎，極盡隆重。記得有一次我約了幾十位僑界人士在洛杉磯我家聚會，預先就跟 Helen 講好她和許老也到，結果眾人翹首以待的時候，門口晚晚出現的只有 Helen 一人，我當即請聚會中的兩位商業大佬驅車奔去許家再度恭請，許老最終還是到了。

記得那一整夜，許老一直都在和一位洛杉磯重量級僑領密坐懇談，把茶細酌。

那些個分分秒秒，看著老人寂寞全解，我極高興。

許老還在的二十多年歲月裡，我周圍斷續能聽到有人神秘地流露自己“和許老爺子打過麻將了”，言語中頗多與有榮焉。

八十多歲之後的許老因為眼底病變，視力極差，幾無麻局。92歲那年他在我家最後一次嘗麻，結果我把家裡的三盞檯燈齊齊打開對準麻將上碩大的字，許老卻還是無從瞄清，眾人掃興之餘只好作鳥獸散。

這其實奇也不奇，九十之年，還想怎樣？只是看著許老自始至終的微笑相當心疼，知道這位滿腹卷宗的老人可真就此走向真正的



暮年。

兩天的追悼中, Helen 紅艷奪目的獻花都被放在無可比擬的位置, 看過去基本上就是直置許老懷中。這是一個極有高度的認可, 一路走來的海外歲月長路, 抹平許老家族八個子女外加十幾個孫子女的關係, 多有學問。



Helen 送上的紅玫瑰。

如果不是十多年前我的報社接到一份來自許家孫輩以“懷念爺爺”為主題的投稿, 我其實不清楚當時許家內部也有嫌隙, 好在這麼多年過去, 共生共榮、休戚與共, 把這個大家漸漸融合, 累積親情。

在許老第二天的公祭儀式上, 我正好坐在 Helen 側後的位置, 之前一直瞄見她淡定自若地在追思教堂中張羅各項公祭細部, 看到我時, 她略顯驚訝, 說是“以為你今天不會再來”。

這怎麼可能? 在向逝者告別的重要環節中, 主持人著重強調只是“直系親屬”集體上台的時刻, 我特別注意到 Helen 基本上充當著一路親屬的領銜, 並被推舉為直系親屬中的第一位獻花者, 記得這二十多年來多少次和 Helen 長談, 感覺中她雖然有過為難卻始終心思堅定。如今的她也年過六十, 在這樣一個官宦大家坐穩交椅, 她必定歷盡艱辛。此次見到 Helen 也曾私下裡問過她的未來, 卻見

她滿面哀戚，無從回答。

巧的是在第一天的親屬祭奠中我不期然遇到了不少熟人，其中大牌首推明鏡集團的頭目何頻。這廝已經徹底發福，卻依舊聰明過人，講著一口堅決不改、甚至似乎還有點為之沾沾自喜的湖南口音，如果長得再天圓地方、身軀偉岸點還真有點毛澤東那麼個意思。

何頻是跟我糾葛超過二十年、關係微妙的“亦敵亦友”，他也是跟許老因左右立場對立而吵鬧二十多年的忘年交。我曾見過幾次他們之間的舌辯，親眼看到許老在跟何頻大力爭辯中卻流露出來愛意滿溢，為此我當時還稍感錯愕，剛看清楚橫互在兩人之間似有還無的意識隔膜，卻也知道他們的情意從未因爭執破功。

我曾說過許老去世前曾經病危過一次，那一次何頻就從紐約趕來，幾周後的這一次又見他忙亂左右，不知道他是根本沒走還是



公祭中直系親屬上台跟許老做最後告別，右二白衣者為 Helen。

返頭折回。公祭時聽到何頻一再檢討自己未能在許老生前將老人回國事宜與國內高層溝通辦妥，聽他再三表示自己已盡了最大努力，我這才深深明白在野二十多年，許老這一拂袖而去，折損了無可言說的幾乎全部關係鏈接和上達出口。

兩天的祭奠中，許老的生平圖片及簡歷一直用大屏幕播放出來，超過三分之二的配樂原始到僅僅是民樂演出的《一條大河》，穿插的另一樂曲是《新四軍軍歌》，曲調很中國，也很左，聽說是許老生前的音樂最愛。

公祭未完時，我預設的鬧鐘悄悄地響了，提醒我按照日程要帶著兒子小歐四處奔學，塵世間的瑣碎如此，跟追思縹緲的意境滿攆，有時候人站在陰陽兩界就會有些懵然。

當天的公祭預計在三點鐘結束，之後的遺體火化時間定在了三點半，跟許老就此揖別，雖是必然卻總突然。

得知國內上層已經應允許老骨灰回國，則當然為他高興，路線鬥爭的苦果他一嘗 26 年並客死他鄉，他當年的政敵也早仙逝，還要怎樣？

那個夜晚回到家中，一張張回看著現場的後續照片，感受周遭氣溫乾熱的一如既往，我把身心放沈在椅子正中思緒空靈兼心知肚明，人間再無許家屯。

陳燕妮

## 遵循《基本法》 “一國兩制”的好官

許家屯先生辭世，百歲人瑞，人生無憾。本人乃香港普通百姓，只因許先生在港工作一段時間，耳聞目睹，感到他是個忠心為港，執行《基本法》“一國兩制”的好官。

1983年，許家屯以江蘇省委書記身分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黨內為港澳工委書記，擔當確保香港回歸、順利過渡時期的重要領導工作。抵港時，大批傳媒到訪，許身穿不算太稱身西服，帶著茶色墨鏡，與一般高幹無異。許到港後，擴張新華社規模，增配大量人手，購入皇后大道東一座原為酒店的多層大廈為總部。

中央訂下爭取港人人心的政策，首先要安定人心，一再強調“馬照跑、舞照跳”，除了外交、國防外，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新華社上層幹部全身心投入公關工作，許家屯專訪香港富豪及知名人士，每月起碼與李嘉誠、包玉剛等重量級人物聚會一次，每年出席工作午餐高達近600次，聽取他們意見。社內設有多名副秘書長專門聯絡各社團統戰。

許任內就港人憂慮及存在的問題如實向中央反映，其中最著

名的，就是大亞灣核電廠及將香港交由港英託管的建議。大亞灣離香港只有幾十公里，港人憂慮建核電廠安全問題，建議上達鄧小平，鄧批評建議幼稚；至於轉達香港商人提出以 100 億港元交由港英託管十年的建議，更被高層一口拒絕。

六四事件後，趙紫陽等開明派黯然下台，當局秋後算帳，開始清算同情學生民主運動的領導幹部，許家屯受到中央嚴厲批評，被免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職務，調回國內退休。繼任人為周南。周南大力整頓新華分社，力圖消除許的影響力。履新酒會上，周南對前任舊社長不屑一顧，令同台的許家屯尷尬，連在場採訪的記者也看不過去。

周南要求中央規定許退休後只能住在北京，不能如許所願住在深圳，以免影響周工作。文件移交時，周南扣下許的私人文件，扣下許在新華分社應得的工資。許返回深圳後驚聞已成立專案小組，專門對付他。

許深知黨內鬥爭規矩，對不同政見的自己同志的追剿，絕不手軟。好漢不吃眼前虧，用許自己的話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許的有職銜高官的紅色護照已被收回，幸普通公務護照仍在身，短短幾天內辦妥簽證，平安到達美國，投靠星雲大師的西來寺。

周南對許追殺未停止過，在他的回憶錄說，許向中央要了 1 億美元來辦企業，說許任用親屬，企業沒辦成，1 億美元資金變得無影無蹤，意思是說許中飽私囊。其實許並沒有帶錢來美，大概他真的沒有錢，否則他來美後也不會叫兒子開口向香港富豪借錢（富豪真的借了）。他用撰寫回憶錄的版權費，在洛杉磯東面奇諾岡新市

鎮，購入一座房子棲身。

許家屯說過香港是本難以讀懂的畫，謙稱自己還沒讀懂。無可否認，許先生是愛港並對香港有深刻認識的中共高級幹部。離港調返回內地前，他表示在港工作六年，從未坐過香港地鐵，想坐坐見識一下，體驗港人生活，其副手張浚生以“不太合適”為由勸阻，令許先生錯失接近港人的最後機會。許先生在港非常忙碌，但他盡量抽空接近香港居民。他喜歡聽香港歌星唱歌，兩次去紅館看徐小鳳演出，也出席過林子祥、鍾振濤的演唱會。

許先生算是帶悲劇色彩的人物，加入共產黨後，一帆風順，做到高官。六四事件中被打沉下去，但不失為國際風雲人物。在美國他也沒閒著，聽說他第二本回憶錄已完工，未知有否更多爆炸性內幕真相？

六四事件後一年多，我從瀋陽乘巴士南下，途經一個叫許家屯的小市鎮，原來該市鎮名字確實與許先生有關。當正值抗日危急關頭，該鎮村民群起參加抗日鬥爭，寫實作家艾蕪因此著有《咆哮的許家屯》一書，鼓舞中國人抗日。在該書感召下，許先生投入抗日革命戰爭，將自己名字改為“許家屯”。由咆哮而起抗日，逐步成大人物，再出走美國，成為作家、思想家和不輕易表態的政論家，讓事業另創新天地。

謹以此文字編成一朵小花，敬上靈堂，說一聲：許先生，我們敬愛您！

鄭子（洛杉磯），世界新聞網

## 持義居異國，故里一心存

中國網上流傳一首悼念許家屯的五言古詩，並附注釋。作者不詳。

哭許家屯

驚聞鄉賢逝，百歲許家屯。  
海闊雲邈杳，落葉不歸根。  
哀哀憶往昔，鐵車入京門。  
痛心疾首者，倉皇夜出奔。  
新貴升東階，玉帶染血痕。  
持義居異國，故里一心存。  
遙遙廿六載，朝夕向帝關。  
耳聾目半瞽，悲聲和淚吞。  
淚盡思不絕，何處可安魂。  
人慟天同哭，夏夜雨傾盆。

## ■ 許家屯留下的秘密 ■

注釋：許家屯，江蘇如皋李堡（今屬海安）人，吾岳父之族兄。曾任江蘇省委書記，香港新華分社社長。27年前京華慘劇，香港《文匯報》開天窗刊四字：“痛心疾首”。

2016.07.02.





追思儀式上兒女孫輩的花牌花籃簇擁許家屯靈柩。



許家屯最近的親人坐在第一排。



追思儀式多人致辭深深打動大家。



追思會一角。



兒女們向許家屯獻上鮮紅、潔白的玫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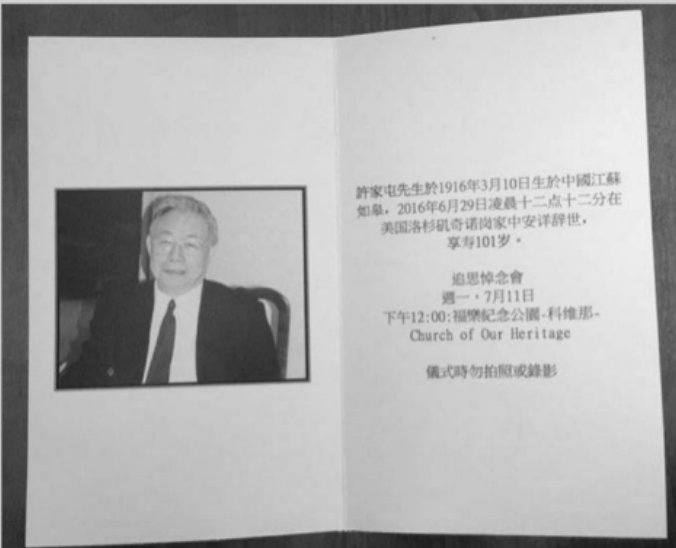


忘年之交閻淮、何頻獻花最後告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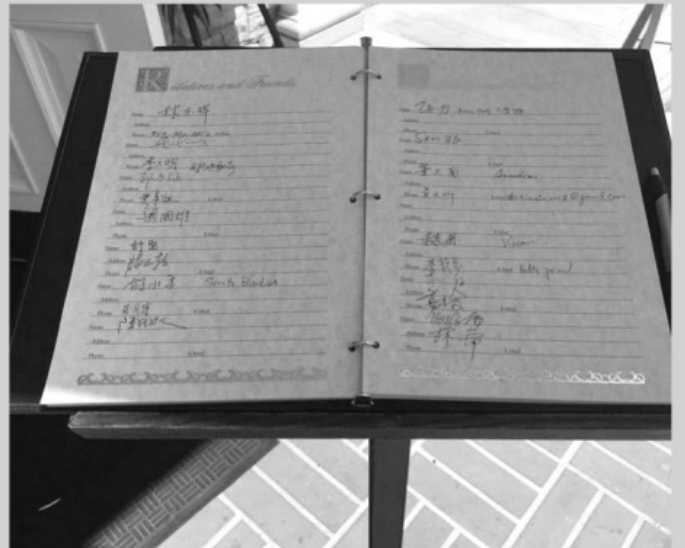


許家屯晚年交往密切的何頻、金建一、梁國雄、李大明等人，扶棺移靈前往火化。

許家屯的兒子許建手捧父親遺像走完最後一程。



許家屯公祭請柬。



公祭簽到簿。



願許家屯在天之靈安息。



吊唁者慰問親屬。



即將蓋棺，親屬兒女向老人行最後注目禮。



正式追思會前一天家人的小型告別式簡約清雅。




親友凝神觀看許家屯生平視頻，緬懷他不尋常的一生。



親友起立默哀。



每位吊唁者都有與老人交往的深長記憶。



**第二輯**  
**私人秘密和政治秘密**

## 沉默的許家屯

我們一群人在互相調侃、歡笑的時候，他和鄰座的老人一樣常常沉默。外出吃飯的時候，他有時忘了帶助聽器，有時帶了助聽器電池卻沒了電。一位常和他聊天的“紅二代”趕緊去買了電池，裝上之後他卻說“有時能聽見有時聽不見”。我說這電池是“中國製造”，就是不能讓你什麼話都聽見。他哈哈大笑，這是幾十年前很多香港人熟悉的笑聲。馬上，他便開始攻擊我：“你是壞人！不——你昨天說得對，我們是敵人！”

二十多年來，我們沒有停止過爭論。無論是他到我美國東部的家，還是我到他美國西部的家，我們很多時間都在為時事，更多的時候為不同的價值觀而激辯。很多朋友目睹過我們的爭論，他雖然有時候氣得滿臉通紅，甚至怒髮衝冠，但用詞依然能保持他自認的“客觀”。我畢竟比他年輕了一半，氣盛，而且常常為了刺激他吐出真言，故意用語極端。

**共產黨高官中有沒有好人**

有一次，我們爭論“共產黨高官中有沒有好人”。我說：“沒有。”他怒了：“我也是壞人？”我答：“如果不講很多假話、不做很多違心事，甚至不對同志落井下石，有誰能升為共產黨高官？”他真的被氣壞了，第二天起來居然還在流淚，他說想了一晚我講的話，沒有睡一分鐘覺。

當然更多的討論，會引起他長時間的回憶，或者很平靜的評點。正常情況下，他隨口而出的話似乎也有職業性的拿捏。追問下去，他會說：“我的回憶錄沒有寫到這點”，“我死也不會說的”。這主要涉及到中共在香港的秘密布局，以及對台灣的情報工作。他自己認為，正是這部分工作，他接受當時國家主席楊尚昆指令不要移交給他的繼任者周南，所以周南報復他，才迫使他不得不決定暫時到美國“旅行休息”。

他現在不願意接受媒體的訪問，理由是不要給香港增加困擾。“我當時和反對派領袖有很深的私下交往，經常吃飯，觀點不同，彼此了解、能夠溝通。當然現在情況不同了，有些亂了。”他說時下香港是“小亂”，也會有“中亂”，但“大亂”不起來，因為有軍隊在。

“九七”之前，北京就對香港的變數，有幾套應對預案：“我們的人到處都在。”

他也不願意談論參與的對台工作細節，但承認他兩次派秘書去台灣見領導人。有一次，他請畫家范曾給台灣領導人畫一幅畫。

“范曾真是聰明人，他送來一幅關公畫，披著紅袍。”傳說中的關公披的是綠袍，披上紅袍，便是寓意中共。

## 沉默常常是他的回應

十多年前，他便將私藏照給我翻印了一套。那些照片中，有他和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等中共頂層人物的合影。談及和這些人物的交往，尤其是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他依然保持一種敬意。他講起有一次單獨去見陳雲，陳雲從寬大的辦公室走過來，“老革命家呀，我一時激動得都不知說什麼好……”他說，“你們不會理解的，你們的眼睛裡沒有國家領導人。”



何頻給許家屯當“專職司機”。

的確如此，我們在餐桌上恣意談論天下時，奧巴馬或者習近平只能當作笑料。即使是完全聽得見，他也懶得參與我們的“胡說八道”。直到幾個小時後，回到房間，他會略帶激動地斥責：“你們批評習近平，你們比習近平還行？”

照顧他的女兒許榕給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刺激老人家了。我也老實很多了。兩年前，他突然從洛杉磯坐了六小時的飛機飛到紐約我家，他說：“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這次，我飛到洛杉磯看他，陪了他幾天，去中餐館、去海邊，去聖地亞哥。告別他時，

他取下看電視的耳機：“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面。我們是忘年交，觀點上的敵人，感情上的朋友。”

我有些感動，也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幾年前有一次，老記者陸鏗來看他，在他家等了幾小時，就是希望跟路上堵車晚到的我聊上幾句，那成了我和陸大哥（陸鏗喜歡自稱大哥）的最後一面。陸大哥與他是多年老友，雖然他也抱怨過陸大哥將採訪胡耀邦不該公開的內容公開了，作為那場訪問的安排者，他現在主要是傷感：“他真是大記者。這樣的記者現在沒有了。”

這次去聖地亞哥時，他也幾次提到晚年生活在當地的歷史學家黎東方。黎東方去世的那天，他正在我家小住，聞訊之後，他一下子好像卡住了喉嚨，久久不語。後來他趕回加州參加了黎東方的葬禮。

我說：“你還會活下去！剛剛完成革命回憶錄，還要寫一本非革命思考錄呀。”他又笑了，因為他耗費了幾年的個人回憶錄，寫他香港之前革命生涯的書，剛剛在一位“紅二代”的幫助下完成了。而他對世界政治價值、戰略的思想性著作，幾易其稿，長達十年，也未完成。

從聖地亞哥回洛杉磯的車上，他坐在副駕駛位上又和我長談了關於這本書的思想框架。我很驚訝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看中共電視台，怎麼還能保持“獨立”的思考？雖然在我看來，這還是馬列主義“老爺子式”的思考，但不是黨八股。

“這是人類文明最好的時期。”他說。

我問他：“如果再回到 25 年前，你還會同情學生嗎？”他毫不



猶豫地回答：“我當然不會支持鎮壓！”我說：“就憑這一點，歷史上有你的地位！”

他沒有笑，但堅定地說：“我沒有歷史地位。如果趙紫陽、楊尚昆採納了我的意見，在絕食一開始便將學生強制拉走，然後封鎖天安門廣場，就不會發生開槍。”他提出了一套具體的操作方案，趙和楊也贊許是“好辦法”。

為什麼最後他的方案沒有實施？他長嘆了一口氣，也吐出他的怨氣：“我現在講給你聽，但你不能發表，發表了我也不承認。”他講完之後，我說：“我不是陸大哥，不是偉大的記者，我不會發表這些內容的。你這個共產黨在美國生活 20 多年，98 歲了，還能保持共產黨真話不公開的本色，了不起！”

我這話有些輕佻。但是他沒生氣，也沒有笑。現在，沉默常常是他的回應，任你怎麼去理解。有幾個人知道，曾有一本書名叫《咆哮的許家屯》？

（2014 年 5 月 6 日，寫於墨西哥外海）

何頻

## 許家屯出走細節

“……五一節前一天，大約八點多鐘，天已經黑下來。香港的上水火車站那個地方，路上沒什麼行人。一列火車從北邊開來，停了一會兒就開走了。車站站台柵欄有個缺口，沿著鐵軌路基旁的小路，一前一後走出兩個人影——前面的是位戴着運動帽、帽檐壓得低低的老人，後面是位中年婦女，兩人似乎並不相識，隔著三四十米，各自埋頭趕路……”

這位老人，就是前中共中央委員、前江蘇省委書記、前港澳工委書記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而後面那位，是護送他的二兒子許閩的妻子。

講述這段往事的金建一先生，當時就在上水站外面那條僻靜小路上。他應許閩的請求，坐他的車一起來這裡等候。許閩守在車裡，金建一走向火車站。他遠遠看到了許家屯，沒有打招呼，確認老人也看到自己了，又仔細環視周圍沒有異常，才一言不發地轉身帶路，給他們拉開了車門……

事過 26 年，金建一回憶起那天晚上的場景，還讓人感受到當時氣氛的緊張。

## 斯人已逝，疑雲猶存

2016年6月29日凌晨，度過百歲生日的許家屯，在美國洛杉磯家中壽終正寢。

然而，這位世紀老人不僅留下了生前多次申請仍未能被批准歸國的遺憾，還留下了延續26個春秋也未消散的疑雲：他為什麼毅然捨棄一切出走國門？如何一點風聲也不走漏地

取道香港飛往美國？在這位被稱為“林彪之後最高級別出走官員”的身後，是不是確有“西方敵對勢力”之手在暗中操縱？

2016年7月11日，《明鏡月刊》記者參加了許家屯追思儀式之後，與幾位朋友圍住了代表母親專程從香港飛來吊唁的金建一：“你是許家屯出走事件的知情人，甚至可算是當事人，給我們講講當時經過吧，現在還有什麼必要保密呢？”

為人豪爽、記性奇佳的金建一，並不推辭：“我究竟捲得多深，一直沒人知道——有人隱約知曉我幫了忙，但也不清楚到底具體幫了什麼樣的忙。許家屯已經仙逝，這麼多年來，他從來沒做過損害中國利益的事，沒有與所謂‘敵對勢力’有什麼勾結。以前有人



許家屯追思會上的金建一。（高伐林攝）

懷疑‘美國在背後策動’，其實沒有任何這類政治背景，連影子都沒有！這確實是應該澄清的事實。”

金建一从上個世紀 80 年代到世紀之交，曾分別担任过香港遠東集團負責中國業務的董事，以及上市公司麗新發展、麗豐控股的董事、高級副總裁，並曾與鄧家、曾家等多個紅色家族的後代有過各種合作。而他的父親金堯如，更是一位名人——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是老資格的新聞工作者；後來人們也心知肚明：他還是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從 50 年代起，是香港所有親中媒體的主管。

金堯如(1923 年 9 月—2004 年 1 月 18 日)，浙江紹興人，抗戰勝利之後，他奉命潛往台灣，在台南教書作為掩護，參加建立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任常委兼宣傳部長，準備接應解放軍攻打台灣。1947 年 12 月下旬，南京政府通知台灣當局逮捕金堯如，他事先得到消息，黑夜越窗而逃。來到香港向華南分局書記喬冠華匯報，喬冠華就要金堯如做辦公室主任兼自己的秘書。他們當時加緊迎接香港解放，憧憬著不久就可以回大陸建設新中國。不料，喬冠華調回北京，中央對香港的功能另有考慮，指示說，要金堯如他們“長期打算”。他很失望，但服從上級安排，在中共控制的《文匯報》擔任總編輯，在這塊英國殖民地從事宣傳和統戰。

文革期間，金堯如被中共以“開會”為名，召回軟禁及勞動改造了好幾年，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又將他派回香港復職。

“香港最大的兩家左派報紙，《大公報》是半官方，費彝民當社長——他是真的可以說了算的；《文匯報》是官方，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發佈官方信息，”金建一說，“我父親是《文匯報》總編



左一金建一，左三鄧質方，左四梁振英。攝於 90 年代。

輯，但又是新聞戰線的黨組書記，他負責七家報紙，《大公報》也歸他管，此外還有《新晚報》、《香港夜報》、《商報》等。按照官方排位置，《文匯報》的地位比他們高。”

1989 年是金堯如一生的轉折點。北京當局發出戒嚴令，激起香港排山倒海的抗議聲浪，極度震驚和悲憤的金堯如和李子誦社長、曾敏之副總編及社委會的同事們一起，決定在《文匯報》的社論版位開天窗，大書“痛心疾首”四個字表達抗議。“六四”過後自然遭到中共整肅，金堯如索性宣告與中共決裂，移居美國加州，直至 2004 年初病逝。

金堯如在香港的見聞和經歷十分豐富，有一部分寫在他的《金堯如 五十年香江憶往》一書中，金建一隨口談到幾個故事，就讓我

們大感興趣：例如，張國燾如何通過他父親向中共表示回國願望，因不能接受劉少奇開出的條件而作罷；又如，他父親說服曾任李宗仁秘書的程思遠回國見周恩來，後來更說服了李宗仁回國……說到這裡，金建一苦笑說：我父親將程思遠他們“忽悠”回國了，做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他自己倒跑到美國來了。——歷史的弔詭一至於此！

直到金堯如病逝之前，人們一直不知道，原來他在1990年還秘密幹了一件大事：協助他在黨內的上司許家屯出走美國。

### 君子之交

許家屯與金堯如，革命資歷和性格脾性相差甚遠。

中共奪取政權的歲月，許家屯是新四軍地方武裝和根據地政權負責人，金堯如卻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學生運動；中共建政之後，許家屯成為地方大員、封疆大吏，金堯如卻是英國殖民地的一介報人；當許家屯奉調走馬上任擔任地下紅色港督，金堯如成為其下級，人們看不出他們有多麼親密，二人幾乎沒有多少私下的交往，書生意氣的金堯如，與許家屯屢屢意見相左，爭得不亦樂乎。

何頻見過許家屯晚年與金堯如相處：“他們爭論問題，許通常面無表情，端坐不動；而金則‘張牙舞爪’，衝到許老爺子跟前……”何頻看了很驚訝，但他也悟出，金堯如在許家屯面前直言不諱、如此放得開，可見他們的關係到了何種地步。

金建一在許家屯追思會上致辭時也說：

在外人眼裡，按今天的官場常態，他們之間沒有什麼世俗的交

情，但是他們兩個卻是可以生死托付的知己，當中沒有涉及絲毫的功利關係，這是真正的君子之交！他們的友誼看上去似乎水波不興，平平淡淡，其實內裡波瀾洶湧。

金建一說：金堯如對許完全沒有提過私人的要求。許家屯知道我爸無求於他，他們之間完全不是那種互相利用的關係，所以才會向我爸開口求助。“是啊，當時那種情況，他很可能被下令扣起來審查，我爸哪能袖手旁觀？”

1989年春夏之交席捲整個中國和香港的政治風暴，不僅對每個人的良知、風骨和勇氣是嚴峻的考驗，對人際關係也是試金石。正是在這場風暴中，他們彼此看清了對方。

許家屯生前在接受我採訪時回憶：

《文匯報》幾乎是報社全體領導一致主張“開天窗”，有人提出來要寫上四個大字，爭論是用“痛心疾首”，還是“夫復何言”？新華社香港分社主管宣傳的副社長張浚生不敢決定，回來問我：可不可以開天窗，寫上四個字？我說你看呢？他說：用“痛心疾首”吧，我說那



1989年5月21日香港《文匯報》社論版開了天窗。

好嘛，我批准了！上級要追究，不要你們負責，我來負責。我這個態度傳達下去了。

金堯如去世之前，許家屯對他在自己出走一事中給予的協助守口如瓶，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和《許家屯回憶和隨想錄》兩本書中都隻字不提；他去世之後，許家屯才披露這段秘辛，話語中充滿對金堯如的感謝和懷念：“我在回憶錄上沒有提金堯如，他當時提出希望我保密，現在他去世了，我要公開這件事，向他表示感謝。”

### 申請赴美，但不是申請避難

許家屯明確地點出了求助金堯如的時間：“（1990年）4月23日，我讓二兒子去找金堯如，要請他幫我搞去美國的簽證。”他請金堯如來深圳當面談。翌日一早，兩人就在新華社的深圳基地見面，金堯如返回香港後，立即前往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

金建一說：“許家屯讓我父親去跟美國總領事交涉，但難點是，他還向美國提出一些條件：不能將我看成來美國尋求政治避難；我只能用旅遊簽證，而且不跟美國政府有任何合作……他一定要美國政府答應了，給予明確的承諾，他才可以去。”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與金堯如相識，但這次，他很難爽快地答應金堯如。許家屯這麼一位炙手可熱的中共高官，竟委託他來接洽出走美國避禍！“總領事考慮再三，對我父親說，許提這些要求，與正常申請赴美手續大不一樣，有點棘手，我們美國用什麼名義接



納呢？說是申請旅遊簽證，來作短期‘旅遊休息’，但又可能轉為長期居留……如果中國政府來交涉，我們如何答對呢？”他表示，這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他做不了主，必須要向華盛頓請示。

金堯如如實轉告許家屯。沒有辦法，只有等。

等待就是煎熬。許家屯度日如年，想到無數種可能性：美國方面是否會最後批准？“六四”之後中美關係正處在公開場合互相指責、私底下彼此試探的十分微妙的節骨眼，美方想必要評估：接納許家屯，對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對政經合作，可能產生何種衝擊？方勵之、李淑嫻夫婦還棲身美國駐華大使館呢，又來一個許家屯，豈不是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許家屯也不知道北京何時會對自己下達隔離審查的指令，達摩克利斯之劍何時猝然落下？

他還擔心美方向國內請示夜長夢多——許家屯多次對筆者聲稱：“我是特務頭子！”在他被中央點將前來香港時，楊尚昆特地授權，讓他統管中共在香港的情報網和對台灣的秘密渠道，他比誰都更清楚，中共諜報人員無孔不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裡說不定就有中共耳目，在等待華盛頓答覆期間，隨時可能消息走露……

雖然懸而未決，但有關各方都在暗中抓緊準備。金建一告訴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通知了美國航空公司，在飛美國的頭班飛機上留出座位，但他們沒有透露乘客的姓名。

4月29日，金堯如終於盼來了美國駐港總領事回話：他的上司批准了許家屯的赴美申請。

## “鐵哥們”的意義

一名普通百姓被飢餓驅使或淪為被追捕對象，決心闖出國門，固然很難；一位前中共高官要經過香港出走美國，其實也並不容易——

中共組織無遠弗屆，對官員們有各種明裡暗裡的監控；香港當時在英國人嚴密的管治之下，進入、居留都有嚴格的規定和手續；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不是誰家的菜園門，可以想進就進、想出就出。這一系列環節，都要秘密穿行，任何環節曝光，都是驚動國內外的大事——畢竟，許家屯是剛剛卸任沒多久的“紅色港督”，在任期間，幾乎天天在香港電視屏幕上露面，沒有哪位香港居民不認識他這副面孔和他的“招牌大笑”。

金建一開始並不知道父親早已捲入協助許家屯出走的事宜，而金堯如也不知道兒子秘密扮演的角色，兩人分別擔負了不同的使命。金建一說，是幾天前許閩央求他協助他父親出走的。金建一在許家屯追思儀式上曾經追溯過與許家的交情：“我和許伯伯的兒子許閩從中學的同學，到一同下鄉插隊的知青。我們是上下兩代人的交情，我在他家裡住過很長的時間。”

金建一對我們更詳細地講過這一淵源：

我父親當時是很革命的，那時香港是資本主義，只有少數學校掛五星旗，多數學校還是掛青天白日旗。他率領左派報紙，聯合左派僑團，跟右派報紙針鋒相對。每年他都會帶一個香港代表團回國參觀、國慶觀禮，都會去上海、江蘇這些地方，認識了在江蘇任職的

許家屯。國內的生活比香港要苦得多，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認為要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1960年，他把我送回國內，要我經受鍛煉，那年我才八歲，之後有段時期還住在孩子眾多的許家……

金建一和許閩後來上了南京寧海中學，這是一所全國知名的重點中學，同學中許多是省委領導幹部和南京軍區首長的子女。文革中，他們又一起來到了洪澤縣（現屬泗洪縣）半城公社，這個公社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雪楓鎮，是以抗日戰爭期間殉職的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命名的，這裡有雪楓烈士陵園。當時劉少奇、饒漱石、陳毅等都曾在這一帶活動。

許閩開口求助要救父親，請鐵哥們幫忙，那還有什麼說的！

### 步行過關被認出

事不宜遲。有了美國總領事的明確許諾，說走就走，第二天許家屯就從深圳動身了。

為什麼選在香港的上水火車站讓許家屯下車？

金建一說，許家屯有可以往來香港的護照，合法進入香港沒有法律上的問題。問題是他的身分特殊，海關、邊防乃至市民，“天下誰人不識君？”這就要求，在公共場合逗留時間越短越好，而上水站，是從羅湖通關口岸進入香港之後的第一站。

選在這裡，還有另一層因素：傍晚時分，香港街頭仍然人潮洶湧，熙熙攘攘，相對來說，上水站比較僻靜，被人目擊認出的可能性

較小。

當然，就算僻靜一點，火車進站口和出站口的旅客還是不少。為了避開他們，金建一和許閩事先做了勘查，給許家屯安排了一條特殊的出站路線：下了火車之後，並不隨著旅客人流走向出站口，而是沿著鐵軌向前走到月台的盡頭。鐵軌兩邊是柵欄，有一個地方有個缺口，正好可容一人鑽出，走到外面的小街上。許閩的車就停在那裡接應他。

即便如此，在羅湖通關的時候，許家屯還是被人認出來了。

許家屯多次從這裡來往於深圳和香港，都是坐在專車後座裡，由前座的司機或者秘書、警衛對關員交驗證件，邊防人員也熟悉他的車牌號，揮手放行，一路暢通。而這次，他已經沒有這個條件：繼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收走了他的兩輛專車。他必須步行過關。

許家屯曾經對記者回述過那一刻：當他走到關員面前，交驗證件時，關員看看證件，又看看他，不無詫異：許社長，您一人走路來的？

許家屯保持鎮靜，含糊其辭地說：是啊，我走一走。

關員將證件還給他放行。當他走過去之後，聽見身後關員對同事不無炫耀地說：“啱先響我呢度行過嘅系許社長（剛才從我這裡過去的是許社長），跟普通人一樣，好平易近人！……”

## “時間差”救了許家屯

許家屯走的正是時候。如果晚兩小時，他就走不了了。

在許家屯走過羅湖口岸來到香港境內，坐上火車前往上水站時，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正來到許家屯的住處找他。

許家屯有個習慣，吃完晚飯之後，要出去散散步，少則幾十分鐘，多則個把小時，不用跟秘書和服務人員打招呼，每天如此，他們也習以為常：反正他不會走遠，一會兒就會回來。這天傍晚，許家屯又是空著手出門，他們誰也沒有發現什麼異樣。他離開一會兒，秦文俊來了。他是來轉達中央電令，通知許家屯去北京的——這一去就凶多吉少了！見他不在，秦文俊問：許社長去哪兒了？秘書回答：他去散步了，一會兒就回來。秦文俊只好等候。

但是這一次，許社長再沒有回來。一小時，兩小時……秦文俊終於明白不對頭了。他向上級匯報“許家屯出門幾個小時，不知去向”，又抱著僥幸心理，一直坐等到深夜。

許家屯是後來得知秦文俊來找他。他對筆者說：“算我運氣好：他（秦）接到中央電令時，作為市領導，必須要去出席市里的‘五一聯歡會’，他只好在聯歡會結束了再趕到我的住處。這個‘時間差’救了我！”

這邊，金建一和許閩等來了許家屯和許閩的妻子，他們上了車，許閩馬上發動引擎。一路上，他們提心吊膽，時時留意後面和側面是否有車跟蹤？幸好，未發現任何異常跡象。四十多分鐘之後，抵達金建一的家。

許閩夫婦在香港有家，但人們一旦發現許家屯失蹤，首先就會來找許閩，許家屯不能住他那裡，只能住在金建一這兒。說好了第

二天一早來接父親，許闖夫婦立即開車回家。

金建一沒與父親住在一起。記者問金建一：“你父親當晚是否前來看許家屯？”



80年代，金建一（右一）陪同許家屯（左一）出席

“沒有。這一活動。

晚上，儘量少驚動

人。”金堯如與許家屯重逢，是過了一年多他自己也來到美國後的事了。

金建一回憶那天晚上，“許家屯在我家进了安排给他休息的房间后，就打了一個電話。因为是关在房间里打的，我至今沒弄明白他給誰打。”

## 離開祖國的最後一夜

“老爺子一晚上幾乎沒有睡覺，也几乎沒怎麼跟我說過話。因为已經安排好了第二天早上從香港到洛杉磯第一班飛機的機票——他越早走越安全，大家也越安全。他始終擔心有关方面知道他來到了香港，會向港英當局施加壓力，甚至會封鎖機場。幸虧還好，並沒有出現這些情況……他到了我家，就問我要紙要筆，他

要寫信。”

許家屯幾乎通宵未曾合眼，一直在寫信，寫了一封又一封。絕大部分是給香港的朋友的：霍英東，包玉剛，李嘉誠，董建華……以前朝夕相處，自己走了，必須要對他們有個交代，也有所託付。

這些信後來都由許閩一一送交本人，都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善意的回應。

最重要的一封，是寫給鄧小平、楊尚昆的。信寫好後，許家屯寫了信封：

周南社長轉呈 鄧小平主席收

信折好裝入信封一起交給了金建一，他又在外面套了一個更大的信封，寫上：

新華社香港分社 周南親收

這封信裡，寫了什麼？

金建一看過這封信。他還記得，信裡沒有一句批評共產黨的話，也沒有對江澤民和李鵬指名道姓，只是說，估計有人要對他下手，在這種情況下只好被迫避開。

許家屯對筆者也回憶過信的內容：常委中的兩個人對我有意見，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國旅遊休息。“我向他們保證：到美國之後，不會要求政治庇護，不會見記者，不會發表文章，不會洩漏國家機密——只要中央他們幾位不對我和我的家屬進行打擊報復，我將遵守這幾點諾言，否則我會進行反擊，要自衛。”許家屯還在信中，對他們兩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謝。

第二天天剛矇矇亮，許閩夫婦就前來，接父親去飛機場。金

建一在門口目送他們離去。

許家屯後來告訴筆者，港英當局得到了有關方面的通報，一切給予方便，他從貴賓室的特別通道進去登上飛機。當飛機離開地面、飛進晨曦，他才感到真正安全了！

國內查到許家屯從羅湖出關的記錄，馬上到香港來找他了。但這時，許家屯已經飛向了大洋彼岸。

金建一回憶：“他走了之後，我們就商量這些信怎麼處理。關鍵就是給鄧的這封信，是送，還是寄？開始想讓一個小孩送到新華社香港分社，但再一想，這勢必給送信的小孩帶來很大麻煩。最後還是決定郵寄，省得留下什麼痕跡。我特意走到離家遠一點的地方去寄，之前還戴了手套，把信封信紙擦了又擦，怕留下指紋……”過了多少天，沒有人來找自己，金建一才算放下了心。

許家屯走了之後，冒出各種各樣的傳言，“許家屯跟情婦一起逃往美國”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純屬無稽之談。金建一特別強調：“許家屯出走美國是一件非常隱秘的事，知情人局限在最小的範圍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他、許閩夫婦和我們父子。”

### 在趙、楊之間傳話

說到這裡，必須將時針往回倒撥一年。

許家屯為什麼要秘密出走？當時是否確實面臨被監禁、被整肅的危險？

1983年，許家屯被鄧小平等元老點將，以年屆退休之齡，從外



交、港澳系統外面調來，空降擔任中共駐港澳的最高領導人。他持有尚方寶劍，說話行事風格大得港人好感，卻得罪了本來就心裡不舒服的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



金建一（右）與許家屯（左）合影。

（後升為副部長）、港澳辦副主任李後、魯平等人，他們不停地向中央打小報告，許家屯與他們一直沒少了磕磕絆絆。而得罪江澤民、李鵬，則與香港在“六四”前後全民聲援和支持學潮有關。

整整一年前，1989年4月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一回來，就打了個電報要許家屯上京。金建一稱，曾聽許伯伯說過：趙紫陽要許家屯搜集海外包括西方各國對中國事態的反應和預測，看看有什麼樣的國際影響，做一個調查分析報告。許上北京後就給趙看了這些材料，提出在憲法框架下解決問題的趙紫陽覺得，這正是他想要的東西，有說服力。

許家屯生前對筆者至少三次回憶那次至關重要的上京。他說：

趙紫陽和我交談，要我先講我的看法。我講，我認為學生和機關幹部是愛黨愛國的活動，少數敵對分子、外國人插了手，美國、台灣、香港也有少數對共產黨敵視的人參加，有些影響，但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學生、幹部、市民應該說是愛國愛黨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四二六社論”），我不贊成。趙紫陽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說，我們現在想辦法說服鄧小平，把社論的意見收回來。他說他在朝鮮時，社論傳給他看過了，當時他表示同意，現在看，他認為不妥。假如改變過來，他可以對外表示由他負責。另外他提了八條具體辦法，例如，學生反對“官倒”，先從我家裡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麼樣，是否參加了“官倒”，等等。

趙紫陽要我去找楊尚昆。他認為我與楊關係比較好，說得來，請楊把我們的意見向鄧小平轉達，去做鄧的工作，希望鄧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說服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見了楊尚昆，楊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答應去向鄧轉達，還要我轉告趙紫陽，可以按照你們的意見先做起來，有什麼事情他負責。楊尚昆還贊成趙紫陽4日接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說各方反映很好，楊本人也認為很好。不過楊尚昆又說了：老爺子（鄧）的脾氣你們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從楊尚昆那裡回來，告訴趙紫陽楊已經同意。我們都比較樂觀了，認為有希望改變過來。

許家屯長嘆一聲：如果學生到此為止，事態就緩和了，可是學生又開始絕食了……

## 急流勇退不可得

金建一也回憶了這一段：聽許伯伯說，鄧小平那時已經不是通

過正常渠道可以見到的了，許家屯能見到的人只有楊尚昆，所以趙紫陽才要許去見楊，把這些情況報告給楊，看看有沒有可能請楊帶著許去見鄧小平，或者把他準備的材料帶給鄧、說服鄧。楊尚昆聽完許家屯之後說，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與他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鄧老爺子的想法與他也比較接近。許摸到這個底，回到香港後，見香港大學生也在新華分社外面冒雨靜坐，要絕食，他就帶了新華分社的人買了麵包汽水，去看望學生，動員學生回校。他從樓裡可以看到學生，撫今追昔，不勝感慨，流了眼淚，對身邊人說，當年我們這樣組織學生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學生這樣對待我們了！

金建一還聽說：梁湘了解到許到北京的情況後，也起草了電報發到中央辦公廳，支持和平解決學潮。哪想到後來情況逆轉！

許家屯一直認為趙紫陽當時不應該去朝鮮，這就讓李鵬有了可乘之機，釀出了後來鄧小平欽定、難以撼動的“四二六社論”的口徑。

趙紫陽下台，黨內改革派聲勢重挫；江澤民取代，黨內保守派氣焰大張。許家屯雖然沒有馬上被整肅，卻感受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步步驚魂，處處陷阱。

許家屯在接受筆者專訪時回憶，他察覺勢頭不好，自己也已經年過古稀，便設法急流勇退：

任仲夷半開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閣下呢？我領悟了他的好意，於是在會議中途，向中組部長宋平提出：年齡大了，精力不行了，要求退休，請中央考慮。宋平聽了很詫異，說中央沒有考慮啊，你是否聽到什麼？我說沒有。他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你不要

有這樣的想法。我說：還是請中央考慮。他說，中央確實沒有這個考慮，你還是勉自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楊尚昆。他批評我：你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六四他與我也都是親身經歷過的，說：你不要這樣想！他也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我向他建議說：香港人對葉選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這個才能，建議考慮。他說，這也是個人選，但是他們家有好幾個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辦。

港澳辦有人向我透露：江澤民找李後和魯平，連續兩天聽他們的匯報，說是反映了不少對你不利的看法。江在一次港澳辦的簡報上寫了一個批語，其中有這麼一句話：看來許家屯確實犯了右傾錯誤。中辦將這個批語轉給了港澳辦，李後接到之後正在看，中辦忽然有人來將這個批語又收回去了。我估計這兩件事不會假。

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後我到北京開一次中央的會議，給江澤民辦公室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想把所謂“一百億”（包玉剛的奧地利裔女婿蘇海文出面，向中國政府建議：以一百億港幣租賃香港十年）的事向他解釋一下。兩天沒有回音，第三天秘書回應了：說總書記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見吧。我開始沒有感覺到推託，會議散會，在走廊裡，江澤民迎面走過來，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講幾句話。他看到了我，卻故意將臉側過去，好像沒有看到我，就過去了——我心裡有數了：他不想見我。

## 朱琳：跟我們家老李走

這段時間，許家屯還為好幾件事心裡非常憋火。

何頻記得許家屯對他講過，有一次在中南海開會，李鵬約他談話，夫人朱琳也參與，竟然露骨地對他說：希望你跟我們家老李走。

許家屯非常生氣，覺得很受侮辱：李鵬嘛，畢竟是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你朱琳算什麼人，要我跟你家“老李”走?! 他努力平靜地回答：我只跟組織，不跟人!

《明鏡月刊》記者還獲知一件事：中南海開過好幾次會，包括討論許家屯在香港期間的所謂錯誤——因為香港的左派工會和學生組織，都站出來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人心沒拉過來，說許家屯工作沒做好。有一次開會又要他承認錯誤，頂起來，同去的新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說：許家屯拂袖而去——站起來就往外走了。江澤民在後面生氣地說：“許家屯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個‘三八式’嘛!” 許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而江澤民是1947年，江這裡是指責許擺老資格。毛鈞年回憶說，自己從未見過高層開會氣氛如此激烈，嚇得大氣都不敢喘。

許家屯知道與新的中央、與江、李等人已經沒有周旋的餘地，沒有辦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楊要求退休，他們又不肯考慮。我就趁香港鄭裕彤一家酒店的俱樂部開張請我去剪彩，記者向我採訪的機會，主動告訴他們：我已經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兩個，一個讓北京的領導人特別是江澤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個是讓香港人有點思想準備，以免萬一影響香港股市。”

許家屯透了這個風以後沒幾天，北京要他去開會，李鵬和中組部一位副部長見了他：中央決定讓你退休，周南接任，你有什麼意見? 許家屯說，我原來就向宋平部長提出退休，現在中央同意了，我

很感謝。問我對周南有什麼看法？我說他對外事有經驗，對地方尤其是對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還是能做好的。會見結束，許家屯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以上都一起到北京開會，江澤民、李鵬、港澳辦全體，外交部的周南，還有幾個他不認識的人參加。江澤民主持，宣佈許家屯退休，周南接任。許同姬鵬飛一起坐車赴會場，途中姬悄悄對他講，他們的決定（他用了“他們”兩個字），我也不知道，沒有徵求我的意見。許家屯講了一句話：“他們對我在香港工作怎麼評價，一句也沒有。”姬鵬飛可能隨後對江澤民反映了，所以江澤民的開場白，就說了一句：“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績的”——就這麼一句帶過。

後來在報紙上公佈：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免去許家屯職務，由周南接任。許家屯說：這個宣佈，不僅超越常規，而且是非法的！“免去”我的職務，而不是說我“退休”，當時說“免去”是很不常見的，為什麼“免去”？“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但那前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開會啊！

### 收車扣薪、專案審查

周南立即到香港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開了個千人歡迎大會。卸任的許家屯在會上介紹了周南，推崇說相信他完全能勝任；而履新的周南致辭，對許家屯一字不提，連一句“感謝我的前任”的話都沒有！與許完全沒有互動，明擺著是讓人家看：我跟許家屯是兩

碼事。這一不同尋常的情況，當場就引起很多人議論，有人當面問許家屯發生了什麼事？許家屯說，“我能怎麼回答？一笑置之。”

許家屯到北京開最後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基本法草案，也算是交代工作。會議期間，他留在香港清理文件、書籍的秘書告知他：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將其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說有些不是私人文件。“這很奇特：怎麼能這麼不信任我和秘書，認為我會把公家文件帶走呢？我帶走公家文件幹什麼？”

許家屯那次在北京去見宋平，提出希望退休之後住在深圳，對港澳情況作些研究——“我感到‘一國兩制’是個新課題，我們對香港情況研究不夠，我在香港工作幾年，深有感觸，想繼續作些研究。但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我住在深圳（金建一說：人們都要聽許的，誰會聽他的？所以他一定要將許逼走。至於是不是江李的授意，很難講，但他確實表露出來了）。宋平對我談，說常委的意見，你還是回北京來。我說，那我還是回江蘇吧，請中央考慮。宋平先說要常委討論，後來也表示同意了。”

會議結束後，許家屯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準備搬家回南京。4月22日一到就得知了兩件事。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傳達他的決定，將許的房車收回；第二件，周南停發了他三、四個月工資。許家屯對我說：按照組織原則，幹部調動，若介紹信還沒有交到接收一方，工資還是由原單位發。我還沒離開，介紹信都還沒拿到手呢！停發我的工資，是何原因？——許家屯特別著重地說：“我不想用‘居心’這個詞。”

讓許家屯更吃驚的是第二天，4月23日，新華分社有人告訴

他，周南頭一年11月一到任，就組織了一個許家屯專案組，他自任組長，新華分社副社長鄭華擔任副組長，調查許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人、財、物。“按照中央的規定，對我這一級幹部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需要經過常委、總書記的批准。他一到任就組織了專案組，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對我動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對我動手。難怪他在歡迎會上對‘許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

### 曾慶紅透露江要整他

更讓許家屯難以相信又不得不信的，是接到了一個絕密消息。此前許家屯對筆者不肯點出消息來源，只說“一位後來位居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江澤民要整我的”，後來才透露：此人就是曾慶紅！當時他已經被江澤民從上海招到北京，擔任中辦副主任。

曾慶紅具體對許家屯講了哪些情況，已不可考。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周南的專案組調查完畢，已經寫了很長的報告送到中央，而曾慶紅想必是能讀到這份報告的。

許家屯還聯想到一個情況，心情更加焦灼。楊尚昆是鄧小平派在政治局常委的特別代表，他又是國家主席，預定這年5月要應邀對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進行國事訪問。楊尚昆與許家屯關係相當不錯，他若在京，或許對自己有一定保護作用；他若出國了，對自己也就鞭長莫及了。想必這就是江、李下手快刀斬亂麻之機！

許家屯後來對外界解釋說：儒家有話：“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孔子家語》）為什麼“大杖”打來要躲避呢？因為如果孩子被打



死了，就陷家長於不義，家長要負打死子女的罪名。“小杖”我已經受了很多次了，這次“大杖”打來，我估計假如我不走，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被江澤民、李鵬拘押審查，那麼也就像趙紫陽和梁湘一樣——趙紫陽被軟禁至死、海南省長梁湘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失去自由——不，肯定還不如趙紫陽和梁湘！“我不想再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遭遇，我走了，將來對莫須有的‘罪狀’至少還有個辯白的機會。”

許家屯當機立斷：走！

一分鐘也不耽誤，他立即讓二兒子去請金堯如來深圳——於是有了前面我們所敘述的情節。

### 落腳西來寺 陸鏗幫倒忙

許家屯到美國，落腳在哪裡？總不能由美國政府來安排吧！他想到了星雲大師的西來寺。

許家屯 2012 年飛往美東時，曾經對《明鏡月刊》記者介紹過這一段：

與星雲是怎麼認識的呢？“六四”以前星雲帶了幾百人的訪問團到大陸訪問，中國將他作為很特殊的統戰對象來招待，楊尚昆親自出面。他到四川等地參觀，萬人空巷啊！他回台灣時經過香港，楊思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廳主任）要求我親自出面招待。我就隆重招待了，知道他是江蘇仙女廟人，我們是江蘇同鄉。他回到美國之後來信感謝，說歡迎我去訪問，任何時候都熱情招待。我拿

著他的信，對我們香港工委的人開玩笑說：“星雲反過來做我的統戰工作了！”

所以我來美國之後，就先到了他那裡。星雲是個政治和尚，而且不是個一般的政治和尚，有相當高的水平。我們倆相處很好，他從來不向我宣傳佛教教義，我也從來不對他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我們交談了很多問題。

金建一對《明鏡月刊》記者說：許家屯與星雲交上朋友了，許家屯出國後若能落腳他那裡，就再好不過，就能避免政治上的牽扯，是星雲邀請他到美國來休息嘛，這樣給中共也留下台階，將來雙方都好下台。許家屯落腳西來寺這個消息披露之後，有人猜測說“許家屯信佛了”，其實他並未皈依佛門。



左三曾慶淮、左四董建華，右一金建一。攝於2000年。

金建一說，美國有關部門謹守此前的承諾，有一次，曾經找了個藉口，要跟許家屯見個面聊一聊——只是聊一聊，沒有說打算有任何合作。但許家屯連見面都拒絕了，說“不方便”。他親口告訴金建一，他對美國人還提出來：希望今後不要再來打擾我。美國方面也尊重他這個態度，確實再沒有打擾他。

經星雲大師安排，許家屯在西來寺開了個記者招待會，告訴大家為什麼來美國、為什麼來西來寺。許家屯再次強調，來美國是“旅遊休息”，與星雲有緣，在香港就結下了友誼；星雲也表示，西來寺邀請許先生前來度假——這也就意味著許與美國政府沒有任何糾葛。

本來這樣挺圓滿，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記者招待會都快結束了，自號“大聲”的老記者陸鏗，一把將話筒接過來，大罵了一通“天安門屠夫”李鵬。本來想通過這個記者會儘量避開政治的，這下全讓陸鏗給攪了！中共當局不僅將陸鏗和許家屯視若寇仇，李鵬更把星雲大師恨得咬牙切齒，認定是星雲故意安排這個場合，讓陸鏗出面來羞辱他，此後很多年都不允許星雲再回中國大陸。“如果沒有陸鏗打這一通橫炮，李鵬不會對星雲那麼敵對。”金建一說。

《明鏡月刊》記者從其它渠道得知，多年後由鳳凰衛視的劉長樂居中斡旋，說星雲在海內外宗教界這麼有影響，應該讓他回國。那時江、李都已經退了，有關方面就同意了。後來不知道是中央哪個部門安排的，讓星雲與江澤民還見了一面，聊了一通佛經。李鵬事後看到消息非常生氣，質問有關部門：星雲來也就罷了，你們還安排他見總書記，給他這麼高的待遇？

“陸鏗就是這樣一個人，”金建一說，“他一心想的就是怎麼抓新聞，怎麼通過新聞贏得大名，香港一傳出許家屯將到香港接任新華分社社長，人還沒來，陸鏗就找到我父親。他知道我父親認識許，說先報道一下許在江蘇主政的情況也好。我在江蘇住的時間長，對江蘇比較了解，父親就要我接受他的採訪；許家屯到香港之後，我還給他和陸鏗牽了線。”

陸鏗不止一次闖禍，此前他闖下的一個影響中國政局走向的大禍，也與許家屯有關。1986年，陸鏗上京採訪對人毫不設防的胡耀邦總書記，寫出的長篇採訪稿激怒了王震等保守派，被他們當作砸向胡耀邦的一塊大石頭。金建一說，實事求是地說，“那次闖禍許家屯是有責任的，是他安排陸上京採訪胡。事先講清了稿件寫好之後要給胡過目，審完修改了才能發表。胡耀邦當時看稿時圈出了幾處，要他修改。但他一看這幾句話比較有價值，就不肯改。而許伯伯當年沒有辦法制止他付印出版。”

### “執迷不悟，背離人民”

許家屯擅自出走美國，儘管自定了名義是“旅遊休息”，儘管對鄧小平、楊尚昆有四項承諾，但是這件事對中共來說還是太震撼了。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馬毓真趕來了，中國駐美國大使朱啟禎也趕來了，動員許家屯回國，說“保證不會有計較”。當然，許家屯不為所動，向他們解釋了自己為什麼出來，說：“這種情況不變化，我不想回去”；他們說“外面情況複雜”，許家屯請他們放心，說自信還可

以應付。

許家屯告訴《明鏡月刊》記者：

後來國內傳出消息，楊尚昆要到南美進行國事訪問，動員我與他一起回國。果然他到南美訪問的時候，委託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打電話，要我與他一起回國。還告訴我，我出來以後，鄧批評我出來是“糊塗”，楊動員我一起回去，免得尷尬。還說回去以後會做比較好的安排。我告訴他，他們已經搞了我的專案組，他說沒有，還說不可能。他不會了解這些情況，我謝絕了跟楊尚昆一起回國。後來的事實證明：楊尚昆連自己也不能保。

1991年3月4日，新華社發出新聞稿：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撤銷許家屯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委員職務、開除其黨籍。文中所述理由為：“他執迷不悟，至今不歸，且與反共勢力混在一起。許家屯身為黨的高級幹部，他的行為背離了黨和人民，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金建一說：許家屯一出走，周南馬上進行了審查清洗，新華分社開展“肅清許家屯右傾機會主義流毒”活動，許的四位秘書都被扣起來辦學習班，要他們對許檢舉揭發。重點是，到底事先有沒有蛛絲馬跡？他們是否事先知道這件事？四位秘書確實都毫不知情，本身也沒有任何經濟問題等把柄。搞了好幾個月，才陸陸續續地讓他們自由。

金建一說，周南他們還懷疑周安橋是幫助許家屯外逃的人，查了他很久。其實許家屯提攜周安橋，是出於對香港回歸之後的人



陸鏗和崔蓉芝看望許家屯。(高伐林攝)

事安排的通盤考慮，防止九七香港回歸之後，西方一些大財團要撤資、移民、走人，所以希望培養一些中國自己的人才所管理的公司可以接管，周安橋也屬此列。當時成立了一個公司“天安國際”，下面有個子公司“天安中國”，許將周安橋安排在那裡當總經理。“天安中國”在國內很紅，到任何地方拿項目、拿地，都被優先考慮，因為他是打著“港商”旗號的自己人。

“周南他們從來沒有將許家屯出走的事，與我們父子聯繫起來。因為在他們眼裡，許家屯從來沒有提拔過我父親，也沒有關照過我，一點關係都挨不上，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從利益交換的角度去分析，我們不可能去幫他出走。”

金堯如也挨批挨整，不過是在許家屯出走之前，因為“六四”前後《文匯報》發表“違背黨的立場”的言論、文章。金堯如當時是浙江省政協常委，有人就來找他，說上面希望你公開表個態，就說“六四”之前，你對國內情況不了解，不知道事件的性質，現在經過通報情況，你明白了，當時鎮壓是必要的。有人還向他透露，李鵬對他很惱火，可能也要下面懲處他。這樣他才下決心與中共決裂。

金建一告訴我們：

周南為首的港澳工委對我爸定的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策反《文匯報》”。罪名夠可怕吧？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六四”時一些原左派媒體人提出建議，認為《文匯報》應該站在人民一邊，你們沒必要殉葬、落下千古罵名，索性就出來自己做吧。這件事與美國根本沒有一點關係，而且英國的法律，政府不能投資辦傳媒，所以《文匯報》本來就是以私人名義註冊並持股的，根本無須“策反”。我父親給當時還在任上的許家屯寫信匯報了這個動向，提醒如果工作做不好，可能會出現這麼一種情況。當局後來查到了父親寫的這封信，就扣到我父親頭上說他“策反《文匯報》”，完全是抹黑和栽贓！

### 情報網安然無恙

許家屯有沒有叛變，中共其實最清楚。

中共各個情報部門在香港原來就設了點，布了線，各自獨立，互相之間不發生橫向聯繫。許家屯去香港任職，楊尚昆就叫他統



許家屯和金堯如夫婦 90 年代在美國合影。

管，許家屯要求：他必須知道所有情況——雖然不可能過問得非常細，但必須掌握情報的大意，知曉每條線的線頭。在許家屯交卸新華分社社長職務之際，按照中央特別給他的指示，這個情報網，他並沒有交給周南，還是親自掌管。

按常規來說，許家屯出走，在是否叛逃難以判斷之際，穩妥起見，他所掌握的情報網，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台灣，不管是他接頭的，還是他派遣的，這些人都應該迅即撤回或者暫時轉移。但是沒有看到任何這種動向，而且所有人都沒有出事——這就是許家屯沒有叛變、沒有泄露機密的最好證明。

中共沒有因許家屯出走而對情報網採取緊急措施，是冒了一定



風險的。不過《明鏡月刊》記者從有關知情的消息來源了解到，當局對風險有多大也作了仔細評估：許家屯掌握的主要是情報網各條線的線頭——國安、總政聯絡部、總參二部、三部在當地的負責人，與他們有接觸，他手上並沒有全體諜報人員的名單；而香港這個地方，形勢也不是那麼嚴重。

更主要的是，記者從可靠渠道获悉，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很不滿意江李，認為二人當時對許的態度失當，許家屯在某種程度上講，是被他們逼走的；許家屯在給他們的信中，有四條承諾，又主動開出“善待我的家人”這樣一個條件——許的夫人在國內，其八個孩子，除了二兒子之外，七個都在國內。鄧、楊拿到他那封信之後，應該能感到許的承諾有一定可信度，很可能通過某種方式，表示了他們的這個態度。

### 誰笑到了最後

周南還得再補敘一筆。

周南雖然接替許家屯當了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中共十四大更當了中央委員，但後來並沒有得到重用。

許家屯與江、李談不攏，他們就想撤換許，當時周南正擔任中英聯合小組的中方代表，就選中他接替。周南也知道這把交椅不是好坐的，但後來在香港口碑那麼差，還是讓人吃驚。他完全是對許家屯的作風反其道而行之：不見記者、不找任何人談話，不跟人來往，就縮在新華社大樓裡面。周南把張浚生推出去當新聞發言

人，讓人們有事去找張浚生。他躲在後面，就有了迴旋餘地：講錯了話，張浚生負責；講對了，我周南有功勞。

香港人一下就感覺到了新舊兩任社長的強烈對比。當時大嶼山的佛像落成，英國末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去了，伸出手要跟周南握手，可他不跟彭握手，口稱“善哉善哉”。或許他是要表示自己立場堅定，但在港人看來，這是極無禮貌、極無風度的。何況，你是共產黨員、無神論者，並不信佛，“善哉善哉”哪是出自真心？

許家屯在任時，周南、魯平聯手要扳倒許；許家屯走後，兩人從盟友變成對手，鬥起法來。許是通天的，港澳辦鎮不住他，他有事就直接向中央匯報請示；周南還想延續此前許那種地位，這就與接任港澳辦主任魯平杠上了：港澳辦是你新華分社、港澳工委的頂頭上司，你周南有事要向我魯平匯報和請示。本來中央打算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周南、魯平都還暫時工作一段，但兩人爭鬥得不可開交，乾脆兩人一起到點下車。

周南揭發許家屯如何腐化，都屬捕風捉影。金建一說：“許家屯的孩子中唯一來到香港的就是許閩，也不是老爺子安排的，是我幫助安排到了一家中資公司當普通職員。其他子女沒有一個來到香港，投靠哪位資本家、合夥做什麼生意……統統都沒有！”

《明鏡月刊》記者獲悉，反倒是周南自己把女兒安排到香港，還授意新華分社副社長朱育誠用公款給他在北京低價弄一座豪宅別墅。不過，周南退休後，門可羅雀，寂寞異常，每天只能自鳴得意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他取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詩句，作為自己的回憶錄書名），只有老夫婦兩人——不是舉案齊眉，而是

吵架幹仗泄火。

結束談話之際，金建一再次強調：許家屯出走，根本沒有任何“西方敵對勢力”策動，是他觉得受到不公正待遇，預感到有更大的危險臨頭，不能坐以待斃，“大杖則走”麼。什麼“叛國投敵”、“美國策動”……統統都沒有！就是他的幾個朋友“兩肋插刀”。更何況許家屯來美後，對“初心”的信仰更加堅定，對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充滿信心，所以才有要回國的強烈願望。如果當初出走是背叛共產黨，怎麼還會有勇氣請求回國？

《明鏡月刊》記者問金建一：當初有沒有認真考慮過參與這件事的風險？

金建一說：“當時獲悉此事的時間很緊迫，就好比我在馬路上看到一位老人正試圖閃避一輛疾駛而來的汽車，你下意識地就會伸出手去。這無關政治，而是人性，何況還是相交多年的兩代人？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高伐林，《明鏡月刊》

## 許家屯如何秘密出逃？

知情人士稱，前共產黨高層官員許家屯把許多秘密帶進了墳墓。

許家屯於今年 6 月逝世，結束了他在美國 26 年的流亡生涯。之後，有關他在 1989 年 6 月天安門民主示威活動遭鎮壓之後大膽逃離中國，以及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些新細節浮出水面。1983 至 1989 年間，許家屯曾擔任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社長。這令他成為中國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的實際代表。

共產主義和民主勢力當時在香港陷入激烈的爭鬥，因此這些細節不止具有歷史意義。對於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的活動，共產黨一直保持著一種類似拒絕作證的沈默。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

香港民主黨創始人李柱銘 (Martin Lee)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在許家屯擔任香港分社社長期間與他見過幾次面。

“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不要太擔心。北京已經把大約五萬人輸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業工作——行政部門、職業領域。”如果英國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說，“這些人就會頂上。”

李柱銘表示，許家屯說這些話是為寬慰自己。“但你看看現在的香港，我覺得他們在掌控這裡。我們的特首是他們中的一員，一

個地下共產黨員，顯然如此，”他說。他指責的是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 (Leung Chun-ying)。

梁振英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

金建一 (Kam Kin-yat) 表示，許家屯在香港交了許多朋友，包括民主派和企業界大亨。金建一的父親金堯如 (Kam Yiu-yu) 當時擔任親北京的香港《文匯報》主編，是許家屯的老朋友。

金建一在洛杉磯接受電話採訪時表示，許家屯思想比較開明，不過結交朋友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李柱銘提到，許家屯曾鼓勵身為律師的他和工會組織者司徒華 (Szeto Wah) 成立政黨。

李柱銘表示，許家屯和司徒華進行商討時，“提到了沒跟我講過的一點——司徒華不必擔心資金問題。當然，現在香港建制派的政黨也由北京資助，直接或間接通過本地的大亨實現。”

在天安門抗議事件發生後，司徒華成為公開批評共產黨的人。

金建一表示，隨著這類抗議活動震動中國，當時的黨總書記趙紫陽請許家屯從香港的角度評估政府的最佳回應方式。許家屯告訴趙紫陽，需要以“和平的方式予以解決”。

趙紫陽表示同意，但他因這一立場遭到免職，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強硬派長期軟禁，直至去世。1989年，許家屯申請退休，但卻被免職。1990年1月，保守派人士周南被任命為他的繼任者。

許家屯轉移到毗鄰香港的深圳，看起來是在等待北京發出決定他命運的消息。但他將命運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據金建一講述，4月30日晚8點左右，許家屯不同尋常地到新華社深圳分社的大樓外散步（此處有誤。應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

深圳辦事處——本書編者)。金建一說這是他第一次對外透露自己協助實現的這項逃脫計劃的細節。

“他空著手外出散步，”金建一說。“一個手提箱都沒帶。”

金建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得到現居紐約的明鏡出版集團 (Mirror Media Group) 出版人何頻 (Ho Pin) 的證實。

在一位家人的陪伴下，許家屯戴著一頂高爾夫球帽掩飾身分，在羅湖過境，進入香港。然後他登上一列火車，在上水站下車，沿著鐵軌走了大概 100 英尺 (約合 30 米)，到達金建一開車來接他的地方。

金建一表示，同一天晚上，北京的指令到達深圳，要求沒收許家屯的護照。

許家屯在香港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由新華社香港分社轉交。他在信中承諾不會泄露任何秘密。負責寄出這封信的金建一稱，許家屯的希望是，如果他堅守自己的承諾，他在中國的家人就能得到寬大處理。美國領事館給他發了簽證，並幫他在最後一刻拿到機票。

許家屯一直保守著秘密，但共產黨始終沒有滿足他回國的願望。

狄雨霏 (Didi Kirsten Tatlow), 紐約時報中文網

# 許家屯的 私人秘密和政治秘密

謠言從來具有豐富和活躍的生命力，不可能止於智者，有時候澄清也無濟於事，尤其是涉及公眾人物。但是，我依然想就許家屯先生的某些傳聞作些說明，盡管他生前對此表現淡然，內心卻應該還是有傷痕的。我希望我的解釋能使他的在天之靈更平靜，也為歷史作下一份證詞。

我多年前就在中國見過許家屯，但當時並沒有私交。來到美國後與他交往 20 多年——不是僅僅作為媒體人、出版人與他的關係，或者是一般性的朋友交往，而是有很深厚的私人情誼。他讓我近距離地直接觀察到一個中共高級官員的內心世界和思維方式，也讓我了解一位長者的生活習慣、歷史經歷。

20 多年來，他來到美東就住在我家，我去了加州就住在他家，一住多日，有時一連幾個星期在一起，朝夕相處，暢論家事天下事；一起開車周遊，一起坐郵輪，一起泡餐廳……甚至我第一次去拉斯維加斯，也是在一次晚餐時談及我還沒有去過賭城，他立即提議由他兒子飯後開車前往，凌晨三四點才抵達。他對賭博既不會也不

參與，卻有一套對賭博經濟的理解；他喜歡打麻將，我不會也沒有心思學，他便屈尊跟我玩紙牌，常常為出牌面紅耳赤。

我與他交往方式，與別人是很不一樣的。多數人見他，都非常恭敬而拘謹，講話小心翼翼，畢竟他是位前高官，是位長者；但我與他講話很隨意，常常反駁他，甚至調侃他，逗他樂，他有時哈哈大笑，有時笑罵我一句，有時笑而不語，這種關係，別人看了很吃驚；但這種關係更平等、更親切，使我比一般人更能與他聊到一些敏感的問題，包括一些私人問題。

### 許家屯的私密之一：情人是誰？

在許家屯的追思會上，參加者都會注意到，有一位女性，並非他的子女，卻站在第一位；她的花束放在最挨近許家屯靈柩的最顯眼位置，署名 Helen（海倫）。朋友們都認識她，最近有名的美國作家陳燕妮記敘參加許家屯追思會的文章，專門寫了一段 Helen，明鏡新聞網也全文轉發。陳燕妮的行文如人，毫無春秋筆法，直指 Helen 便是傳聞中許家屯的“情人”，讚揚了 Helen 的為人。

我與許家屯一開始交往，同時就認識了他身邊的 Helen，後來也就成了朋友。我自己和我的媒體在寫關於許家屯的文章時，常常下意識地避免觸及這個隱私。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漸漸覺得，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忌諱。許家屯當年與元配顧逸萍一同出走，成了革命夫婦，兒女成群；而 Helen 是許家屯晚年的生活助理，也是他的紅顏知己。



當年，74歲的許家屯途徑香港飛往美國，是他二兒子許聞送他上的飛機，陪同他的有二兒媳、孫女，許聞處理完幾件急務隨後也就到了。許家屯一行開始住在洛杉磯西來寺，後來一大家租住在爾灣的公寓，還一度借住在台灣一位航空業大佬的房子中。



許家屯與 Helen。

過去對於許家屯和 Helen 怎麼相識，事涉敏感隱私，我很自覺地不去觸碰。但是這次在協助辦理許老後事中，我看到 Helen 極為傷心，常常痛哭垂淚。她是在許家屯無權無勢、身體也越來越差的歲月中照顧了他二十多年——有時許家屯的子女照顧他，但大多數時間，是 Helen 在照顧。無論如何，這是不能輕易加以嘲弄的：有幾個子女能做到這一點？幾個朋友能做到這一點？是什麼力量支撐她做出這麼大的犧牲？

Helen 是中共軍隊幹部子弟，本人也曾是解放軍一名軍官，據說年輕時是南京軍區有名的“黑牡丹”，漂亮而有氣質。她是怎麼認識許家屯的呢？她的妹妹嫁給許家屯的小兒子（很早離婚了），有一次她隨妹妹到許家，吃飯吃到一半，許家屯下班回家了，家人要給

他添碗拿筷，許家屯說，你們吃吧，別管我，就去忙去了。

最開始的接觸就是這麼簡簡單單幾句話，但給 Helen 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從小在軍隊，見過許多高級將領，包括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無不粗俗無禮，根本沒有對人的尊重，像她這樣的年輕女兵，多怕見這些老將軍，能躲就躲。她非常驚訝，在中共高官中，竟有許家屯這樣儒雅和氣、談吐清晰又態度平易的人。

Helen 後來成了家，有了孩子。過了一段時間，作為受信任的駐紮深圳的軍官，Helen 被中國政府安排前往香港工作，成為“200 人計劃”中的一員——這是中共為“九七”佈局的一部分：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遵照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幫助香港企業度過難關，在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幫助下，安排由國務院交通部出面，貸了一筆款給董建華的東方海外公司，Helen 與其他交通部的幹部，就是作為出資方的代表來到董建華公司任職。Helen 在香港，曾經隨許家屯、董建華一起，訪問過美國夏威夷等地。

Helen 從不關心政治，1989 年學潮，她基本上沒有參與。1990 年 4 月 30 日，許家屯預感到要被整肅，冒險出走，Helen 是看到報紙才得知這件事的，十分吃驚和不解。

很快，董建華找她談話，告訴她，許家屯出走到美國，需要照顧，他的家人照顧不過來，問她是否願意前往？她設法找到了許家屯在美國的電話號碼，撥了電話給許，詢問他在哪裡，近況如何，許家屯在電話中表示希望她來照顧自己。已經離婚了的 Helen，就這樣離開了香港的東方海外公司，來到美國，與許的家人一起照顧他。

後來，許家屯的兒子許閩一家人因為不適應美國生活，就回國



1988年，經東方海外公司安排，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前往美國訪問遊覽。

了，只留下 Helen 照顧許家屯。

Helen 內心充滿矛盾和掙扎。來美國之初，她哪裡想得到，要滯留這麼長的時間！她有父母，有兒子，來到美國時四十出頭，現在也已年近古稀。她早就想回去了，但是她看到，許家屯在身居高位時，門庭若市；到他出走美國，雖然過一段時間，會有老部下、好朋友前來拜訪，但是畢竟更多的是平常日子，需要獨自度過、需要身邊有人照顧。

許家屯到了晚年，頭腦清楚，記憶力驚人，但是他畢竟耳朵和眼睛越來越不行，走路也步履蹣跚，生活越來越難以自理。最熟悉他的起居飲食乃至體力病情的，還是 Helen。許家屯越來越依賴 Helen，每次 Helen 回國探親，許家屯都明顯地情緒低沈陰鬱。

這樣一掙扎，二十多年過去了。

許家屯所關注的政治方針的變化，高層措辭的調整，國際關係的博弈……Helen 統統不感興趣，我帶著朋友來跟老人談得熱火朝



Helen 萬般不捨許家屯離去。(高伐林攝)

天，Helen 都不參與。但許家屯到哪裡，她跟隨；有人來拜訪許家屯，她接待；許家屯有事要辦，她打理；許家屯要與人打交道，她交涉。所以媒體上就稱她“私人秘書”、“生活助理”……

許家屯活到一百歲，在我們看來，這是驚人的高壽了，但是 Helen 發自內心地相信，如果他能得到更好的照顧，就能活得更長久，儘管這樣也就意味著自己更長久地辛苦。她已經完全將照顧許家屯看成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感情、義務和道德，就這樣交織在一起。

許家屯的夫人顧逸萍在江蘇去世之後，許家屯與 Helen 的關係，在朋友們看來，就更加順其自然，並無不堪，也並不浪漫。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很欽敬許家屯的女性，獻出了她自己寶貴的二十多年年華，來全力照顧他。凡是熟識許家屯和 Helen 的人，無不稱譽她對老人這麼多年的照顧了不起，是一位奇女子。

最後幾年，許家屯的女兒許蓉來了，與 Helen 一同照顧。其他幾位子女也相繼前來看望，尤其是臨終前，子女與 Helen 在場，他走得安詳。

## 許家屯的私密之二：捲款多少？

有傳聞說許家屯捲走大筆巨款，在美國過著奢華的生活。

我數不清與他一起吃過多少次飯。許家屯不像中國那些成功商人、得勢高官那麼熱衷珍饈美味。他的飲食簡單，最大的興趣是切磋、思考問題，而不是吃。他不吃海鮮，與大魚大肉無緣，充其量喜歡吃一點家鄉的小黃魚、吃燒得軟軟的青菜。他也不嗜酒，但遇到高興事，他也愿斟一小盅家鄉的洋河大麴，與大家一起舉杯。去世的前一個月，他堅持要和我們喝一杯。

在我看來，他就是個“土八路”麼，根本不懂得吃，不脫農村習氣，吃飽就行。在香港，他與大商人時常要有餐敘，也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講排場，而是談事為主，交流為主。

許家屯的住宅很不錯，但談不上多麼豪華，他買的時候，當地房價還不太高，Helen 也將自己在香港的住房賣掉，加上許家屯撰文寫書得到的版稅稿費，才買下這處住宅。後來升值了，但他們用房子做抵押，換取生活費用。

他不認識錢，美元和人民幣都不認識。在中國當官時，工資都是秘書處理。到美國，沒有現金收入，也很少現金開銷。和美國一般老人一樣，他享受免費的醫療照顧。

在他比較年輕時，飛來美東或到其它地方，坐的還是經濟艙。後來身體不那麼好了，有朋友得知，才幫他買商務艙。我到加州去見他，他總要 Helen 帶我們到外面吃飯，再三叮囑 Helen 買單，但往往最後被我或朋友搶下買單。我就跟他開玩笑：你們共產黨狡猾

狡猾的，請我們吃飯，最後還是我們買單！

從幾十年的交往中，我看不出來他帶了多少資金。有一次說到，當時到美國帶了八千元或一萬，忘了問他是美元還是港元？十幾年前，他曾提議，他口述我執筆，一起為香港媒體寫稿攢稿費。也曾幾次與朋友合作，想弄點商業合作，出的資也就幾萬元。

更重要的證據是，中共從周南接任就調查他，他出走後更是翻箱倒櫃地調查，對他有那麼多的誣陷之辭，最想找出的是他經濟上的把柄，好給他定一個“貪污受賄”的罪名。但他們就是找不到！文件上從來沒有說他捲款逃跑這條罪狀。

說許家屯沒有經濟犯罪，倒有幾個例子可為反証。真正揣著巨額公款潛逃出國的人，會像許家屯這樣在海外拋頭露面嗎？不會的，他會潛藏下來。有一個級別跟許一樣、資歷沒法跟他比的人，正巧可以作為一個對照：高嚴，曾經當過吉林省長、雲南省委書記、後來擔任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跟許家屯相同，他也是中共中央委員；跟許家屯拒絕李鵬拉攏截然相反的是，他是李鵬的馬仔，提拔了李小鵬、李小琳。高嚴才真正是被認為是捲款逃跑，現在誰知道他的下落？

更諷刺的是，許家屯在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部下，分社第一副社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鄭華，後來擔任許家屯專案組副組長，來整他的黑材料，鄭華自己才真正涉嫌經濟犯罪，帶了大量的錢出逃海外，銷聲匿跡，也沒有人知道其下落。

中國有句俗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可高嚴、鄭華這些人的“廟”在哪裡，瞞得嚴嚴實實，絕不讓人知道。對比之下，許家屯不

僅“廟”在那裡，“和尚”在那裡，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要求回國，他敢於這麼要求，說明他心中坦然，若真有經濟犯罪，回國豈不是自投羅網？

反過來說，當局又是天網行動，又是獵狐方案，紅色通緝令發得煞有介事，卻偏偏就是不讓許家屯回國——這難道不是從反面證明了他並沒有任何腐敗犯罪，等於給他的清白做了背書嗎？

### 許家屯的政治之術

中共將“統一戰線”列為獲勝的三大法寶之一，與“黨的領導”“武裝鬥爭”並列，各級黨委都設有統戰部。但是統戰部這些年來哪裡還有一絲統戰功能？只是中共總體腐敗的一部分。

統戰部門，按照中共自己的初衷，應該是盡力團結社會上與中共有不同意見的、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現在政協中充斥的卻是什麼人呢？多是歌星球星、老闆名流，“政協委員”成為他們用以自我炫耀和保護的標籤。所謂的民主黨派負責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這些頭銜是他們升官發財、甚至躋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捷徑，坐在那裡道貌岸然地參政議政，只是給中共充場面而已。

中共的統戰部墮落成一部“分贓機器”——你給它多少錢，它給你什麼頭銜，與其稱之為“統戰部”，不如稱之為“被統戰部”。

而當年許家屯到香港去做統戰工作，完全不同。

商人是香港社會的中堅，許家屯到香港後關心商人，與他們加強溝通，像 1985 年，包玉剛患有癌症，許家屯就積極幫助他治療。

他更幫助商人渡過經濟危機，重新站穩。當時的商人，第一對中共沒有信心，第二也沒有看到中共治下能有自己在中國發展的機會。許家屯不是簡單地給商人一個頭銜、一個名額，也不只是讓中央掏錢挽救他們的企業，而是信任他們，與他們一起討論如何促進中國發展，也促進他們自己的事業發展，設法幫他們開拓合作的空間。他跟李嘉誠經常交談，與他一起吃工作餐，聊去聊來，就聊出了海南建省的想法，後來開發海南建省設特區，經過許家屯居中牽線搭橋，李嘉誠就起了很大作用。現在的統戰部賞賜那些拍馬屁的人一個“委員”席位給他們做保護傘，哪能與他同日而語！

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是傾向中華民國的，他的東方海外集團，特意用中華民國的國花——梅花作為標誌。當公司遇到極大的經濟困難，他們找台灣政府拉一把，台灣見死不救；董建華情急之下，轉而找北京。許家屯認為，幫這些商人，就是幫香港、幫香港民眾。向中共積極建議，最後經趙紫陽拍板，由交通部出面給予資助。

這樣的事有很多起。有個別被資助對象是白眼狼，緩過氣來發了財就走了，但更多的人將錢還給了國家。董建華就是這樣，他將交通部投資的救命錢都還給了交通部。這是董建華後來成為特首的背景。

許家屯與香港媒體的關係也堪稱典範。他曾告訴過我，香港每一份報紙，他每天都要看，那個年代，報紙是掌握香港動態的最重要渠道，他坐在那兒從頭版翻到最後一頁，沙發都磨破了，袖子被報紙的油墨蹭得髒兮兮的。



許家屯主動接觸媒體人——包括《明報》老闆、武俠小說作家金庸。而且許家屯有個特點：你越反動，我越主動，他看到香港哪些專欄作家和媒體老闆不信任中共，對回歸持反對和抵制態度，他就越是主動去找他們溝通。

現在中共統戰部的座上賓，不是對中共方針政策持有獨立思考見解的思想家、文藝家，而是比中共觀點更左的人、品質更低下的人，而許家屯是去團結不同思想觀點的人。許家屯尊重他們，照顧他們的感受。他不指望改變對方的看法，但是希望能增進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他們中許多人沒有改變觀點，這是不是表明許家屯的統戰沒有收效呢？恰恰相反，非常有效——香港的癥結就在於人們對中共沒有信心，許家屯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香港有幾十份報紙，發行量巨大，因為香港人喜歡喝茶，喝茶就要看報，這些報紙對香港民心的影響舉足輕重。許家屯通過與媒體人的互動、交朋友，讓他們感覺到中共並不是那麼容不得新聞自由，促使他們提出更有價值、更有分量的批評，促進了整個香港社會對中共加強信心，媒體也更具有公信力，逃離潮沒有失控——直到“六四”才形成高潮，人們才紛紛移民。

不能不承認他這一點令人驚嘆：許家屯來到香港之後，跟上時代的適應力何等敏捷！他本來是江蘇省的地方領導幹部，雖然是沿海省分，但其開放程度，遠遠不能與香港這樣的世界大都會、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剛開始他戴著墨鏡，穿的衣服也不合時，頭髮很亂，形象不佳，香港報刊和民眾嘲笑他是“土包子”，他從善如流，很快

就從形象到談吐煥然一新。到他離開崗位時，媒體戀戀不捨；這次他的追思會，滿屋花圈花籃，我看到其中一部分是香港的媒體人送的。

許家屯在任時，必須面對與中共作對的政治勢力。他既不是惡狠狠擺出戰鬥姿態，也不是躲在自己房間什麼人都不見；不管左的右的，他都去打交道，坦率談出自己的看法。他去世之後，比較正派的建制派、右派和中間派人士，同聲哀悼緬懷，評價都很正面。建制派有位領袖回憶說，許家屯退休時，到一個基層教育機構去告別，這在中共高官中是非常罕見的。

他晚年與我們這些小字輩交往，也體現了這個特點。雖然彼此觀點不同，甚至南轅北轍，但他能容忍不同聲音。因為我們關係太熟了，我就像他的一個晚輩，所以偶爾他也會對我發一下火。但總的來說，對我的異端邪說，他不僅能夠包容，而且能夠認真傾聽。

他認為我是做媒體的料，有一次我去紐約 JFK 機場送他上飛機，他拉著我的手說，我要是還在任，就向中共中央申請，批給你兩個億美金，讓你把媒體做大！中國人需要在世界上有一個大媒體。你是認真做媒體的，是真正相信專業精神的、懂得媒體規律的媒體人，你敢於讓不同聲音都表達出來，儘管你討厭中共的聲音，但你也不會去捏造、封殺它，你不會歪曲你不喜歡的信息，而會努力去誠實、準確地傳達出來，這是很難得的。

後來，他多次說要介紹我去找信任他的大商人——他點出了幾個大商人名字，說要動員他們給我投資。他這麼說，我只是笑一笑，但我當然不會同意，因為我認為，只有媒體獨立，聲音才會獨立，一

個媒體沒有自我生存能力，終究會喪失獨立的聲音。獨立生存能力，是媒體獨立聲音的基本保證。

最近幾年，他也總是說，你的媒體要做大！大了，才能對中國有重大幫助，對世界有重大意義，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做得很辛苦。他總是問我，要不要認識這些大商人？要不要我寫信給這些大商人？我總是回答他，我首先想做好一個獨立的媒體，而不是一個大媒體。

許家屯是吃過虧的。他資助過一個台灣人辦的媒體——統戰需要麼！但這位老闆總是進出賭場，有一次居然在賭場裡輸得精光，打電話給許索要幾十萬元。許家屯沒辦法，雖然當時中國的財政還很困難，不像現在“不差錢”，可是當時要拍中共馬屁的人不像現在這樣多嘛，這個關係還不能斷掉，許家屯只好向楊尚昆求助，由國家來買單，特批給這個所謂“台灣媒體大亨”資助。許家屯說，與中國的形象比，與中國的統一大業比，這個錢，還是小錢。

媒體人中也有他佩服的，許家屯常跟我說：陸鏗是好人，但他爲了新聞不顧一切，急於發表一些報道，最有名的一次就是經過許家屯安排，上京採訪了胡耀邦，卻對胡耀邦明確要求改的幾處不肯改，最後成爲導致胡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對這一件事，許一講起來就很生氣，說陸不顧後果。但他與陸鏗又是很好的朋友，對陸鏗的人格給以很高評價，說他不爲錢、不討好權貴。許家屯當新華社分社社長時，有一次陸鏗過生日，許送了禮，陸鏗一定要退回；許要給他資助，他也不要。

我跟陸鏗關係也很好，陸鏗在台灣寫回憶錄時，我去看望他，

才了解到，陸鏗這麼有名的記者，人脈這麼廣泛，經濟卻很困難。他請我到餐館吃飯，沒有吃完的菜，他就交給廚師保管，我很奇怪，廚師告訴我：陸大哥就是這樣的，招待客人沒吃完的菜，保管在這裡，他平時就吃這些。陸鏗這些高貴的品質，使許家屯和他保持了那麼長久的友誼。

許家屯與金堯如的關係也一樣。一起吃飯時，金非常率性，又喜歡喝點小酒，金與許的政治觀點很不相同，尤其到晚年，金對中共完全不抱幻想，喝酒喝得臉紅脖子粗，高聲大嗓，許不動聲色。他們倆是生死之交，關係源遠流長，但他在任時，並沒有照顧金堯如及其家人。他能出走，是金冒險協助，如果沒有金，能否出來是很難說的。那在當時是非常政治舉動，稍有閃失，性命堪憂，至少很可能終身坐牢，但金氏父子毫不猶豫地幫助了他。

金堯如先生曾是中共台灣工委宣傳部長，當年中共台灣工委全體被捕，獨有金得以逃港。一個早年成功地逃脫了國民黨緝捕的人，晚年幫助了一個中共高官成功逃脫共產黨的緝捕——歷史轉了一個怎樣的大彎！

我很早時就見到一些老紅軍、老首長、老革命，他們也常常給我們講革命經歷，但講著講著，就講起了恩怨，家長裡短，這個將軍怎麼造假，那個書記怎麼行騙。許家屯不是這樣，也常常回憶江蘇、香港的往事，但很少掉入恩怨的陷阱，我們知道江蘇的班子、香港的班子中人事矛盾很複雜，但他基本上不跟我們講述瑣碎的是是非非。他對江澤民、李鵬是非常有看法的，但即使談到他們，他用詞也非常謹慎，很有分寸。

像他這樣不在背後議論人的，我敢說，不僅在中共政治人物中很少，就是在一般人當中也很少。

香港某些人對許家屯落井下石，在許去世之後，有人在中共報紙上講了一些很不得體的話。許生前也遇到類似的事情，我與許家屯談起來，他不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很少用激烈的詞，更不用猥瑣的詞。

例如，我們曾經聊到姬鵬飛，姬比他的資格還要老一些，掛了很多頭銜——中共許多元老都是這樣掛很多頭銜，卻並沒有到任，更不會管具體的事情，許家屯在五十年代初擔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時，書記是韋國清，但韋根本沒有到福州市委上過一天班，都是許家屯在當家。這是中共體制中很不正常的現象，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尤其明顯。姬鵬飛退休後又重新出山擔任港澳辦主任，但他實際上撒手不管，也不關心，關心的是打麻將，在打麻將中得點小錢。而許談到這些事時，都是輕描淡寫。

不參加政治活動，是他出走美國之前就給自己定下的原則。他來美國，是金堯如託付陸鏗去接洽星雲大師，接待他到西來寺落腳，也就是爲了顯示自己避開政治。

我介紹了很多朋友給他，每個朋友都有不同的觀點，多數情況下他都樂意傾聽和交流。但他也有原則。海外一些人邀請他參加各種活動。但如果是政治標籤鮮明的反對派或民運領袖，他往往不願出席。有一次一位民運人士兼商人舉行婚禮，希望通過我來動員許家屯出席，我答應了，但跟他一說，他堅決不肯去，認爲這位人士名聲太大，反共色彩太明顯。我因答應了對方，於是半開玩笑地



站到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巨人身邊。

說：“許家屯同志，你同意也得執行，不同意也得執行——因為我已經答應了，這是沒辦法的！”他勉強去了，但頭天去了，堅決不出席第二天的正式婚宴。

### 許家屯的政治秘密：留下的和帶走的

人們說：許家屯去世，帶走了許多秘密。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事實。對這些秘密，他堅決咬住，不肯和盤托出。有時我跟他開玩笑說：你千萬別跟我講秘密，秘密掌握越少越安全。有時我逗他：講出來吧，再不講就貶值了！他說，我死也不會講的。

到底他“死也不講”帶走哪些秘密？二十多年來，經常聊天，也支離破碎地了解了一些，我大體上認為，這些秘密，有一些確實是我們不太了解的，例如，他對情報系統的掌握，對高級幹部的腐敗，高層關係的複雜……他不肯講。

不過，我點過一些情況，贏得他的共鳴。

我跟他聊起，80年代時，見到國共內戰時期第三野戰軍的一些老將軍，他們發牢騷說鄧小平上台之後，刻意打壓華東系、三野系。舉了若干例子。1983年嚴打時，抓了高幹子弟，說他們違法犯罪，但後來看，給他們安的罪名都很蹊蹺，實際上證據不足甚至沒有什麼證據，卻被處以極刑。

例如胡曉陽，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養子，《世界建築導報》的記者；陳小蒙，是《民主與法制》的記者，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都被控定義含糊的流氓罪而被槍斃——陳小蒙的家裡到現在一直認為是冤案；葉飛的女兒也因經濟犯罪被捕下獄；許家屯本人的兒子當時在一個城市擔任局領導，也坐了牢。許家屯後來一直對這個孩子很內疚，認為是自己牽累了。

鄧小平與三野的矛盾也延伸到“六四”，七位上將上書反對武力鎮壓，與此也可能有關係。本來中共政界軍界，四野山頭是最大的，但文革中爆發林彪事件之後遭到重挫；一野本來就沒有多少實力，不足為患；就只三野與二野PK了。上書的七位上將中，葉飛、張愛萍、宋時輪等都是三野的。鄧小平肯定意識到了三野這些老人的積怨，於是在“六四”鎮壓之後設法化解，啟用了三野參謀長張震，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鄧小平之所以同意李先念、陳雲的推薦、讓江澤民接班，也可能考慮到了江是華東系的後代。

我跟許家屯談起鄧小平對三野系統的人下重手，激起三野的人不滿，許很有同感。

對於高層政治中隱秘的關係，一般的地方官員因為離得較遠，

並不像在北京工作的人那麼了解。但是江蘇不是一個一般省分，又是南京軍區所在地，所以許家屯比一般省委書記有機會了解得更多。不過，他通常並不太吐露，通常都是點到為止。

許家屯究竟保守了哪些機密呢？我認為，大體上有這麼幾方面：

首先，他是港澳工委書記，他走馬上任就提出要求：要把港澳地區政出多門的情報網整合起來。這個地方，幾十年來中共各個系統都向這裡滲透，就拿軍隊系統來講，就有總參二部、三部、總政聯絡部、總後、國防科工委，還有南京軍區、廣州軍區等；軍隊以外，還有公安部、國家安全部……他們都有情報人員、秘密工作者。

許家屯要求都由他統管，中央同意了。當然，他畢竟是比較高層的領導人，主要是宏觀領導，除了重大事件他必須親自了解詳情、重要系統他必須熟悉幾個主要領導人之外，更多的事，他不可能了解得很具體深入。但有幾個方面是比較特別的，他要親自掌握——

第一方面，中共發展了哪些地下黨員。在港英政府中、後來的特區政府中，有哪些秘而不宣的地下黨員？香港有很多傳說，但許家屯守口如瓶。我每次問他“×××是不是地下黨員”，他都打哈哈。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僅敏感，而且他時刻謹防因自己的言論在香港鬧出大風波。

第二方面，中共勢力的佈局。各地的國家安全、公安系統都發放了許多持單程通行證來到香港的新移民，不少是政府派遣的特殊人員，有的擔負長期使命，有的在一段時間內扮演一定角色。許家屯應該是掌握一部分情況的，因為他很自豪地說過：“我們有很



多很多方案!”他還說過,各個系統中都有我們的人。中共有兩手準備,一手是儘可能與英國合作,儘可能在華人精英中做好工作;另一手,對於香港回歸前後可能發生什麼情況,制訂了很多預案,來應付所有的情況,不排除發生動亂甚至暴亂的可能。考慮得嚴重一點,防範於未然,是他參與佈局的重點。

第三方面,滲透是多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某個表面上紅得發紫的華人,可能是港英有意留下的棋子——有意給人很左、很進步的印象,以愛國領袖的身分出現,與北京關係密切,其實可能背負港英或其它勢力的某些使命。許家屯是掌握一些人的真實面目的——當然,我懷疑他們掌握得那麼完整,但至少他的口氣中透露已經掌握了其中部分人。這一部分人,他也不講。

九七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的重大試驗,很多人對此很稱讚鄧小平,認為確實是個天才的方案,一舉兩得,既解決了香港問題,也針對台灣——希望借香港這個試驗,對台灣能有示範效應。有次我去《鏡報》老闆徐四民家,他也對我說過:要做大買賣了,要把在解決香港問題中獲得經驗的一批人,投入到解決台灣問題。當然台灣後來的事態發展,出乎人們的預料,當時也並沒有估計到“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個成功的好樣板。

許家屯在擔任港澳工委書記半年以後,又增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職務,直接聽命於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這個小組,由楊尚昆主管,他也是軍委實際當家人,明確指示許家屯在香港主管對台溝通的渠道;楊尚昆的助手、副組長、辦公廳主任是楊思德,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上將是組員。

許家屯與“三楊”打了很多交道。楊德中上將的子女在許家屯去世之後送花圈，顯然是代表父親，也是當年在對台工作中結下的淵源。而這也正是激化許家屯與周南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南認為許家屯沒有完整移交，但許家屯交卸職務之際，是楊尚昆特別明確叮囑：這些對台聯絡渠道，不要交給周南。或許楊尚昆認為，台灣工作對象都是國民黨元老，年紀比較大，而周南的資歷不夠、分量不夠，才要許不交給周南？這是否涉及與江澤民、李鵬的微妙關係？李鵬當時親自拉許家屯入夥，他拒絕了，他們是不是通過打壓許家屯，來與楊尚昆方面進行博弈？我們不清楚，但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許家屯在對台秘密事務中參與了哪些事呢？雖然他講起來含糊其辭，我拼湊起來，他隱約透露出，與台灣的交往層次很高，次數很多，關係很密切。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將畫家范曾的一幅關公，交給台灣某位領導人，傳遞信息。關公傳統上是穿綠袍的，但這幅畫上的關公卻穿了紅袍，據稱是暗示代表中共。



許家屯與范曾。

還有一次，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大陸為了給李登輝一些顏色看看，舉行軍事演習，許家屯無意中講到：當年呀，是“他們”要求“我們”搞軍事演習、“他們”要求“我

們”施加壓力呀，有利於“統派”在台灣島內站穩腳跟。若沒有大陸的軍事壓力，他們在台灣更加孤立、更加弱小。當然，我不相信所有台灣“統派”都是這種想法，但是我相信，確實會有某些元老要求與“我們”暗中合作。最近幾年，不是很有一些台灣政界人士頻頻前往大陸，要求合作，可以看出其來有自：他們希望打大陸牌。這些是不是也是許家屯掌握的秘密的一部分？

有一次許家屯派了最信任的一個部屬秘密前往台灣，接觸了很高層級的官員。許事先就交代了：如果被發現了，堅決不能承認自己的身分。後來這個秘書回到大陸，但是至今對這一段經歷絕口不談。

老實說，這些問題，時過境遷，現在已經變成明日黃花。不過，這畢竟還是兩岸關係史上一段重要的經歷。

還有一些，應該也是許家屯保守秘密的內容：當時許多重要人物，高幹子弟，都想弄到一個香港身分，視作榮耀、機會，而許家屯是這方面的大佬，所以他們都想跟許拉上關係。這一些內容，許家屯也是口風甚緊。

他的秘密，我想不外乎包括以上這些方面吧？

有人曾經說過，胡耀邦是中共領導人中的異數，我看許家屯，也實在是中共高官中的異數。我見過不少中共級別相當、年齡相仿的元老，我常常拿他作比較，這些人頭腦很糊塗，價值觀很混亂，記憶一片混沌；而他不僅記憶力很好，知識結構在更新，有很多獨特的思考，有邏輯性，可以有條不紊地闡述好幾個小時，比那些高官強得

太多了! 直到生命的最後歲月, 101 歲了, 才腦子開始糊塗, 有時告訴我“我講三點”, 但講了五點, 又跳到了第二點……

他去世之後, 我每天都在回憶與他交往的片段, 很懊悔在許家屯在世時, 沒有更珍惜與他的友誼, 更充分認識他的價值; 沒有在他頭腦還清楚、記憶上佳時, 多問深談。我每次帶了些朋友去, 朋友與他聊起來了, 我往往坐到一邊處理我的事務了。所以一些朋友了解許家屯的思想和他的口述歷史, 也許比我更為深入, 更為系統。現在回想起來, 我很遺憾, 也很歉疚。

今年 6 月, 他住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院, 醫生說他的生命已近耗盡, 器官衰竭。我對 Helen 說, 他在醫院臨終房得到照顧更好些, 許家屯卻堅持要回家。

去世前三個星期, 他沒有吃任何東西, 甚至沒喝一口水。生命力意志之強, 罕見。

去世前幾天, 我在他的床前, 不知說什麼好, 只是對他說, 我會幫你出書。他說, 等我半個月一個月, 我好了再來修改。

這一天, 是他最後講出話的日子。這一天, 他還講了這麼一句話: 壓力太大了, 國家給我的壓力太大了!

(2016 年 8 月 5 日 - 6 日)

何頻 口述, 高伐林 記錄整理, 《大事件》雜誌

## 隱居美國思考什麼？

1990年5月1日上午9時25分，從香港飛到舊金山降落的飛機上，走下剛剛交出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權柄的許家屯。他以“旅遊休息”為名，避禍去國，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彈指一揮間。這位被媒體稱為“繼林彪後中共最高級的出走官員”在美國南加州已經隱居整整15年了。1993年出版了《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台灣聯合報報系旗下分佈於亞、歐、美的所有報紙一時都因連載此書而洛陽紙貴，後來他又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但這些書，似乎充滿“畫一句號、告一段落”的意味，隨著歲月推移，許家屯好象越來越刻意退到了公眾關注的視野之外。香港回歸之後的“陣痛期”經久未歇，經濟一蹶不振，政治動盪不安，社會煩躁不寧，竟至釀成兩次香港“七一”數十萬人大遊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連任期間稱病辭職下台，全球矚目。但是在四面八方的嘈雜聲浪中，人們很少聽到這位深諳香港情況、為香港基本法立下汗馬功勞的前中共駐港最高負責人的聲音。

2005年4月，筆者前往南加州叢山峻嶺之中登門拜訪，整整一個星期，與許家屯先生作竟日長談，並抵近觀察他的飲食起居，執



許家屯時常眺望窗外的蔥蘢蒼翠。(高伐林攝)

意去探究這位前中共高官究竟在想什麼、幹什麼，同時也想請他回憶他的大半生經歷，梳理他的思想情感發展變化的脈絡。

## 他住的是一座“中國山”

許家屯住在位於洛杉磯郊區的齊諾希爾——Chino Hill。“Chino”在西班牙文中，就是“中國的”“中國人”之意，他住的竟是一座“中國山”。

看到這一帶山影幢幢，草色芊芊，不由得要湧起“世外桃源”之慨：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好一個修身養性的所在！

家中最不安靜的場所，卻是許家屯的臥室。他在這裡放了一

台大型電視，只要一開就開到音量特大，也難怪：視力與聽力減退，而他又是那麼急切地想看清、想聽清。他在這裡通過衛星電視，能看到中國大陸十好幾個中文頻道，看得最多的，是香港鳳凰台、江蘇國際台——他這一生中，投注精力心血最多的、結下感情最深的，正是江蘇和香港。他對筆者說，熟悉的地點，變化了的面貌，讓他格外感興趣，從屏幕上經常能看到許多熟人呢。當年的後起之秀現在正施展才幹，怎麼想得到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有一雙前輩的眼睛在注視自己？許家屯什麼節目都看，中國新聞、時事評論、文化專題、戲曲精選……他來自崑曲的發源地，愛看京劇，尤其著迷老生戲，過去他與很多當紅名伶有過交往，對他們的藝術成就如數家珍，雖然自己不唱——至少不當著人唱，但是看他目不轉睛，手指、腳掌下意識地打著拍子，可以想見對這些唱腔早已爛熟於心。

許家屯家裡文化氣息濃郁。陸儼少、錢松喆的山水與黃胄的駿馬遙遙對望，黃苗子的篆字與費新我的左手行書相映成趣，青花瓷瓶與天使擺鐘中西和璧……體現出主人的修養根柢和生活情趣。筆者卻被靠窗沙發旁的茶几上高高一摞書刊報紙所吸引。有上個世紀的老書，紙頁發黃，有這個月剛在中國出版的新著，油墨尚香：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好幾卷《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還有英國霍布孫著《近代資本主義進化論》、《江蘇省地圖冊》……

許家屯對記者說過，他在擔任中共香港主管時，每天要看十幾份報紙，其中香港 13 種，還要看傳達“北京聲音”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廣東地方報紙。早上起來匆匆掃一眼各報頭版

標題，就趕著上班處理堆積如山的雜務；晚上十點以後坐下來再細細閱讀，一直讀到夜深人靜。還得看有頭的、無頭的各種文件、“大參考”、“國內動態清樣”，每晚至少要閱讀五萬到八萬字。“了解中央精神，主要靠文件；了解香港社會信息，主要靠報紙。”

現在沒有文件看了，中文報刊就成了他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這裡有《世界日報》、《星島日報》、《亞洲周刊》……近年又多了何頻所創辦的媒體。

可慮的是，對於許家屯來說，報紙上的字越來越漫漶不清了，戴上老花眼鏡也無濟於事，閱讀成了難題，只能借助放大鏡。一座落地放大鏡燈放在窗邊，這就是許家屯的讀報角。坐在這裡，白天就著陽光，晚上開亮燈光，他可以聚精會神地半天不挪窩。

筆者注意到，讀報角的茶几上還放著一把剪刀呢。

## “二十世紀的經驗”

閱讀難，寫作也難。然而，許家屯的書桌上放著一個紙夾子，他常常坐在這裡，將思索寫下來，“有一天我寫了二三十頁！”看到筆者不大相信，他笑了：我的字寫得大呀，一頁寫不了幾個字！記者看到，果然，豎排密密麻麻寫滿了胡桃大的字。

不管怎樣，能這麼寫，足夠讓筆者驚訝了。“你在寫回憶錄嗎？”筆者知道，許家屯許多當年的同事、上司，像許世友、江渭清，都出版了傳記、回憶錄，數年來不少人也曾對他建議過，要他寫一寫自己的峰回路轉的生涯。他真開始寫了？



“不是！”許家屯說。他對寫回憶錄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回憶自己個人的經歷，沒有多大意思，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讀者也很難理解。要寫回憶錄，也得從當時國內局面、黨內形勢和社會生活的進程寫起。”他要放在宏觀視野下觀照自己個人的足跡。他現在每天在紙上塗抹的並非回憶錄，而是一篇暫名為“二十世紀的經驗”的思考心得。

“二十世紀的經驗”？——好大的題目！

他笑稱：這是被何頻逼出來的啊！原來，2002年4月，許家屯曾到美國東部小住，與他的忘年之交何頻等人圍繞中美關係、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等話題，激辯了幾天。他從那時孕育了一個想法：要將自己的看法整理出來。

許家屯雄心勃勃。他請來一位年輕朋友協助，自己口述錄音，請這位朋友整理打字，已經談了十來次了，大體上已經講完。他打算在近期內理清這部專著的思路，爭取今年下半年寫完書稿，“大概七八萬字左右吧，也可能有十萬字”。

“二十世紀的經驗”，到底指的是什麼？筆者要許家屯透露一二，但或許一來覺得思考還不成熟，還會修改調整，二來也想為未來的專著賣賣關子，他不肯講總體構架，只是將其中涉及的題目侃侃道來。二十世紀，實在是一個充滿了太多殺戮血腥的世紀，一個人類以空前的魄力和勇氣去探索發展道路、付出億萬生命代價的世紀，一個充滿了戲劇性轉折、希望變成絕望、絕望又孕育希望的世紀，自己有幸經歷過了血與火的歲月，豈能虛度，不將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後人？

這部心得的寫作，顯然讓許家屯十分興奮。扳著指頭對筆者說了好幾個他這部反思專著將寫到的“三”：

——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東西方各以美、蘇為首兩個集團的冷戰；

——三大社會運動的興衰：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民族獨立運動，資本主義自我改革運動；

——三大矛盾：貧與富的矛盾，和平與暴力的矛盾，多元化與一體化的矛盾；

……

筆者記得，許家屯在他們那一輩中共高官中，是以善於總結和提出提綱挈領的口號著稱的，頗見其政治謀略段位之高。例如，他來到香港後，將人們常說的“求大同存小異”改動一字，對外提出各界要“求大同，存大異”；他在對北京匯報時將當時香港局面歸納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震動了閉目塞聽、一廂情願地以為港人盼望回歸的中南海高層；而他提出“依靠兩翼”，即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資產階級，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更不啻石破天驚……

提起這些往事，許家屯十分得意：“我的膽子大得不得了啊！當年港澳辦對我這些提法統統不表態。只有一個人後來表了態，就是總書記趙紫陽。但我要求他書面批一下，他還是沒有批——不是他不想批，實在阻力太大！”

“江澤民上任後，提出香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實際上是否定了我的‘依靠兩翼’。”但許家屯沒有料到，江澤民後來提

出“三個代表”，又來了個“否定之否定”。

## 激進理想害慘中國

許家屯精神豐饒，精力充沛，他對此解釋說：“我睡得好，所以精神好！”有幾次，深更半夜了，筆者還看到他讀書、寫作亮著燈。他一談就是四五個小時，開始筆者還怕他累著，談了個把小時就要找個藉口請他歇一會兒，而他總是不予理會，不願打斷思路。最後反而總是累得我這年輕幾十歲的人叫饒。

筆者深切地感受到，許家屯這麼多年來確實思索了很多問題，力圖捋到最根上，也儘量站到最高處。他漫談到很多話題，每個話題，他都有其內在的邏輯性，有根有據，有條有理。

談知識經濟的特點，他講得頭頭是道：知識經濟同社會資本結合，不但能夠加速改變社會結構，而且使整個社會協調發展的可能性增加了，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不僅如此，人類對財富開發的手段也變了——要開發腦子，開發自身的潛能，這樣，普及教育成為最重要的任務。

他談本世紀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布什名之為“反恐戰”，這是一場超限戰：沒有前方與後方之分，沒有軍事與非軍事之別，從地下、水下到太空都可能是戰場，世上萬物都可以作武器，危險也正在這裡：可能動用核、化學、生物、網絡，和眼下還不知道的新科技；除了可能造成極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之外，還可能對人的精神產生摧毀性的衝擊：到處不太平，警報日常化，人類喪失安全感，憂

鬱症擴散……

談得多的，還是他走過的歷程，尤其是進城之後的風雨旅途。他詳細地回憶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戲劇性遭遇，又向前追根溯源。

許家屯不同意從“權力之爭”的角度研究“文革”，不同意從權力欲的層面批毛澤東——“這太膚淺！”他認為，毛澤東的錯誤是從放棄新民主主義、跨進社會主義開始的。他急於大躍進，急於搞人民公社，他的同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跟不上他，他就批評、鞭策，一次比一次嚴厲，錯誤就這樣升級，矛盾就這樣激化。換句話說，他與他們，確實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許家屯對筆者分析了毛澤東從“反右”到廬山會議，從“四清”到“文革”的思想線索，怎樣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各種力量的互動中，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步錯，步步錯，最後走向毛澤東思想的頂峰，也走向中國的浩劫。

毛澤東為什麼急於放棄自己親手制訂的新民主主義綱領、路線，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他的動機何在？”這是理解中國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的鑰匙。

毛澤東並不是在社會危機的壓力下才找社會主義的出路。許家屯回憶說，“當時的經濟形勢是好的，我接觸的中央領導人，劉少奇、陳雲都很自豪，說我們市民供應比蘇聯好，我們比蘇聯的一套要高明：蘇聯的貨架是空的，我們的貨架是滿的，他們吃黑麵包，我們吃白米飯。”許家屯將毛澤東的動機，歸結為他的激進社會理想。

再追問，毛澤東的激進理想，又從何而來？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讀得並不多呀。許家屯認為，還是從馬克思、列寧那裡來。雖然毛澤東沒有讀多少原著，但他接受了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社會的基本思路。“你不能只看他講話引用古文多，形成文字、最後修改，都是由大秀才們從馬克思列寧著作裡找依據，還要說給他聽，就變成他自己的東西了。”

### “下決心不評論香港”

筆者問：你這紅色一生中，在香港執掌港澳工委的七個春秋，應該是最亮眼的一段。今天在香港回歸八年之後，再來看香港，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沒想到，思維敏捷，滔滔不絕、不時發出“許氏招牌笑聲”的許家屯，一下卡了殼。足足有一分半鐘，他什麼話也沒有說。

筆者想再對許家屯“啟發引導”一番：“……譬如說，香港演變到今天，哪些符合你們原來的預計，哪些與你們當初的設想南轅北轍……”

許家屯卻冷不丁冒出了一句：“我來美國之後，下決心不評論香港。”隨後，又是半分鐘的沉默。

大概是對我的尷尬抱有歉意，許家屯還是開口了：

你要我談香港，這不是給我出難題嗎？一談，必然涉及評論香港當今人物和事件。怎麼評論？我不可能完全客觀，有我的立場和觀點。我一談，就會給現在香港已經錯綜複雜的局面添亂。

筆者理解他的顧慮。那麼，就換個角度：過了這麼多年後，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也出版了十二年之後，再回過頭來反思當年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許家屯指出，理解香港，有一個不可須臾忘記的最重要特點：香港是被英國人統治了一個世紀的殖民地。

本來是中國與英國之爭、殖民地與宗主國之爭，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又加上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香港成為冷戰兩個集團交鋒的主要前沿陣地之一。

“人們只說香港是‘金融中心’，‘交通樞紐’，其實，它還是‘間諜中心’！”他說，各路間諜雲集香港，香港是英國的遠東情報中心，美國與中國建交之後，本來情報中心在北京，後來也轉移到香港；情報人員人數最少的是蘇聯，因為很長時間中國與西方都抵制它，它搜集情報受到很大限制，派了人馬來香港刺探各種信息，香港沒有讓它與其他大國

一樣設總領事館，蘇聯間諜們只好想出各種各樣的名目在香港棲身活動。

新華社、港澳工委，是各路間諜的“眾矢之的”，“光對我們竊聽電話、攔截電訊，對方就



許家屯晚年視力急劇衰退，用上了這一副帶照明的放大鏡。（高伐林攝）

用了幾百人。我們新華社有的領導人辦公桌下面被偷偷裝設了竊聽器。新華社有一大一小兩個保密會議室，由國家安全部派專人來裝設反竊聽設備，對付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竊聽手段，但還是不保險。我與北京通電話，準備讓它偷聽的，我就在香港打；不想讓它偷聽的，我就去深圳打。”

雖然香港回歸了，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巨變，但許家屯相信，香港仍然是間諜們大顯身手的地方，這裡是情報“富礦”：比在內地要自由得多，每天幾十萬人進出；大陸又有那麼多企業、機構在香港。

### “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中詳細記載了英國人為了將香港繼續保留在他們手中而玩了多少名堂。在英國人認識到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心不可動搖，他們不得不交還主權、治權之後，在許家屯還在任的那個年代，就為保留他們的利益而進行全面部署安排。

“全面”到什麼程度？許家屯歷數了英國人各方面所下的工夫。

英國人管治香港這麼多年，從沒有搞民主，行政局就是由港督、三個司的主管、以及太古、匯豐、怡和幾個大亨組成，他們說了算。六十年代前期曾經有總督想搞點民主，但英資企業反對，因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搞民主必然要提高福利，就得加稅，香港稅率低的優勢就會喪失，於是叫停。可是，在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要搞

“代議政制”，要在“九七”前對香港政制來個根本性改變。1984年鬧出的“本子風波”，就是在“民主化”問題上的第一次交鋒。

許家屯很激動：英國人哪裡是真心搞民主呢？是想分化香港社會，以便在撤走之後保留影響，“外界往往只從‘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的角度看問題，其實焦點是由誰主導香港？每個人主觀上或許並不如此，動機各異，但客觀上是如此啊。”

講起“本子風波”，許家屯憤憤然：我批評了英國方面不按“本子”（中英聯合聲明）辦事，引起傳媒嘩然。“包玉剛、董建華、查濟民等人支持我，嘉道理要包玉剛帶話也支持我，但是姬鵬飛不支持，外交部一直不表態。後來還是鄧小平在包玉剛宴請席上明確地給我撐了腰：‘你沒有錯。’”

許家屯說：在組織、人事上，英國人對高級人才和公務員隊伍早就佈局謀篇；在財政預算上，英國人執意要修機場、大橋，上大項目，“我到香港時香港每年支出300多億港幣，到移交時支出竟達1千多億”；香港本來薪水就很高，港督的俸祿超過美國總統，英國人撤走前又大幅提高公務員待遇，最高達30%，一舉三得：收買了人心，留下了難題，又趁機大撈一把；連香港社會基層細胞——有些屋村委員會，英國人都控制，甚至請英國退休人員來管……

在許家屯眼裡，香港目前的眾多爭執、矛盾，都或明或暗、依稀可見英國陰影，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只是被人借題發揮的具體因素。

“你想，為什麼這些人‘逢中必反’？”

他認為，“逢中必反”現象有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有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



——新中國成立，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一是到台灣，二是到香港；

——中國大陸歷次政治運動，許多直接和間接受到傷害和影響的人移居香港，這些人多數對中共沒有好感，有些人甚至有仇恨；

——有些人受西方教育影響，受西方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對中共的專制很有看法；

——有些人對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有不完全理性的情緒化反應；

——少數人真正有政治背景。

許家屯還說，香港收回後外國影響自然有變化，“英國影響降低，美國影響增強。這是英國很長時間來在世界上力量比重減弱的自然結果。香港沒有回歸前，英國直接管制香港，在香港還主要是英國影響；他們撤走了，自然就減退了。西方還想在香港這個平台上發揮作用，要影響中國大陸嘛。都在說‘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他們既防止‘兩制’變成中共的‘一制’，同時又促成大陸變為香港的‘一制’，一直在鬥啊。”

“如果我在香港，可能被反得好一點，但是也會被反——他們這些人就是‘逢中必反’嘛！”

話說回來，英國人搞布置，中國人能閒著嗎？“我們也針鋒相對地搞啊，我當時手上掌管上億特費，不就是幹這個的嗎？”許家屯說起搞統戰給老報人陸鏗十萬港幣、被陸鏗退回的事，記者問：你還給了哪些人呢？“這些事，我不能講，一講，就天下大亂了！有些事，我到死都不能講。”

筆者勸他說：你寫出來收藏好，注明多少多少年之後再公開不行嗎？就像肯尼迪被刺案的有關史料那樣……

許家屯使勁搖頭：那也不行。

看來，黨籍被開除了的許家屯，黨性並沒有褪去。

## 調任香港是人生一大飛躍

筆者問：你現在留念香港嗎？最留念什麼？

許家屯嘆了一口氣說：從日常方面講，我對香港沒有什麼留念——關鍵是沒有概念：我並不知道香港到底有多好。你不了解，我在香港苦啊，苦得不得了！

許家屯說，新華社是“老虎嘴”，專門“吃人”，天天要跟人吃飯——香港時興在餐桌上、打高爾夫球時談正經事。“我不會打高爾夫球，也沒有時間學，而吃飯不用學，就得將吃飯當任務了。一年除了到北京和內地開會、匯報，我在香港呆三分之二時間，要跟人吃五六百次，你算算吧！像梅蘭芳一樣趕場，一天晚上趕兩三場。我同李嘉誠等人，一個月總要有一次‘工作午餐’。香港人的習慣是每頓飯要吃三小時，實在受不了，後來是安子介提議改成了兩小時。”

許家屯自己的飲食其實是很簡單的，愛吃紅燒獅子頭，許多所謂山珍海味，並不合他的口味，“對吃，我沒有多大興趣。”他也不愛吃水果。他的家鄉瀕臨東海，海產多，但他不吃石斑魚，只吃最賤的黃魚。筆者看到，炒得軟軟的青菜芯就是他現在每頓飯的最

愛。

許家屯在香港甚至沒有坐過地鐵。沒有逛過街，對香港市容都沒有多少印象，當時的行蹤“只有點和線”。曾經想體驗一下生活，他去看過兩次電影，但是他一人想看，就得買十幾張票，保衛人員組成“圍牆”前前後後都坐滿。這樣興師動眾看電影，他也就不敢多嘗試。

不過，許家屯說，說我對香港真沒有什麼留念嗎？也不對。我有感情！我想念那些老朋友！我希望香港好！

他一再說：香港沒有虧待我。我被中央從江蘇調到香港去，有幸接觸到了中國以外的世界，視野一下廣闊了，這是我平生的兩個飛躍之一，對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的看法有了質的變化。

### “五一聯歡會”救了我

到香港是“兩個飛躍之一”，那麼另一個飛躍是什麼？

是脫離中共體制，來到美國。

許家屯對我詳細地解釋了他當時為什麼決定到美國“旅遊休息”，講述了那短短幾天裡驚心動魄的過程。是一位後來位居中共高層的人士向他透露江澤民要整他的；而他看到了海南省長梁湘如何被李鵬以“研究開發海南洋浦港”為藉口騙到北京，一下飛機立即被軟禁的前車之鑒；他又得知接替自己職務的周南成立整他的材料的專案組，顯然是奉了中央常委或總書記本人之令……這些迫使他決斷：“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而在許家屯 1990 年 4 月 30

日晚上離開深圳後兩小時，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就來到他在深圳的住地，轉達中央電令，通知他去北京。見他不在，秦文俊一直坐等到深夜。“說起來也算我運氣好：他接到中央電令時，必須要去出席‘五一聯歡會’，只好出席完了再趕到我的住處。這個‘時間差’救了我！”

如果當時不出來會怎麼樣？“不出來，被江澤民、李鵬拘押審查，那麼現在也就像趙紫陽一樣在軟禁中度过餘生了——不，肯定還不如趙紫陽！”

許家屯對江澤民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認為江澤民的主義就是“沒有主義”，左右搖擺，對他的人品也不以為然。“《他改變了中國》這本書寫他與‘六四’毫無關係，還說他對受命如何猶豫……把他寫得多麼清白！哪是這麼回事！那年‘五一九’鄧下了決心要撤下趙，通知各省負責人分批到北京去打招呼，（5月）25日我到了北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到機場接我，轉來轉去地繞到了中南海住下。我問還有什麼人來，他說江澤民已經到了。我問是不是也是來聽打招呼的，他說不是，是調來中央工作。我問做什麼呢？他說，還沒定，但是已經明確了要他接替啟立的工作——啟立當時管書記處常務、管意識形態。江澤民當時已經接受了，哪裡清白，哪裡猶豫？”

“有人問我：到美國來是否後悔？哈哈，不存在這個問題嘛！”

幸虧到美國來，親身體驗了這個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民主、法治制度最完善的國家的生活，許家屯坦承，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正如何頻等一些朋友對許家屯半開玩笑地說的：你現在怎麼越來越變“左”了！許家屯並不諱言，美國確實還是當今世界最民主的國家，但他對美國社會的弊病看得日益清楚，對美國政治的走向日益擔心。美國，是當今世上最好的制度，但不是人類最終的理想。

“美國的民主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開始時黑人與婦女沒有選舉權，後來才有。”許家屯擔心的是，“現在民主向大眾化的擴展停止了。因為反恐防恐，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施加了很多限制，公民權利方面反而還倒退了。”

他放大嗓門說：“美國權錢交易合法化，要不得啊！從政黨化發展到兩黨化，發展到一黨獨大化！三權又獨立又不獨立，不獨立的這一面，帶來很大的隱患啊！”

為什麼說美國的三權有“不獨立的一面”？“三權越來越不能互相制約了：最高法院九個大法官，五個是共和黨總統提名當上的，觀點上傾向於保守——小布什 2000 年上台，不就是他們裁決導致的麼？三權的另一權，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呢，現在也是共和黨把持。”

如果說，到香港使他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弊病、資本主義的活力，那麼到美國來，使他又看到了資本主義也絕非天堂。他對人類未來道路的展望，有了進一步的思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長期共存、共融。列寧斷言“資本主義垂死”是犯了錯誤，西方在“蘇東波”之後認為“社會主義滅亡了”也犯了錯誤。兩種制度可以取長補短，求同存異，融而有異。“這個共存共融會有很長時間，幾百

年? 也許還不止!”

而中國, 也應該找到第三條道路。

### 第三條道路

在來美國, 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 許家屯反覆琢磨社會主義的失敗, “有馬克思的錯誤, 有列寧的錯誤, 有蘇共自身的錯誤。”

他對筆者說, 私有與公有的矛盾, 是從“人之初”開始的, “食色性也”, 人第一要生存, 二要繁衍, 這就要取得資源, 就要在一定的空間生存活動。人類的矛盾是由對資源和空間的占有和分配產生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代表了解決私有與公有這一基本矛盾的兩大思路。

過去講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 資本主義是自由經濟。自由經濟的好處是自由, 是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 毛病是放任——市場是按照供求情況變化, 供不應求就漲價, 商品多了就過剩, 經濟危機的週期性就由這種“無政府主義”而來。但是羅斯福新政把計劃經濟、國家調控加進來, 現在格林斯潘用利率來調節, 就起到了宏觀調控的作用。現在中國也在嘗試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許家屯說, 不僅一國內調控, 還有全球範圍的調控: 七國首腦會議, 世貿, 世界銀行, 等等; 現在更主要是以經濟區的形式來實施的地區宏觀調控。過去將“計劃”和“市場”對立起來, 我要消滅你, 你要消滅我。還是鄧小平說得好, 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 現在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我活你也活, 我

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許家屯一方面認為民主應該不斷擴大、深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全球並沒有理想的民主典範，二戰後許多實行了民主制度的國家，現在有的發生倒退，有的陷入動亂。

許家屯再三強調要“和平演進”，放棄暴力，實行民主也好，社會轉型也好，都要搞漸進式的改良，不搞激進式的革命。“李澤厚他們這麼提出來了，但沒有具體設計怎麼做。而我在《二十世紀的經驗》當中，有了具體的設計。”

儘管許家屯不肯說具體怎麼設計，但是筆者聽出點端倪，他設計的道路，似乎是從黨內民主開始，通過黨政分開，分割權力，直到最後改變一黨專政結構。

他說，現在中共黨內還是有有限度的民主的，不過沒有全社會監督，也沒有制度性的程序來保證將非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精英吸納進入頂層。“這種民主是諮詢性質的民主，對任何意見，我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不採納，你也沒有辦法。”他認為，應該從實現真正的黨內民主著手，首先要讓黨內精英進入頂層，全黨能夠監督頂層。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但不能停步，要擴大到黨外。這是從整個中國變化發展的進程來考慮的。中國應該避免陷入混亂無序，找到比較穩定的改良道路。

許家屯說，十三億人的國家，不穩定，是世界的災難！

### 還是想回國

“中國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的山；這“世外桃源”雖好，畢竟也不在故土。許家屯出國十五年，思鄉之情時時衝擊著他的心靈。

“去年我的老伴顧逸萍過世，我的子女要求我回去，也要求組織上同意我回去。”顧逸萍在1998年就曾中風住院。

2002年4月，筆者聽他說過：“中國是我的祖國呀，我當然想回國看看，但不乞求。要論安享晚年，還是住在美國安靜，我只是想能兩邊走走。就是要寫回憶錄，光憑記憶也不行，得回江蘇去查查當年報刊資料。”

1916年出生的許家屯告訴筆者：“前年有一天晚上在別人家玩的時候，我突然昏倒了……一下子就人事不省了，倒是沒有一點痛苦，吐了一身，自己也不知道。同伴趕快打電話叫急救車。我大概昏迷了半小時吧？醒來的時候已經在車上躺著，正趕往醫院去。”

不過，這一次意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居然跟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許家屯隱居於此，來客不多。附近有些故交隔三岔五地通通電話、見見面。偶爾有客人從香港來，從中國大陸來，從美國各地來拜訪。筆者探訪他期間，正碰上老報人陸鏗和崔蓉芝來訪，從下午談到晚上。凡是這樣的日子，許家屯就特別高興。

有消息人士曾向筆者透露：“許家屯離開中國後，江澤民派人去問董建華，是否他資助許走的。董建華回答：許家屯沒有來找我，他如果來找我的話，我不能拒絕。江澤民又下令手下去詢問了香港很多頭面人物：董建華與許家屯到底是什麼關係？實在查不出董建華與許到美國有何聯繫，只好作罷。但還是有人為此受到了



牽累。現在董建華不能來找許家屯，因為江澤民已經這麼問了他，董要避嫌。”筆者就此向許家屯求證，他不置可否，只是說：“對任何老朋友，包括江蘇等地的老朋友，我的態度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你來找我，我不拒絕。”

他說，《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來過，哈佛大學的中國研究專家麥克法夸爾教授來過，“麥克法夸爾掌握了很多關於‘文革’的史料，把他的專著送給我，我苦於讀不了！”李銳、胡績偉也來過，還有一些老上級、老戰友，本人不方便來，要子女前來探望。

對胡錦濤與溫家寶的新班子，許家屯說：我是基本上肯定的。他們的一些做法，例如解決三農問題，開發西部以解決地區差別，等等，我是贊成的。包括這次對趙紫陽後事的處理方式，我也基本上肯定。許家屯還說，外界對曾慶紅估計過低。我推測，將來首先擺脫江澤民的影響的，可能是他。

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方針？許家屯希望是後者。如果是後者，就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本質上就是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的調整嘛。

“不過，要給他們時間。”許家屯告誡。

他也希望，老天給自己時間。

（2005年4月）

高伐林

## 回憶在香港工作的 若干重大事件

前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共港澳工委書記許家屯，以“旅遊休息”為名避禍出走，隱居美國南加州“中國山”（Chino Hill）已經 17 年。這位被媒體稱為“繼林彪後中共最高級別的出走官員”，1993 年在台灣出版《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後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除此之外，人們很少聽到這位深諳香港情況、曾為香港回歸殫精竭慮的前中共駐港最高負責人的聲音。兩年多前筆者專程登門拜訪，發表《許家屯隱居美國 15 年，正在想什麼？》，此後他又歸於沉默。用他的話說，當年本是“局內人”，現在成了“局外人”，他不願對香港事務發表意見，以免構成干擾。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後，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相繼發表談話和在回憶錄中以激烈言辭抨擊許家屯。自稱“九二老人”的許家屯無法再保持沉默，“來而不往非禮也”，接受報刊和電視採訪，回擊誹謗之辭，澄清相關歷史事實。2007 年 12 月，筆者再次專程前往南加州登門拜

訪，根據他多次講話錄音，整理了這份記錄稿。

## 中央對香港方針雖定，具體問題有分歧

高伐林(以下簡稱“高”)：你在1993年回憶錄中，評述了出國前在香港新華分社的工作。對回憶錄中所寫，現在你有沒有什麼還想披露、補充，或者想訂正的？

許家屯(以下簡稱“許”)：我當時寫回憶錄時，是有保留的，保留的是這麼幾個部分：

第一，我從接受任務到離開香港，具體情況，回憶錄基本上都有了，但是沒有連貫起來形成一個整體，特別是對一些重要的背景，我有所保留；

第二，香港黨的組織，和安全部門的工作，基本上沒有講；

第三，有關我在香港參與和主管的對台灣工作的情況，我做了保留。

對於第二、三方面，許多東西我還要繼續保留——特別是其中有些重要情況，仍然不便公開；有些東西，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講。對於第一方面，我要做些補充說明。

1983年調我到香港工作，是偶然，對我來說也很突然。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幹部“四化”要求，我已經過了退休年齡；我從來沒有做過外事工作。不過既然黨要我去香港，我從來不討價還價。中央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書記處常務書記)、胡啟立分別找我談話，做了交代。國家主席李先念，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

(副組長是趙紫陽),也找我談了話。主管港澳的廖承志,也跟我談了。他們的談話給我的感覺是,中央同志之間,在貫徹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大的原則方針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因此帶來了後來在香港六年半一系列的問題。

他們最關心的是中央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趙紫陽特別提出來: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等人在中央領導人會見的時候說,香港一些高層人士反映,新華分社不採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希望中央直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告訴我,他們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一起商量,派喬宗淮——喬冠華的兒子,到香港中文大學任客座講師,掛個名,聯繫香港的社會高層人士。這條線,不經新華社,直接通中央。中央對了解香港情況的重視,可見一斑。他們交代我,你去了之後,這條線就用不著了,喬宗淮由你分配工作。

胡耀邦特地提出:你在江蘇的經濟工作抓得比較好,看看怎麼樣充分利用香港的經濟?

胡啟立還專門交代,要我到香港三個月後,系統地、全面地向中央做一個報告。

他們提出一個特別重要的事情:“文革”中,香港黨、工農群眾,以及愛國人士,反對港英壓迫,搞反英抗暴鬥爭,盡管是必要的,問題是過火,有理、有利,但沒有掌握有節。延伸出來,對黨的工作是很大的傷害,他們歸納成“一左二窄”——“窄”是基礎面太窄。

與廖公(廖承志),會上見面不算,曾接觸過兩次。第一次是中央領導同志接見我的同時,我去他家。香港的巨商查濟民先到,他已經知道中央要收回香港,就搞了一個英文的收回香港的若干條



許家屯晚年思路依然敏捷，對關心歷史的高伐林談古論今。

建議。廖逐條回答他，我聽來十多條都不止。見我的面以後，廖繼續回答這個建議書，一邊翻譯，一邊解答，哪一條寫得不錯，哪一條原則上可以考慮，哪一條不行。看起來是回答建議人，我體會同時也是對我做交代，因為我當時對這些具體問題一無所知。他非常認真、態度很自然、自在、很瀟灑，舉重若輕。

還有一次接觸。我向中央提出請求，到香港去之前，放我一個月假。中央同意了，我就去了一趟延安，瞻仰我接觸革命思想之後心中就一直向往的聖地。然後到廣東，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找人了解香港情況。到深圳去了一趟。當時要參觀中英街很困難，我想去看看都沒有得到批准。這個時候，廖承志正在廣東，我便又去看他。他簡要地將香港的情況做了交代，重點講了歷史方面。還要我赴港之前找港澳辦秘書長魯平，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了解

一下情況，特別要我去找一個退休的老社長。從他的談話，我感覺不到當時胡趙他們提起的“一左二窄”的跡象。

## 香港回歸，最重要的是人心回歸

高：你到香港工作重點是什麼？

許：很關鍵的一點是爭取香港人心回歸。

對於基本法，不管是起草委員會，還是諮詢委員會，與會的人都很認真，一條一條，一字一字，推敲，討論，爭論。香港人有不少人擔心，回歸以後，已有的自由喪失了。所以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提出來：這個自由，那個自由，都要寫清楚。當時我在會議上內部討論的時候就主張：凡是香港人提出來的要寫的这个自由那個自由，可以同意的，都寫上；不管是從正面提出來要保護，還是從反面提出來，不允許怎麼樣，都寫上，不要怕。自由問題就寫了正面的、反面的三四十種。

我之所以這麼主張，是因為胡耀邦、習仲勛他們都表示過這個意見。我長期以來在一個省裡主政，沒有怎麼接觸自由、民主這些話題，到香港前在中南海接受任務的時候，吃飯時間到了，每人領一份，邊吃邊漫談，胡啟立講：民主、自由，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不要認為是西方的東西，就加以排斥。這番話我聽起來很新鮮，印象很深。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的這些爭論，好處是報紙上馬上就反映出來了，實際上變成全民性的討論，加上港英政府也派人

專門單獨開會，一字一句地討論基本法草案，他們的意見，通過兩個渠道反映到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一個是參加這兩個委員會的同英國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另一個是通過外交途徑，像英國駐華大使和駐香港的機構，將他們的意見正式反映出來。這就成為香港全民加上中英政府，多方面廣泛參加議論的過程。成為爭取香港人人心回歸的核心工作。

高：關於港人簽名要求大亞灣核電站遷址的爭論是怎麼回事？

許：香港人和香港媒體，對大亞灣核電站建設的問題很關心，擔心將來一旦發生像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那樣的事，會造成災難，紛紛簽名要求北京別在大亞灣建這個項目。他們不是反對核電，是不同意這個地點，希望建到離香港遠一點的廣東山區。我認為，這個意見未嘗不可以考慮，我一方面到大亞灣去向有關技術專家和負責人了解關於核電安全的情況，並且請他們組織人到香港來做宣傳；另一方面，我將香港人的意見、建議向中央反映、轉達，我沒有多講自己的看法，但我實際上是同意的，不止一次發電報。結果鄧小平講話了，不同意遷址，我也就堅決執行了。我認為我的做法沒有錯，我是在做香港人人心回歸工作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爭取香港人心回歸還有另一個重要工作：香港經濟在八十年代初期，1982、83年，陷於萎縮困境，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全球石油危機之後，沒有恢復；另一個是人們對香港前途感到茫然，影響信心。香港總督麥理浩去北京談新界租借條約到1997年屆滿後的前途問題，希望“續租”，中國外交部那時對這個問題一點準備都沒有，不敢就此作決定，鄧小平接見麥理浩，明確地說中國要收回。可港

督回來，不敢明白地公布中國要收回九龍和香港，只一味地“要香港人放心”。他越講，香港人越不放心：“文革”後很多人逃到香港，他們不相信中共；海外對中共負面宣傳得也很厲害，人心惶惶，經濟怎麼能正常？

許多大中企業瀕臨倒閉，求救無門，港英政府和銀行對他們的危機、要求，表現得不積極，他們反過來向中國求救。我那時剛到香港上任，從爭取香港人心回歸的角度出發，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和工委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主要是中資駐港機構，特別是中信集團的老總，討論決定：有些大的項目，報中央、國務院核批，對這些困難的大中企業，有工業、金融業、地產業、証券業、交通運輸業……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資助。在1984年中英公報簽訂之後，人心安定下來，經濟也就好轉了。

1987年、88年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同樣也是報請中央、國務院，支持港英政府，共同出面，維護香港。股災後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香港的財政司和匯豐的董事長，到新華社來找我，董事長要求我們給以支持，要中國銀行拿出三億港幣，匯豐拿兩個億——具體數字我記不太清楚了。我一方面批評他們：你們才出兩億，要我們出三億？一方面表態同意支持股市。晚上11點鐘，我直接打電話給趙紫陽——本來給北京打重要電話，為了保密，防止竊聽，我通常是回到深圳來打，但那次是從香港打的，有意讓港英知道我與中國領導人直接通話。趙紫陽接了，說我們這裡正在討論這個問題，讓張勁夫跟你講討論的決定。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在電話上同意共同支持，經過努力，度過了這次股票危機。



香港有人反映：英國的企業在股災中得到了好處，但我們還是救了他——我們是救了港英政府，但更救了香港人、香港經濟。這個意思，我跟趙紫陽也講過。

這段時期，我們積極支持一些大中企業克服困難，是經過黨中央、國務院同意的，有些重要項目經過國務院親自考察批准。

按照胡啟立的囑咐，到香港三個月之後寫出了報告。在報告中這麼寫上了“人心回歸為中心”。趙紫陽、李先念聽後批准。

我按照胡耀邦提出來的關注香港經濟，看怎麼樣利用，動員香港人更多地回大陸投資。我們總結了香港人回大陸投資的模式，其中一種主要的模式，我歸納為“前店後坊”——前面是商店，經營銷售，後面是加工生產。

當時大陸在批“一切向錢看”，說到大陸投資的香港人是“皮包商”：夾一個皮包，印一個名片：“總經理”、“總裁”，到大陸行騙。我向趙紫陽建議，我們宣傳“時間就是金錢”，又批評“一切向錢看”似乎早了一點：人家來投資，不向錢看，向什麼看？他表示贊成。對“皮包商”，我也講了看法：自由市場在大陸還不流行，我們應該認真學習香港商人的經營經驗。我們說是“投機”，其實是他們善於抓機遇，做生意就是要抓機會麼。投資沒有作成功，都是“皮包商”，做成功了，就是正規商人。皮包有大有小，我們也應該參考他們這種做法。趙紫陽點頭，表示同意。

我還講，廣東的任仲夷提出對中央的政策要用夠，要善於變通，廣東有些幹部提出“遇見綠燈大膽走，遇到黃燈快點走，遇到紅燈繞道走”，中央政策有正確的部分，我擁護；也有不正確的部分，

可能錯誤的部分，要盡量像任仲夷那樣變通。我向小平同志匯報時就講，江蘇發展工業，與中央有很大不同。改革開放，應該讓人探索。趙紫陽對我這套講話沒有認為是“胡說八道”，沒有批評我，實際上都認同了。

### 港澳國際投資公司的來龍去脈

高：最近周南的書中說，你 1988 年成立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拿了國家一億美金去投資。但是錢都沒有了，你“肥了自己”。

許：事情是這樣的：我向趙紫陽匯報說：香港的精英在本地和內地投資酒樓，酒樓造價十幾萬美金，他們本人只拿一部分，然後向銀行貸款。這是普遍做法，當然，你要有信用，按時付息、還本。銀行對這些戶頭是“晴天放傘，雨天收傘”，項目規模愈大，銀行愈放心，越希望你多貸款。我想，香港可以這樣做，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這樣做呢？所以我建議中央政府，將給外資的政策擴大到給香港的中資企業，讓香港的中資企業到內地投資，用香港銀行的錢回內地投資，“肥水不落外人田”，可以加快內地發展速度，可以壯大中資。

我在香港就提出，英國人在香港有匯豐銀行，有太古、有裕和……我們為什麼不能在香港搞一個、幾個匯豐、太古、裕和？周南（外交部部長助理）、李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兼秘書長）反對我的說法，但趙紫陽贊成，就調整了政策，讓香港的中資企業到內地投資，享受外資待遇。

隨後我就又對趙紫陽建議，想在香港由中資出面，找一些香港的大商人，成立一個投資公司，吸引他們一同回內地投資。用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銀行的資金。當時他們有些人對中國的信心不夠，所以我有這麼個建議。趙紫陽又表示同意。

我就向他要兩億美金來組建這個公司。他要我去找副總理姚依林，姚是國務院掌握財權的。當時趙紫陽有困難：他奉命搞物價闖關遇到大的挫折，剛剛被批判了，同李鵬、姚依林的關係很緊張。趙紫陽認為我同姚的關係比較好，要我直接找姚，請他做決定。我就去見姚依林，沒有先說紫陽同意了，直接就向他提出這個建議，要求給兩億美金來組建這樣一個公司。姚依林立即表示同意，但沒有馬上決定給我多少錢，說要等紫陽召集開會時討論一下。過了一段時間，就批准了我這個建議，同意撥款一億美金：由國務院撥給我五千萬，要我向香港的中資銀行貸款五千萬。

這個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就成立起來了。我邀請了包玉剛、李嘉誠等十多位香港著名企業家，開了一個籌股會，請他們共同到內地投資。他們也熱心地參加，拿出了資金參加股份。但是後來開董事會往往開不起來，董事們多半缺席，不像開頭那麼積極。這是什麼道理？我們研究得出一個看法，這個公司的董事長是中銀駐港的總裁、總經理是華潤的總經理，而這些香港巨商們都習慣了自己做大股東，自己控股，自己判斷經營，他們不習慣當小股東。當初之所以入股，是礙於面子，不想傷我們的心——說得難聽一點，免得得罪我，所以投了股之後不積極參加。我就跟財經領導小組商量決定，想退出的話，立即退股，利息照付。多數股東撤資，投資公司就

成為中銀、華潤為主導了。

投資不可能馬上見效，數量也不大。公司成立之後，海南島開發，搞了一個電廠；在河南，山東，搞了些工廠；在福建考慮投資搞高速公路。我親自陪霍英東到福建，專門去看陳嘉庚在家鄉建起的廈門大學，建議霍英東在家鄉也這麼搞一所大學——主要搞教育，附帶搞產業，我們港澳國際公司可以參加。當時廈門正在搞海滄特區，我要他們具體商量。

我們想由這個投資公司來搞滬寧、滬杭高速公路，當時江澤民在上海當市長，我親自請上海、江蘇、浙江和交通部的領導，一個市長、兩個省長和一個部長，在上海開會，我提了建議，他們都同意了，我請上海市委寫報告給中央批。後來上海不寫，我催了幾次也不寫，到現在我也弄不清什麼原因，後來就煙消雲散了。

這一套很龐雜的計劃，為了什麼？為了開發內地，為了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他們說我說我“安排私人、親戚”去參加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我一個人都沒安排！——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人事上，港澳國際投資公司董事長由中銀老總兼，總經理由華潤的總經理兼，我參加決定投資公司這兩個主要人選，其他人員我一概不知道，下面的人事安排由他們提出意見，工委組織部門審定。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根據說我“安排私人、親戚”？拿出證據來。

當時港澳國際投資公司正在向內地投資，還沒有收益，講什麼“虧空”？完全是造謠。我離開之前，雖然受了“六四”的影響，正是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大展鴻圖的階段。以後垮沒垮，我並不很清楚，假如垮了，要看是誰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是他周南的問

題，因為他取代了我，是港澳國際的最高領導人。

### 包玉剛說“只有你沒向我提出過私人問題”

我在香港從來不管錢，我自己連零用錢都不帶。包玉剛先生去世了，如果他沒有去世，他可以證明。記得有一次我跟包玉剛先生吃飯，吃完我站起來了，他突然講了一句話：我很佩服你。我很詫異，看著他，他說，我認識到的你們的高幹，只有你沒有向我提出過私人問題。我當時說不出的感覺，雖然他是在表揚我，但“只有你”三個字包括了很多意思。

這期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有一次，我同李嘉誠共進工作午餐，他提出一個建議說，準備一百億到海南島搞開發，徵求我的意見，要我當企業董事長、最好能兼海南的行政負責人。我聽了非常興奮，覺得這個想法太好了。但是我表示，我擔任企業董事長、行政負責人，中央不會同意，而且我歲數大了，也沒有這個精力，我可以做顧問，盡我最大的力量來支持這個企業。他雖然有點失望，還是同我議論了誰可以當董事長。他這個想法給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到辦公室，立即向中央和鄧小平寫了一個電報，反映李的想法，也提出了我的建議，主要是兩條：建議中央用香港的經驗、人才、資金，讓香港人經營，香港人支持，來進一步開發內地尤其是海南島，內地也應該學習香港，在改革開放參考香港經驗；第二個建議是：海南島是否建省，成為一個省級特區。鄧小平看了，親自批，要趙紫陽考慮落實。這樣，海南島的建省工作就馬上行動了，成立了建省

籌備班子，領導小組負責人又邀請我做他們的顧問。

李嘉誠的建議給香港大企業家進入內地投資帶了頭，在此之前都是中小企業投資。

鄧、胡、趙、姚依林，他們幾位，還有楊尚昆、習仲勛、王胡子王震、萬里，對香港都非常重視。事實上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作出了很大貢獻。港澳對內地的投資，占內地的外資投資的60%左右。近幾年來是否有變化，我沒有查資料，記憶之中，到了最近兩三年，都還占外資投資的第一位。

另外一面，香港經濟繁榮，八十年代後期，也受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很大的促進，效果越來越顯著。當然，這是整體工作的結果，特別是中國內地內地改革開放的結果，香港積極配合，不是哪一個人努力的結果。

## 趙紫陽要我去找楊尚昆

高：1989年北京學潮，5月1日你上北京，5月2日，你與趙紫陽談了兩個小時，談了什麼問題？

許：交換對天安門學生請願的看法。

趙紫陽4月30日從朝鮮一回來，就打了個電報給我叫我去。我到北京，有人告訴我，北京普遍反映：鄧小平上了李鵬的當。李鵬在趙紫陽走了之後馬上開常委會，聽了陳希同的話，陳說給他五萬軍隊，保險可以解決天安門的問題。他們就去向鄧報告了，鄧同意他們的意見。

趙紫陽和我交談，要我先講我的看法。我講，我認為學生和機關幹部是愛黨愛國的活動，少數敵對分子、外國人插了手，美國、台灣、香港也有少數對共產黨敵視的人參加，有些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學生、幹部、市民應該說是愛國愛黨的。《人民日報》社論，我不贊成。趙紫陽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說，我們現在想辦法說服鄧小平，把社論的意見收回來。他說他在朝鮮時，社論傳給他看過了，當時他表示同意，現在看，他認為不妥。假如改變過來，他可以對外表示由他負責。另外他提了八條具體辦法，例如，學生反對“官倒”，先從我家裡查起，看看我的子弟怎麼樣，是否參加了“官倒”。

趙紫陽要我去找楊尚昆，認為我與楊關係比較好，說得來，請楊把我們的意見向鄧小平轉達，去做鄧的工作，希望鄧小平收回成命；他自己去做說服常委的工作。

第二天我就去見了楊尚昆，楊表示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答應去向鄧轉達，還要我轉告趙紫陽，可以按照你們的意見先做起來，有什麼事情他負責。當時楊尚昆還贊成趙紫陽5月4日接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說各方反映很好，楊本人也認為很好。不過楊尚昆又說了：老爺子（鄧）的脾氣你們也是知道的，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

我從楊尚昆那裡回來，告訴趙紫陽，楊已經同意。我們都比較樂觀了，認為有希望改變過來。趙紫陽的講話外界反應也好，相當一部分學生回學校了。如果學生到此為止，事情就好轉了，可是學生又開始絕食了。為什麼絕食？是自發的還是有人給他們出了主

意？我就不清楚了。北京當時是否清楚，我不知道。

高：最近鄧小平的女兒說，開槍不是鄧下的命令。

許：我相信他不會下命令開槍——不會有人下命令開槍。但是，下了命令要部隊一定要進天安門，其結果就是：不下命令也會開槍了！

高：沒有命令，誰敢開第一槍呢？

許：那種形勢，不是平常形勢。

## “六四”使香港人信心接近崩潰

高：香港也出現十分複雜的局勢，你怎麼看待，採取了什麼對策？

許：眾所周知，香港受到很大的衝擊。最大的變化是：對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信心嚴重下降，惶惑不安。用腳投票，移民多了。許多企業，包括很大的外資和華資企業，雖然沒有走，但是紛紛往外地、外國轉移、遷冊。北京對香港一部分人也很警惕，擔心香港變成所謂“外國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雙方不信任度增加。

我當時忙於安撫香港的中資機構和所謂左派社團，他們擔心“秋後算帳”。春夏之交，我們對香港的群眾性大遊行，基本上表示了參與、支持的態度，我們認為香港人的愛國情緒是空前地高漲，雖然有些人從中活動，反對中共和中國政府，但絕大多數香港人是愛國的，是希望中國進步，不是“反華”。在當時的情況下，中資機構和左派社團要是不參加，馬上就會被孤立於排山倒海的香港人愛



國潮流之外——不僅是孤立啊，甚至馬上就崩潰、垮台！從這個角度來講，也要參與遊行。所以我當時告訴他們：可以參加，但是不要發表講話；有些口號，我們不能呼喊，比如說“打倒某某某”；有些宣言，我們不能附和。有些中資機構要求設胡耀邦靈堂，我們主張，領導不要參加，群眾自發悼念不要阻止。

後來《文匯報》幾乎是報社全體領導一致主張“開天窗”，有人提出來要寫上四個大字，爭論是用“痛心疾首”，還是“夫復何言”？新華分社主管宣傳的副社長張浚生不敢決定，回來問我：可不可以開天窗，寫上四個字？我說你看呢？他說：用“痛心疾首”吧，我說那好嘛，我批准了！上級要追究，不要你們負責，我來負責。我把這個態度傳達下去了。

### 我不搞“秋後算帳”，有人要算我的帳

高：“六四”以後你的情況怎麼樣？

許：中央追究我們在六四期間的舉措。我與張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辦姬鵬飛主持會議，中央對外宣傳領導小組的兩個負責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參加了。我要張先報告了事情的經過，我來補充。我說，香港的情況與內地不一樣，因此我們採取了與內地不同的對策來處理。假如有責任，我們負責任。會議無結果而散。

後來港澳辦又開了一次會——北京當時所有單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們反省，要香港工委檢查。我對姬鵬飛說，我們香港不搞“秋後算帳”。在這個會議上，最積極的是周南，他說，我們外交部

都檢查了，你們香港工委就不能檢查一下？我反擊他說：香港是香港的情況，內地是內地的情況，我在香港宣布了：這些左派假如將來要追究責任，責任是香港工委領導人的，我是書記，我應該負責任。我說我在會前向姬鵬飛表達過了，假如一定要檢討的話，我來做，不要下面做，我不會“秋後算帳”。這樣又無結果而散。

我回香港後，寫了一個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檢討得夠不夠？上面沒有回音，我估計是不會滿意的。這個期間我對外主要是繼續做人心回歸的工作，主要是減少港人對中央老的和新的領導人不信任心理。我積極動員香港中上層人士到北京，請新老領導人會見他們。一方面反映他們的疑慮，一方面請中央領導人解釋，讓他們重新恢復對中國領導人的信心。我組織他們去，他們很勉強，幾乎提出同一個要求：不見李鵬，只見新的領導人。開始一兩批這麼安排了，後來港澳辦李後打電話來，很不客氣：你們這樣要求不行，我們無法安排。再來必須要江、李兩個人都見。後來勉強安排了一兩個團——我記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幾位，請鄧小平親自接見做工作。當時包玉剛生病，已經比較嚴重，不在香港，在美國治療；李嘉誠去了北京，見到了鄧小平。

### “百億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高：關於包玉剛女婿提出要出百億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風波，是怎麼回事？

許：是這樣的。“六四”以後，香港人對北京、對中共、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來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後受到衝擊，接近崩潰。我的中心任務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包玉剛的長婿蘇海文先生，是奧地利人，有一天到新華社來見我，帶來一份建議書，上面十多個人簽名，都是香港本地社會精英，名人巨賈，內容是推薦自己，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借香港，由他們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問他：“你徵求過包先生的意見嗎？”他不置可否。我揣測，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長婿出面。就不再問他。我對他講：這個建議，我的看法，估計北京不會同意，但我會向北京報告轉達。北京有什麼回答，我會向你們轉達。我建議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擴散，擴散了對香港、對中國、對你們這些建議的人，都不見得會有好的效果。這個問題太嚴肅了，我當時態度很嚴肅；他雖是個外國人，卻是中國人的女婿，可能對中國國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態度嚴肅地不斷點頭。

我作為中共在當地負責人，我的任務就是隨時要向中央報告當地的情況，何況是這麼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馬上向北京匯報。後來我到北京去，是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江澤民正式就任總書記，江澤民應我的要求接見了我，我談了很多情況，也報告了這件事。他沒有表態。我說這件事這麼重大，是否我將建議原文報中央和小平參閱？——我用了“參閱”兩個字，他點頭答應。因此我後來發了電報。後來大概不到一個月，我又為什麼事去北京開會見我的上司姬鵬飛，進他辦公室前，聽到裡面姬同魯平、李後正在議論這個電報。我聽魯平批評講：“這簡直是賣國！”我進去向他們解釋，這個

電報我事先請示了總書記，他同意我發的。他們當場沒有話講。

後來是我得知，李後還是魯平說，是我講的，發這個電報是因為“總書記同意這個‘香港人出一百億租借十年’電報”，他們說我造謠。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將來可以當面核實，我講總書記同意“發電報”，根本沒有講總書記同意“電報”。況且，提建議的人，都是中國人、香港人，雖然來跟我說的人是外國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發電報，一是我應該忠實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響的人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即使有欠考慮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們是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用錢來衡量，對中國政府不夠了解，用錢來租借實行自治，這還是承認中國政府的，承認香港領土是屬於中國的，這能叫“賣國”嗎？我對此坦然。當然，這就成為我的罪狀之一了。

## 為我的退休大擺陣仗

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批判趙紫陽、江澤民正式就任總書記的會議，江澤民與李鵬每人做了一個長篇報告，提出要“治理整頓”——實際上是對改革開放的方針治理整頓。我當時是中顧委委員，是列席會議，同任仲夷一個組，在小組會上討論發言表態的時候，我記得任仲夷的發言很技巧，沒有實際表態，大講價值判斷，實際上是不同意這兩個報告。我沒有他這麼聰明，我就一字都沒有講。會議小組長和其他人要我發言，我說，情況我不清楚，沒法發言。他們說你講講香港情況吧，我就講了講。很不幸，會後相互閑談的

時候，我講這兩個發言下面會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實想法。

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開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閣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領悟了他的好意，於是在會議的中途，向中組部長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齡大了，精力不行了，請中央考慮。宋平聽了很詫異，說中央沒有考慮啊，你是否聽到什麼？我說沒有。他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我說：還是請中央考慮。他說，中央確實沒有這個考慮，你還是勉自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楊尚昆，提出這個要求。他批評我：你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六四他與我也都是親身經歷過的，說：你不要這樣想！同時他也說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我向他建議說：香港人對葉選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這個才能，建議考慮。他說，這也是個人選，但是他們家有好幾個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辦。

“一百億租借香港自治十年”這件事之外，又發生了幾個情況。其中最主要的是：港澳辦有人向我透露，江澤民找李後和魯平，連續兩天聽他們的匯報。說是反映了不少對你不利的看法。第二件事，江在一次港澳辦的簡報上寫了一個批語，其中有這麼一句話：看來許家屯確實犯了右傾錯誤。中辦就將這個批語轉給了港澳辦，李後接到之後正在看，中辦忽然來人將這個批語又收回去了。我估計這兩件事不會假，因為他們從來就是對我有意見的。還有，在四中全會之後我到北京開一次中央的會議，我給江澤民辦公室的秘書打了一個電話，想把所謂“一百億”的事向他解釋一下。兩天沒有回音，第三天秘書回應了：說總書記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見吧。

我開始沒有感覺到是在推托，會議散會，在走廊裡，江澤民迎面走過來，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講幾句話。他看到了我，卻故意將臉側過去，好像沒有看到我，就過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見我。

我想這樣沒有辦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楊要求退休，他們又不肯考慮。我就趁香港鄭裕彤新開的一家酒店的俱樂部開張請我去剪彩的機會，記者向我採訪，主動告訴他們：我已經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兩個，一個讓北京的領導人特別是江澤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個是讓香港人有點思想準備，以免萬一影響香港股市。

我透了這個風以後沒有幾天，北京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有重大變化，要調我回去，周南來接任。我心中有數，但新華分社一些人埋怨我，說你為什麼要對記者講這個話，弄假成真。我說，哪裡是假？就是真的嘛。我是想退休。果然北京要我去開會，李鵬和中組部一位副部長（宋平沒有來），對我講，中央決定讓你退休，要周南接任你，你有什麼意見？我說，我原來就向宋部長提出的，現在中央同意了，我很感謝。問我對周南有什麼看法？我說他對外事有經驗，對地方尤其是對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還是能做好的。當時正是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發生危機，他們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我們曾經議論過，最擔心的是軍隊的態度。就這樣談了半個多小時，結束了會見，我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新華分社副社長以上一起到北京開會，江澤民、李鵬、港澳辦的全體，外交部的周南，還有幾個我不認識的人參加。江澤民主持，宣布我退休，周南接任。會前我同姬鵬飛一起

坐車赴會場，途中姬鵬飛悄悄對我講，他們的決定（他用了“他們”兩個字），我也不知道，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李鵬他們已經找我談過話，我也表過態了，怎麼還要開會？我還講了一句話：他們兩人對我在香港工作，怎麼評價，一句也沒有。姬鵬飛可能對江澤民反映了，所以江澤民的開場白，就說了一句：許某人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績的，一句帶過。問我對周南任職有什麼意見，我說沒意見；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離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基本法還有一兩個月，是不是讓周南先到任，消息遲宣布，讓香港人心理有個準備，免得發生什麼意外，影響港幣升降。他當時很嚴肅地回答：還是就回來吧。我也沒有意見。

後來，在報紙上公布：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免去許某人職務，由周南接任。這個宣布不僅奇特，超越常規，而且是非法的。怎麼說超越常規？是說“免去”我的職務，不是說我“退休”，當時說“免去”是很不常見的，為什麼“免去”？“經過人大常委會討論”，人大常委會又沒有開會啊！太離奇了。

### 周南奉命來整我的專案

周南立即到香港赴任。開了個千人左右的歡迎大會，我在會上特別介紹了周南，說他可以勝任，而周南的發言對我一字不提，在會場上就引起很多人議論，不僅相互交談，而且有人當面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回答？一笑置之。

到北京開最後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基本法草案，算是

交代工作了吧。會議期間，我留在香港的秘書清理我的文件、書籍，向我反映：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將我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說有些不是私人文件。這很奇特：怎麼能這麼不信任我和秘書，認為會把公家文件帶走呢？我帶走公家文件幹什麼？這也罷了，我向宋平提出來，希望在退休之後住在深圳，對港澳情況作些研究——我感到一國兩制是個新問題，我們對香港情況研究不夠，我在香港工作，深有感觸，想繼續作些研究。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宋平跟我談，說中央常委的意見，你還是回到北京來。我說，我也不回北京，還是回江蘇吧，請中央考慮。他開始說要中央常委討論，後來也表示同意了。

當中他問：你知道不知道，什麼人提出來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我寫過一篇文章談“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刊登在《求是》上，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我知道是任仲夷提的，聽他講，知道當時中央對這個問題很注意，北京有人組織了專門班子準備寫文章批評我在《求是》上那篇文章。所以我就答非所問：我知道北京有人要批判我這篇文章。他說，沒有這回事，我不知道。我對宋平很尊重，他很正派，他說他不知道，我想他很可能是不知道。

會議結束後，我先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準備搬家回南京。4月22日到，第一天就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傳達他的決定，要將我的房車收回；第二件，我的老伴告訴我，周南停發了我三、四個月工資。按照組織原則，幹部調動，介紹信還沒有到接收一方，工資就還是由原單位發，我還沒有離開，介紹信都還沒有拿到手呢。周南是11月到香港，那時是4月，停發我的工



資，是何原因（我不想用“居心”這個詞）？

讓我吃驚的是第二天，4月23日，新華分社有人告訴我，周南一到任，就組織一個許家屯專案組，他自任組長，鄭華擔任副組長，調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人財物。按照中央的規定，對我這一級幹部組織專案組進行調查，需要經過中常委、總書記的批准，才能立案。他一到任馬上就組織專案組，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動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動我的手。難怪他在歡迎會上對“許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來整人的嘛。

更駭人聽聞的是，就在這幾個月當中，他調查已經完畢，寫了一個報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來周南不是為我退休而來，是為整我而來！我想到“六四”前後和退休的情況，那麼大陣仗，開了一個特別會議來宣布一個幹部退休，這是少見的；還聯想到一個特殊情況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原來，楊尚昆是國家主席，是鄧小平派在中央常委的特別代表，那時出國訪問，所以他們趁機快刀斬亂麻！楊尚昆還打個電話給我，要我不要再談退休的事，說明他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決定我退休了。這是我擔心的，有人要對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決心出走。

儒家有話：“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這是儒家傳統，為什麼“大杖”打來要走呢？因為如果打死了，家長都還要負打死子弟的罪名。

“小杖”我已經受了很多次了，這次要“大杖”，我估計假如不走，被整的話，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連趙紫陽和梁湘的下場都不如。我曾經對下屬開玩笑說，假如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慘。現在果然來了，我不想再有這樣的遭遇。所

以我下決心。我想，我走了，對莫須有的“罪狀”至少還有個辯白的機會。就下了決心走。

4月30日，我二兒子的媳婦跟著我，從深圳經羅湖到香港，5月1日，從香港到美國。

我以前的回憶錄裡有個情況沒有講：4月23日，我讓二兒子去找金堯如，幫我搞美國的簽證。金到香港的美國總領事館辦簽證，總領事不相信，要向國內請示，所以到29日才通知我。

我30日到香港就住在金家，給鄧小平、楊尚昆和中共中央寫了封信。我說：中常委的兩個人（當時我沒有點名）對我有“不同意見”，他們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國，我對外就這麼講。我向他們保證：到美國之後，不會要求政治庇護，不會見記者，不會發表文章，不會洩漏國家機密——只要中央他們幾位不對我和我的家屬進行打擊報復，我將遵守這幾點諾言，否則我會進行反擊，要自衛。我對他們兩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謝。

我在回憶錄上沒有提金堯如，他當時提出希望我保密，現在他去世了，我要公開這件事，向他表示感謝。

第二天，我到香港機場，看到英國人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到美國後，駐美大使和駐洛杉磯總領事都來見了面，動員我回去，說保證不會有計較。我向他們簡單解釋了我為什麼出來，說：這種情況不變化，我不想回去。他們表示擔心說“外面情況複雜”，我請他們放心，說自信還可以應付。後來國內傳出消息，楊尚昆要到南美進行國事訪問，動員我與他一起回國。果然他到南美訪問的時候，委託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打電話，要我與他一起回國。還告

訴我，我出來以後，鄧批評我出來是“糊塗”，楊動員我一起回去，免得尷尬。還說回去以後會做比較好的安排。我告訴他，他們已經搞了我的專案組，他說沒有，還說不可能。他不了解這些情況，我謝絕了跟楊尚昆一起回國。後來的事實證明：楊尚昆連自己也不能保。

最後這一階段，說明中央內部的嚴重不同意見，對“一國兩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個犧牲品。我輾轉聽人講，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個工具而已，說得難聽一點，是個打手。

這就是我今天流落異國十七八年、風殘晚年，孤獨的九二老人對回憶錄的補充。

高：那麼你出來之後，生活如何？

許：生活不錯啊，我出來時只帶了一萬港幣。剛來時在西來寺，主要靠星雲大師；後來有朋友幫助我過了一段時候；再後來我就寫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試論和平演進》，在《信報》發表，《信報》給我多少？兩萬美金。我的回憶錄，得到幾十萬美金版稅，一點也不假，我這個房子就是這麼來的。我在《信報》和《蘋果日報》寫文章，稿費都是經得起查的。出來後有朋友雪中送炭，這能叫貪污嗎？我講過了，有朝一日，大家都沒有顧慮了，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公布，哪一個朋友資助了我多少。

第二，我出來的時候，向鄧小平、楊尚昆寫了一封信，我向他們做了四條保證，但是也說了，假如他們中央常委對我或者對我家屬繼續迫害，我就被迫不遵守這些承諾。結果他們確實不放手，開除

了我的黨籍，說我“背離人民”——我怎麼背離人民？所以我發表了第一篇文章《試論和平演進》，當時是蘇聯垮台了，我到了美國之後，初步研究了美國的情況，認識到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和平改革，兩制可以和平演進。我當時批評了撒切爾夫人，她宣布，共產主義已經滅亡。我說，言之過早。後來出了回憶錄，寫了些文章。所謂洩漏“國家機密”，不外乎就是這些，這些東西遲早都會公開的吧。其實，我保留了很多，我掌握了分寸。現在，除了要將回憶錄的線索勾清楚，其它的我繼續保留。我為什麼這麼做？就是從大局考慮。

我為什麼寫回憶錄？就是兩條：第一是“為稻粱謀”——出來要吃飯啊。誰說我貪污了什麼東西，那我還用“為稻粱謀”嗎？第二，我講了，寫下資料，供大家參考。我寫這些資料，不僅有保留，而且繼續宣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另外，我到現在，仍然是沒有要求政治庇護。許多人要來見我，我都謝絕，特別是大陸不喜歡見到的人。

## 香港回歸十年證明“一國兩制”成功

高：香港回歸十年，當年你的構思變成了現實，現在對香港的指導方針有什麼新的認識？

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穩定繁榮”，這是戰略性的、長期的方針，回歸十年的實際證明，這個方針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是有效的。《時代》周刊原來說“香港已死”，現在說“晴天有

雲”，証明香港沒有死，香港是陽光明媚的晴天，但是有雲——有雲是正常現象。十年回歸當中有黑雲，有疾風暴雨：東南亞經濟危機，禽流感，50萬人上街遊行……“晴天有雲”，我希望是白雲，不是烏雲，有烏雲範圍不要太大；有烏雲很快消失。

香港的這個戰略方針，由三個要素組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穩定繁榮。

第一個要素，要“一國兩制”。“一國”以下的“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的“兩制”。對“兩制”，有人擔心它變成“一制”——擔心變成社會主義“一制”，有人希望它變成“一制”——希望變成資本主義“一制”。我相信在中國，不會讓它變成“一制”，五十年不變麼。胡耀邦還講過，一百年不變。

第二個要素，港人高度自治，有兩個問題要弄清：一是“港人”而不是別人——外國人，外國的代理人——高度自治，用鄧小平的話說，是愛國愛港的港人，不僅要愛港，還要愛國；二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是在“一國”，在中央的領導下高度自治。

高度的“度”，什麼人來掌握？看起來，是中央來最後定，可以高到極限，也可以不那麼高。這就決定：香港要安定，假如香港政府在安定、繁榮的問題上自己沒有能力、辦法解決，可以請中央政府支持，“特辦”，由人大出面來解釋；必要的時候，像遇到不可抗拒的災難，由香港政府提出來，由人民解放軍協助。

可見，“度”的高低，從基本法看，是由中央、由人大來掌握，但實際上是香港人自己掌握。決定於香港政府、社會，香港的經濟難題自己是否能解決？不能解決，香港政府就請中央支持。香港人掌

握得好，這個“度”就很高；掌握得不好，這個“度”就降下來。

第三個要素，能否繁榮，決定於安定，安定是繁榮的前提，古今中外，包括香港在內，沒有一個地區、國家，在動亂當中繁榮。香港本身不斷地經歷過安定也經歷過動亂，最大的動亂是二十世紀中日本人占領。後期的繁榮，是因為四周動亂，唯獨香港安定。有這麼一個“四周負面，香港正面”的機遇。香港要繁榮，必須要注意這個前提。不安定的因素是什麼呢？很多：過分政治化，特別是因為本身利益的政治、經濟、社會衝突產生的政治化。

香港要民主，要改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體制經過重大的改革，經濟、政治危機很嚴重，但是除了戰爭之外，本身做了重要的體制性改革。所有大的國家都經過這種震動，體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也好、戰敗國也好，殖民地這個因素崩潰了，基本死亡，但資本主義沒有滅亡，體制得到了很大的自我改善，資本主義證明可以繼續發展。香港的資本主義要發展，也必須要改革。

什麼叫民主？這個詞是西方的。我查了《牛津大詞典》，公元前幾百年的亞里斯多德說，民主就是由全體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體制。民主是個政體，按照西方關於民主的學說和解釋，我分成三個要素：

第一，政體要有代表全體人民當家做主，經過推選、普選出來的人；

第二要有一個法律——代表全體人民權利、當家做主的法律，法律是多種多樣的，規定不管選什麼人，要代表、執行全體人民的

利益，這是主要要素；

第三，怎麼執法，要有監督，防治他們違權、專權。

三要素，核心是法。民主政權，是全體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不等於普選才叫民主。普選出來的政權，不一定能夠代表人民當家做主。英國式普選，美國式普選，法國式普選，台灣也是普選，是地區普選，美國被奉為民主楷模，他們普選出來的人，能夠代表全國人民當家、全國人民利益嗎？用什麼辦法來選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和訴求的人，這才是重要問題。我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完美的辦法來做到這一點。美國開國的時候黑人、婦女沒有選舉權，還規定了有一定家產的人才會有選舉權，是經過不斷發展才到今天這一步的。普選的基礎，我到美國來才了解。從新聞報導上看到選民怎麼抱怨呢，一個“壞蘋果”，一個“爛蘋果”，只能在這兩個中選一個，“好蘋果”選不上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這種霸權，能夠代表全美國人民的利益嗎？九十年代克林頓傾向於以武力為後盾的和平的政策來進行擴張，現在小布什傾向於用武力的辦法，成效就不如克林頓時代，克林頓時代消滅了赤字，現在赤字則增加了。

對普選問題，有人說我保守，我認為我不保守，我是穩，我主張循序漸進，所謂“序”，就是不斷地改革，不要影響經濟發展。我沒有改變看法：民主的目的是為了發展，讓每個人都得到利益，都能發財，而不是讓少數人。

美國有二百多年，英國搞君主立憲更長，四百多年了，還在摸索期間。香港要多長時間？我不敢講。這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

## 香港會不會邊緣化？

香港的經濟現在是服務性行業為中心，我建議要做新的轉型，將服務性行業向更高素質的行業轉型、提高知識性——這是知識性經濟時代。時代的特點是，以知識為綜合性生產力，特別是科學發展，不斷地思維創新，科技創新，來提高知識素質。

回歸之前，英國政府無心來發展科技創新產業，從衛奕信到彭定康，都是搞民主。這樣香港在科技創新上失去了十幾二十年，應該急起直追。香港的地位、軟件、物力財力，完全可以做到後來居上——

地位：香港的地位與回歸之前不同，中國影響大了，香港也可以擴大。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初步成功，經濟地位、國際地位提高，影響擴大，香港從東、南亞地區性的經濟影響、金融影響，完全可以向世界擴展，發展成全球性的經濟、金融影響。

實力：香港有軟實力，財力，物力，學到中國與印度發展高科技的辦法，用他們調劑、吸收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用孵雞蛋的方式，建設高科技特區。中國有一個買千里馬的故事，大臣買了一匹死馬的馬骨頭，國王責怪他，他說，我將馬骨頭買回來，千里馬就會來。果然，後來來了不是一匹兩匹，而是來了很多。香港要用這個精神，用比美國更優越的條件來吸收人才。香港當然有財力，也不要多，一年幾十億，政府拿一部分，民間拿一部分，來的“馬”中，有很高水平的，也可能有騙子，有幾匹“馬”成功就行了！

高：我看您這裡書啊報啊雜誌啊電視啊，都是集中在對中國情



況和動向的報導評述上，你對中國的現狀如何分析？

許：勢頭很好。過去反對的認為不好的，都開始改變了。事實勝於雄辯。九十年代西方包括香港一部分人，說中國“馬上就要崩潰”。我在香港時，最親近中國的大老板問我，會不會有問題？當時有民工潮，上億人進城，好多人擔心中國會亂、會崩潰。我說這是好事，不是壞事！農民進城，改革、開放、建設需要人麼，若完全不需要，他們來也就沒有希望麼。他們做了工，可以寄錢回家，學了手藝，眼界開闊，將來回去可以改變家鄉的面貌。後來我到美國來，還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也是這麼答覆。

當時大陸出了一本農村調查的書，在西方轟動一時，說看起來中國農村要崩潰了。我到美國來認識一個年老的同鄉學者，他的兒子寫了一本書，也是關於中國農村，有論據，有事實，他估計，幾年以內中國要崩潰。他們問我怎麼看？我笑笑說：危言聳聽。農村問題是很嚴重，但是中國正在想辦法解決，不會崩潰。他們只看到了問題存在的這一面，對可以解決和正在解決的另一面，不是有意地回避了，就是無意地忽略了。從學術上來講，就是不客觀，從政治上講，他們有偏見。現在問我，答覆同樣如此。

對於美國來講，中國經濟發展，多了個競爭對手，經濟上是互補，怎麼叫“威脅”？過去想控制，現在不能完全控制了，就是這麼個“威脅”。

說中國“軍事威脅”，美國的批評就對嗎？美國的軍事基地全球都有，威脅別人，軍費八千多億美金，中國連零頭都不到啊，全世界所有國家的軍費合起來也沒有你多啊。是你威脅人家還是人家

威脅你? 片面嘛! 但世界就是這麼一個世界, 一面倒。

中國問題很多, 缺點很多, 有些事情做得不對, 過去犯了很多錯誤, 有些很嚴重, 但是在發展, 在改進。很多人認為我是“反共”的, 對我寄予希望, 但是我是反對共產黨的錯誤, 他們可能失望了。我是講的真話。我認為講得客觀。

高: 大陸很多城市會對香港造成競爭, 香港會不會邊緣化?

許: 這正是香港的長處: 本來是邊緣, 它成為了中心! 因為香港善於利用邊緣的地位。過去幾十年就是如此。香港不怕競爭, 善於競爭。只要善於發揮這種精神。不要怕深圳、上海、寧波超過你。當然不要惡性的競爭。你們年輕人是否沒有了自信心? 哈哈……要發揚老一代包玉剛、李嘉誠這些人的精神。而且他們當時是敢於向英國人的大企業競爭。香港人的這種精神現在還有! 他們進入內地, 帶動、鼓舞了內地許多地方的企業。現在大陸很多人都知道有個李嘉誠, 就是學他的競爭, 以他為標兵。

政府與社會都應該注意對弱勢族群, 在福利上提高、改善, 避免社會矛盾激化。注意讓中產階級增加收入, 逐步發達。西方資本主義也很注意這個, 應該從這方面著手, 保證社會安定。當然要力所能及, 不要力不從心, 要讓政府財力、社會財力能夠負擔, 社會公平, 不是拉平, 而是逐步縮小差距。

最近中國很多維權事件, 是否反映中國的制度制衡很差? 地方權力太大? 不能一概而論。地方權力太大這種情況不能排除, 但大陸現在權力還是集中在中央。問題不在地方權力大小, 試問, 假如沒有一定權力, 怎麼工作? 問題在權力使用得當不得當。應該為人

民謀福祉；現在很多用得不得當，權為個人所用，用在個人謀利、謀名，相當嚴重，應該禁止。

中國的制度制衡也是有的，反貪污，不但槍斃小官，還槍斃了副省長、省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上海陳良宇也“雙規”了。中外政壇上，貪污從來沒有禁絕過。美國合法化了，鑽法律空子。例如，打高爾夫球就可以賭輸贏，我贏你一棒，你輸我一棒，可以賭錢，錢數可以高可以低，多的可達幾萬美元。靠制衡，也要靠官員自我的制約。我到香港之前，認為香港很廉潔；到香港之後，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才知道，下面很廉潔，上面不一定。

港英政府當時的高官不廉潔的情況，雖然我掌握得不多，也知道至少有四五件大案。我相信，港英中高層都知道，就是不敢講。我沒有對當時的港督衛奕信明講，只是說：現在人心有所動蕩，有傳說，廉政公署只查華裔中的大商人，不查外籍大商人和高官。他說，沒有這回事，我們按法律辦事。他和我都是打官腔，心中有數。我現在講這個話是有根有據的——有些當事人找過我。

### “一國兩制”可行，“一球兩制”呢？

“一國兩制”十年實踐，我看，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個很大的創新，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一個國家，用和平的辦法而不是武力的辦法，收回曾經喪失的國土。我曾經請教台灣來的資深歷史學家黎東方，問他，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和平統一的先例？他經過認真考慮，說：好像還沒

有。

第二，殖民地當地人在主權回歸之後，實行高度自治，這麼一個轉型模式，是高度創新，好像全世界都沒有——我也用“好像”，因為我看到的資料還不多。

第三，用和平的辦法來解決國際土地爭端，好像也沒有。過去是民族獨立，不是“回歸”。殖民地獨立的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回歸祖國，沒有聽說。

這也說明了“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這對兩大政治體制的和平改革——西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社會主義陣營中以中國為代表——有什麼啟示呢？中國當初想出“一國兩制”這個辦法，本來是為了解決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是不是意識到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重大突破？我看，也許多少意識到，但很可能沒有。

我出來到美國之後，思想發展了：是不是可以“一球兩制”？我看到美國羅斯福的新政改革，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加上蘇聯貧窮共產主義和中國“文革”的失敗，加上鄧小平改革開放，胡錦濤的和諧社會，和平發展，將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推進到了新的階段。香港的發展是人類精神發展的和平演進的開端。我花了幾年時間，寫了一篇東西，還在寫。兩大政治體制求同存異，採對方所長，補自己之短，異減少了，同增多了。異開始辯証了，“一球兩制”，可能長期共存，相互在求同存異、容異求同這麼一個趨勢當中，共同存在，共同發展。由容異，到趨同，做到人類和平演進，而不是武力相向。

## 何時可以“落葉歸根”

高：你說過“在政治清明的時候”你會回大陸，現在到時候了嗎？

許：這不是我的問題啊。我希望回去啊。聽其自然吧。我講過，中國人的傳統是“落葉歸根”，我不例外，異鄉再好，也沒有故鄉好。我的第一故鄉是江蘇，第二故鄉是香港，今年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取得很大效果，我雖然不能有所貢獻，也想看看。能不能看到，這不是我主觀願望能做到的。如果中國政治清明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就可以回去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當然已經不多了——能夠回去看看。可能性存在，可能大，也可能小，也可能做不到。

高：你多年保持沉默，在香港回歸十周年之後為什麼接受媒體採訪？

許：我曾經是局內人，香港回歸時我已經是局外人，但是我愛香港，關心香港發展，香港地方雖然小，卻是內外各方關注的中心，情況很複雜。我如果發表意見，從我自己來講，是客觀的；但是在香港，必然會引起各種議論，可能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糾紛，甚至為香港添亂。我不想添亂，所以我決心不評論。只有一次，董建華當特首不久，香港的一個朋友寫信問我有什麼看法，我寫信回覆了他，他把我這封信發表了。

回歸十年，香港轉型比較成功，發展比較好，作為一個曾經在香港工作過的人，我對香港有感情，希望香港繼續好下去。為了愛

護香港，有些看法意見想向香港朋友同胞提出來參考。也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供香港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分享。所以我就打破沉默了。

在這個期間，正巧知道周南、魯平發表了一些不符合實際的、甚至誣蔑性的奇談怪論，有人關心我，告訴我周南接受記者採訪，胡亂編造，講了對我不利的話，我在網上找到了，我的回應本來是不屑一顧。周南寫了我的專案調查報告，在報紙上公布開除我黨籍的所謂“罪狀”，只有四個字：“背離人民”，具體的“罪狀”是“和右派人士來往”，哪兩個右派人士呢？一個是星雲大師，一個是著名記者陸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周南現在講的這些東西，假如有一樁是確實的話，為什麼不在開除我的黨籍的時候公布？當時為何不將我“貪贓枉法”“貪污腐化”的證據拿出來，堂而皇之地列為我的罪狀，名正言順地開除我的黨籍？比杜撰一個“背離人民”更有說服力嘛！何勞你周南、魯平現在出來誹謗我？“背離人民”的大有人在，我自認為還不至於墮落到這個樣子。

我保留將來有條件的時候，用法律來討回公道，來判斷誰是真話，誰是歪曲甚至編造。本來完全不想理睬，但又想到有些事實澄清一下，更有利於香港的發展，所以我借這個回顧的機會也說明一下。

（2007年12月）

許家屯 / 高伐林（採訪）

## 告別人世之前的長談

許家屯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洛杉磯時間凌晨 0 點 12 分，在子女家人環繞凝視之下，安然與世長辭，享壽 101 歲，給他多姿多彩、大起大落、毀譽交加的一生畫下句號。

許家屯自從 1990 年 4 月底在友人安排之下，避禍離國，26 年來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關注中國的變化、一刻也沒有停止思考人類前途。其清晰的記憶力、敏銳的思考力，令人驚歎。

《明鏡月刊》記者 2012 年曾經對許家屯做過一次專訪，聽老人縱論古今。但許家屯讀過之後，告訴記者，希望“暫時不要發表這篇漫談”，因為當時港台和美國許多媒體的記者，多次要求採訪許家屯，他都婉拒了，“你這篇長文一出去，他們就會都蜂擁而來，我招架不住啊！寧靜日子就沒有啦，所以請你還是緩緩吧。”

一緩就緩了四年。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人能打擾許家屯了，他帶著對這個世界或深或淺的思考、或對或錯的預測，帶著只有他知道的諸多黨國機密，永遠沉默。於是，我們在此發表老人這一席談話。

2012 年 6 月中旬，由女兒等陪同，從洛杉磯飛到美東小住。得

到消息，《明鏡月刊》記者立即前往他下榻之處拜訪。

許家屯出生於 1916 年，已經過了 97 歲生日。數年前摔過數次跤，手腕骨折，折斷的肋骨穿透肺部，醫生下了病危通知。很難想像，這樣一位耄耋老人，居然還能飛行 6 個小時。他打開話匣子從下午談到午夜，精神矍鑠，毫無倦意，直到深夜 12 點多，記者數次要他歇一歇，他還意猶未盡，還在聲若洪鐘地長篇大論。

許家屯視力近乎全盲，已經無法看書、看報、看電視，好在借助助聽器，他能夠聽電視。他對《明鏡月刊》記者，談天說地，憶古論今：披露鄧小平清除楊家將的曲折秘辛，辨析趙紫陽錄音中提到許家屯而留下的疑團，回憶對薄一波其人其言的印象；他更暢論對“和平演進”理論的新的感悟，講述“蘇南模式”的由來和發展，分析薄熙來事件之後中央高層的幾種可能的處理方案；新名詞一個又一個地從他嘴裡自自然然地蹦出來：“虛擬經濟”“金融風暴”“希臘危機”“新左派”……

漫談中，許家屯不時就要考考《明鏡月刊》記者：

“胡錦濤在博鰲論壇上與連戰會談的講話你看了嗎？提出哪些石破天驚的觀點，後來官方又收回了？”

“老布什在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之後，有一篇劃時代的講話，後來克林頓、奧巴馬都延續了他的思路，產生嚴重後果……你說說看，他講了什麼？”

“後冷戰時期，用以交戰的武器是什麼？”

《明鏡月刊》記者往往被問住，於是老人滔滔不絕，給我上課。這位“七七事變”前就投身救亡的老革命，這位歷經數十年風



風雨雨、為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付出大量心血的高級官員，這位以“休息”名義前來美國隱居的老人，告訴我，他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眠之前，孜孜不倦地注視中國和世界的變化、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前景。他站在 97 歲的人生海拔高度，俯瞰來路，瞻望遠景，更超脫，更開闊，更辯證；而他強調他正在“四個重新認識”（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告訴《明鏡月刊》記者：他請了一位大學生，給他搜集美國法治史資料……又給中國古話中“活到老，學到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之類格言，做了生動形象的注解。

這次漫談，是從薄一波說起的。

### 薄一波的江湖語言和投機心態

高伐林：許老，您與薄一波打過交道嗎？

許家屯：很少。在江蘇省工作的時候，在大會上遠遠地看見過，記憶中只有一兩次在小會上坐得比較近。不過那一次我對他的印象可不好。

1958 年“大躍進”，毛澤東提出要鋼鐵元帥升帳，超英趕美，中央在北戴河開鋼鐵會議，各省都是第一書記去，我因為在省委書記中分抓工業，江渭清（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就帶了我一起去，我們是參加華東小組討論，組長是柯慶施，薄一波也參加我們這個組。中央定了 1070 萬噸鋼的指標，分配到各省，挨個檢查，放了狠話：誰沒完成，就開除誰的黨籍！我們這個小組會，參加的人就是幾個

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江蘇是江渭清表態，我呢，只是旁聽。薄一波對各省書記提問題，還表示懷疑，柯慶施就反駁他，兩人爭起來——他們這種爭論大概不是第一次。會議快結束時，他們倆又爭起來了，具體爭的什麼問題，我已經記不清楚了。我想不到薄一波求饒地說：“柯老，你也讓一口飯給我吃吃嘛！”

——這是什麼話?! 當時筆者對黨內鬥爭還十分天真，心想：你是老革命嘛，要有老革命的氣度、氣派、素質嘛，黨的高級領導幹部，要講馬列主義，而這是江湖黑社會的黑話嘛! 這是當著這麼多省委書記下級的面，我從此對他看不起了。

高伐林：唉，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不是講“操40天娘”嘛! 毛澤東也回罵：“滿足操娘要求，操夠”，更粗魯低級啊。

薄一波與柯慶施爭論，是不是有黨內派系之爭的背景呢? 別人



2012年6月，96歲的許家屯從加州飛來美國東部小住，滔滔不絕地與筆者長談了9個小時。  
(高伐林攝)

說柯慶施是堅決的“毛派”，堅決擁護毛澤東……

許家屯：他確實如此，他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是真心地相信的——我那時也是真心相信的，我們這些幹部沒有不相信的。毛主席講了話，我們就儘可能地領會精神實質，要領會透。

講到薄一波，還有一件事讓我看到他的投機。

1989年的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江澤民正式上台的一次會。我那時不是中央委員了，是中顧委委員，列席中央全會，參加廣東小組討論——那時任仲夷（廣東省委書記）已經退休了。江澤民講話，李鵬講話——通常這種全會只有一個人主講，那次破例，兩個人做長篇報告，要大搞對改革開放政策“清理”、“整頓”；薄一波以中顧委副主任的身份，也有篇長篇書面報告，與江、李講的差不多長，全面呼應他們清算改革、開放的主張，其中講到計劃和市場的問題。你知道，鄧小平對市場有一種提法，陳雲另外有一種提法，兩種提法不一致。薄一波怎麼辦呢？他在報告中，將兩個提法都列出來，鄧的提法放在前面，陳的提法跟在後面——你投機也就罷了，這讓下面怎麼執行？！

那次江澤民在會上還講：個體戶是非法致富，要整得他們“傾家蕩產”！

高伐林：這與鄧小平的思想就有很大差別了。

這裡要指出的是，許老說是十三屆四中全會，可能是記錯了。查中共決定“用三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的全會，是5個月之後，1989年11月上旬舉行的十三屆五中全會。

許家屯對薄一波有一說一：

筆者任職江蘇時，薄一波幫了一個大忙，使我難以忘懷。那是70年代末，江蘇省的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引起省內外堅持正統經濟軌道的人們的非議。在本省那位省長請求下，國務院組織了一個有關部、委四十多名司、局長幹部的調查團，由副總理薄一波帶隊，來江蘇調查鄉鎮企業對大工業是“擠”了，還是“補”了（即對大工業的原材料、供銷、投資等方面是擠了，還是起了補充作用）。

薄一波來南京之後，先聽取了那位省長匯報，再找筆者匯報。匯報用了一個上午，下午他表態出乎意外，竟同意筆者對鄉鎮企業的做法，他說：“你說服了我，農民不用進城了，僅這一條，就解決了國家一個大問題，其它問題等調查後再討論。”

國務院調查組最後的結論，對鄉鎮企業是正面的：“補大於擠”，倖免了一場災難。

許家屯很有感慨：全面看一個人是很不容易的！

### 鄧小平與楊尚昆分手祕辛

許家屯：江澤民上台，靠的是陳雲、李先念，他完全聽他們的，不聽鄧小平的。鄧在北京講話不起作用，他才南巡，到武漢主要就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計劃和市場的關係，一個是“誰不改革，誰下台”。

楊尚昆當時陪他一起南巡，他那時對楊是非常信任的。誰也沒有想到，才過了幾個月，到中共十四大，鄧小平就跟楊尚昆分手

了。

高伐林：你那時已經離開中國了吧？

許家屯：是的，但是有很了解內情的人告訴了我那段經過。

高伐林：我們獲知的情況是，楊家將下台，主要是江澤民和曾慶紅說動了鄧小平。

許家屯：你知其一，不知其二。鄧楊分手，牽涉的是鄧、楊、江的關係。

在楊尚昆跟著鄧南巡，聽他第一次在武漢講“誰不改革開放誰下台”之前，有個任務已經定了，就是十四大的人事班子，鄧要楊尚昆、萬里、薄一波三個人提出初步名單。那時已經明確了：李鵬下台，江澤民是不是下呢，鄧沒有講。

但是到武漢講“誰不改革，誰下台”，楊尚昆領會，下台的可能包括江澤民在內——他是主要的領導嘛，他反西化，反自由化，搞什麼“姓無姓資”討論。

到了深圳，鄧小平又講了一次：“誰不改革開放誰下台”。楊尚昆覺得自己領會了鄧的意圖，才要楊白冰提出“保駕護航”。他跟鄧有老關係啊，至於“保駕護航”這個話是否向鄧匯報過，我就不清楚了。但當時楊的判斷是，江、李都不聽鄧的話，所以要“保駕護航”。

中共十四大，常委肯定都是要動的，不在話下。楊尚昆分析，可能鄧小平也想動江澤民了，便為江、李兩個主要領導都準備了接替者：江澤民的“後備軍”是喬石，李鵬的“後備軍”是田紀雲。這個人事方案提交給鄧小平看之後，鄧對李鵬明確表了態，要下；但

是對江澤民呢，鄧沒有表態，沒說同意，也沒說不同意——我得到的消息就是這樣，至於他不表態的具體語境和表情，我就知道了。

不過，楊尚昆誤解了，以為鄧小平並不反對江也下台——鄧雖然沒有說是，但也沒有說不呀。楊尚昆就著急了，就將喬石和田紀雲找來談話，告訴他們，有可能接替黨政一把手，只是沒有最後定案，現在要提前準備，不過，一定要保密。楊尚昆的毛病在這裡，操之過急啊。

1992年5月，田紀雲應中央黨校校長喬石的邀請，到中央黨校講話，講的什麼？批“左”，批的就是江澤民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台的那個講話……

高伐林：是的，當時這個講話，外界很快得知了，田紀雲講得很尖銳：“在消除‘左’的影響的時候，要特別警惕那些風派人物。……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一場災難。”

許家屯：他第一天講，第二天黨校有人就將錄音拿出去，在北京市傳開了！這就給江澤民、李鵬一個警醒，他們感覺到來勢不一般。

喬石隨後也在中央黨校講了一次話，也是批“左”——又被公開了！

江澤民感到被動，搜集了材料，通過鄧小平的親屬交給了鄧小平。材料上提到：楊尚昆同萬里他們，要搞一個“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班子”，還要給“六四”平反——這在當時還得了？

材料中還有一條：楊尚昆同萬里想當“第二個鄧小平”，就是太上皇。

鄧小平立即下令：楊白冰停止活動。楊尚昆與萬里立即退下。

我得到這個可靠消息很早，中共十四大還沒有開，我就知道了。當時我的幻想是：鄧小平會不會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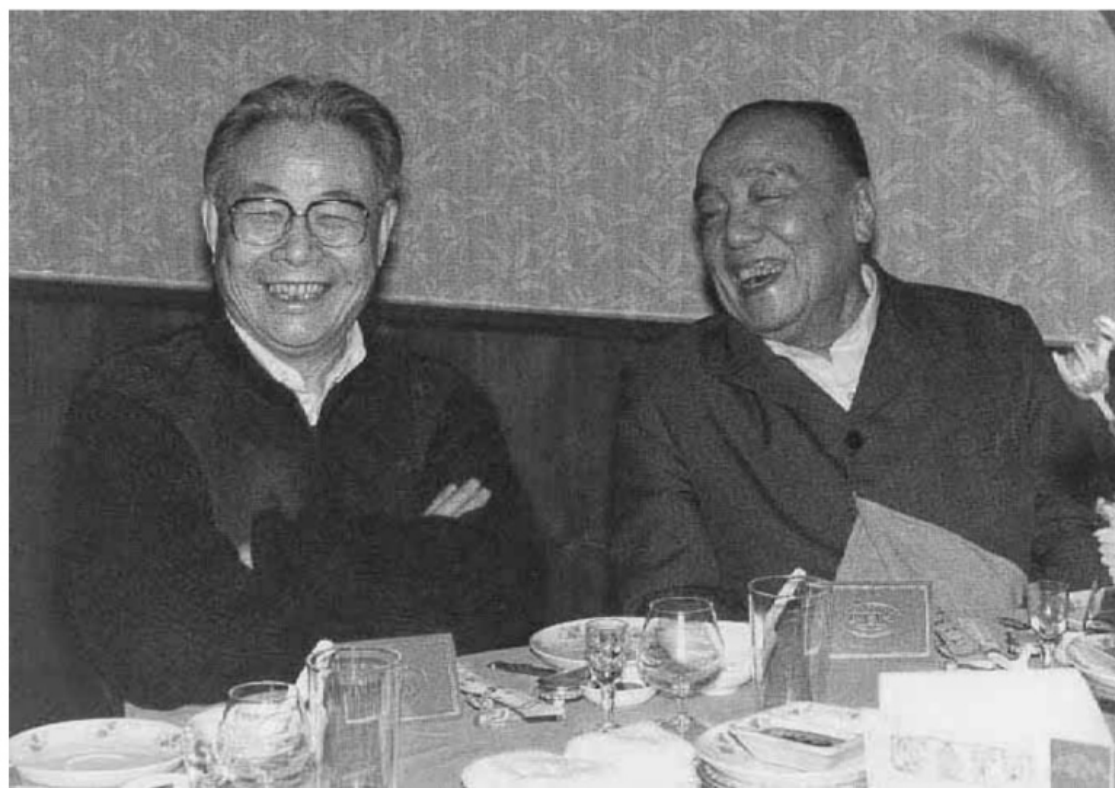
楊家孩子與鄧家孩子本來關係十分密切，鄧家孩子喊“楊爸爸”，楊家孩子喊“鄧伯伯”，每天接觸，吃吃喝喝，在中南海一起游泳，誰要沒到場，就會立即打電話催他快來。鄧小平下決心之後，兩家的關係就忽然斷掉了。楊小二（楊尚昆的二兒子楊紹明）以前專給鄧拍照的，這下也不能再去了。

### 楊尚昆和習仲勛禮賢下士

高伐林：您與楊尚昆的關係很好，很了解他。

許家屯：關係是不錯，說“很好”也行。在我沒有到香港工作之前，不認識楊尚昆，連面也沒有見過。開會時也基本上沒有見到他，因為不太注意嘛。楊尚昆當了十幾年中辦主任，毛澤東視察各地，他並沒有跟著，都是中辦副主任跟著，我們接觸的都是副主任。

是中央決定我到香港工作之後，楊尚昆與習仲勛主動找的我。我到香港很偶然，鄧小平發現我很遲，1983年才重用我——那年我已經67歲了，過了退休年齡，中央正在推行幹部年輕化，但鄧小平不讓我退休，定了讓我去香港。楊尚昆和習仲勛在“文革”結束、平反之後，在廣東工作過一段時間，對香港和澳門情況比較了解，



許家屯（左）與楊尚昆相談甚歡。

也有一些統戰關係，他們出於好意，向我介紹情況。他們對港澳工委意見很大，廖承志主管港澳工委，對中央搞信息壟斷，很多情況不向中央匯報，連胡耀邦他們都對具體細節不清楚。楊、習兩人主動找我，給我指示，要我注意一些問題。這樣就認識了。

記得我去北京受命，楊尚昆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尚昆同志要見我。楊那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後來還是鄧派到政治局常委的特派員，常委開會，他代表鄧參加；常委討論情況，他去向鄧匯報；鄧有指示，他向常委傳達——鄧是中國的一把手，楊實際上就是中國的二把手。他秘書來電說他要來看我，我當然說，我去看楊老吧。但秘書說，不，尚昆同志去北京飯店——我當時住在北京飯店。我



是後輩、是下級啊，“受寵若驚”這個詞不完全準確，因為我談不上“受寵”，但是心情還是很不安的。

楊尚昆很禮賢下士，一般都是跟你商量的口吻，不是發號施令。習仲勛也是這樣，非常平等、謙和、客氣，循循善誘。他們都是受過折磨的人，不像江澤民那樣。江的氣派是上不了台盤的！連我的氣派，在江蘇，後來到了香港，都比他大。

高伐林：領導人個性很不一樣。

許家屯：我的印象當中，譚老闆（譚震林）的性格很倔強，很直率，不說假話。他不像薄一波那樣投機善變。譚老闆是最早跟著毛出來的，資格老，跟毛的關係很深，所以大鬧懷仁堂，他是挑頭的。

我在“文革”中同譚老闆打過一次交道。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那時要張春橋去解決上海問題，總理又親自點名向南京的造反派，把我要出來，要我上北京，跟造反派組織代表一起坐下來談判，解決江蘇問題。當時開了六天會。第一天，除了造反派代表，就是三個人：周總理，譚震林和我。譚震林也發了言，造反派不敢批總理呀，就猛批譚震林。

第二天早上，從總理住的西花廳出來，去跟造反派談判的會場時，譚震林突然站下來說：我不去了！總理的臉色一下變得鐵青，問：為什麼？譚說：我送上門去給他們批呀？總理說：你讓我一個人去呀？——他的意思是，把我一個人累死呀？

僵在那裡好幾分鐘，譚硬是不肯去，很犟啊！最後總理和我兩個人去了，譚就再也不來了。

## 薄熙來“為老百姓”都是幌子

我現在對“文革”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新的領會。“文革”對我來講，負面的東西很大，但正面的東西比負面的東西還多。我認真檢討，要讓今後少犯一點錯誤。

毛澤東的成功是前無古人的，錯誤也是前無古人的。“文革”這種錯誤，只有毛澤東才會犯，別人不可能犯——沒有條件麼，那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文革”把造反派發動起來，反我們這些人呀，我們這些人是黨和政權、國家機器主要的組成部分，發動群眾把我們這些人推翻掉，這種民主古來沒有啊！

難道美國的民主就是真正的民主？美國從一開始就分兩派，慢慢演變成今天的兩黨。我從美國教科書上了解到美國的民主是怎麼來的，再加上我對美國現實很膚淺的認識——我不是根據馬克思怎麼講的，毛澤東怎麼講的來認識美國。

告訴你吧，我現在是四個重新認識：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重新認識毛澤東思想。

高伐林：在您這樣的年齡，“四個重新認識”，不簡單！

許家屯：我重新認識，有三年了。謝謝何頻和你反駁我、挑戰我，促成了我去找根據，去研究。對你們，我只有好感，沒有反感！沒有你們，我不可能思想進步。沒有人反對不行啊。要歡迎反對派。江澤民他們就不懂這個道理。

可惜，我人老了，沒有更多的時間了。不過嘛，“覺今是而昨非”，有這種精神，人就有活力。

說起“文革”，薄熙來在重慶的做法，讓我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引起聯想。他完全是跟胡、溫唱對台戲。胡錦濤、溫家寶政策的主要精神，是貫徹鄧小平講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做到共同富裕。對他們的所有措施，都要從這個角度來領會。他們要做到公平發展，社會共富，朝這個方向推進。要達到共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薄熙來搞唱紅大會，十來萬人——不是光重慶市的唱紅大會啊，還是華人的唱紅大會，各個省市都有，中央機關、各個部門基本上都到齊了，港澳台也參加了，華僑也參加了，全球的華人都參加了。他本人沒有到場，但是鳳凰衛視等等媒體都趕著拍馬屁。重慶與香港媒體的關係很好啊，不只是某一家，這麼多媒體都鼓吹重慶，想必有利益交換。

說起薄熙來對社會貧窮弱勢群體的照顧，用了多少錢？就在他上任以來近五年期間，他借了一萬億！投到從生產到福利各個方面。他哪裡只是想當政治局常委？他的眼睛是盯著總書記啊。此人拉攏習近平，但心裡想的是取代習近平。很有雄心壯志啊！

高伐林：在您看來，薄熙來單純是為了攫取權力呢，還是想得到權力好推行他的路線、幹一番改造社會的事業？

許家屯：他想幹什麼事業！偷轉了那麼多錢到海外，有人說 80 億，有人說 60 億，有人說人民幣，有人說是美金……還有人說不是 80 億，還要加個零！從他發家看，從他最初政績看，從所作所為看，他不是一心一意為老百姓，那都是幌子。

## “我是特務頭子”

新左派力量很強啊，野心太大了！他們計劃上台之後，把胡的一套全否掉，要真正的“太子黨”掌權。現在胡錦濤的任期快滿了，但是就算只有三四個月，也會有大動作，胡錦濤交班之前值得一看。

王立軍事件對胡錦濤是天賜良機。我看對薄熙來問題的處理，有三種。目前這樣是小處理，有可能中處理，還是大處理。

高伐林：中處理、大處理是指什麼？

許家屯：中處理嘛，人事變化會大一點，從薄的案子還會牽涉其他人，揭露新的案子；大處理呢，首先表現在人事上，最終體現在思想路線——我不贊成你們“制度”的說法……

高伐林：光換人不改革制度，能解決問題嗎？

許家屯：我不贊成你這個看法——這又牽涉到民主、專制的問題了，這一下扯不清，得好好從頭說才行。

高伐林：您是否注意到，重慶事件有個很重要的特點：這次黨內事件的國際因素很突出。

許家屯：這是偶然的，他們想利用國際因素。林彪當時也有國際因素啊，他想去蘇聯嘛。我不是也到美國來了嗎？不過，我並不是同美國關係好才來，你不能只看表面啊。

高伐林：您的國際關係是怎麼搭上線的呢？

許家屯：我是特務頭子。在香港時，所有情報的關係，發生的大事，我都知道，具體細節我不一定過問，當時主要盯住美國的情報人員在幹什麼，台灣的情報機構在幹什麼。英國的、蘇聯的……

我們都要知道他們在想什麼、跟誰接觸。當時香港好些教授，也拿了我們的錢。回憶錄上沒有多講這方面的情況。直接的、間接的情況我相當了解，不過，我沒有跟他們建立聯繫。

我來到美國之後，美國就很想了解我們對美國、對台灣的情報工作——我對他們說，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會講——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講。我還有很多統戰關係，也不會講，講了我對不起朋友，人家當初是相信你，現在出賣他們，這怎麼行？

我出來之後，大陸對我在調查研究，但是有一條他們不需要調查研究就可以知道：我沒有泄密，所以香港的地下情報網組織都沒有受到破壞。

高伐林：您到美國，金堯如和星雲幫了忙。

許家屯：是的，金堯如怎麼幫我，原來跟你講過。與星雲是怎麼認識的呢？“六四”以前星雲帶了幾百人的訪問團到大陸訪問，中國將他作為很特殊的統戰對象來招待，楊尚昆親自出面。他到四川等地參觀，萬人空巷啊！他回台灣時經過香港，楊思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廳主任）要求我親自出面招待。我就隆重招待了，知道他是江蘇仙女廟人，我們是江蘇同鄉——都是蘇北人。他回到美國之後來信感謝，說歡迎我去訪問，任何時候都熱情招待。我拿著他的信，對我們香港工委的人說：“星雲反過來做我的統戰工作了！”——我是開玩笑啊。

所以我來美國之後，就先到了他那裡。星雲是個政治和尚，而且不是個一般的政治和尚，有相當高的水平。我們倆相處很好，他從來不向我宣傳佛教教義，我也從來不對他做“思想政治工作”。

但是我們交談了很多問題。

高伐林：您剛才談到林彪問題。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林立果他們刺殺毛澤東，就像當年荊軻刺秦王一樣，含有某種歷史正義性。

許家屯：不能這麼看，從歷史觀點來看這種看法不成立。儘管毛澤東自比秦始皇，還說過比秦始皇還厲害的話，但將毛澤東等同於秦始皇，說不通。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不能只從“文革”來看，要從其一生長期的經歷和作為來看。

過去，毛澤東做對了的，我們跟著對——他是大對巨對，我們是微對小對；毛澤東做錯了的，我們跟著錯——他是大錯巨錯，我們是微錯小錯（笑）。當然對我個人來講，是大錯，但是放在社會上講，是小錯。

對毛，對鄧，對楊，對趙紫陽，都應該這樣：要從其一生長期的經歷和作為來看。

## 趙紫陽的回憶錄迴避了什麼？

你看過趙紫陽的回憶錄吧？其中有個地方提到我，你記得是怎麼說的？

高伐林：我有點印象，記不太清。（記者後來查到：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提到一處許家屯：5月4日我接見亞行代表時就學潮問題的講話，是根據我的意思，由鮑彤起草的。學潮問題要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當時在北京的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說他5月4日見到了楊尚昆，楊對我的講話極為贊同。”)

許家屯：我在我的回憶錄中寫到過，那次同他談了很長時間，講了很多話，討論了很多事情，為什麼他都不提，只講了那麼一句呢？是他打電報要我回北京交換看法，我先講了對學運怎麼看，香港怎麼議論；趙紫陽又講了自己的思路，然後要我去找楊尚昆，請楊去找鄧小平，勸他收回關於動亂的定性。——趙紫陽沒有講我跟他關於怎麼樣去平息學潮的“陰謀”。為什麼一句不講呢？

高伐林：您怎麼分析？

許家屯：從他整個錄音講話的結構來考慮，趙紫陽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強調自己從學潮開始起，都是按照黨的組織原則辦的。他意識到，把我叫回北京，商量這些中央的決策，是違背了黨的原則的。

高伐林：這算違背黨的原則嗎？

許家屯：他是中央總書記呀，把一個地方大員叫到北京，商量怎麼把中央決定了的事情扳過來……

高伐林：你作為黨員，黨章賦予你對全黨大事發言的權利呀。

許家屯：是他找我啊，並不是我找他。

高伐林：從他的角度想，這應該也不違反黨的原則：作為總書記，要說服拍板的鄧小平，自己直接去說服他，他不肯接受；就繞一個彎子，找一個下級黨員迂回去勸說……

許家屯：既然不違反黨的原則，他為什麼在回憶錄中隻字不提？

高伐林：哦……隻字不提，說明他在回憶的時候，認為違背了黨的原則？

許家屯：我告訴他對他的亞行講話的反應，這在叫我上京這件事中，只是個枝節，與主要意圖沒有關係，他在回憶錄中只提了這個枝節，避開了主要的核心。結合他整個回憶的結構，他是要說明，他的一切活動都是合乎組織原則的——他思想起了變化，最大的變化。

他當時要我去，是應該的，但是他後來要將它迴避掉。他當時這麼做，表現出很大的勇氣，寫回憶錄時，勇氣到哪裡去了？

我跟趙紫陽很早就認識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在江蘇當省委第一書記，他在四川當省委第一書記，將手下地市委書記全部帶到江蘇來參觀，我陪他們在蘇南看了一個禮拜，向他們介紹了半天我們江蘇是怎麼做的。那時我已經知道他要上調中央了。他走時間了我一句話：你今後怎麼改革？我沒有回答他——我答不出來。我甚至沒有想到，我們這個做法就是改革。

後來我到香港工作之後，與趙紫陽的關係處得很好，他對我很支持，就算港澳辦、甚至中央常委做了決定，我覺得不妥當的，我就向他講，供他去考慮。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港澳辦開了一個全國性的會議，把中央常委在對外關係上所做的指示，這個常委講了什麼，那個常委講了什麼，全部匯集起來，叫“九個不允許”：不允許對外再開窗子，不允許外匯留成，留成要上交……等等，還有像陳雲講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諸如此類。



那時要搞改革開放啊！我當時與香港工委的人一起去參加會，從頭到尾我沒有講話。中銀、招商的主管對這個“九個不允許”意見很大，跑來質問我，你怎麼不講話？我不好回答。

會開過之後，我去向趙紫陽辭行，問他有什麼指示。他問，會開得怎麼樣？我說，不怎麼樣，“九個不允許”麼。他問，你有意見為什麼不提？我說，我能提嗎？你們六個常委都畫了圈才開這個會，我要是提了，不是跟你們六個常委作對嘛！趙紫陽說，那怎麼辦？是不是重新開一個會？我說，不要了吧，那樣影響太大了。我的意見請你考慮一下：我回去不傳達，你這個文件不要轉發。後來，他真的就沒有轉發。

那段時間批“一切向錢看”，我對趙紫陽反映：反“一切向錢看”反早了。現在人們剛開始起來，個人的積極性剛剛才發揮，就批這個口號，會有負面影響，阻礙改革開放。他也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有幾個說法：“看見綠燈大膽走，看見黃燈趕快走，看見紅燈繞道走”，是任仲夷在廣東提出的，提得很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句話呢，是我提的呀。

當時我不敢像重慶這樣大的口氣，提什麼“模式”，是胡啟立在我離開江蘇之後，去蘇南調查，他提的“蘇南模式”。我這個“蘇南模式”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在“大躍進”中就開始了。後來到困難時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時候，我打了埋伏，沒有砍掉，保留下來。

## 回不了家鄉就寫回憶錄

高伐林：您多年來一直要求回家鄉，現在有眉目了嗎？

許家屯：李源潮表過態說：中央領導同志很關心你，歡迎你回來；江蘇省方面也表示了歡迎，但說要等文字的東西——要等批示。卻沒有人敢批！

高伐林：李源潮不能批嗎？他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又是中組部長啊。

許家屯：李源潮也不敢批。常委很難意見統一啊。江、李的影響還是很大。

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國內，只有一個女兒在這裡——這一點國內現在很開明了，不會搞株連。

高伐林：您的回憶錄快完成了嗎？

許家屯：有十節了，回憶到我當如皋縣委書記了。

高伐林：那才寫到三十來歲啊！

許家屯：後面還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高伐林：是怎麼進行的呢？

許家屯：眼睛完全看不見了，老年黃斑，沒辦法，不能看書，看報，看電視也不行了，只能聽電視：中央台、江蘇台，鳳凰台……不能寫字了，只能寫很大的字。有時打了腹稿，憑感覺寫，一天寫幾百字，但沒辦法改——看不清楚麼。不能寫就說，我錄下音來，有位年輕朋友幫我整理、查資料。

我從來沒有脫離現實，通過報紙、電視、來往客人了解現實情

況——包括你嘛。眼睛看不見，我可以聽啊。知道了情況，我要思索、要尋根究底啊：為什麼會這樣？毛澤東講：什麼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學無止境，我每天都做學生。聽電視我也是在學習，聽新聞，聽觀點，是不是有這麼個問題？這個評論員為什麼這麼講？那個評論員為什麼那麼講？太自信不好，堵塞了自己。我每天從睡眠中醒來，就開始思考，忽有所悟都是在睡回籠覺的時候。

我的接觸面很窄，來看我的人並不多。美國歷史上有不少問題，我還不是很清楚。偶然認識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他母親不讓他回去，要他在美國發展。我現在請他當我的先生，把美國的歷史——大學教科書上講的歷史，包括數據，主流的有關文章，都找出來，給我上課，我要重新研究，美國人怎麼研究和敘述他們自己的發展史、評說他們的四十幾個總統。

美國的印第安人現在是 500 萬，本土 48 個州有一半，250 萬。最開始有多少呢？為什麼別人都繁殖，他們卻減少？西部電影能找到部分答案。我覺得，是對印第安人採取了種族滅絕政策。

## 關於中國和世界的六句話

高伐林：幾年前您寫了關於和平演進的長文。

許家屯：那是幾年前了，你不知道吧，我又豐富了、發展了！

總的來講，全世界的大趨勢是和平演進；要從文化上來講呢，是文化大融合開始了。這是一個特點。

另外一個特點，二十世紀，流行的說法是人類發展的拐點，用

我的說法，是最偉大的世紀，是產生了新觀點、找到新出路的世紀。人類有史以來，戰爭演進與和平演進，交錯進行推進歷史——哪種為多，年頭更長，我缺少資料，沒有統計，說不出來。但我有個觀點，借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來講，事物都是相對的，過去將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類，這是形而上學絕對化了，正義戰爭裡面有非正義的因素，非正義戰爭裡面有正義的因素。倒退的結果有可能是前進，倒退本身就含有前進的因素。這也就是我們常講的“危機”——“危”裡面有“機”，“機”裡面有“危”。

戰爭演進到 20 世紀就發展到了極致，第一，戰爭變成了全球性的；第二，武器的殺傷力極大，發明了核子戰武器，足以毀滅一切，將人類文明和自然界都毀滅，生物進化從零來起。這樣，冷兵器、熱兵器、核武器……從熱戰變成冷戰，現在到了後冷戰，武器也變了。變成什麼了？我考考你。

高伐林：您指的是信息？

許家屯：不是。冷戰的武器就是思想、文化，就是“和平演變”，實質上就是孫子講的“攻心為上”，將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思想意識都改變了。

老布什在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之後，有一篇講話，非常重要，你看過沒有？

高伐林：那就是 1991 年了？我不記得了。

許家屯：他主要是講建立世界新秩序。最突出的一點，是將全世界都列入美國利益的範圍，太空，地下，海洋，都成為美國利益所在！他這就是宣佈：美國霸權主宰世界，美國的秩序成為世界的

秩序，美國的法律成為世界的法律。全球都屬於他們！這是向全人類挑戰啊！後來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都延續了老布什這套思路。客觀上做不做得得到是一回事，主觀上想這麼做是另一回事——人類的貪心、野心就是這樣啊，發揮到極致。

美國有不少發明啊，宣佈“人權高於主權”，聲稱為了人權，可以去干預、顛覆人家的主權。還有一個發明，是“知識經濟”，這是克林頓任期快結束時的成果，在經濟領域應用高精尖技術，美國在二十世紀末、本世紀初在很大範圍推動“虛擬經濟”，這是美國推動霸權的很重要的武器，美國現在已經自食其果。但給 2008 年金融風暴埋下了禍根。

我對中國的黨情、國情，概括了四句話；對國際形勢，也有兩句話——

大家不是擔心中國會亂嘛，我概括了四句：小亂天天有，中亂經常有，大亂亂不起來，如果大亂是從中共高層開始。

國際形勢呢，是兩句：中美難免一戰，中美可以避免一戰。

高伐林：您認為，十八大習近平接任之後會有什麼新的舉措？

許家屯：你考我啊，我不知道。現在還是要看胡錦濤。他不是將十八大推遲了嗎？以前不是九月，就是十月。擺不平，表面上看是人事，本質上是路線、是思想。所以還要看胡錦濤。

胡錦濤是很了不起的。不管中共內部怎麼亂，他提出這三個思想：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就不能等閑視之。

什麼叫“以人為本”？人類最原始的東西，就是人本身。由於勞動分工，社會才分化為階層、階級。這是社會進化的必然結果。

但是進一步進化，就要回到沒有階級、沒有階層的人本身，胡錦濤提出“以人為本”，是將中外古今的精華融合提煉了。一個社會真能做到“以人為本”，一定會欣欣向榮。這就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毛澤東的“鬥爭哲學”，都翻了過來，不是鬥爭為主，而是合作為主，共同發展。平等，合作，共贏……共贏就是共富。

## 全球兩種制度都在和平改革

胡錦濤的思想路線，不會只是他一個人的思想結晶，一定有一個班子，來概括。他在博鰲論壇上接見連戰有個講話，你讀過嗎？

高伐林：嗚嗚，我沒注意。

許家屯：我問過香港幾個記者，他們也都沒有注意。

高伐林：胡錦濤這種場合的講話，側重在兩岸關係吧。

許家屯：對呀，但他在講兩岸關係中講了三句話，很重要，我說，是又一個盤古式開天闢地呀！哪三句話呢？繼續改革開放，不斷改革開放，和平革命——他把改革開放，看成和平革命，這就為人類未來開闢了一個新的出路。

但“和平革命”這一條，後來他們不提了，這就說明，肯定中央有人反對、有人批判他了，批判的力量還很大，所以他講出來的，連文字都收回了。我請人在網上搜尋，那三句話都沒有了、查不到了！

高伐林：胡錦濤現在就算認識到這些，但他面臨的形勢與您在台上的時候，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時候有了極大的變化。那時各級領導階層成員還基本上抱持理想，各界各個階層對

改革發展也有基本共識；而現在利益如此衝突，權貴利益集團的力量發展得如此之大……

許家屯：不能這樣看。你把問題看得絕對化了，不能將中共單純看成一個利益集團。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是有特殊利益集團，不能迴避，他們的勢力相當強大。但是主張深化改革、往前走的力量也很大！你們不僅要從中共看，還要從中國的全局來看——比如說，中國農民最近幾年來變化就非常大。你們若不了解共產黨，不了解中國，沒有仔細深入地去研究中國社會的許多細小變化，那也會陷於片面、主觀。

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也有知識分子。看中國歷史，造反的、要推翻一個朝代的基本上都是這兩部分人。現在造反試試看，有多少農民跟著走？八億農民，現在將近一半進入城市。農民還沒有完全脫貧的，按照國際標準，還有一億兩千萬；按照中國標準，還有兩千萬。其它都不同程度地進入溫飽，相當一部分進入小康。胡錦濤他們上台之後，注意到給農民實惠，提高最低工資啊，健全擴大勞保福利啊，減免稅負啊，教育普及啊……就說教育吧，這是不得了的事業：一年招生 600 萬啊！過去想也不敢想。當然，批評的人很多，說“濫竽充數”，但這是難免的麼。

我在和平演進長文的第七章，主要就講二十世紀，是人類最偉大的世紀。戰爭發展到了極致，霸權發揮到了極致，人類對和平的要求也增長到極致，出現了和平進化的苗頭。一國兩制，一球多制，就有可能達到和平共榮。

兩大制度都在改革，社會主義制度改革，資本主義制度的改

革。所有制起了變化，不光是私有制，還發展了股份制、私營企業國營化；改善了勞動者的生活，工會的作用增強了，為公認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在國家控制下，緩和了社會矛盾，不是讓資本主義無度地發展。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組織，WTO，從全球範圍內宏觀控制，西方經濟就不是純粹的自由經濟了。企業也開始變革，改善工人的生活，管理變得人性化——這實際上，就不再是將工人當成完全的機器，而是看成是人。

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和西方也加強計劃，增強社會福利。由企業主導的第一次分配不可能均勻，於是由政府主導，用第二次分配來調節。政府用稅收、發行公債來獲得資金，對金融也適當控制，把失業、退伍軍人組織起來搞高速公路，基本建設——這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吧。美國的社會結構就起了變化，本來是兩頭大中間小，啞鈴型，現在是兩頭小中間大，紡錘型——這種變化不單是發生在美國，但是美國最典型。

資本主義的思路，是用外面的財富來滿足內部；用未來的財富來滿足現在，抽取自己未來的、子孫的資源，把子孫創造的價值，提前到今天消費。歐洲出現希臘危機，就是因為兩黨競爭，允諾給老百姓的東西太多了，超過了實際可能。美國以後的問題，也是社會的財力是否能夠負擔社會福利？“嬰兒潮時代”的人要社保、要醫保，負擔得了嗎？

這一類改革都是和平的，大大緩和了國內矛盾。西方的共產黨基本上垮了——只有思想沒有黨嘛。工會呢，都變成了貴族工會：工人福利不錯，工會官員的待遇更高，他們還怎麼會要革命呢？



美國分配嚴重不均，但因為紡錘型兩頭小中間大，掩蓋了這個嚴重情況。全世界 70 億人，美國 3 億人占有了全球將近一半的財富。若全球一半人達到美國的程度，地球能養活嗎？承受不了。物極必反。美國同全世界的衝突，是必然的，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美國擁有世界霸權地位有一百年了，什麼時候讓位？必然有這個問題。所以它現在恐懼中國。我說“中美必有一戰”，就是這個原因：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利益！意識形態只是利益的反映，將意識形態放在前面是不對的，不是唯物論。

### “天下第一村”最開始是我扶植的

江蘇的華西村這個典型，最開始是我把它扶植起來的。那還是“文革”之前的六十年代。華西大隊開始搞起來的情況，我們在江蘇寫文章講過，它的最突出特點是：學大寨，只學改天換地，其它大寨的制度、規定，都沒有學。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講要“放權”，我在江蘇是放了權的，放到縣裡，縣裡怎麼放，我不管。有些權放到他那裡了，他有權決定很多東西。我不但不給他錢，也不敢亂指使他幹什麼。但他做了什麼，我支持；有些東西，我提醒。不僅肯定他的做法，而且作為樣板來推廣。我提的要求是：樣板能做到的，條件相同的地方，也應該能做到；條件不一樣的地方，當然不能強求一律。當時我把全省，按照農科院的意見，劃了七個區，分別樹立樣板，不是一刀切。蘇北有蘇北的樣板，蘇中有蘇中的樣板，蘇南有蘇南的樣板。我到

各地帶兩個老師，一個是洋老師，農科院的研究員——我當時帶的人當中，有一個後來到北京當了農科院院長、中央委員。我向他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再一個是土老師，老農——所謂“老農”，是有經驗，但年紀並不一定大，吳仁寶那時也才40多歲。江蘇的老農大多是中學、高中畢業生。我向土老師、洋老師學習，毛澤東說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華西村起步從農田搞“噸糧田”（每年每畝生產一噸糧食）開始，我們省裡、市里都沒有給錢，他們是靠自己的農業勞動完成了“第一桶金”積累，也帶動了我們全江蘇大面積“噸糧田”建設；

其次呢，他們沒有將副業取消，改革不僅是農業的改革，而且三業（農業、工業、服務業）俱全，齊頭並進。改變了工分制，是按勞分配加上按需分配，二者相結合。按需分配是分配什麼呢？吃、住，都由集體分配，每人十平方米以上，基本上是兩層樓房，全部電氣化——電燈、電話、自來水，有的還有電冰箱、電視，都是集體發給。吃飯也有“按需”的部分：逢年過節，每家分魚分肉；幼兒園、小學，都不收費用，校服、文具也由隊裡出；上了初中，就獎勵，升一級都有獎勵。上大學，假如自己繳不起費用，集體給你出——只是有一個條件：畢業後回來工作多少年。

這個大隊的社會管理，也採取現代化方式，除了工資之外，還發放養老金、醫療費，家家有儲蓄——不是自己存，而是大隊給你保管，拿去投資，年底分紅。我離開江蘇到香港的時候（八十年代初期），他們家家的存款，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兩三百萬。我在香港工作期間，他們已經每家發汽車。他們還到北京、上海投資，農

民到大城市投資，他們是第一個！剛開始在北京搞了個小酒樓，我還去看過。他們還有另外一個“第一”：到黑龍江、寧夏，搞了“黑龍江的華西村”，“寧夏的華西村”。出人出錢出辦法，幫助當地脫貧致富。

胡錦濤參觀了寧夏的華西村，非常欣賞。

吳仁寶已經 80 多歲了，他們還自己搞起了旅行社，是全國第一個農村旅行社！他的村民輪流出國。他的言談舉止，已經像一個政治家。我在江蘇當省委書記時，非常看好這個人才，把他提上來，當他們江陰縣的縣委書記，我想逐步培養他成為省委副書記——當了省委副書記之後就超出我的權限，歸中央管，我就管不了了。沒想到，他幹了一年，就不想幹了，說要回去當老百姓。我問他原因，他也沒講。我後來同意了，他回去還當他的支部書記。

高伐林：中國網絡輿論對吳仁寶有反應。

許家屯：我知道，一個，是搞世襲制，他退休了，兒子接任書記；另一個，村民和打工者的待遇不平等，是兩種制度。這都確實是問題。我講過，假如我能回去，就幫助他重新組織，真正闖出一個模式來。

華西村這個模式，城市化的道路跟別人很不一樣。是原地發展農業、工業、服務業，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服務業。還有一個特點：就地城市化，農民不進城，城里人下鄉——相當多的城里人前來呀。現在是村辦市，全國唯一啊！

吳仁寶已經完全超越了農民，亦工、亦農、亦商、亦政……

高伐林：他沒有完全超越農民，在新建的摩天大樓上擺放了金

牛。

許家屯：是的，這些問題上，反映了他的農民本性。還不止此呢，他那裡的建築，式樣也不倫不類！不過你要是光看這些呢，就還是知識分子的角度，缺少歷史觀、也缺少現實觀啊。要從現實出發呀。農民嘛，沒有點農民習性，怎麼可能嘛！

### 周恩來：許家屯來了沒有？

我在江蘇，在農業上改變面貌，做了兩樁事情，第一，抓了蘇南模式；第二，抓了蘇北水利灌溉的配套。蘇北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平均兩年一次洪水。你想啊，中國 13 萬平方公里的水，都要經過蘇北。所以毛澤東要求：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這完全正確。大禹治水的經驗，主要是“疏”。疏不了怎麼辦？就要讓它停一下子。所以我們建水庫，要有湖泊，短期蓄水，或者長期蓄水，像洪澤湖就起這個作用，讓洪水來的時候留住它一陣子。這不是我的發明，是中央和省裡前輩的功勞。當時搞大平調，河工都是幾十萬人啊。農民說，又是秦始皇造長城。

搞灌溉網，有了大河，還得有小河、支流，有溪，有通到田地的灌溉渠。旱的問題解決了，但還有澇的問題，要搞旱澇保收，穩產高產。我的功勞呢，就是用中小河溝連成網，配套了！在蘇北，我解決了這個配套問題，做到了穩產高產，又改造了一千萬畝鹽鹼地。那是“文革”期間的事，我 1970 年“解放”，在省革委會當一個副廳級幹部，開全國農業會議時我就講這個。記得那次是周恩來主持

會議，他上來就問：許家屯來了沒有？我站起來說：我在這裡。總理沒講幾句話，就開始表揚：幹部要經得起大風大浪的鍛煉、考驗，大浪淘沙。他點了我的名，又講了這番話。

我也沒有太在意，問了他一個問題：搞河溝，用換工的辦法可不可以？——什麼叫換工？我這個公社、這個大隊，要挖河，要修堤，要改道……向你那個公社、大隊裡借勞力。將來你那個公社、那個大隊，要挖河，要修堤，要改道……我就還給你。

我離開江蘇後，蘇北成了第二個糧倉——現在則是江蘇唯一的糧倉，原來還有一個糧倉蘇南，後來搞鄉鎮工業，農田都變成了工廠、學校、醫院和旅館了。

我離開江蘇時，江蘇的農業從全國第四位變成了第一位，工業從第三位變成第二位。江蘇調給國家的糧食，一年就是十幾億斤！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都高興得不得了啊！

（2012年7月）

高伐林，《明鏡月刊》

## 他想念故土戰友， 故土戰友也想念他

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近日病重送院，據悉中共中央已做內部通告。許出走美國後一心想回國，等待 20 多年，心願還沒有達成。星雲大師說，有些事可以靠時間解決，但有些事過去了就沒有了。

因為腎衰竭影響排尿，許家屯腹腔積水一直威脅到心臟，要緊急送醫院搶救。因為百歲高齡，他一直處於昏睡狀態，尿中毒、腎功能僅剩 10%，醫生開出了病危通知。

在許家屯送院前還清醒時，他不忘告訴家人，託人緊急向北京報告他的狀況，更希望可以讓習近平總書記知道。據悉，北京接報，亦快速有了反應。畢竟，許家屯曾經官至中央委員、正部級官員，雖然被開除了共產黨黨籍，但他在海外 20 多年，從來沒對黨有不利的言行。

### 2008 年為四川大地震流淚



許家掛著中國著名畫家黃苗子的篆書：“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高伐林攝）

自八年前第一次赴洛杉磯訪問許家屯以來，共有超過六次專訪許家屯的經歷，還有一段時間為他整理書稿。每一次見面，許家屯都會侃侃而談，健談的老人會整整花一下午時間和你聊。自那時起，給我的印象是，許家屯極想回國、想回家，這樣的念頭在他心中成為一個強

烈的願望，揮之不去。看網上消息稱，中共中央已內部通告了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前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病重的消息。有說，中央已做好準備，最高領導人批准若駕鶴可回國，但都無法證實。如屬實，那怕是捧著骨灰落葉歸根，也圓了老人家的夢，卻情何以堪！

出走美國，許家屯一直沒有放棄對國家的思念之情。2008年5月，我第一次赴洛杉磯訪問許家屯，當年92歲的老人，為四川大地震流淚，在電視機前與中國民眾一道默哀三分鐘。隱居洛杉磯18年的老人難掩對祖國、對同胞的思念之情，表示“很想去看看”。

美國洛杉磯東南部的奇諾崗(Chino Hills)為一片起伏的山地，遠遠望去景致秀美，在一處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的環抱下，幾幢獨立別墅格外醒目。許家屯的居所就在此地，他已在此經過了20

年的隱居生活。居所客廳寬敞整潔，正面牆壁一幅巨匾，秀麗的字體抄寫下陶淵明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看得出，這首詩為許家屯所鍾愛，也是他多年來心境的寫照。

許家屯最大的心願是回到祖國，他多次對我表示，當初出來避難時就說好要回去的，離開中國，目的就是為了有機會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但沒有想到會這麼長時間。如今想回去，一是知道中國發展得很好，想去看看；二是年紀大了，落葉要歸根。臨出走時，許家屯給鄧小平、楊尚昆寫信了，提出了赴美後不尋求政治庇護、不泄露中共機密、不會見媒體、不與民運人士接觸的“四不”保證，想短暫在國外居住一段時間。

雖然年邁不免體弱，何時可以回家的日子看不到，許家屯還是充滿著樂觀：“情況複雜，急了也不行。只能視如無睹，不去想太多了。”不過，言語間，思鄉念舊的感慨依然難以揮去。許家屯不無隱瞞情感的說，“人到了暮年，落葉歸根，這是很自然的想法，現在國內發展這麼快，而且十七大以來中央新班子提出和諧社會、和平建設、和平革命，都是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種嶄新的思想解放，一種很重大的創新。我有興趣，去看看，我等待這個日子。”

不少人關心許家屯，當年一起革命的老戰友公開呼籲希望讓許家屯早日回國，這些都讓許家屯點滴在心頭。最初在美國接待許家屯的星雲大師亦對我說：“記掛著許家屯回國的事。因為他清楚記得，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希望許家屯回去，許也稱是出門旅遊，要回去的，當時美國西來寺也是臨時收留他，要勸他回國的。”



星雲大師早前接受我訪問時說：讓許家屯回去，我一直都心懷好意，沒有一點壞心，現在看來可能還要時間。不過，有些事情可能靠時間可以解決，但有些事情過去了就沒有了。許家屯先生年邁了，一個老人沒有了，就永遠改變不了，希望不要留下永遠的遺憾！

### 回香港回大陸都可以

2012年，年屆96歲，許家屯雖然行動不便，卻思維敏捷，對往事記憶清晰。許家屯再次對我表示：“出來時間長了，希望回去，至少想回去看看。但我很矛盾，不想因為回去，把頭腦中想的一些東西丟掉。假如不丟掉，那當然回去好。回香港，回大陸都可以。”許家屯想到一些老地方看看，看看新面貌，看看一些老人。他尤其心繫江蘇老家，過去他離開時還有些窮農村，現在有哪些變化？許家屯嘆一口氣，感慨道：“唉，老朋友、認識的人都不在了。”

“中國第一村”——江陰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與許家屯世交，那是因為許家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時與吳仁寶結緣，還幫過吳仁寶的忙。許家屯出走美國，吳仁寶專程赴美探望。在美國，兩位老人談了一下午，許家屯談到那一年的政治事件處理的一些內幕，他怎麼流亡到美國的細節。吳仁寶表示，我一直認為，你做的沒錯，但離國而去，讓人留下了話柄。

吳仁寶曾經為許家屯回國之事向中央寫信。信由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轉交胡錦濤。胡錦濤已經不是總書記，還是國家主席，他表示不管政治了，不問中央的事情了。當時的表態是：許家

屯回國，個人沒有意見。

吳仁寶重病彌留之際，許家屯在電話那一頭老淚縱橫，他叫兒子跟吳仁寶說，要等他回來。吳仁寶說了四個字：叫他回來。

那年，我到揚州蘇北醫院老幹部病房走訪了許家屯的老戰友黃雲祥，帶著遠在美國的許家屯的問候，黃雲祥顯得特別高興，連連問：“他好嗎？他好嗎？我歡迎他回來。”

許家屯 1939 年到泰興任中共泰興縣委書記，黃雲祥是宣傳部長。許家屯轉告黃雲祥，如果能回去，一定第一時間去看望他。為了讓許家屯能早日回來，黃雲祥幾次向中共江蘇省委反映情況，希望可以讓許家屯回國，“我認為，這樣也可以保證他不在美國犯錯。”但老人無奈地說：“我孤掌難鳴呀。”

平時，許家屯習慣端坐在客廳向南靠窗的位置，窗外綠草如茵，在冬日西斜的陽光照拂下，看似沈睡著的許家屯，要麼戴著耳機靠在椅背聽新聞，要麼低頭冥思，想著他永遠想不完的問題。他不斷編織一個中共老黨員的反思和理論創意，卻一直在等待結果。

人的一生，用 20 多年時間“旅遊度假”，對誰來說都似乎奢侈、似乎漫長了。雖然，這裡風景秀麗，鳥鳴花香，陽光、山麓、綠草相連，是合適的延年益壽之地。不過，許家屯並不想以此地為歸宿，他說，旅美只是權宜之計，他還在等待，等待“旅遊度假”結束回國的那一天。

紀碩鳴，《超訊》2016 年 6 月號

## 一百歲的清醒頭腦

在洛杉磯，這位自“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前正部級官員一直在等待“落葉歸根”。曾有人受托向胡錦濤提呈，答覆是：“時間未到。”

### 山氣日夕，欲辯忘言

因為年老體弱，百歲許家屯腎臟功能衰竭影響排尿，積水一直漫延到胸腔，引起心臟衰竭，在 2016 年 5 月中旬一度陷入昏迷狀態，被緊急送往洛杉磯 Garfield Hospital（加惠爾醫院）搶救。醫生說，他的腎功能僅剩 11%，發出病危通知書。不過，六天之後，美國時間 5 月 19 日，許家屯奇蹟般出院了。他形容自己“彷彿新生一般”。

說“新生”，其實更像是夙願未了。這位離開中國已 25 載的前共產黨正部級官員一直在等待，有朝一日，“落葉歸根”。

病重期間，網上消息稱，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派人去探望他，還留言隨時可以聯絡。也有說，中央已經通報許家屯病危的消息，最高領導人批准駕鶴可回國。但據筆者了解，這樣的消息根本無從查核，只停留於想像。歷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一個離經叛道

的高官，絕對不可原諒。

而前中共中央委員、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前中共港澳工委書記許家屯仍然滿抱希望。從 2008 年第一次在美國洛杉磯和許家屯長談訪問，到 2015 年初在他的奇諾崗居所有二次長達八小時的專訪，在筆者總共十多次的長時間訪談中，許家屯透露最多的就是“落葉歸根”的心願。從中國人的儒家倫理出發，這是人之常情。曾經有人受托向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提呈許家屯的願望，得到的答覆是：“時間未到”。這句沒有明顯拒絕的黨中央最高領導的“指示”，讓許家屯仍然堅信黨會寬恕，只是需要等待。

不過，對一個百歲老人來說，他等得起嗎？

從鬼門關走一遭，百歲許家屯又回到了他的美國洛杉磯往東南的居所奇諾崗（Chino Hills）。Chino，在西班牙語裡，是“中國人”的意思。這裡是一片起伏的山地，一處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環抱之下，幾幢獨立別墅格外醒目。許家屯已在此度過了二十多年的隱居生活。

雖然早在 1991 年就已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二十多年待人接物時，他仍然處處維護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黨派。

初見許家屯是在 2008 年，他 92 歲。正值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遠在半個地球外，美國南加州的許家屯，一直坐在電視機前及收音機旁，觀看、收聽來自四川的消息，為震後的人間悲劇流淚不止。他吩咐家人為災區捐款。電視直播畫面裡，天安門廣場的人們為大地震中的受難同胞默哀三分鐘的時候，他也站起身，肅立無言。

那時，隱居洛杉磯 18 年的許家屯接受筆者的獨家專訪，提起震區，他說自己“很想去看看”。他流暢地運用著那個將他拒之門

外的話語體系，一連串的感恩與肯定。他說，令他欣慰的是，中共領導和人民在這場大災難中經受了考驗，“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在災難面前表現出的是這一屆政府一貫的‘以人為本’尊重人的權利和價值，為人民服務的理念，不僅是我，全世界具有公正情懷的人，都予以很高的評價。這就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希望。”

許家屯承認，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對他影響最深。而胡耀邦、趙紫陽與毛鄧相比，還是有較大的距離；胡趙缺少政治韌性，如果韌性多一點，也不至於與鄧疏遠，“這是一個悲劇，鄧和胡趙，是可以不決裂的”。而他認為，胡錦濤、溫家寶具備政治韌性，“特別是胡錦濤，青出於藍”。對中共的主要領導，他一直是極盡讚揚。彷彿他從未曾遠離。

### 從不批評共產黨更不洩密

出走美國，他曾經用了“躲避”二個字，稱“到美國躲避的事情很倉促，臨時決定”。

那段 20 年前的故事，他還記憶猶新。1989 年默許當時中國政府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後，黨中央要求時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許家屯調離原職，繼任者是周南。1990 年 4 月 21 日，北京最後一次開會結束交接工作回到深圳時，許家屯正準備搬家去南京老家，已經買好火車票了。他收到一系列不好的信號：新華社新任社長周南派人沒收了他的車子，還查扣了一批私人文件，主要是個人的書信，周南成立了專查許家屯的專案組。

許家屯想到海南省長梁湘——這位創建了深圳特區又籌備了

海南島建省的“苦官”，在“六四”後被冠以“以權謀私罪”被撤職，之後被扣壓北京，受到反覆審查（梁已於1998年病逝）——許家屯動了“躲避”的念頭。

出走時，許家屯給鄧小平、楊尚昆寫信。這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舉動：從歷任出走的中共官員看來，從來沒有一個人外逃還給領導寫信的。許家屯在信中說：我同中央常委有些人意見不合，他們對我可能有些動作，我需要暫時避一避。許家屯說，我是外出旅遊休息，並向他們作出“四不”保證：不搞政治庇護；不輕易見記者；不撰寫文章；不洩漏黨和國家機密，希望鄧、楊見諒，並希望不要搞家屬，只要相安無事，定會堅持這幾條。

許家屯想的是，當初出來避難時就說好要回去的，離開中國，目的就是為了有機會可以再回去，“如果我不走，可能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

二十多年來，許家屯信守了自己當初四分之三的承諾。唯一沒有做到的，是後來他還是撰寫了文章。許家屯稱，那是因為中共將他除名，動手在先。所以他出了回憶錄，寫了文章，但他有他的底線：從不批評共產黨，更不洩密。

到美國時，他謝絕了很多人的拜訪——“尤其是大陸不喜歡見到的人”。美國聯邦調查局找到美國華文新聞界老報人陸鏗，想讓陸搭橋見許家屯。許家屯不見。陸鏗答美國聯邦調查局說：你們來他不會見，國務院派人來可能會見。美國國務院派人來見許家屯。許家屯表示，大家見面也沒有什麼話說，美國的要求他不會答應，他也沒有什麼要求提出，就散了。台灣也派人來見許家屯，更是

話不投機。

## 百歲了, 頭腦依然清醒

他的口風很緊, 百歲了, 頭腦依然清醒, 知道的很多, 卻隻字不吐。2012年, 梁振英和唐英年候選香港特首之爭, 詢問他誰更適合當特首, 他就是不表態。回答說, 香港已經是亂局了, 我說多了, 不是給中央添亂嗎? “這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一致的, 香港人要注意穩定、繁榮這兩個詞。”

香港的記者最熱衷追問的就是香港官員中, 誰是共產黨? 梁振英是否地下黨? 許家屯不否認心中有個名單, 但他絕對不會告訴你。哪怕是20年過去, 有些事情都可以解密了, 仍然不說。還是那句: “我不能給中央添亂。”

2015年一次媒體訪談裡他說, 他相信習近平當局還會挖出更大的“老虎”, 那時, 他將會實現回國的心願。

美國有民運人士組織的活動, 許家屯一概拒絕, 偶而有一次不清楚參加的人員情況, 去了以後發現是民運人士的活動, 他很不開心。他跟筆者說, 以後不管什麼活動再也不出席了。

不過, 有學者要拜訪, 他都來者不拒。大陸自由派學者許知遠去拜訪許家屯, 幾句來回, 許家屯就品出味來了。當時正值香港占中, 許知遠問老人家的看法, “我當時就講了, 什麼占中不占中, 都是中美之爭。”許知遠寫文章稱許家屯是“國家的口吻”。

許家屯事後對筆者表示: 我知道他屬於所謂的自由派, 所以

我同他講，這是“中美之爭”，現在英國已經退到後面去了，中國收回（香港）之前，英國人就已經聽美國人的了，所以這是美國所謂的“重返亞太”的部署。

美國明鏡新聞集團總裁何頻是許家屯的座上客，兩人屬忘年之交，有不同的價值觀，經常為民主爭辯。許家屯稱何頻極右，何頻稱許家屯是老左。許家屯事後對筆者說：所謂民主，我同何頻辯論，我說給你兩個小時來表述，我再用兩個小時來駁斥你，他不同我開展這個政論。

十八大前，許家屯有過對中國內亂的擔憂。習近平主政後，他很樂觀：“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取得了西方工業化 300 多年發展的超人意外的發展速度，但同時在江澤民、李鵬主政時期他們私字當頭，拉幫結派，雞犬子女幾乎一起貪污腐化，把國家社會搞得老虎成群，蒼蠅滿天飛。十八大習近平領導的中央不僅整頓隊伍恢復中國傳統的民族美德，還老虎蒼蠅一起打。打老虎不管官多大，權多高，像薄熙來、周永康，軍隊的徐才厚、谷俊山先後都拉下馬，開除了黨籍，依法辦理，現在還在進一步打大老虎。”

前共產黨員許家屯曾經多次向媒體表示對習近平大力反腐的興奮和支持。在這場腎功能僅剩 11%、心臟衰竭、被下達病危通知書又奇蹟般“新生”的生死劫難降臨之前，2015 年一次媒體訪談裡他說，他相信習近平當局還會挖出更大的“老虎”，那時，他將會實現回國的心願。

紀碩鳴，端傳媒



## 吳仁寶臨終：叫他回來

江陰華西村是“中國第一村”，老書記吳仁寶與許家屯世交，那是因為許家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時與吳仁寶結緣，還幫過吳仁寶的忙。當時華西已是“樣板村”，比較出名，改革開放時面臨分田到戶。吳仁寶認為不能分，分了集體精神就沒有了。有人則認為他和中央頂著幹，還指責他思想僵化，不懂改革開放，還夢想著吃大鍋飯，想做土皇帝。

許家屯是江蘇省委書記，他和負責農業的周副省長，支持吳仁寶，沒有在華西村實行分田到戶。許家屯主張全省的分田到戶工作先試行一年，然后再作決定，因為全省蘇南、蘇北的情況不一樣。

吳仁寶在試行中主要推廣了大寨戰天鬥地的精神，動員已經實行了集體化的全大隊農民將全部農田改造為高產穩產良田，第二年畝產就超過了千斤，第三年就較大面積地首創全國噸良田（三熟超過 2000 市斤）。他隨即又將平均主義的工分制，改為社員的吃住、社員子女的教育所有學費、文具費等供給制，同時推行按勞付酬的工資制。這在當時的蘇南農村都是首創性的，因為他同時發展了隊辦工業、隊辦服務業，特別是農村旅遊業。省委對吳仁寶的不斷創新都及時召開經驗交流會，向蘇南、蘇中傳播。華西村全體

村民在吳仁寶的帶領下，就這樣逐步走向富裕。

許家屯後來調到香港，互相之間還有聯絡。如果當年沒有許家屯的支持，華西也實行分田到戶，就可能沒有今日的華西了，集體資產沒有了、鄉鎮企業崛起也沒有了。

1990年許家屯出走後，吳仁寶想去找他。但通過渠道詢問領事館，對方都說不知道許家屯在那裡，只大概知道他在洛杉磯。

有一年，許家屯拜託身在美國的周副省長兒子到華西問候，吳仁寶馬上拍板要去看許家屯。吳仁寶的眼睛不好，視網膜脫落。他說，時間不多了，一定要去看許家屯，一行人是帶著輪椅去美國的。

許家屯比吳仁寶大12歲，2011年，吳仁寶尋到位於洛杉磯的Chino Hill。吳仁寶是被推著輪椅進去，許家屯是扶著輪椅走出來的。一進門，兩個老人擁抱而泣。許家屯感慨：到美國這麼多年，你是第一個體制內的人，並且是有名氣的人來看我。

吳仁寶出訪美國，曾經有很多人表示不贊同。因為正遇上華西村建村50周年，會很隆重，還有領導來訪，有人怕這個時候鬧出一點事來。但吳仁寶態度堅決，他說，沒有許家屯的支持，就沒有華西村的今天，“我是非常尊重他的，這個恩華西村很難報。”



吳仁寶

在美國，兩位老人談了一下午，許家屯談到那一年的政治事件處理的一些內幕，他怎麼流亡到美國的細節。吳仁寶表示，我一直認為，你做的沒錯，但離國而去，走了讓人留下話柄。許家屯有回國的願望，並寄希望吳仁寶，因為吳仁寶當時可以直達胡錦濤。

那天許家屯很高興，兩位老人一起吃飯，很多年不唱歌了，許家屯還唱起歌來（唱的是三十年代初期田漢的《熱血歌》），把大家都逗樂了。許家屯說，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不是誰要打敗誰，而是殊途同歸。

回國後吳仁寶生病了。一直在上海治療，當時知道吳仁寶病情的也不到十個人。他住在上海醫院，回來後才把身體狀況透露給江陰市領導。直到最後一星期了，知道來日不多，吳仁寶才打了電話給許家屯在深圳的兒子許建，告訴病情。許建當晚打電話給許家屯，電話那頭許家屯一下子不出聲了。許建知道，父親哭了。

許建從深圳趕到華西村，在吳仁寶耳旁說，我爸爸要你等著他。吳仁寶還清醒，說了四個字：叫他回來。

許家屯曾經把他晚年還能否回來的很大希望寄託在吳仁寶身上的，他向吳仁寶表達了很強烈想回國的願望。吳仁寶曾經為許家屯回國之事向中央寫信。信由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轉交胡錦濤。胡錦濤已經不是總書記，還是國家主席，他表示不管政治了，不問中央的事情了。當時的表態是：許家屯回國，個人沒有意見。沒有想到，吳仁寶走得這麼快，一切又回到原點。

## 星雲大師： 期待他回國給中國加分

星雲認為，許家屯沒有要求政治庇護，在美國也沒有牽引出麻煩的國際問題，未傷害到中國。若現在讓他回國，對中國會有很大加分，會讓所有中國遊子覺得國家是一個母親，對群眾、民心有團結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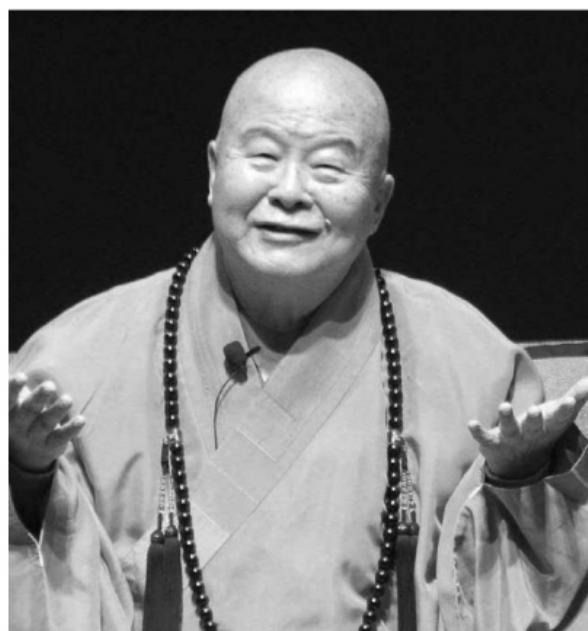
從第一次見許家屯至今 20 年，星雲和許家屯可謂知交：許家屯初到美國時，星雲大師經常在美國陪伴；即使以後許家屯搬出西來寺自置物業，星雲每年都會有二三次去美國，兩人每次都會見面；但接受筆者專訪時，星雲表示，和許家屯只是君子之交，每次見面都是許家屯到西來寺來，大家只是聊天。許家屯期待回國，星雲表示贊同，並在不同的場合都說：許家屯年紀大了，落葉要歸根。回國，是中國人的文化，是中國遊子的心願。他期待“讓許家屯回國，給中國加分”。

最近星雲回大陸的時間多，去美國的機會少了，有一二年時間沒同許家屯見面，但星雲仍然記掛著許家屯回國的事，因為他清楚記得，當年的中共領導人希望許家屯回去，許也稱是出門旅遊，要

回去的，當時西來寺也是臨時收留他，要勸他回國的。以下是訪問的摘要。

與許家屯二十年的交情，你對他這個人和解決他回國的看法是什麼？

許家屯是一個聰敏的幹才，忠黨愛國沒有話說，只是時逢高層思想不統一，我們講因緣不對。假如說現在共



星雲大師

產黨能讓他回中國，對中國會有很大的加分。讓所有出去的中國遊子覺得國家是一個母親，最後都能敞開胸懷，能原諒這些人，對群眾、民心有團結的作用。我在不同場合都這樣講，我現在講這些話，和當年讓許家屯住在西來寺時的願望是一致的，都想到有一天他該回去。

你至今覺得這件事很值得？

好在我幫忙。美國中央情報局確實派了好幾批人到西來寺追查他。找到以後，也和他談條件，要給他一幢房子、給予待遇。最初，一個星期起碼碰面談話一次，但許家屯在我這裡有安身之地，他就根本不為所動。生活沒有問題，也沒有必要接受美國的資助了。其實，我是幫忙中國，我認為是做了對大陸有貢獻的事情。舉

例說，你家的孩子出走，我替你收留，不讓他與壞人接觸，你應該感謝我，你要把他帶回去，我是有貢獻的。我也沒有讓他做壞事。

從出家人看社會紛爭，如何解開“六四”這個結？

像我們這種人，一生做和尚，不會翻來覆去的，我交朋友都是一生的，沒有說什麼好好壞壞的。當初收留許家屯時，根本與“六四”沒有什麼關係，現在這個事件 20 年了，如果能讓他回去，就是最好的說明，“平反”、“和解”，都是後面的事。讓他回來了，表示國家的寬大，表示許家屯對國家的信賴，這很好嘛。每一個中國人再走出去多少年，也要落葉歸根。

過去共產黨在革命的時候經常向國民黨提出一條，釋放思想犯。大不了這些都是思想犯，如今思想犯也改變了，不是這個思想了。有些過去的異議分子，現在有些不一樣了，你就寬宏大量，給這些遊子一條歸路。

你覺得許家屯有回去的可能嗎？

讓許家屯回去，我一直都心懷好意，沒有一點壞心，現在看來可能還要時間。不過，有些事情可能靠時間可以解決，但有些事情過去了就沒有了。許家屯先生年邁了，一個老人沒有了，就永遠改變不了，希望不要留下永遠的遺憾。

很多人都會問，西來寺為什麼要收留許家屯？

當年接受記者訪問時我就說了，西來寺對許家屯先生，就如對

一般信徒一樣，本著慈悲、人道、宗教家的立場，接引一切眾生，希望社會上的人士，不要將任何問題都歸於政治，在政治以外，還有很多人情、友誼、道義，收留許家屯先生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在香港，關心許氏的人，知道其落腳處，皆認為很好；在北京，許氏沒有要求政治庇護，沒有傷害到中國；在美國，沒有牽引出麻煩的國際問題；在台灣，大家也很高興他在西來寺；對我而言，助人為快樂之本。

對許家屯先生則因我對他意見主張的尊重，一切都很自由。希望關心許家屯先生的人歡喜就好，千萬不要把我與政治扯在一起，我是不管政治的，我只是站在宗教家的立場，對苦難者盡一份心力而已。

許家屯海外熟人很多，為什麼就找上你了？

我訪問大陸經過香港，許家屯請我吃飯，香港的大亨都參加了。後來，他也對我說，主要的工作是為了統戰和大家搞好關係。你到大陸去如此受歡迎，我也跟你有一個交往。沒有想到，這些在以後都是“罪證”。許家屯說，提議到美國來要找我，也因為我吃過他的飯。他想，我們又是老鄉，我是出家人，總會幫忙的。許家屯先生來美時，即向我表示想旅遊、休息，我非常尊重其意思。每一個人都有權追求他的生活方式，用“平常心”看這件事吧。

二十年來，很難找到你同許家屯一起拍的照片，你們究竟算什麼關係呢？

跟許家屯這麼多年只拍了很少照片。我和許家屯就是君子之交。他曾經說過，將來回大陸要皈依，他說，有一天能回大陸，一定是大師的弟子或護法。但佛教信仰是自由的，完全不受外力誘惑。

許家屯在你那兒住了多久？你們經常談什麼呢？

許家屯在我那裡住了一年多，是在西來寺後面的小房內。他跟外界很少接觸，人家也不能影響他，他可以安定下來反思。他一個人很寂寞，我有時間就去和他聊天，我們是同鄉，他會講什麼時候參加共產黨，我跟他講什麼時候出家。我發覺他的行政、文學觀念很進步，很有智能。一般人的思考不如他那樣銳利，很有見解。政治思想上，對共產黨始終忠心耿耿，給我們談話都講共產黨好，維護共產黨。那時，我對共產黨還不了解，只到大陸去過一次，就聽他講。在美國對共產黨沒有顧忌，聽他講也沒事。如果在台灣早年，聽都不敢聽，他講得慷慨激昂，我想，這是一個老革命。

有人說他帶了很多錢出去，你的觀察是這樣嗎？

據我所知他沒有錢，也就是說沒有貪腐。但有人資助他買房子，第一次有錢買一套房。我猜有台灣商人給過他一筆錢。後來他拿到了一筆寫回憶錄的稿費，把房子又換了。《信報》很了不起，很有道義，真正支持他，出厚禮叫他寫稿子，幫了他的忙。許家屯講了，金堯如幫了他很大的忙。後來金堯如也到美國，陪他打牌，比我陪他的時間還多。我也不會打牌。



因為幫助了許家屯卻得罪了一些高官，你怎麼看？  
這是一種誤會，人間的誤會很可怕，好的變成壞的了。

這是很深的誤解，有沒有想過很冤枉？  
我只能說時也、命也、運也、奈何也。實在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感到委屈？

我從遠處看，中國五千年來，一直被看作東亞病夫受欺負，是世界的弱者。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中國崛起，一掃東亞病夫，一掃過去的屈辱。千遭難遇，萬金難逢。在這個時候，每一個中國人不盡心盡力，愧為中國人，個人犧牲、委屈是小事，國家大體為重。為中國打拼的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理想。

像我這種人不是沒有地方住，榮譽名譽都不稀罕了。要的是什麼？我們要人間歡喜平安快樂，如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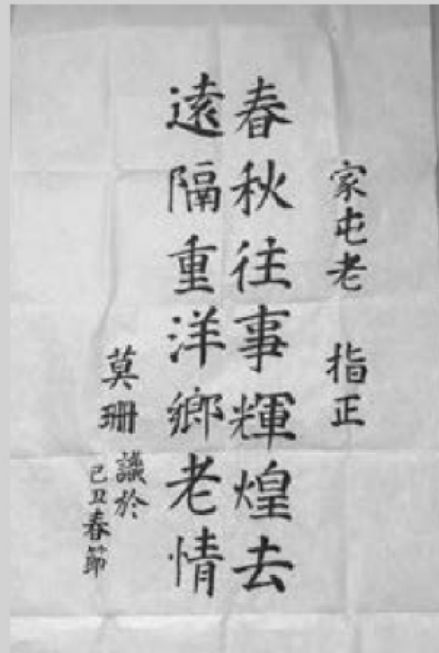
紀碩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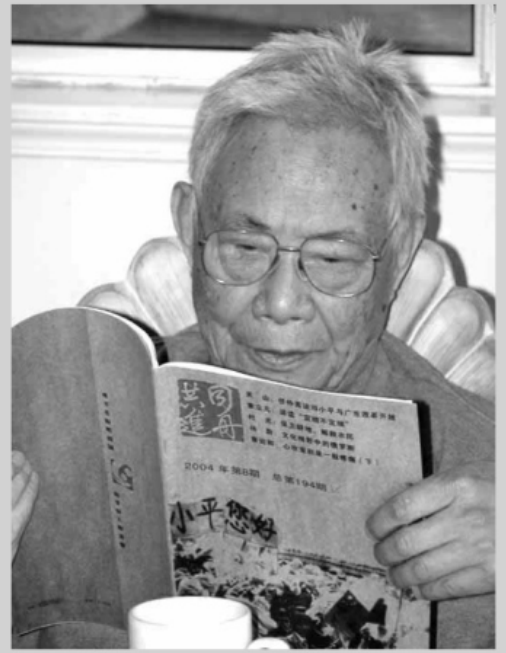
與前中組部幹部、獨立學者閻淮合影。(高伐林攝)



曾外孫女十分孝順，許家屯一要走路，她就要來扶。她是太爺爺的“開心果”。



當年與許家屯一起離家、投身革命的戰友莫珊，耄耋之齡，託另一位老戰友赴美時給許家屯寫了一幅書法作品表達思念。



友人從中國大陸回來，給許家屯拿來最新的雜誌，他饒有興味地瀏覽。(高伐林攝)



許家屯思維活躍，談笑風生。



許家屯瀏覽台灣《聯合報》。《聯合報》連載《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引起很大轟動。




許家屯下廚有模有樣。



許家屯最後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在這裡度過。（高伐林攝）



雖然視力不佳，但還是饒有興趣地觀看電腦，瞭解網絡科技。（高伐林攝）



**第三輯**  
**香港統戰和海南推手**

## 從許家屯這面鏡子 映照香港當前亂局

今年5月6日，承蒙香港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賞飯於星光行潮庭酒家。席間，談起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湯院長立即豎起大姆指興奮地說：“許社長真了不起，要不是當年被迫出走美國，我看兩岸統一早就水到渠成了。”一席話，頓時將本人的思緒牽回到那個難忘的歲月。

筆者有幸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逾11年，對許社長有一個從遠距離的仰望到近距離觀察和了解的過程，時至今日，香港各界及媒體對其開明、親民形象和突出貢獻仍津津樂道、高度讚揚，對此本人多有感慨。經過30多年來的風風雨雨和思想積澱，本人認為，重溫許家屯故事，研究“許家屯現象”，反思“許家屯事件”，對於破解香港當前的亂局，乃至中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 “許第一”開創新局名揚香港

本人與許社長有緣。1983年6月30日許社長來香港上任時，本人正在廣州暨南大學讀書，當時暨大條件相對較好，學生宿舍每層樓都有一部電視機，可以看到香港電視。每天吃晚飯後我都會看看新聞。或許由於從小經歷文革的磨煉，思想早熟，少年老成，看人頗有幾分眼光。看到鏡頭前的許社長一頭白髮卻神采飛揚，活力四射，有一種特殊的親和力與感染力，漸漸感到這是一位卓爾不群的風雲人物，敬仰之情悄然而生。

說來也巧，1985年，為加強對香港工作，經中央領導批准同意，由中組部統籌，在內地沿海各大城市抽調一部分骨幹充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隊伍。接著，1986年分社又派人在這些城市的各大學選拔一批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到分社工作。但主要對象是黨員，雖然暨大黨委對我也作了推薦，但由於本人不是黨員，結果就沒有了下文。我心想，不是黨員，也可以做其它工作嘛，於是毛遂自薦，給許社長寫了一封求職信，並附上本人幾篇已發表的文章。後來得知，許社長收到本人的信後，立即批給分社有關部門，很快便通知本人到分社的外事部工作。

1986年8月26日，本人乘坐的士前往分社上班，一上車，的士司機就打開話閘子：“你們‘許第一’形象好，有魅力，自從他來了以後，新華社給人的感覺就大不一樣。我真想去給‘許第一’開車，工資少一點也沒關係。”

本人在廣州讀書四年後返港，聽到“許第一”這個外號還是第



新華社香港分社舊址。現在是一家酒店。

一次，讚揚許社長的話也頗契合本人心意，於是在當天下午外事部的全體會上便將的士司機的話復述一遍，但出乎本人意外的是大家聽了都沈默不語，尤其是香港本地幹部表情特別嚴肅，一位本地人副部長甚至板起面孔。外事部長紀紹祥見此情形，立即轉換話題，替本人解困。散會後，紀部長對本人說：“你剛來，多了解情況，但也不必有多思想顧慮，要大膽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本人才知道，內外對許社長的評價反差頗大。香港社會對許社長帶領分社走出“左派”狹窄圈子，走向社會，廣泛開展對外交流的新舉措新作風評價頗高，有人通過統計，發現許社長出席對外活動的次數大大超過當時的港督尤德，在香港民眾中的聲望也相對較高，中共高級幹部能有如此高的民望可謂前所未有，這就是“許第一”外號的由來；但在內部的反應就比較複

雜，新調來的幹部對許社長開明、開放及親民作風評價較高，而原來的幹部則不以為然。其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許社長由鄧小平點將從港澳系統外空降而來，系統內各方面總感到突然和不適應，特別是分社原屬廣東省委管轄，過去分社社長及副社長清一色是廣東人，這次由“北方佬”（廣東人稱廣東之外的人為“北方佬”）任社長，心裡不是滋味。二是許社長一上任就要樹新風開新局，要糾正“一左二窄”的錯誤傾向，不少資深的幹部思想不通，認為這是全面否定過去的工作成績，對許的新舉措看不順眼。例如有位資深的老幹部認為，許社長多次演講都坦承中共在文革時犯了大錯，要徹底糾正，這樣說豈不是讓香港人更沒有信心？

事實說明，情形恰好相反，香港人正是從許社長真誠的態度上看到了希望，增強了信心。

還有人刻意向外宣傳說，許社長“拉幫結派”，“搞江浙幫”。本人認為，這是故意歪曲事實，1985年調來一批沿海城市的幹部，是經中央領導批准，並由中央組織部挑選的，而且許社長對他所重用的幹部在工作上要求十分嚴格，有時還有點不近人情，因為能者是要挑重擔的。

在工作中，本人深深體會到，延續30多年的極左路線留下極大的影響，要轉變思想觀念十分艱難，官場上，不少人將改革、創新、進取視為畏途，寧可不作為、寧左勿右、論資排輩，按老一套辦最為保險、最正確的觀念根深蒂固。改革就是逼出來的，是對原有規範框架的挑戰，不可能無爭議。因此許社長“牆內開花牆外香”



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 克服“一左二窄”錯誤傾向是中央的要求

不少人以為提出克服“一左二窄”錯誤是許社長個人主張。前不久，看到一位左派元老撰文談此問題時，形容許社長的新做法表現了“資產階級政客作風”，所扣的帽子真不小！實際上，即使中央文件沒有明確提到“一左二窄”問題，但許社長上任之前，胡耀邦、習仲勛、萬里、楊尚昆等中央領導都對許社長提出改變這種狀態的要求。

克服“一左二窄”，許社長首先是從改變自己做起。初到香港，許社長的某些言行受到香港輿論的批評，他開始也是用內地習慣的老一套回應。例如，他巡視九龍城寨，林行止批評他把內地一套搬來香港。他覺得林的批評很過分，立即進行反擊，“點名”反批評。對於一些希望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的親英人士，他用“殖民主義的孤臣孽子”一詞向他們施加心理壓力，結果全社會一片嘩然，反應負面。碰了釘子之後，許社長立即放大心量，反省自己。他意識到，解決問題不能靠講大道理擺立場，用概念壓人，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善用智慧，善於換位思考，將心比心，以寬容、理性、謙和、自律的態度與香港各界各階層溝通對話、交流，主動“入鄉隨俗”，向能者取經，向智者問策，從善如流。其結果，是你給別人空間，別人也給你空間，大家共享更大的空間。內心的空間大了，逆耳的

批評也就變成順耳的哲言，成為激發自己智慧和潛能的動力，批評者變成自己的“恩人”。林行止等一些尖銳批評者，後來都成了許社長真摯的朋友。

本人在外事部的一項工作，就是每天早上翻譯各英文報的社論及重要評論，供許社長閱讀。其中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有些批評中共和分社（包括許社長本人）的文章，由於篇幅太長只作摘譯，但他閱後都批示要求全文譯出，可見他對批評意見的重視。而他對別人做思想工作，則是採取委婉之中談原則，平易之中見立場的方法，學習周恩來“身如柔柳，心如磐石”。

以罵中共出名的《哈公怪論》專欄作家許國，是家父上世紀 40 年代在香港讀書時的同學。有一次他對本人說：“你們許社長很善於做人的工作，他請我吃飯，我以為他會批評我的專欄，結果他對我的專欄一句話也沒說，而是通過講故事和笑話來間接啟示和提醒我。他很懂知識分子的心理。”

許社長以自己思想認識的飛躍，來開創香港工作新局面。在他精耕細作下，穩定了港人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減輕乃至消除港人恐共、拒共的心態，形成了資本家放心、中產階層舒心、基層民眾歡心的良好社會氣氛。

### 發揮香港優勢促進內地改革開放事業

許家屯長期在江蘇省領導崗位上工作，改革開放意識強、膽子大、敢負責、方法多。他善於超前思維，提前佈局，善於從地方實際

出發，從基層吸取經驗，豐富和升華自己的理念，為地方建設興利降弊，造福地方，造福當地人民，並及時將經驗上報中央供參考選擇。

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許家屯任江蘇省副省長，分管計劃及工業，他將計劃權下放給市、地、縣，雖然招來一些守舊人士的批評，但此舉使江蘇省的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受到中央的表揚。

文革期間，他被當作“走資派”關了兩年，出來後靠邊站兩年，於 1971 年任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分管農業，又“死不悔改”，大力發展社隊企業（即後來的鄉鎮企業），最早推進農村市場經濟，“以工促副（業）”、“以工補農”，以及農民“亦農亦工，亦農亦商”，後來又創造了“蘇南經驗”。對許家屯的某些觀念和做法，保守的陳雲很不以為然。陳雲常說：“江浙人最喜歡搞投機倒把”（即搞副業）。許家屯以亮麗的成績及鐵一般的事實，說服了中央主要領導，趙紫陽去考察，讚揚江蘇省“發展經濟的辦法好”。接著鄧小平又在江蘇無錫聽取許家屯的匯報，時間 1 小時 58 分鐘，大大超過原訂的 20 分鐘，《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有兩篇文章談到“蘇南模式”。以實事求是著稱的陳雲在事實面前省悟了，於 1984 年在北京當面向許社長說：“我向你檢討，你比我聰明，我多年想辦而沒辦成的事，你辦到了。”

既是改革促進派、又是改革實幹家的許家屯來到香港後，發揮自己所長，立即著手充分利用香港的資金、人才、經驗優勢，用以促進內地的改革開放。例如，他利用香港優勢配合國務院沿海發展戰略、以及鄧小平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的部署，特別是收集吸納

香港知名人士的有益意見的經驗，提出了許多可行的、有建設性的意見。1986年許社長受到李嘉誠先生談話的啟發，立即趁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開分組會の間隙，請假去海南考察，回來後立即向中央建議利用香港經驗，在海南建省，做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許社長是個雷厲風行的實幹家，確定目標後，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全力以赴繞開內地在體制、機制上的弊端，避開過時繁瑣的陳規陋習。分社外事部在海南建省前後，就組織了幾批外國商會人員和駐港外交官去海南考察。

紀部長有一次對我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按規定，駐港外交官到內地參觀，要經外交部批准，但有時外交官邀請該國駐港商會成員一起去的話，若完全按規定辦，往往是批准下來時，已錯過時機和商機。對此，許社長總是說：“等批示來，黃花菜都涼了。”於是，採取先辦簽證後補批准函的變通辦法，結果引起外交部多次“抗議”。以後，外事部只好採取自組旅遊團並事先與內地有關方面聯繫好的方式，這樣就不耽誤時間了。許社長為了利用香港優勢促進內地經濟建設，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有建設性的工作，受到中央領導、各省市領導的充分肯定和讚揚。對此，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其回憶錄中有多處較為詳盡的說明。

## 善用“他山之石”

許社長到香港後，從重新認識香港社會開始，到重新認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過了一個思想逐步深化的過程。

本人到外事部上班大概一週後，紀部長就讓本人擔綱起草許社長在香港國慶籌委會上的講話稿，這是第一次由外事部起草這類講話稿，而且是讓一個剛大學畢業的“新丁”起草。大家都感到有點驚奇。本人則是又喜又憂，喜的是領導信任，憂的是擔心寫不好。看著本人猶豫的神情，紀部長說：“就是要讓你多練習，你給許社長信中附上的幾篇文章，我看寫得不錯嘛，我對你有信心。”聽罷紀部長一番鼓勵的話，本人欣然接受任務。寫到當年內地的經濟形勢時，本人專門寫了有關如何“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段話。許社長閱後用粗筆在這句話之下劃了一條橫線，將初稿批給有“秀才”之稱的分社副秘書長牛釗修改。對於這句話，紀部長認為許社長劃線的意思是，這不是鄧小平的原話，所以要修改；牛釗副秘書長則認為，這表明許社長正在思考這個問題。牛釗副秘書長說對了，沒多久本人就注意到：許社長在多次與香港及海外人士談話時，有不少內容都是探討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問題，特別是許社長與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有關美國中產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長篇對話，引起本人的極大興趣。之後，香港媒體開始報道許社長正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消息。同時，本人了解到分社內部有資深的老幹部寫信給港澳辦和中央領導，批評許社長犯了“原則性、方向性的錯誤”。

1988年8月底，本人調到分社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佐牧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協助他起草許社長一個內部講話稿（對象是中資機構領導及有關機構研究人員），題目就是“如何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此時，佐主任剛參加許社長率領的赴美考

察團從美國回來，他說，他正在為許社長起草一份向中央匯報赴美考察資本主義情況的報告，許社長的初步看法是：從認識鄧小平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一國兩制方針出發，只有全面、正確、客觀地了解、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和規律，吸取和利用資本主義有益的東西，包括其創造的物質文明和有積極意義的精神文明，才能更好地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同時也更有利於在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許社長還用通俗的話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長期共存、共融，兩種制度實際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競賽，但不會變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長期在江蘇省工作、熟悉許社長的佐主任還說，對於新生事物、新思想、新觀點，產生不同的看法是十分正常的，但不同的思想認識會產生不同的結論，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他舉例說，毛澤東和陳雲如果能到資本主義世界走走、看看，可能對資本主義的看法會不一樣。有時，某些保守的政治觀念局限了他們的眼光，陳雲具有實事求是精神，但他沒有到廣東到深圳來看看，十分可惜。但另一方面，如果從個人恩怨出發，從搞內鬥的目的出發來參加爭議，則需要警惕，因為這在某些情況下會產生嚴重後果的，也是人們不願意看到的。

後來，許社長撰寫《重新認識資本主義，自覺建設社會主義》一文，經過佐主任文字上稍作潤色之後，在 1988 年《求是》雜誌第五期發表，立即引起黨內的爭議和某些人的強烈抨擊，事情鬧到趙紫陽那裡。趙說：許家屯的基本觀點沒有錯，這才把發難者的口堵住了。許家屯出走美國後，分社開展“肅清許家屯右傾機會主義流

毒”活動，研究室主任陳偉在研究室全體會議上說：許的這篇文章是“為資本主義唱讚歌的大毒草”，江蘇省也準備開展大批判，但鄧小平說話了：“我看這篇文章沒有什麼大問題。”於是大批判不搞了，分社的批判之聲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而收聲了！

### “許家屯現象”值得重視和研究

香港有評論認為，許社長是“黨性堅定，思想開明的共產黨人”。一個共產黨人能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獲得民眾衷心的愛戴和擁護，而且能長期維持好名聲，這個前所未有的“許家屯現象”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它說明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方針是非常英明的，也說明許社長提出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是有重要意義的，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領會“50年不變”，“50年後更不必變”的內涵。許社長認為，在香港工作，更應將原則性和靈活性兩個看似互相矛盾的東西結合起來、統一起來。運用好的話，可以身處矛盾而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只有原則性，沒有靈活性，就會脫離民眾，陷於孤立；只有靈活性，沒有原則性，就降低人格，而靠無原則的遷就換取的合作和諧是暫時的，不可持續的。

在維護國家原則的同時，許社長以自己長期地方工作的經驗，充分照顧香港的實際情況，顧及香港人不同於內地的觀點和顧慮。

“本子風波”就是許社長面對大是大非問題敢於亮劍的突出例子，許社長一方面回擊英方不按本子辦事“偷步”推出代議政制“還政

於民”的行為，迫使英方停止行動，並公開承諾對香港政制發展採取“循序漸進”、“與《基本法》銜接”的方式進行。另一方面，許社長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區別對待的方式，對某些人的方式方法提出尖銳批評，而對另一些人則採取寬容、接受的態度，因為其中反映出香港人不想中英雙方“開火”、希望維持安定局面的心態，掌握這種心態，有利於日後更好地進行爭取人心工作。

這裡再舉一個突出例子，就是許社長樂意接納部下的開明意見，主張《基本法》起草必須有港人參與，並派喬宗淮副社長專程上京向港澳辦以及中央領導反映這個意見，順利促成有代表性的港人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成立起草委諮詢委員會，把《基本法》起草過程變成增加港人信心的過程，這一做法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某些經驗。

從許社長個人來說，他有長期鍛煉的真本領，有自己的獨特優勢，不僅思想開明，視野開闊，善於與各界和媒體打交道，適應新時代步伐和民眾的要求，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而且，許社長有善於向民眾學習，甚至向自己的對手學習的謙和作風，這樣就能超越對手，脫穎而出。

許社長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改革家群星燦爛的時代。如果沒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勛、萬里、楊尚昆等中央領導的鼎力支持，許社長早就無法立足了。“許家屯現象”既是英雄造時勢，也是時勢造英雄。許社長順應民情民意，造福香港人民，他成全了香港，香港也成全了他，為他提供了創造奇跡的舞台，或者說他和香港共創奇跡。許家屯故事家喻戶曉，對“許家屯現象”人人有興



趣，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上寫下輝煌的一章。

“許家屯現象”使本人想起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所說的一句話：“我們的人民真是太好了，我們犯那麼大的錯誤，人民還原諒我們。”本人想說的是：和內地人民一樣，香港民眾太好了，否則就不會有“許家屯現象”！本人相信，一個人能長時期把好名聲維持下去，那一定是有真本領和高尚品格來做支撐的。許社長替天行道，上天也十分眷顧他，99歲高齡的他身體健康，每天早上照吃湯圓，不用忌糖。許社長身體強健在分社也是“許第一”，每年體檢他的各種指標都好於我們青年人，大家私下都說：“許社長不愧是帶兵打仗的體格！”

### “許家屯事件”再思考

對於“許家屯事件”（出走），不少人以為是許社長捲入“六四”風波的權力之爭中。本人認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事實上，“六四”風波期間，許社長基本上跟中央主要領導亦步亦趨保持一致的，趙紫陽等中央領導去看望絕食的學生，許社長也到分社大樓外面看望絕食的香港本地學生。至於文匯報“開天窗”，在香港這個特殊環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認為，有三個信號是許社長出走美國的原因：

一是許社長早在1988年就向中央寫報告申請退休，並要求退休後到深圳當代經濟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工作，趙紫陽批示“同意”，鄧小平也批示：“我看可以。”但許社長的繼任人周南卻向某中央領

導以許社長會“干擾工作”為藉口，推翻以前的決定。

二是 1990 年 4 月許社長在鄧小平接見基本法起草委員全體人員之後，準備離京時，想與某中央領導見面遭拒絕，起了疑心。

三是周南來港上任前，專門花時間在深圳貝嶺居炮製許社長的“黑材料”，長達 10000 多字，誣告許社長十幾條莫須有的“罪狀”，並上報中央某領導。顯然，第三個信號是主要原因。

周南一到深圳就違反當時分社的有關規定，喝洋酒，住別墅，但在“黑材料”中卻倒打一耙，說許社長在貝嶺居搞了“一個腐化墮落的安樂窩”。十分荒謬可笑。有關“黑材料”詳情，將邀請知情人士撰寫文章敘述，此處不贅。

許社長出走美國，固然違反了高級幹部所應遵守的紀律，但周南歪曲事實，污衊許社長的劣行十分可惡可恥。另一方面，周南來港上任後，不僅自己在北京郊區違規建別墅，而且被揭發及在港刊上曝光後，採用激化矛盾的方式處理問題，以搞亂局面來保自己的位置。其劣行反映文革遺毒遺風，同時也反映我們體制和機制存在缺乏監督的極大漏洞和弊端。

“人在做，天在看”，公道自在人心！許社長出走美國後，他的上級和同僚如谷牧、彭沖、葉飛、梁靈光等人都對他作出公正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原廣東省省長梁靈光有一次到家父在廣州的寓所聊天，有人問他對許社長的看法，梁老省長坦率地說：“我和許社長是老戰友，從抗日戰爭到解放福建、建設福建，大家都知道他是爭先搶事幹的人，很有奉獻精神的人，當年抗日游擊隊改編時，他指揮的部隊人數一直比我的多。我和任仲夷退下來的時曾經問他‘我

們已安全著陸，你呢？’他說‘我服從組織，還在天上飛。’真想不到，他沒能安全著陸。”

“許家屯事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中國要真正崛起，必須克服從紅色文化中異化出來的根深蒂固的極左思想，必須消除這種“不良基因”，必須反對激進主義，減少內耗，增加黨內的透明度，消除體制和機制的弊端，把中華優秀文化和世界先進文明更好地結合起來，以提高軟實力，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實現真正意義上崛起。

通過重溫許家屯故事，研究“許家屯現象”，反思“許家屯事件”，回過頭看近三年香港出現的亂局，本人認為，亂局來自內部，特別是黨內有人就是要用激化矛盾的方式，讓香港沈淪，讓香港“掉鏈子”，讓習近平主席“沒面子”，從而進行權力博弈，抵制改革，抵制反腐倡廉。幸好習近平主席明察秋毫，以“不流血”為底線處理“占中”運動，粉碎了某些人搞亂香港的圖謀。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奇怪的是有些官員的心胸和眼光卻反而變狹窄和短視了，想要“變臉”了，要“報仇”了，對待香港的態度越發惡劣了：

你提出批評，他就扣帽子；

你要寬鬆，他偏要收緊；

你希望柔軟，他就要強硬，甚至硬上加硬；

你想要百家爭鳴，他就是強求“同一”。

總之，這些人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你不照辦，他就撤你的廣告，讓你內地的生意泡湯。他們不是像許社長那樣調和內部矛盾，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是恰恰相反，拉一派打一派，故意製造分裂，製造混亂。他們把人心搞散了，卻自以為“技巧高明”。他們用一種偏見看世界、看香港，而且不斷強化這種偏見，走向極端，引導更多的人犯同樣的錯誤。有的人甚至想乾脆對香港媒體實行“大清洗”，把所有大專院校都換上所謂“自己人”，只能發一種聲音。要是果真如他們所願，那中央豈不成了聾子和瞎子？！

這樣的人自以為聰明，以為如此一來便可以為所欲為了。

引用一句老祖宗的話作本文的結束語：“多行不義必自斃”！奉勸那些自以為得計的人，別幹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蠢事了。

閩江，《太平報》第二期，2015年8月29日

# 我“賣國”？——七年香港工作的一些回憶

引言：近日，許家屯回憶包玉剛大女婿蘇海文曾提出以十億元租賃香港十年，轟動政壇。為止，許家屯特別為我們詳述這一事件的前前後後。他亦首度回應有關他“賣國”的言論，和大談在香港期間一些鮮為人知的往事，內中不乏第一手資料，可堪細讀。——《明報月刊》編者

## 初到香港時

1983年，我到香港工作前，中央負責人同我談話，交代港澳辦公室、新華社、辦事處機構過去有“一左二窄”的錯誤，對中央匯報情況不全面、不完全，似乎有點想封鎖真正情況，他們主要根據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提的意見，另外搞一條線，反映香港人的真實情況。（廖承志當時負責港澳辦及新華社，我認為這個事實可能是做具體工作的人的毛病，和廖承志沒有關係。）

所以，我上任前想先去港澳辦看材料。我請了一個月假，到廣

州了解情況。我找新華社副社長來介紹情況，實際上他沒有講什麼內容，另外，去香港之前，我去見李先念，他是中央國務院外事領導小組組長，直接管港澳辦及外交部，這個時候，廖承志去世了，他問我兩樁事情，其中一件是徵求我的意見——哪一個人繼任港澳辦主任。我就提谷牧，他說他不喜歡谷牧，因為谷牧是“革命派”，他主張姬鵬飛。李先念同我講，我們都是“洋冒進派”，給我“震動很大”。看來他對搞改革開放的人有意見、有看法，而且把我歸為那一派，“我什麼派都不是，但我主張改革開放”。雖然他同樣是主張用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回歸問題。

### 鍾士元主張主權換治權，中下層多擁護香港回歸

我到香港工作後，一方面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一面展開工作，例如說，我先花了一段時間接觸中下層，而後轉過身來，開始比較廣泛的接觸中上層，特別是重要社會上層人士，和他們交換意見，了解情況，如包玉剛、李嘉誠、關德勝、邵逸夫、利銘澤和鍾士元、鄧蓮如、匯豐銀行董事長沈畢（他們三人都是喬宗淮聯絡的人）等。

他們有的同意中國收回香港，但多數人有疑慮，主張同意港英“用主權換治權”的辦法，甚至還有主張中國暫時不要收回。我在和社會上層人士接觸當中，他們大多採取同樣態度，甚至有一次在一位美國巨賈家中交談時，他的一個兒子插進來問：“你們這樣做，不是把英國的殖民地，變成中國的殖民地嗎？”我也接觸中下層，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擁護香港回歸的，上面這些情況，基本上代表

了香港的當時情況。我還訪問了九龍城寨，為利銘澤出喪扶靈，和某家企業家開張剪綵，初步開擴了局面。

三個月後，我到北京，按照胡啟立的要求，向中央匯報香港的情況。除了個別向胡耀邦、胡啟立匯報外，主要聽取匯報的是李先念、趙紫陽、姬鵬飛（趙、姬兩人是外事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我具體地說，以往中央以為香港人普遍愛國，歡迎回歸，實際上香港大部分不是這個情況，且對回歸疑慮很大，移民潮移民很多，一年都有幾萬人。

其次，“以主權換治權”的說法在香港有市場，不少港人贊成，包括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公開提出要中國當“董事長”，英國當“總經理”這種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因此我認為在回歸上面，應以爭取人心為主，人心不回歸，即使香港回歸，也不鞏固，而人心回歸的重心工作，是群眾工作等中長期工作。雖然我報告得到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但此時，李後、魯平、周南等人已伺機想來整我。

### 意見受重用魯平酸溜溜，李後周南的文革式批鬥

第一次是在1984年夏天，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開會之前，中共政治擴大會議派了兩個文件草案，一個是香港具體問題，另外一個關於港澳工作缺點錯誤，要發通報，實際上是批評我在香港的作法。於是我就打電話給姬鵬飛說有意見。我請示，如果沒有定稿，我想把我的意見，在會議上講一講再印。隔了幾個小時，姬鵬飛說，文件不成熟，就暫時不討論。



周南



魯平

在會議期間，我去見胡耀邦，因為中英談判膠著三個月，其中主要問題是中方有關主張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提議。我向胡耀邦建議，能不能允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回歸後繼續存在一段時間，這樣英國人面子裡子都過得去，而我估計英國人會接受這個條件。那時鄧小平已經要開會了，於是我趕快去，經過一個大花園，把趙紫陽攔下來，告訴他，他表示贊成。隔了一天，姬鵬飛說，小平同志答應了許家屯的意見，只見魯平自言自語的說：“我們也有過這樣意見的……”

還有一次，是所謂的“本子風波”。中英談判期間，我沒參加。而按道理在談判之前的準備工作，談判後的總結工作，我都應該參加，但是港澳辦從未讓我參加，反而直接通知新華社當時的第一副社長李菊生，也不向我匯報，直接就去了。我注意到英國人是談判桌上的老手，老奸巨滑，在戰略上



是被動的，但戰役上很主動，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改變現況。李菊生則辯稱我們向來是“後發制人”，但我覺得，我們應該知道人家準備什麼問題，先掌握英國人的情況、做法，然後我們準備好了對策，再讓他先提出來，才叫真正的“後發制人”。英國人的情況都不知道，會談的時候，他提出來我們臨時才想辦法應付，這不能叫“後發制人”。在這段時間，港澳辦內部有人告訴我，李後、魯平、周南，對我很不滿意，經常透過簡報，向中央負責人匯報我的情況，往往講香港報紙評論跟批評我的意見，他們再上綱上線，對我的批評用語，跟文化大革命一樣，我聽了不感覺到奇怪，也沒有放在心上，可是他們更加變本加厲。

### 立局議員向姬鵬飛告狀，鄧小平大讚“本子風波”

1984年11月，我在新華分社內，召開我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記者會。有記者問到，有什麼因素會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我的回答主要內容是，“關鍵是按‘中英聯合聲明’辦事，離開聲明的規定辦事，就有破壞的作用……現在我們看到有些人，有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我們不能不關注這個問題。”當記者提問時，我眼鏡因有些模糊，正取下擦拭，我右手拿著眼鏡，左手拿著“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邊比畫邊晃動回答問題，晃一晃本子。畫面經過傳媒報導後，引起軒然大波，英國外交部馬上抗議，人心惶惶，但此時，中國外交部連續兩天保持沉默，香港議論紛紛，懷疑許家屯犯了錯誤。之後，中央第一個表態的是萬里，他說看了許家屯的講話，沒有什麼。

後來外交部表了態，不痛不癢，香港人多敏感，認為北京對我是不是有意見，反而是有些有影響力的朋友，例如包玉剛安慰我，說你講得好。後來姬鵬飛到港訪問，英國政府派了立法局議員來陪他，我們三人坐在車廂內，立法局議員英國人針對“本子風波”，當我的面告我的狀。姬不表態，但他不應該沉默，應立即駁回，因為不是許家屯個人，是國家是非的大問題，我當時很有意見。後來過了一段時間，鄧小平在北京釣魚台接待包玉剛請吃飯，我也參加了。吃飯過程中，鄧小平忽然同我講：“你是不是有一次講話引發爭論嗎？你講得對啊！不這樣講，讓英國人鬧下去，那怎麼成？”會後有人要我寫個報告，但我認為沒有必要，中央至少都會有人知道的。

第三次的風波就大一點。1986年港澳辦忽然通知我，要我連同兩個副主任、副社長李儲文、鄭華回京，搞個談心會。姬鵬飛要我先發言，我就講：“我不知道要發什麼言，談什麼心，還是你們先談吧。”魯平、周南、李後三個人接連發言批評我。第二天上午，李儲文發言，綜合對我批評。下午要我發言，我意識到不是簡單的會議，已有人告訴我了，全部發言都印成報告——是“詳”報不是“簡”報，他們還準備周南接我的任，到我發言時，我一句也沒檢討，針對他們的批評，我一個個駁回。李後對我批評最出力，他們的論點主要是外事工作當中，沒有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外事無大小，小事也是大事，都要請示才能做”。我則答以新華社在香港的事有外事，但主要不是外事，還要做群眾工作，統戰工作，我假如完全遵照外事規矩，對外講一句話，做一件事，寫一段文字，都要請示，我在香港就不要做工作了。我理直氣壯的說，況且我們現在在做開關

的工作及事業，不可能這樣事事請示。會議結束，聽到李後同魯平說，“一句話、一件事都不檢討”！對我忿忿不平。

## 姬鵬飛說許家屯“左”，周南給聯合國抓把柄？

姬鵬飛在我發言後，要我再考慮，再做一次發言，而對我進行了十幾分鐘的批評，說我“左”。我考慮了一晚，第二天我跟他們講，我說我不發言了，我將近 70 歲了，應該退休了，假如還要我繼續工作的話，大事可以向你們請示，但小事我無法事事請示，否則就無法工作了。會議僵在那裡，大家面面相覷，主席姬鵬飛只好宣布休會。

第二天鄧樸方來見我，問了開會情況，我沒有感覺得意外。同一天，李先念找我去談話，也問了會議開得如何，事實上他已經知道了，他說，“你退休吧，今年 70 了？退休吧。”我說，“我本來想退休，是他們不讓退的。”“是誰不讓退？”“是胡耀邦。”

李先念說，既然是耀邦要你不退，你就不退吧。當時如果要我退，我是真的想退。又隔了一天，趙紫陽找我，說鄧小平讓我“再工作一段”。我說，最好讓我退休，中央如果不考慮這個意見，我是否做到十四大為止。除此之外，我要求港澳工會改組，要李儲文退休。

關於有人批評我任用私人派系，搞江浙幫，這點更與事實不符，因為我改組時就跟上面說，要改善“窄”，除中組部直接從北京調派外，我要求在廣東、江蘇、浙江跟上海市“三省一市”抽調 20

個幹部，從事香港工作。

當時有傳言說是周南要來接我的工作，但是中組部主管港澳幹部的某副部長說了，香港工作要有政治家的人才行，周南不適合，而且他在聯合國又有私人把柄給外國人抓到，怕他出大問題，怎會再他去香港？

### 如實反映也賣國？不贊成租賃香港

“六四”風波使相當多數的港人對一國兩制喪失了或嚴重削弱了信心，讓他們嚇壞了，尤其是香港的中上層精英者，原來他們就擔心共產黨政策多變，“六四”後，疑慮更重了。那個時候嚴重到什麼程度？連高層中最相信共產黨的某巨商也動搖了。他同他們的兒子商量：公司要不要遷冊、闔家要不要移民？兒子們主張遷冊移民，巨商本人也動搖了，考慮了很久，才表示“等一等，再看一看”。

我當時的任務，一方面是向北京匯報，希望上層多做港人工作；另一方面是向港人做解釋工作，恢復港人信心，在此種情況背景下，我先後組織了一部分港人中上層精英，他們有的是志願的，也有我們邀請的，還有巨商要直接和鄧小平見面，其他人聲明只見江澤民不見李鵬，至於他們反映什麼情況，我不很清楚，因為港澳辦不給報告紀錄我們看。見了兩批港人以後，港澳辦來電說，不能只見江澤民一人，要見江李兩人都要見，我們也很難解釋，後來就停止了。魯平說我“誤導港人”——我有多大能耐，製造一個“六四”風波，誤導港人？

至於周南講的“賣國”，其實，這誣告不是周南講的，而是魯平“發明”的，事情是，當時包玉剛的大女婿蘇海文（奧地利人）到新華分社找我，他搞了一個向中國政府建議書，提建議的共有十多人，多是港人，具體有誰，我也記不清了，建議以一百億港幣，向中國政府租賃香港十年為期，由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我看了以後很震撼，當時就問他，包玉剛先生知不知道？他不答覆，估計包可能知道。

這個事情太大，他們心態可以理解，但是我認為出格了，所以向他講，我會如實向北京中央反映，我又說，我的看法，中央不可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因此我向他建議，這個事情到此為止，不要再擴散了。事實就是這樣。

後來我到北京開會，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正式就任總書記，我跟他單獨見了面，對他匯報了香港的情況，談到了蘇海文的建議，我說他們這個事情出了格，要不要把這個電報報到中央來，要不要也報告給鄧小平，他點點頭，我就認為他同意了，我就發了電報給黨中央跟鄧小平。不久我又到北京，去看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我聽見魯平和李後在姬鵬飛的辦公室內議論，我要進門之前，聽到魯平講，“這種做法就是賣國嘛！”我才清楚他們講的是這件事。向他解釋，發這個電報之前，向江澤民匯報過請示是否將這個建議原文上報，江澤民點了頭，我才發的。後來有人告訴我，聽魯平說，“許家屯講江澤民已經同意了這一建議，所以才發電報的。”我不相信魯平會這樣說，因此沒有解釋。

——如實反映港人情況，是賣國嗎？

## 江澤民說許家屯“右”，江、李阻止改革開放

我雖然知道江澤民上台後，找李後、魯平，聽取他們匯報了兩天，可能聽了我不少他們認為我有的缺點和錯誤，但我仍不相信他們會捏造事實，無限上綱，強行誣陷。太下作了！我如實反映港人情況，是賣國嗎？他們不向中央及時反映香港人真實的情況，就是愛國？真是顛倒是非，莫此為甚！特別是魯平，竟誣陷我認同蘇海文等人的建議，無中生有，果然獲得新領導人的賞識重用升官。

五中全會，江澤民及李鵬舉起“治理、整頓”大旗，阻止改革開放，我很失望，決心退休。會議中，我跟組織部宋平表示要退休，但沒有談成。期間，我去找楊尚昆說要退休，楊尚昆就說：“不要再說退休了，沒有人啊！”我說葉選平可以啊，香港人反應很好。楊尚昆答說：“這個考慮不錯。”不過仍沒有下文。後來有人告訴我，江澤民在港澳辦的一個文件上，批了一句話：“看起來許家屯確實很右。”批過以後，江辦就把這個批語給港澳辦。港澳辦一位處長從魯平手上看到這幾個字，後來江辦又急忙把批語收回去。

我把這幾個情況匯同起來，那為什麼要戀棧？所以在回到香港以後，就在出席巨商鄭裕彤的君悅酒店皇朝會俱樂部開幕儀式剪綵時，我趁機向採訪的記者講，我已經向中央提出請求退休，批准是遲早的事。見報後，第三天我就得到消息，事情突然有變化，周南要來接我的任。後來中共中央來電報，要我回京。回京後，李鵬跟中組部的副部長見我。李鵬說，中央決定你退休。我感謝中央的決定。李鵬徵求我的意見，問：“周南接任怎麼？”我說：“周

南很好啊。”會後我回香港準備交代，不到兩天，忽然接到電報，新華社所有副社長同我都要到北京開會，在開會路上，我碰到姬鵬飛，姬作無辜狀說他事前不知情。我說，我在香港工作六年多，中央一句話都沒有，不知他們是怎樣評估的，我有點意見。後來江澤民趕到主持會議，宣布中央決定我退休，調回，周南接任。江澤民加了一句，“許家屯同志在香港工作期間，還是有成績的。”當時我反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三月分開最後一次會議，周南可以先到任，但是否可以等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通過，然後再公布周南的人事，江澤民講“不必了”。

### 周南不提許家屯露玄機，不“休息”難逃賣國帽

當時江李有很多失常的活動，例如未經人大常委會通過、公布，就迫不及待派周南來接我的差事，周南二月到港，我和副社長們商訂擴大春茗酒會，同時向港人告別，租用了國際貿易會議中心的大會堂，我在致詞時，特別介紹新社長周南，向周南祝福，但是反觀周南在致詞時，一字未提許某的姓名和離港的事，香港人很敏感，會還沒散，會場議論紛紛，一下會場好多人過來問“是怎麼一回事”，很不正常。

我認為他們要像對付梁湘一樣對付我。梁湘當時是海南省長，江澤民、李鵬用中央名義，發電報要梁湘和省委書記許士杰兩人去北京討論海南洋浦開發區，結果一下飛機就由警衛部門帶走，後來用莫須有的罪名判了梁湘的罪。

周南 11 月上任，我因參加最後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4 月下旬正式離開香港工委。可是，周南一到任，立即成立所謂“許家屯專案小組”，自任組長，鄭華為副組長，調查我在香港任內的所謂“人、財、物”。按中共組織原則，調查一個省部級主要幹部，須經中央常委或總書記決定。周南的動作，顯然是奉命而來。4 月 20 日，我到深圳搬家，新華社有幹部從香港趕來告訴我，周南已將調查我“人、財、物”的專案報告，報送中央，結合一系列不正常現象，可見中央有人士謀我之急。

“六四”風波，我雖與趙紫陽謀求避免戒嚴，在香港沒有執行李鵬的所謂指示；江澤民上台後，沒有執行他“治理整頓”改革開放的方針，而魯平、周南等不過是他們“整頓”我的工具。我與周南、李後等無私人恩怨，他們在胡耀邦、趙紫陽任內，因思想行為“一左二窄”抑鬱不得志，在新主子下，一拍即合，成為過河卒子，得到信任，升官重用。至今仍對一個老弱者不放手，所為何來？如果他們編造的事實是確實的，為何不在開除我黨籍時，公開列出，而僅以“莫須有”、“背離人民”作藉口？

周南的專案調查報告，那時早已在手；用來豈不堂而皇之？現在看來，如果不來美“旅行休息”，至少魯平、周南所謂的“賣國”帽子是難逃的。我的下場，豈不比趙紫陽更慘？

許家屯口述，《明報月刊》記者整理，《明報月刊》2007 年 8 月號



## “一國兩制”， 就是要有反對派

何頻(時任《中國時報》主筆)按:

許家屯在談話中依然喜歡哈哈大笑，這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笑態，記者形容為“招牌笑”，這可能是他比較能得到香港市民好感的原因之一。這位前中共中央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0年以“旅行休息”名義旅居美國洛杉磯後，北京駐美大使拜訪過他，楊尚昆任國家主席時還曾邀請他回國，最後對他的處理似乎有意低調，開除了他的黨籍，撤銷了他的職務，但並沒有被組織全國性公開批判。

不僅僅因為許家屯是中共一個老資格高幹，掌握著大量機密，而且許多老上司、老同僚、老部下至今還是北京的掌權者，北京要對他留有餘地。事實上，許家屯仍保持一個中共黨員的心態，為大勢已去的社會主義信仰辯護，他認為只不過是路線上、策略上出了問題，如果堅持改革開放，共產黨可以持續執政，中國也將強大無疑。或許正因為如此，許家屯與北京高層的政治邏輯才有近似之處。很顯然，他與老戰友趙紫陽一樣，並不是與共產黨在政治上真正對立，而是遭同根相煎。既有的中共史，基本是一部翻案史。權力鬥爭的

失敗者經常有機會捲土重來。毛澤東、鄧小平均是先例，以致於趙紫陽系的人物至今還抱有希望，雖然外界似乎認定江澤民江山已定。倘若北京局勢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變化，許家屯不會再在美國“旅行休息”片刻。

旅居洛杉磯後，許家屯曾經發表一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外界認為，他自己也承認保留不少。他近年一直謝絕記者的訪問，避免公開談論時局，即使他的書房堆滿中文書報，也沒有一天不思考、分析中國的局勢。

但是1996年7月下旬到8月初，許家屯破例在洛杉磯寓所連續四天接受了筆者的訪問，從香港、兩岸關係，談到北京政局，有時一天談話時間超過八九個小時，到深夜12時，80歲的許家屯依然思想敏捷。可惜許多談話內容，許要求不能發表，以下則是這次訪談現在可以公開的部分內容：

### 第一部分 香港：平穩過渡的可能性大

#### ◆不爭取港人支持是很大的失策

何頻：自從您1990年離開香港之後，除了發表《香港回憶錄》，一直避免談論時局。我最近去香港，聽到有人批評您說：許家屯怎麼到現在還不講話？他得為香港市民講幾句話呀。所以，我今天請您破這個例。

香港有人將接替您社長職務的周南視為強硬派，而將您視為開明派，似乎如果您在任，新華社與港督彭定康關係不會那樣惡劣。

政治真是如此簡單嗎？周南執行的是北京的意圖，您在任上可能也難免如此吧？

許家屯：六四事件之後，西方世界對中國政策趨向強硬，英國亦不例外，結束了以前中英關係密切合作的階段，在香港問題上變得強硬起來。北京呢，按照鄧小平的意思，你強硬我也強硬。另外，香港市民因為六四事件，對北京的觀感起了變化：由過去比較普遍的不信任、恐懼逐漸淡化，認為《基本法》基本可以接受，變為不滿、憤怒、對立，擔心“今日北京，明日香港”，後來變為希望用民主的辦法抵制北京的介入。中英、港京關係變得高度緊張。我當時企望溝通、解釋，和緩這個局面。對港英當局，我與港督衛奕信保持個人接觸，建立一種諒解關係，不致於完全沒有迴旋餘地。

我希望北京新的領導人能了解香港的特殊情況，爭取挽回香港人的信心。但是，北京有些人擔心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和平演變的前哨陣地，講了一些不必講的硬話。他們認為我太右，我只好提出退休。在這種情況下，新來的周南作風就不同於我了，他是帶了批右的任務來的，他認為香港的工作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何頻：這個時候，香港總督衛奕信也退休了。各方都換了主帥。彭定康可以說也是個不服輸的強硬派。

許家屯：衛奕信同我處境相近，香港有人告，倫敦也有人指責港督衛奕信和去世的前任港督尤德一樣，對中方立場太軟，是“叩頭外交”的代表人物，換彭定康來實行強硬路線。其實，我看尤德、衛奕信都是一心一意維護英國利益的，只不過策略上靈活一些。他們爭取過以治權換主權，發現北京收回香港立場不可能改變，便



許家屯與何頻合影。(高伐林攝)

努力為英國、為香港多爭取一些利益。他們對《基本法》一條條、一句句提出爭取意見，實際參加了制定《基本法》，盡可能維護英國的利益，也一定程度地維護了香港人的利益，說他們是“叩頭外交”是不公平的。

彭定康是英國首相梅傑要報答的功臣，得到梅傑的支持。他對英國文化、政治當然很熟，但對與中國人打交道是外行。於是強硬對強硬，雙方都過了頭。

何頻：北京火力對準彭定康，甚至稱他是“千古罪人”，似乎把彭定康解決了，香港就安定了。

許家屯：彭定康有他個人的問題，但他是代表英國政府的，執行的是英國政府的政策。北京不應將主要矛頭對準彭定康個人，關鍵還是要與倫敦交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不與彭定康見面，周南在酒會也不與彭定康握手，做得太過份，應該有一點外交上的風度和禮節嘛。結果把兩國政治上的分歧、鬥爭，變成了意氣之爭，沒有去努力爭取香港市民的了解、同情、支持北京的行為。這種做法是很大的失策。這一時期中國在香港的所作所為，沒有爭

取到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支持，以至於後來立法局選舉，親北京的勢力只得到市民較小的支持。

何頻：彭定康比較激進，但他很會利用民意，所以他敢於違背中英之間原來的默契、協議。

許家屯：對。他利用了香港市民的情緒，他鑽了空子，搞了一個“三違犯”，搞政制改革。從外交信譽上，英國政府是背信的。

北京在這場鬥爭中，第一，應該讓香港人知道事實真相；第二，應該告訴香港市民，中國政府這樣做，不是反對香港民主化。過去香港也有人批評我在這方面保守，我今天仍然認為民主要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相信這會得到許多人的認同。但是，今天的情勢變了，要適當加快民主步伐，北京應該理解這種願望。可是呢，北京有的人看不到這一點，結果許多民心跑到彭定康、跑到李柱銘、司徒華那邊去了。

### ◆不用香港特區作政治試驗

何頻：中國設置了深圳等五個經濟特區，帶動、刺激了全國的經濟發展。鄧小平提出在香港用“一國兩制”的原則，有沒有更深層次的政治考慮：希望利用香港這個政治特區作政治試驗、垂範，讓中共政府學會容忍政治反對派、容忍新聞自由？

許家屯：沒有。沒有想到用香港的政制推動內地的政治改革。北京有的人怕的正是這個，怕香港政治影響內地。最開始只是換一個旗子，香港其它都保持不變。後來提出民主問題，鄧小平反對西方民主那一套，主張在香港實行行政主導。其實，英國在香港原

來實行的也不是三權分立的民主，而是諮詢民主。假如我在香港，我會主張通過解釋，承諾在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後，可以考慮提前修改《基本法》，建議特區政府提前實行直選。

何頻：不管怎麼樣，香港只有幾個月主權便要回歸中國了，英國終究無力回天。但是，香港民主派有相當的民意基礎、政治實力，北京不能視而不見。隨著九七越來越臨近，雙方內心越來越緊張。怎樣對待民主派，成了衡量“一國兩制”的標誌。不能容忍反對派，何謂“一國兩制”？你可以收回香港，但收不回香港民心，只是一個強暴者的形象。

許家屯：這個問題迴避不了。香港民主力量發展了，北京要因勢利導。可是北京太強調以我為主，沒有強調以港人為主。按照鄧小平的意思，在後過渡期，防止英國政府搞亂香港，要香港人多加干預，北京有些人卻主張以我為主，是自己出馬。大大小小的官員講了太多話，不斷干涉，授英國人以柄，更增加了香港大多數人的不信任感：九七還未到，你就這麼多的干預，九七後你不是會更厲害？變成太上皇。

#### ◆民主派問題處理不好，會出亂子

何頻：未來北京將如何對待民主派，收買、分化、打壓、容忍？

許家屯：任何社會都有異議人士。香港社會複雜，有反對派是正常的。當然，民主派成員不少是港支聯成員，又支持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中方對民主派戒心很大。匯點原來與北京關係比較好，北京也決定請匯點一位負責人參加預委會，但匯點宣布與民主派合

作，北京就不讓他參與了。等於宣布與他劃清界線，不來往了。這種處理太僵化。

最近跡象表明，北京試圖改變這種僵硬作法，讓反對派有參與空間。這應該是一種好的轉變。不要把民主派逼上街頭。“一國兩制”，就是要有反對派。北京負責人應有這點聰明。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怎樣確定對民主派的政策，關係到未來香港社會會不會出亂子。

何頻：對公務員的政策呢？他們是保持香港正常運轉的基本力量。

許家屯：基本上是正確的。以前要公務員明確表示對北京效忠，要公務員的材料，沒有必要！造成不必要的困擾。香港人很敏感，脆弱得很，經不起風吹草動。

#### ◆港人不要把自己力量看得太小

何頻：現在有人說，香港實際上已經被中共控制了，香港到處是新來的大陸人。從外人看，可能如此，但站在北京的角度，這些來自大陸不同系統不同目的的人，九七後如何管理，恐怕比管理港人還難，他們會不會出亂子？

許家屯：說香港完全被中共控制了，恐怕估計過高。當然，從政治影響上，是差不多了。但從經濟意義上，還遠得很呢。有些商人遷冊了，轉移了一些資金，但重心還在香港，因為香港容易賺錢。匯豐、怡和等就是如此。相當一段時間內，中資在香港還不能成為主流。不要怕中資，互利互惠，中資發展有利香港繁榮。不過，港

人不要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小，要監督他們遵守香港的法律，依照《基本法》，據理力爭，不能讓他們憑特權來違犯香港法律。魯平說管住不讓他來，管只是相對的，你可以管得住一部分，但管不了另外部分。香港有多少家中資機構？沒有人能統計出來。

#### ◆香港會不會出現“二二八”

何頻：即使還有不少人懷疑“一國兩制”能切實執行，但越來越多人已經接受九七回歸這個事實，自動抑制言行，甚至模仿大陸的腔調。不過，仍有學者認為，殖民地回歸，人民心理難以調適，體制難以融合，容易爆發暴力衝突，例如台灣的“二二八”。

許家屯：在中英談判期間、在《基本法》起草期間，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避免發生動亂、暴力衝突。當時考慮到香港動亂，擔心台灣搗亂，現在看，台灣的因素也大大減少了，香港亂了對台灣同樣沒好處；主要考慮是英國政府不合作，有意搞亂香港。現在中英關係好轉，搞亂香港，對它好處不大，壞處不小；其次，民主派，搞亂香港的可能性也較小，如果它成為亂源，會失去它的大多數支持者；還有一個因素，香港公務員，大部分公務員都會過渡，警察力量還可以維持秩序，可以消除一般混亂。香港與英國撤離其它殖民地有同有不同，最主要的是中國就在旁邊。雖然還有一些其它因素，但《基本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保證，作亂的可能性都不大。北京希望拿香港來給台灣作示範，取信於世界，不希望香港動亂。

當然，人心脆弱，容易出亂子。但如果各方能有所克制，特別中方要開明，大家認真遵守《基本法》，就可以防止出亂子，不致出



大亂子。我看，香港平穩過渡的可能性大，因為符合各方利益。我對香港前途審慎樂觀。

#### ◆“錢七條”就是港台關係的界限

何頻：北京方面強調將“九七”回歸作為與台灣統一的示範，但是兩岸正式關係未能恢復，使台北與香港在“九七”之後的政經關係缺乏法理，不知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許家屯：經濟上的合作，是大陸、台灣、香港三方的需要，所以我相信從理智出發，三方關係會朝好的方向發展。現在要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問題，三方差距比較大，從香港方面看，主要不在港英政府，而是香港的民間政治力量要注意分寸；從大陸的角度，《基本法》、“錢七條”就是政策、界限，確定了台灣與香港的關係；台灣可以運轉的空間不是很大，尤其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情況下。

何頻：您在任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香港“九七”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本身的過渡問題？現在它是香港的第二政府，是因為有港英政府，未來香港回歸了，香港是港人治港，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如果存在，是作為中共黨在香港的領導機構，還是作為“太上皇”？

許家屯：這個問題我考慮過，但是沒有正式討論過。我好幾次向姬鵬飛提出來，希望中央討論一下，明確香港新華社“九七”之後的地位，姬鵬飛未置可否。新華社在香港的地位，是一個特殊形態，因為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中國不會在這裡設總領事館，不能用外交關係來處理兩地關係，所以用新華社來代表中國政府。香港老早就有共產黨，於是黨的領導機構也擺在新華社里面，黨政合一。

“九七”之後，按照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國防在香港有駐軍，外交部在香港有辦事處，其它事情由香港自己處理。國務院還要不要在香港有代表機構？如果設立，很容易給人“太上皇”的印象，也容易出問題。中共黨組織怎麼辦？在英國統治時期，它名義上是非法的，是地下黨的形式，中共港澳工委是半公開的。在特區政府成立後，共產黨怎麼辦？難道還是地下黨、非法黨？

共產黨不可能不存在，但是和特區政府什麼關係？按照大陸的《憲法》，共產黨是領導黨，在香港怎麼辦呢？這個問題非明確不可。我個人原來的考慮，有兩個辦法，一是全部公開，但是你共產黨參不參加選舉？參加，不參加，香港人都有疑慮。另一個辦法是領導機關公開，黨員部分公開，共產黨不參加選舉。更重要的是，共產黨在香港不是領導黨，不是特區政府的“太上皇”。否則，還叫什麼“一國兩制”。共產黨在香港主要是作群眾工作、統戰工作、作調查研究，為中央作決策研究。

何頻：“九七”駐軍司令員已確定是劉鎮武，外交部駐香港辦事處主任似乎應由現任駐倫敦大使姜恩柱出任，誰來接替周南呢？有傳聞說是中共海南省委書記阮崇武，有人說是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黃菊。

許家屯：人事的變化，不容易預測。這個人重要的是思想要開明，香港人能接受，級別太高反而容易成為“太上皇”。

何頻：是不是考慮過將特區行政長官在國務院掛個副總理、國務委員職務？

許家屯：有過，我向中央反映過這個意見。

何頻：您在任上時有無確定特區行政長官人選？誰會成為第一任？

許家屯：當時中央並沒有定，我個人考慮過幾個候選人，現在不想說。

何頻：特區行政長官的條件有哪些？

許家屯：最重要的是這個人要對執行《基本法》有信念、有決心、有能力；真正能抵抗、防止各方面對《基本法》實施破壞性的壓力、干涉。

## 第二部分 兩岸：誰拖得過誰？

### ◆與台灣高層建立了秘密溝通管道

何頻：您在新華社任上時，還參予負責與台灣的聯繫工作，參予對台事務的部門其實很多，有軍隊、國安、黨的系統，新華社起了統管的作用嗎？

許家屯：那個時候台灣與大陸直接關係不多，而香港與台灣關係多，我向楊尚昆建議過，利用香港加強對台灣的了解、統戰工作。楊原則上同意，於是在新華社內成立了對台領導工作小組，超越了原來的台灣工作部。楊尚昆說過，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有些事情，特別是高度敏感的事，台灣工作部也沒有參予。

何頻：有沒有與台灣高層建立秘密溝通管道？

許家屯：有一些。

何頻：包不包括蔣經國？

許家屯：不論有沒有，現在不說為好。

何頻：您離開香港時，楊尚昆曾經請您不要將對台灣的工作交給周南。

許家屯：是的。我沒有交。來美國六年了，也沒有和任何人講過這方面的情況。離開香港新華社後，我回過香港，主要是奉命辦一些與台灣有關的事，結果周南向北京告狀，個別同事因此蒙不白之冤，被調回北京。後來周南參不參予對台工作我不可能知道。

#### ◆解放軍想動武不是空穴來風

何頻：您出身三野，與解放軍領導、參予制訂對台作戰的粟裕、葉飛和張震應該很熟悉，您在五十年代初期又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我想知道的是，中共當年是不是真的要攻打台灣，還是象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所說的那樣，毛故意不打台灣？今年解放軍是否有動武的準備？

許家屯：那個時候確實要攻打台灣，各方面都在作準備，由粟裕負責，張震是他的主要助手。還準備派彭沖到台灣作地下省委書記。沒有統一台灣，是葉飛、張震等人最大的遺憾。

我看今年有人說解放軍想動武，不是空穴來風，軍隊確實有人主張用武逼談。

何頻：完全站在第三者立場，解放軍這次軍事演習太混亂了，可能達到了部分目的，但從表層看，北京失分太多。

許家屯：北京對李登輝訪美沒有心理準備，當時唐樹備還跑到台灣，籌劃第二次會談，幾天後才匆促應戰，又反應過度。最失策

的是對李登輝批判不留餘地，對美國提出了美國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要美國公開認錯。這些過度的要求不可能達到，達不到，第二步怎麼辦？只有用軍事演習了，但是在戰術上又不智，先打飛彈，時間持續又長，讓台灣起了抗藥性的作用。

客觀來講，不強硬不行，但得有一個度。過度了，達不到，如何下台？決策上太粗糙。此次較量的教訓是，沒有一旦華盛頓實行武力干涉時，與之作針鋒相對較量的準備，就不要對台灣一再採用武嚇。達不到要求，不真動刀槍，如何下台？如果準備真動刀槍，就必須作華盛頓武力干涉的可能，屆時適時實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針，還是棄甲曳兵而走？當年在強美悍蘇挑戰下，力薄國亂，勇接挑戰，出兵朝鮮，用兵珍寶島，沒有喪權辱國；第三次國共內戰中，渡江作戰、攻占上海、炮擊金門，都作了如美英參戰，首先向我開火，即予還擊的打算，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沒有作最嚴重的打算，就不要用僥倖之策。結果在美航空母艦臨台威脅下，對台武嚇的軍事演習草率收場；在李登輝高票當選下，放棄點名要把李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策略，改為不再點名，默認李為“台灣領導人”，“聽其言，觀其行”，又成談判對手。可惜的是，雖賠了幾十億人民幣的演習費用和國家面子，終於回到較為理性的決策軌道上來，只是下台得灰頭土臉，夠喪氣罷了。

當然，北京是釜底抽薪，壓力主要針對美國的。有得分但失分更多。

如何講究策略，應當強硬而不過度。這個度，就是強硬到不致破壞爭取一個較長時期加速進行經濟建設，增強國力的和平發展

環境和機會。在策略上要給自己留下台餘地，採用一個強硬但對方可能接受的度，如必須用武力威脅而不致引發戰爭的度。這次兩國兩岸較量，華盛頓較兩岸在戰略策略運用上，失分也不少，但得分較多；不能不說這是北京方面失策過多造成的。

#### ◆華盛頓與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妥協

何頻：許多人說解放軍的演習幫了李登輝的忙。不過從實質上，阻止了華盛頓與台北關係的提升，完成統一可能不符合美國利益，但兩岸武力衝突更會危及美國試圖維持的亞太安全框架。如果這個邏輯成立，儘管北京與華盛頓有多層次的矛盾，但華盛頓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變得更慎重，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華盛頓會對台北加以制約。

許家屯：鄧小平復出之後，一直將對美工作作為外交的首要。六四事件後，布什派特使到北京，鄧小平親自接見，雙方都要維持友好的關係，符合世界和平格局的保持，這一點並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而根本改變。而且，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越來越成為兩國關係和平的基礎。這是大的局勢。相比之下，中台美的三角關係是一個小局勢，小局勢要服從大局勢。小的局勢可能有時矛盾會突出，影響了大的局勢；現在又開始恢復理性，至少短期內，北京與華盛頓不太可能在台灣問題上產生大的衝突。華盛頓與北京在台灣問題上進一步達成妥協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何頻：這不是對台北不利呢？

許家屯：當然不會如台北主觀所想。假如台北在拓展國際空

間上有所克制，這種和平的環境對台北不見得沒有利。如果台北對華盛頓的壓力不買帳，很可能的結果，是華盛頓一步一步疏遠台北。這樣，台北的籌碼會越來越少。

### ◆不要急於解決台灣問題

何頻：對大陸情況有基本了解者當明白，北京雖然口頭上喊統一，但實際上沒有精力、能力現在就去完成統一。不過，有人認為，基於台獨勢力的急速發展、基於對李登輝言行的解讀，迫使北京不得不決定提早解決台灣問題。

許家屯：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鄧小平說他這生可能看不到統一，實際上把時間推遲了；江澤民在八點講話中，把統一時間講得很含糊。但是，李登輝訪問康乃爾，類似香港問題，本來北京還沒想到收回香港，英國人跑到北京要續約，結果鄧小平表示要收回，沒有了迴旋餘地。現在北京表示在“九七”之後要解決台灣問題，等於有了時間概念。台灣問題一旦上台面，北京領導人無法含糊。

從理性的角度，中國需要和平建設的角度，不急於解決台灣問題。台北要有所克制。

何頻：現在的局勢暫時穩定，採取的是拖的策略。北京希望國力強大後，台灣自然走上統一之路；台北呢，希望大陸變，國際局勢變化。到底誰拖得過誰？

許家屯：現在各方都在逐步走向理智。但是，北京在拖又不在拖，現在時機不成熟，但不會沒有時間概念地拖下去，在主觀上有

了時間表。

台北在拖也不在拖，他希望大陸變，國際局勢變得有利於自己，從李登輝的就職演說來看，他用的是進攻型防禦策略，企圖憑藉美國、日本維護亞太安全，充當它們對大陸和平演變先鋒。李登輝提出中國人幫中國人，幫什麼，是促使大陸起質的變化：和平演變。他要去大陸作“和平之旅”，姿態很高，但不是談統一，而是去談亞太情勢、亞太安全和平。他的秀才花了不少腦筋。台灣獨立趨勢還可能發展，我看雙方的較量很難停止。

何頻：武力威脅對於台灣何時終結？

許家屯：這要看雙方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台灣希望大陸無條件放棄武力，這是不可能的。大陸需要一個和平環境進行經濟建設，不會輕易使用武力。台灣也要看到，過度的政治動作，兩岸關係緊張，北京不可能放棄基本原則，到一定程度，他們無法交代，會不惜使用武力，這對兩岸都沒有好處。應當看到，中美、日美關係出乎各自的利益，壞也不會壞到那里去；也就是說，來自華盛頓、東京的支持，對台北有限，依靠是不安全的。

#### ◆北京會在很多方面讓步

何頻：北京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強調各自表述，這個結怎麼打開？台灣需要一定國際空間，北京又堅決不讓步。

許家屯：北京講的是：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一個中國。台北張京育回應的是：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講我看問題不是可



能解決了嗎？雙方都可以交代了。但是張京育又說，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這句話可以不提嘛。

如果雙方表現誠意，取得互相信任，走上談判桌，按照我對鄧小平構想的理解，北京會在多方面讓步，包括國際空間。

### 第三部分 北京：江澤民走向非鄧化

#### ◆江澤民亦毛亦鄧

何頻：當初沒有幾個人看好江澤民的政治前景，事實上江澤民在台上的時間超過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政治上與他摩擦的力量是存在的，但不足以使人相信江澤民會被拉下馬。如果明年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上過了關，中國就不再是後鄧小平時代，而是後江澤民時代了。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許家屯：江澤民能掌權這麼多年，有他本身的能耐，但主要是在鄧小平等元老庇護下才有今天，今天還沒有完全離開這種庇護。他是六四事件中上台的。假如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不可能有今天相對穩定的局面，中共也會象蘇聯東歐垮台。江澤民執行鄧的路線是搖擺的，現在還是以鄧的路線為主導，不過在逐漸與鄧的路線拉開距離。鄧小平不能理事或一旦去世，江澤民的地位會遇到挑戰。

何頻：是什麼力量驅動江澤民走向非鄧化？毛澤東之後，改革開放路線是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出台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固然功不可沒，但是有他的局限性，所以一定程度的非鄧化是必然的，所

以有人提出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問題是怎樣非鄧化，是回歸保守，還是修正發展方式、速度，或者更進一步改革開放？

許家屯：江澤民對鄧小平的路線應該有繼承、有否定、有修正、有發展。現在也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以符合、有利於新的形勢。但是現在江澤民提出“講政治”，不是這個性質。

你曾經說他是似毛非毛，似鄧非鄧，亦毛亦鄧，很矛（毛）盾（鄧），很有意思，但他是怎樣非鄧的，我看他不是往前推，而是往後拉，事實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多了，而是不夠。不是快了，而是放慢了。政治改革後退的一個標誌，是從黨政要分開，走回到一元化。江澤民在政改上，比鄧小平還保守。江往負面發展以鞏固他的權力。有沒有可能鞏固他的權力呢？有可能，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會受影響。中國可能再一次喪失一次發展機會。

#### ◆“講政治”造成了混亂

何頻：當年鄧小平、胡耀邦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很快得到理論界響應、支持，但江澤民這次提出“講政治”，理論界反應遲疑。什麼叫“講政治”？很模糊的說法，似乎是要否定“經濟建設為中心”，似乎政治發展比經濟發展重要。整個社會的環境容許這樣做嗎？

許家屯：我看“講政治”造成了混亂，不但達不到他的要求，還有反效果。因為他重新挑起了姓社姓資的爭論，重新提出了“反異化”，“反西化”，“反和平演變”；左的思潮乘機而起，這是反潮流的。引起反彈、抵制是必然的。沒有辦法，《人民日報》只好發社

論表示“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沒有變。不過，他又提出劃清五種界限，主要是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界限，其它界限實際以此為中心，使人更感到惶惑。

#### ◆大陸進入勃列日涅夫時代？

何頻：過去幾年一直有關於江澤民地位不穩的傳聞，特別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時，後來又有所謂“江落石出”的說法，現在北京政壇的說法是，中國大陸實際上進入的是比較僵持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受制於已經成長的改革派勢力，極左派很難為所欲為；但政經的結構，又制約了民主勢力很快成為主流力量。所以江澤民不是李登輝，也不是華國鋒，更象勃列日涅夫，您看是不是這樣？

許家屯：回答這個問題比較難，政治變化因素多。現在中國大陸內部對中共、對社會有很多不滿，但黨內黨外要求大幅度變革、質的變革的力量還不夠強大，多安於現狀。所以中國變得象勃列日涅夫時代可能性比較大，但時間可能不會象蘇聯那麼長。

在還沒有一個力量能夠替代中共之前，還是要促使中共進行政經改革。

何頻：明年的中共十五大和後年的九屆全國人大，是中共權力大調整時期，政治波動會比較大。

許家屯：外界不少人以前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太悲觀，現在又太樂觀。北京政局變化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

許家屯 / 何頻（採訪），《中國時報》

## 妥協和讓步 有利於香港安定

**何頻按：**聯合國並沒有特意將1997年命名為香港年，但是1997年的香港無疑是最受世人關注的都市。恥辱或輝煌的歷史，平穩或混亂的過渡，都將對東西方的關係提供極有力的證明和轉機，更迅速影響到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和兩岸三地關係框架的建構。

可以承認，時下香港的景況好過人們過去的預期。不過，英國撤離其他殖民地的手法和後遺症，中共體制的特性和作風的慣性，怎能令人高枕無憂？何況，炒樓狂潮接著“廢法”風波，商賈加大賭注，政客增多摩擦……顯示香港的過渡不可能風平浪靜。

許家屯也不可能無視這一切。這位曾經參與香港過渡框架及方案的設計者，遠隔重洋，遠離浮華喧鬧的官場，並沒有稀釋他對香港過渡的關注，相反，恬靜得幾近孤獨的隱居生活，使他對局勢更具洞察力。1996年7月他接受記者專訪，對中國兩岸三地情勢的分析引起廣泛關注，被多家媒體轉載和引起了一系列評論。1997年3月，他專就香港過渡問題，在洛杉磯再次接受了記者專訪。以下是專訪摘要。

## 北京沒有顧及港人的憂慮

何頻：香港經濟震盪的危機似乎大大降低，政治的摩擦便愈加凸顯。臨時立法會的法理之爭略微平息，“廢法”的戲碼便接了上來。認真看一下“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雙方都認可兩個原則，一是1997年6月30日之後維持現行法律不變，二是所謂現行法律指的是制定《基本法》之前已實行的法律，如果之後港英政府訂的法律要未來特區政府承擔責任和義務，必須由中英雙方達成共識。到底誰違背了既定原則？如果是港英，為何得到民意的熱烈支持？

許家屯：從兩國外交，從已有法律條文看，是英國人違背了協議，為什麼北京反而顯得被動呢？因為他的弱點被人抓住了，就是六四事件使香港人缺乏安全感，對前途充滿憂慮。英國人利用這一點，適時修改法律擴大港人的自由度，好像英國人在保護香港的人權和自由；而在北京看來，英國人的動作居心叵測。

但是北京的反應顯得太僵硬，沒有顧及港人的憂慮，沒有充分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也沒做好解釋工作，然後再來考慮港英單方面制訂的法律那些可以保留，那些需要“還原”，否則情況不致於鬧得這麼僵。

## 北京應該提高一下信心

何頻：缺乏自由令人痛苦，但享受自由之後再被緊縮更令人難

以接受。港英近年修改的“人權法案”和“公安條例”的確擴大了港人的自由度，實施起來也沒有發生不可收拾的事故，北京到底出於什麼心理非得“還原”不可？

許家屯：英國人修改這些法律當然最主要的不是保護香港人的權利，而是出於他自身的利益考慮。北京很擔心英國人撤退之後，外國勢力、民運勢力利用這些法律對大陸進行演變、顛覆。

何頻：真有那麼可怕？

許家屯：香港地理條件特殊，多年來一直是許多國家、許多政治勢力對大陸進行滲透的基地。典型的例子是六四事件，港支聯起了很大作用，使北京高度警覺，怕發展下去危及政權。不過情勢在變化，北京應該提高一下信心。現在他是有一些過分擔心，太緊張。

## 妥協和讓步有利於香港安定

何頻：香港籌委會最後的結論是只廢除部分法律條文，表明港人的抗爭有了一些成果，似乎印證了您去年所說，香港人不要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小了。

許家屯：說明北京聽到了香港的聲音，這種妥協和讓步是有利於香港安定的。北京應該盡最大可能對香港不作干預。

這次籌委會不少人投了反對票、棄權票，說明籌委會可以反映各方面的利益，不是一種聲音。他們有自己利益的考慮，是一件好事情，這樣不會完全按北京意志行事。

## “英國撤離，美國監管”？

何頻：美國的壓力是否也有作用？現在國際間流傳一種說法，叫“英國撤離，美國監管”。事實上美國近年增大了在香港問題上的分貝，這對於香港是福還是禍？

許家屯：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一個東西方文明融合的城市，香港問題國際化是避免不了的。美國在香港有不小的利益，他們的“關心”在意料之中。但是，美國似乎還有進一步的考慮。如果美國是監督香港“基本法”得到執行，對於香港而言是件好事，會起到某種保護作用；如果美國把香港作為與中國較量的一張牌來打，把香港作為籌碼，對於香港來講禍多於福。

香港有些人想利用國際勢力保護香港。要注意一點，不要讓人當了籌碼。

## 董建華要平衡各方勢力不易為

何頻：您過去談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時，強調應是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董建華正是如此。但是他近來在“廢法”爭議中與北京步調一致，聲望下降，還有人燒他的芻像，顯示他正面臨一個艱難的環境。

許家屯：我看董建華還需要多關注香港人的情緒和利益。不過他不是無條件支持北京，他是出於維護《基本法》的考慮。

董建華要平衡各方勢力的確不易為，未來可能還有更麻煩的

事，聲望可能還有更大幅度的起跌。但是民主派也不要太走極端，燒他的芻像就比較情緒化，對尋求共識不利。

## 平民的利益是否會得到充分保障

何頻：一個成熟的都市，行政區域領導集團，當是要盡可能顧及各個利益集團的平衡。董建華最近組建的“特區行政會議”也受到批評，似太過傾斜商人，除了譚耀宗和楊鐵樑。香港畢竟不是公司，商人在香港決策層過重的角色，令人懷疑平民的利益是否會得到充分保障。事實上，過去香港公用事業被商人壟斷，使市民得不到很好的照顧。

許家屯：香港的政治體制應建立什麼樣的模式？曾經有四種模式。第一種是“解放式”，工農無產階級專政；第二種是馬照跑、舞照跳，只是換一個旗幟，換一個人，“總督”由中國人或香港人來做；第三種是港英提出來的，叫“代議制”，行政局、立法局、總督都直選；第四種體制就是現行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民主按步就班、循序漸進，以保障這個政權是一個以中高層商人為主，同各階層結盟的政權，共同執政，不同於殖民地的總督專權，有利保障香港經濟的活力，社會的穩定，以及民主的發展。

如果董建華的班子工商界人士少一點，其他人士多一點更好一些。現在還有辦法補救，將來他可以請不少非工商界的人士擔任顧問。

何頻：董建華曾經說他是一個強勢領導人，但他的環境與李光



耀、李登輝大不相同。

許家屯：當然不同。不過你要注意到當年李光耀、李登輝起家之初聲勢也不比董建華好。事在人為，董建華能堅守《基本法》就大有可為。

### 台港關係可以實行政經分離

何頻：與台灣的關係一直是董建華避諱的話題，他說由中央負責。然而，香港特區不可避免與台灣打交道，依據的法理是《基本法》、“錢七條”，這都是原則，有沒有可以落實、執行這些原則的機制？

許家屯：現在的問題是兩岸政治上處於僵持狀態。在這種情勢下，除北京外，香港沒辦法表示什麼態度。但從兩岸三地關係來講，香港的中介地位無法替代，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交通運輸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某種私下接觸，“交朋友”有何不可？

在政治僵局沒有公開打破前，台港關係可以實行政經分離，經濟的合作在今天誰也擋不了。台港關係目前有利兩地經濟合作。

### 有人擔心台灣問題“香港化”

何頻：香港平穩還是混亂過渡對台灣最有利？

許家屯：從民族，特別是從經濟角度上講，海峽兩岸希望香港平穩過渡的人占多數。假如香港順利過渡，《基本法》得到遵守，

中共給外界的印象是守信用的，有利於海峽兩岸統一，這對於台灣的明獨也好暗獨也好是有消滅作用的，他們擔心台灣問題“香港化”。

何頻：您能不能預測一下，香港最糟糕的情況是怎麼樣？

許家屯：現在的情況比預料的好，會有波折，但不大可能出現大的混亂。各方有分歧，但較克制。

何頻：萬一出現混亂，經濟崩潰，北京會準備動用緊急準備金？

許家屯：用大陸的錢補香港的洞？香港真正經濟崩潰，大陸是補不起的，我也不相信會補，香港要靠自己。

許家屯 / 何頻（採訪），《中國時報》

## 中共在香港九七後 應透明化、公開化

曾慧燕(《聯合報》記者)按:

香港九七回歸,已經近在眉睫,經過“六四”波折、對自己為之奮鬥一生的共產主義理想仍相當執著堅持的香港新華社前社長許家屯先生,1997年6月14日接受了《聯合報》專訪。

訪談內容包括許家屯對香港回歸典禮、中共地下黨、十五大、六四事件、“一國兩制”和兩岸關係等問題的看法。對於目前眾所關注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問題,許家屯指出,地下黨“九七”後應透明化、公開化,並立即向特別行政區政府登記註冊,以免成為“非法黨”。

以下是訪談內容摘要:

問:今天有報導說: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共方面已改善與您的關係,因為江澤民恐防您“揭露更驚人內幕”,不利江澤民利用香港回歸進行權力鞏固。據說您持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早已過期,中共駐美使館已發給您新的護照,並邀請你返香港出席回歸典禮,是否屬實?

答：這並非事實，我的護照早就過期了，但目前中共不可能給我新護照，有可能嗎？沒有這回事。除非大陸政局發生很大變化，我返港的時機，還早呢。至於所謂改善關係，沒有這回事。假如真的想改善，不是我向他們承認錯誤，而是他們要向我承認錯誤。當然，現在他們不可能認錯。假如我有錯，他們是大錯，我是小錯。趙紫陽目前去香港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我個人覺得，趙作為中國前總理代表政府與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北京應讓他參加香港回歸典禮。

問：您有沒有向中共使領館申請過換護照？是您根本沒有申請，還是申請了他們不給？目前您是否已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

答：我有美國綠卡，中國護照過期後，沒去申換，也沒與領館接觸，他們會給我發嗎？不可能。他們也不必擔心我洩露什麼機密，我能講的話，都已講過了，不能說的話，過去不講，今後更不會講。

問：您如何與中共改善關係？到目前為止，除了您的回憶錄一書及陸續接受媒體訪談外，還有多少中共高層內幕，您是“守口如瓶”的？有人說，為了人身安全起見，您已將一些“核心機密”製成錄音帶妥善保存。此舉是為了防止有人欲對您不利時，收“投鼠忌器”之效。您出版回憶錄，是否也有向中共表示“我能說的到此為止”之意？

答：我寫回憶錄，沒有這個考慮，主要想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來，減少人們對香港前途的憂慮。至於錄音帶的問題，很抱歉，我無可奉告。

問：香港九七回歸在即，作為曾經處於這一歷史漩渦中心的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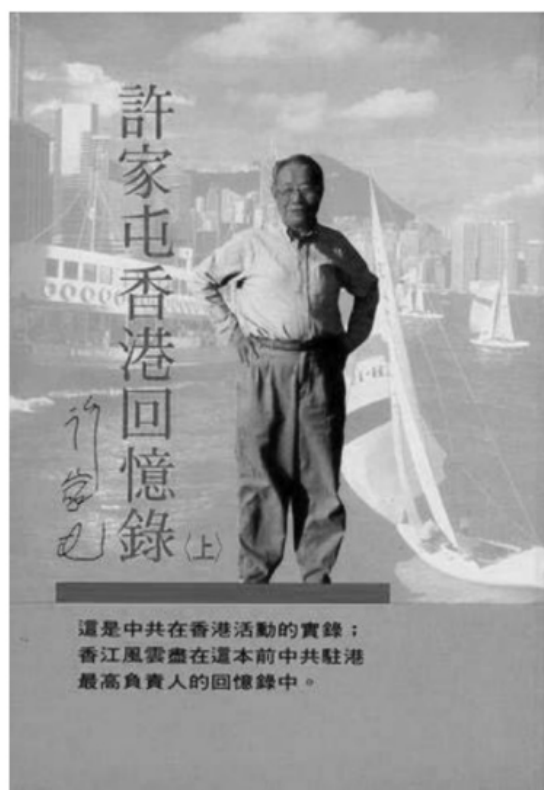
事人和熟知中英談判內幕的決策者、執行者之一，您卻與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前總理趙紫陽先生一樣，未能親往香港目睹這歷史性的一刻，心中是否頗有遺憾？

答：從個人來說，沒有遺憾。因為現在當政者對“六四”問題的看法，與我不一樣，由於他們處理不善，所以我為勢所逼出走美國。如果說到遺憾的是，中共自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不能正確對待過去歷史上發生的錯誤，沒有勇氣改正。這點頗遺憾。

問：您在回憶錄中，對香港前途保持一貫的樂觀態度，現在中英兩國經歷了幾許的風風雨雨，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變？

答：基本上沒變化，對香港前途我是樂觀的。主要基於三個理由：一、大陸要改革開放，還要進一步利用香港，香港對大陸改革開放貢獻很大，大陸知道不能搞壞香港，否則負擔不起政治和經濟損失；二、香港要給台灣做示範；三、在國際上繼續扮演多元化、一元化的角色，參與國際社會運作，要藉執行中英關於香港協議來改善國際形象。

問：但一般人擔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中央規定內地企



《許家屯香港回憶錄》（聯經出版公司）

業不可在香港炒匯，仍有不少內地企業違反規定。

答：所以要把從內地到香港發財的人管起來，按香港法律和市場規律辦事，不能把貪汙腐敗的風氣帶到香港，不可享特權。

問：您曾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六年七個月，眾所週知，香港有不少地下黨員，甚至包括一些名流富商，據說支聯會民主派也有地下黨員。“九七”後，您如何看中共黨組織在香港的活動和作用？是否贊成中共黨員在香港公開身份和公開活動？記得以前您曾主張他們“公開存在，但不公開活動”，現在這看法有沒有改變？

答：香港工委和地下黨 1997 年後在香港的活動應公開，馬上向特區政府登記，光明磊落，減少港人的疑慮，不管怎樣，都應公開化、透明化。以前因是殖民地時代，“九七”後由特區政府接手，共產黨在香港仍維持地下活動形式，不但不正常，還會成“非法黨”，怎麼說得過去？應按基本法辦事，自覺地公開，作帶頭執行基本法的模範。

問：一般認為，辜振甫先生若以海基會董事長身分，獲邀參加 6 月 30 日在港舉行的主權交接儀式觀禮活動，這是當前對兩岸關係最大的考驗及可能的轉機，很可能是突破兩岸僵局的關鍵，您也如此認為嗎？

答：我認為辜振甫此行，突破兩岸僵局還不具備條件，對此不必抱太大希望。兩岸關係要想走出低谷，向良性方向發展，可能要等中共十五大召開後，才會出現較大變化。

問：香港“九七”回歸，必然給台灣帶來外交壓力，台灣政局由於內部連串風波，也進入最關鍵危險期，今年也是台灣承受內外衝

擊最猛烈的一年，繼南非後，台灣在非洲的外交戰線開始拉警報。中國政府去年底就宣佈，凡與中國沒有邦交的國家，其在香港的領事館將降格為非官方機構，您當時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中央對此有沒有具體政策？

答：我在香港工作時，這個問題還未提上議事日程。目前兩岸關係低迷，關鍵在於彼此意識形態及文化差距太大，互不了解，缺乏互信基礎。假如不想法解決，兩岸關係惡化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差距就更難縮小。大陸的統一意識越來越高漲，台灣邁向台獨的步伐卻越來越加快。不過，動武的可能性不大，中共動武與否，完全取決台灣的態度，大陸目前正爭取在和平環境下搞好經濟建設，除非台灣出現換國號或宣佈獨立，大陸別無選擇才會這樣做。屆時即使拿不下來，也可用封鎖或半封鎖的辦法迫台灣就範。

問：“一國兩制”的提出，最先針對的主要對象是台灣，中共承認保持資本主義的台灣，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從這幾年的形勢發展來看，“一國兩制”將來會否淪為一國一制？

答：不會。香港不會變成社會主義，大陸也不會變成資本主義，也許會出點差錯，但國際有監督作用，全世界的焦點都注意到香港，中共希望建立一個好形象。沒有人有膽量推翻“一國兩制”。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一國兩制”的考慮，的確是首先以台灣為對象，讓大陸搞大陸的社會主義，台灣搞台灣的資本主義，對台灣的條件比香港更寬，台灣自治的權限也比香港大，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法律和自己的情治系統，因為台灣是中國本身的統一問題，不同於香港是從外國手中收回。

最初這些構想，目的是爭取當時台灣的領導人蔣經國，他去世後，北京觀察到李登輝不僅代表台灣本地勢力，而且代表台獨勢力。他的作為顯示他是“獨台”，台獨勢力的活動、存在和發展，至少是李登輝縱容的結果。由於他的漸行漸遠，使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中共高層根據這一變化，重新評估兩岸形勢，認為依靠武力解決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從中共觀點看，李登輝得到美國和日本的支持，將來台灣與大陸統一問題，還必須破除這些障礙，如果將來不得不用武力來實現統一，也要考慮這些國際因素。

問：北京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對李登輝總統不抱希望的？

答：1989年，台灣總統選舉前，我們就已看到假如李登輝繼續當總統，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可能性就會減少。第二年，國民大會改選，把萬年國代選掉，本地代表占了多數，至1992年立法院改選，更進一步削弱大陸外省人勢力，台獨或獨台的力量增強，發展為以武力統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問：當時您在香港負責對台領導小組，曾打通不少台灣軍政高層的渠道，並注重發展“新生代”，後來您退休後，由誰接替您這方面工作？

答：我在主持香港對台工作小組時，曾聯繫到一些台灣的上層關係，這個組織成立目的是開闢香港當地親台勢力的工作，然後尋求對台工作的突破，重點放在上層和新生代，另外就是調查研究台灣的最新情況，及時向中央反映。楊尚昆、楊思德當時一再向我交代，要單獨聯繫，不要告訴其他人，直到周南接任我的職位後，楊尚昆還交代不要告訴周南。後來我被迫出走美國，這個小組的工作



由誰接替,我就知道了。

問: 由於您同情八九民運, 失去 50 多年來為中共奮鬥得到的一切, 如果歷史可以重新來過, 您是否後悔?

答: 不後悔。假如我不來美國, 或將會變成一個庸庸碌碌的人。他們雖然開除了我的黨籍, 但我的心始終沒變, 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依然。人在國外, 我還是關心國內的一切, 我是“死不悔改”的頑固派, 始終是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

問: 即將在今秋召開的中共十五大, 有可能是中共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點, 而且充滿變數, 現時許多問題仍撲朔迷離, 如鄧後跨世紀權力班子如何組成, 國有企業如何改革, 政制改革會否提上議事日程等。有人說, 從現在到十五大的幾個月時間, 中共高層什麼事都可以發生。您如何看上述問題? 是否看好江澤民?

答: 江澤民目前力求做好兩件大事, 即為香港順利交接和為十五大保持平穩。目前看來, 收回香港已問題不大, 7月1日後, 人們的眼光會逐漸轉向十五大。一般會關注中共高層領導班子是否有變化, 是大變化還是小變化, 這個問題像你說的那樣, 充滿變數, 目前還很難預料。

鄧小平去世, 看不看好江澤民, 要看他有沒有智慧和勇氣抓住機遇“救黨救國”, 能否真正起到承先啟後的作用, 深化經濟改革,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目前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千載難逢, 因為國際國內形勢對江澤民都較有利, 處於和平環境, 正是發展經濟富民強國的好時機, 能不能在經濟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在黨的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才能從根本上克服黨內各種病

患，長治久安，目前為大陸社會帶來比較嚴重隱憂的是國有企業的失業工人。

問：鄧小平去世後，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現暫時出現一個權威的真空，沒有一位領導人能扮演過去毛澤東、鄧小平一言拍板、一錘定音的威權角色。有人注意到，中共在鄧去世後的“告全國人民書”和江澤民在追悼會上所致悼詞中，有幾個耐人尋味的變化：一、未提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二、淡化“六四”，僅提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國際發生政治風波”；三、在悼詞中，提到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您看這是否反映江澤民有意淡化“六四”呢？

答：現在還不是解決“六四”問題的時候，最迫切的是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江澤民目前顯然有意淡化“六四”，但正如我在前面所談到的，如何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看江澤民的智慧和勇氣了。

問：香港新華社前台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說，在1979年至1982年間，北京在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曾經歷“痛苦的選擇”：中共本來沒有意思要收回香港，而希望繞過“九七”年限，延長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但英國卻逼中方表態，堅持要就“九七”問題談判，要北京將不平等條約，延續30年至50年，使中方沒有退路，只好決定收回香港。此說可靠嗎？

答：我沒有聽過這個講法。李後先生（原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在他出版的《回歸的歷程》一書中，雖然罵了我，我仍認為他寫得比較接近事實和可靠，可作為官方資料參考。

問：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先生，曾批評英國浪費五年時間企圖

竄改中英協議，您認為英方在那些具體事情上是違反聯合聲明的？另外，有一種講法，說彭定康來港後，才忽忽忙忙要發展香港民主，您同意此說嗎？

答：這個問題有“六四”影響的因素，中國方面應負責任，港英政府與中方由合作變為對抗。在衛奕信任港督時代，情況有一定緩和。彭定康接任港督後，與中方不僅是公開對抗，某種程度彭定康還利用“六四”因素，搞“還政於民”和“民主拒共”，不守信用，破壞了中英協議，實際上不僅破壞了外交信譽，對香港也不一定有利，既影響中英兩國外交關係，也影響兩國商人利益及英國利益，英外交官也對他不滿。總的來說，他得到的少，失去的多，得不償失，信譽無法恢復。英國工黨上台後，本來可以將責任推給保守黨，但現在卻繼承下來，不按信譽辦事。

彭定康說沒看過《基本法》有關條文，作為英女皇派出的香港總督，這麼重要的文件他說沒看過，這是什麼話？你不看，違背了協議，居然說“我沒看過”，怎麼行？不過，中國對彭定康個人的態度，在外交上也不對。彭定康代表英國，有他的個人因素，但主要是英國的問題，不要對他人身攻擊，甚至不握手不會面，這個大可不必，缺乏泱泱大國的風度。

問：您對臨時立法會有什麼看法？

答：臨時立法會是英國迫出來的，中方迫不得已另起爐灶。《基本法》沒有這條，當時制訂《基本法》時，沒考慮到英國人會破壞呀，當然不會有，但中國在這問題上，《基本法》是人大通過的，那就再通過一下嘛，因英國破壞了，所以我們迫不得已，重起爐灶來搞這

東西，是不是，這樣子就不至於後來一直弄到現在什麼都不合法，搞得這樣被動，所以兩方面都有錯。

問：一般認為，香港政權移交後才是真正的考驗，李光耀先生不久前在接受倫敦《金融時報》訪問時，建議董建華先生推翻彭定康先生在港進行的所有改革，還原彭定康來港前的法例，李認為，董必須向中國政府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不受危害，以取得中國信任，故董在開始時就要做盡所有令人不愉快的事，讓香港人清楚了解他的管治基礎。您認為李光耀說的有道理嗎？董有沒有“中庸之道”可走？如何做才能贏得香港民心和讓北京放心？

答：第一我不評論李光耀的說法；第二我不介入“港人治港”。

問：您在香港時，曾被稱為“地下港督”……

答：那是戲稱，不是真正的。

問：您在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曾發生轟動一時的“本子風波”，被視為“過渡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誌”，反映北京對香港的政制改革的不滿，導致13年過渡期內香港一而再再而三出現政制爭端，現在重提舊事，您是否仍堅持當年的立場？

答：這個問題總的來講，處理還算正確。港英政府率先起步修改原有殖民地政制，讓港人參政，宣稱要建立“權力根植於本地”的代議政制，據說目的是“還政於民”。但北京對此表示不悅，認為香港未來政制要由《基本法》決定。中國外交部也向英國交涉，要求代議制的變革，要與未來的《基本法》銜接，不要影響“九七”的順利過渡。但英國欲搞另一種銜接，通過搶步，要《基本法》與既成事實銜接，達到“13年大變，50年不變”，放棄對“中英聯合聲

明”的承諾，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我在1985年11月舉行記者會，談到香港政制改革與《基本法》銜接的問題，提出要注意一些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由於我眼鏡有些模糊，在取下擦拭時，另一手拿著“中英聯合聲明”的小冊子，邊比劃邊晃動邊回答問題，顯得很激動，結果我被輿論批評講得太激烈，影響形象。“本子風波”引起強烈反應，是我當初始料不及的，但獲得中共高層的肯定和支持。而事後一個月，英國就接受代議制要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此後，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雙方基本走上合作階段。鄧小平後來對我說，你沒有錯，假如你不講，讓英國那樣搞下去，香港非亂不可。

問：您在香港時以“黨性堅強，思想開明”見稱，您曾提議台灣機構在香港的各種活動，在不搞台獨的前提下，都可繼續，報紙也可以辦下去，求大同，存小異。您看未來特區政府是否容忍台灣社團在香港活動？

答：我看台灣在香港的問題，一個是某些活動要注意，其他就不用講了。還有就是假如共產黨公開了、登記了，也有一個黨的問題，恐怕也要考慮怎麼處理。

許家屯 / 曾慧燕 (採訪)，《聯合報》

# 最坏的情況是 北京暗中插手香港事務

**李怡前言：**在距離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尚有整整三個月的1997年4月1日，筆者趁在美國旅遊之便，到洛杉磯與許家屯先生訪談了兩個小時。這位從1983到1990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參與制訂收回香港主權、制訂“一國兩制”政策的人物，在訪問中坦率地談到他當年與今天對香港前途的想法，其中也涉及一些少為人知的人與事。這份訪談錄相信會受到讀者以至香港社會的重視。

許先生今年82歲，身體康健，思路敏捷，精神甚好。在美多年，他一直關注著香港的發展，沒有錯過任何一件小事。

## 從小受的教育是要強國，要雪恥

李怡（下稱李）：還有不到三個月，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日子就到了。作為最早參與香港前途談判，參加設計“一國兩制”，為它在香港具體落實做了許多工作的人士，您今天主要的感想是甚麼？是興奮？是憂慮？還是有甚麼想法是與過去不一樣的？

許家屯(下稱許):我參與中英前途談判是間接的。當時有個小組,在內部進行討論,提供意見,制訂方案,然後由外交部先是姚廣,後是周南出面與英方談判。小組由姬鵬飛主持,他既是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之一(組長是李先念,另一副組長是趙紫陽),又是港澳辦主任,所以由他召集。我因在香港工作,掌握香港情況,故也參與在內。

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的想法是:香港主權很快要收回,基本法要實施了,這從中國歷史、從現實意義來看,都是件大事。我從小受的教育,是要強國,要雪恥。不管其他方面怎麼樣,從這個角度來看,收回主權是無可厚非的。而且這是用新的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所謂新觀點,是第二次大戰後,解決這類問題往往要用武力,現在我們用和平方式。另一個新觀點,是中國承認和接受了一個國家之內可以實行另一種制度——資本主義制度。

現在是怎樣實施“一國兩制”的問題。這裡有兩層意義:第一是資本主義在香港能不能維持,使這個制度不變;第二是能不能依靠港人,即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的事由香港人自己去管。我個人的看法是樂觀的,相信這兩條都能做到。

李:過去香港能夠在中國內部局勢不斷動盪,一度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之下,仍然維持長期繁榮穩定,主要是由英國人統治,在政治上與中國有所區隔。今後區隔沒有了,中國內部政局是否穩定?會不會有變化?改革開放會不會走回頭路,對香港都有直接的影響。考慮到這一點,您仍然樂觀嗎?

許:我的樂觀是從幾個方面來看的。

首先，我認為，鄧小平去世了，中國領導層不管有沒有變化，變好的可能性比變壞的大。即使它現在的班子不動，江澤民也不敢改變改革開放的道路。他沒有這個勇氣，也沒有這個基礎。更重要的是，中國老百姓和共產黨內部不允許他改變這道路。他現在要穩定，要是他把這個政策變了，他就不穩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應該說是改革開放道路的一部分。

改革開放的步伐，可能快一點，可能慢一點，可能有曲折，但那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全面來說不會變，因此“一國兩制”也不會變。這是從經濟上講的。

政治上，中國現在的政治是停步，甚至倒退，但這種現象不能持久。假如說：鄧在的時候，江在政治上還可以一成不變的話，鄧後就不行了。理由還是一樣，他缺少勇氣，也缺少基礎。

### “一國兩制”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

李：可是，他有沒有改的勇氣呢？現在所提的政治改革，似比趙紫陽時後退了。

許：江澤民提了政治改革。他的政改內容，同外面所理解的政改內容，不是一回事。

李：趙提出黨政分開，他不提黨政分開，他不提了。

許：他不敢提。政治上很重要的提法是：在經濟體制上，仍以公有制為基礎。這樣國有企業的改革，步子就沒辦法向前邁。他現在重新把姓資姓社的問題提出來，提出要劃出幾個界，又說要講



政治,反西化,反異化。提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因此,在政治上比鄧後退了。在經濟體制上,自己劃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圈子,走不出來。他能不能跳出自己的圈子?現在看不出來。將來能不能?話不能說死。現在來看是可能性比較小,因為是他自己劃的圈。

李:那麼您怎麼說政治上變好的可能性大呢?

許:政治上將來有變化的可能。若有變,就是變好的可能性大。變,是因為有幾個矛盾無法解決。比如說,國營企業,幾千萬工人怎麼辦?工人下崗,拿基本生活維持費,這不能解決問題。有人說,這是新的無產階級。

新的無產階級還包括部分幹部,特別是退休幹部,退休工人。這些新無產階級,對現狀極為不滿。

另外,不管怎樣,新的中產階級出來了。他們同香港人一樣,擔心中國走回頭路。

一方面是新的無產階級對現狀不滿,另一方面比較滿意現狀的人又擔心走回頭路。這兩種力量都要求政治上要有所改變。

這些力量會影響共產黨內部。使共產黨被迫著要變。變的話有兩種可能,一是和平,一是暴力。

## 共產黨要改 不改就可能亂

李:我想我們都不希望再有暴力。

許:我想共產黨面臨兩個機遇。這兩個機遇不可失。一個是



許家屯最愛鴿子，意大利威尼斯的廣場上有成百上千隻鴿子。

經濟上繼續發展的機遇。全國經濟儘管問題很多，老百姓不滿，但經濟卻是在發展。老百姓對共產黨還沒有絕望，還希望改好，不希望改壞。你要怎樣掌握這個機遇，去改造國有企業，去適應這個形勢呢？第二是共產黨自我改造和政治改革的機遇，老百姓希望共產黨改，逐步改，改而不亂，但你要改，不改就可能亂。

李：您剛才講“一國兩制”是中國經濟上改革開放的一部分。若改革不走回頭路，香港的“不變”就有保證嗎？

許：大陸經濟要改革，對香港需要進一步利用。大陸經改，有內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條件。外在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華僑特別是香港人的投資。到現在，外資利用當中，香港占的份額最

大，進出口占首位。我看七月一日以後還是這樣子。香港的金融地位，別的地方一下子代替不了。大陸企業要上市，要吸收資金，還是要到香港上市。經濟上直接間接要進一步利用香港。因此，大陸主觀上不會想把香港搞垮。客觀上，若香港搞垮了，它也負擔不起，我到香港時，香港財政收支達 300 多億港元，以那時的匯率來算，是 100 多億人民幣，那時我從江蘇出來，江蘇整個省的財政收入才 70 多億人民幣。我同李先念、趙紫陽說這個問題，趙說不能讓香港垮，垮了我們負擔不起。現在更不得了，今年香港的財政收支達 2500 億港幣，現時的匯率就是 2500 多億人民幣。香港搞垮了，大陸怎樣負擔？

另外就是政治上的考慮，下一步要解決台灣問題，香港要起“率先垂範”的作用。

還有國際因素。冷戰以後，國際進入多元化時代。中國大陸要在這多元之中起其中一元的作用，這意識越來越強。儘管中國想改變西方所建立的國際現有秩序，但一下子改變不了。它一方面要先求適應，另方面再圖謀改變。要適應就要建立新的形象。“中英聯合聲明”雖然是中英兩國的事，但拿到聯合國備案。你假如不執行，人家拿來批評你，你沒有話說。你可以說這是我的內政，但你不執行，你違背了，你喪失國際信用，在國際政治上失去公信力。這是中國要顧及的。

從中國的經濟改革，從對台灣作範例，從國際政治這三個方面來講，中國不會否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它會很小心地執行政策。

李：你覺得他們是不是小心呢？有些人認為中國已視香港為囊中物，故無須小心了。

許：最近比較小心。第一是領導人及港澳工作負責人講話小心。第二是對外面的反應，外界批評比較注意，有所改進。第三是對董建華表示尊重，不管內裡如何，口頭上信任董，放手讓董做，對行政長官的過渡措施表示支持。司級官員過渡全數同意。這都是進步，應該肯定。

### 不能只看到迎合一面 也要看到自主一面

李：香港社會帶批評性的意見有沒有反映到上面去，供制訂政策作參考呢？

許：中央高層，對香港輿論、國外輿論，主要的言論、評論，他們每天都看。這是慣例。除了大小《參考》（指每天上下午各一本的《參考資料》及每天一份的《參考消息》），還有其它的言論摘要。越到上層的，越簡要。人家看不到的，他們能看到。而且他們比較注意。這一條是不會改變的。

李：我們在香港，看到越來越多的本地名人，千方百計去迎合北京。這種迎合，可能會使北京掌港澳政策的人飄飄然……

許：你們只看到迎合的一面，沒有看到香港人自主的一面。近年來，看港人本身的力量在起來，自主的一面在發展，港人治港政策有了本地人的基礎。比如說，臨立會主席的選舉，新華社從政策角度屬意黃宏發，臨立會議員從自身利益的角度選了范徐麗泰。

李: 有人說是總書記辦公室主張范徐麗泰的。

許: 不是這樣。這是港人自主的表現。今後要強調港人自主, 培養信心, 提高定力, 一方面港人要有信心自己處理好內部問題, 另一方面要處理好同中央的關係, 所以我贊同董建華的說法, 不搞對抗, 要溝通, 要協商。

李: 參選期間, 董建華比較得民心的話是, 協商不等於軟弱, 爭取不一定要對抗。

## 外國以香港作顛覆基地由來已久, 一直如此

許: 今後中港矛盾是主要矛盾, 而北京是矛盾的主導方面, 中方要堅決對香港不干預。香港遇到不能解決的問題, 喊救命要幫忙的時候, 中央才來幫幫忙。中方能不能做到, 我不敢講。最壞的情況是中方對香港事務暗中插手。這種情況要警惕。因為插手可能插好也可能插壞。插好的可能性小, 插壞的可能性大。所以最好是只幫忙, 不插手。

李: 照我看董建華當選以來的表現, 似乎不覺得跟北京溝通有困難, 但對支聯會的存在、“六四”集會, 都有保留。從修訂公安條例與社團條例來看, 他似乎傾向於認為香港不要成為顛覆基地。不對抗北京, 就可以有自主權; 而對抗就甚麼都沒有了。

許: 我認為他的看法是對的。最困難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六四”集會和支聯會。因為香港作為外國勢力以至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顛覆基地, 是由來已久, 且一直如此的。現在台灣的力量縮

小，英國仍有很大的力量。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就把原在北京的情報總部搬來香港。我在香港時就知道，英國在遠東的情報總部設在香港，尤德是主要負責人。這是客觀存在，要他們放棄不可能。其實各國都一樣，主要是面子上要做得好看一些。

### 中國有六千人在香港收集情報？

李：中國也在香港收集情報吧？

許：我到香港以後，羅德丞通過副社長祁烽邀我到他家吃飯。我那時正開展統戰工作，你不請我我還要請你呢，所以就去了。在他家坐下來沒講幾句話，羅德丞就說，我事先說明，我是不會幫你們做情報工作的。我聽了很感愕然，就笑著說，我們大家交朋友，你說到哪裡去了！然後吃飯、談話，講得久了，他就主動把港府內部的一些情況告訴我們了。為了這件事，我有一次在北京開會，還對喬石說，是不是我們的情報工作做得過了頭了？以致人們都以為我們是要收集情報的？是不是有六千人在香港收集情報？香港有如此傳聞。喬石說，不會那麼多吧。

李：這件事很有趣，但外國在香港收集情報，與支聯會、“六四”集會有甚麼相干？

許：外國在香港的情報活動，與演變顛覆中國的圖謀有關，他們要通過一些人員或組織進行。從中國角度看，不期望香港人涉及到這類活動裡去。當然“六四”前後，香港絕大多數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運動的活動是香港人愛國的表現，不能也不應視為顛

覆大陸的活動。更不能將“六四”後香港相當多數人期望用民主來“限中”“制中”，即“限”“制”中共過多干預香港事務的心境加以混淆歪曲。彭定康來香港後，他抓住了香港人這個情緒，加速擴大香港的民主進程。你中共責怪英國不守國際信譽、破壞中英協議是可以的，但不能怪香港人。高明的政治家，應當正視，考慮問題的全面實際，作出合乎全面實際的反應。結果，與英國人彭定康針鋒相對，搞臨時立法會，卻不理會相當多數香港人是甚麼樣的感受。

李：香港的民主，就是香港人對自主、自治的廣泛參與，中國對香港的民主為甚麼總是層層設限呢？

許：原來我們起草基本法時，就是搞民主治港，但為甚麼把民主的步子拉慢了呢？因為在英國長期統治之下，香港資本家完全依靠英國人，他們沒有組織起來當政的願望。那時我同包玉剛、李嘉誠等議論這個問題，希望他們考慮組織起來，也即是組黨的問題。他們興趣不大。當時對組黨最有興趣的是查濟民，但獨木一時不能成橋。李嘉誠後來有了改變，支持李鵬飛組黨。

所以當時我們認為，要有一段時間，讓資本家漸漸願意組黨。為甚麼呢？當時你們都批判我依靠資本家——共產黨依靠資本家呀！其實我是替香港著想。香港所以有今天的繁榮，主要是能夠讓資本家迅速發財，能較易較快成為大小資本家，大資本家更快更多地發財，低稅、自由等，很快發財。越是資本多，發財越快。香港對外國、外地區有吸引力之處在此，特色在此。把吸引力拿走，就完了。假如讓中下層馬上執政，高福利，加稅這一套，就完了。我承

認，在這個問題上我保守，是走資派。我是從香港出發，不是從資本家出發的。所以我在內部提議香港要有前過渡期、後過渡期。前過渡期是從簽署聯合聲明到“九七”回歸的前12年，後過渡期是“九七”後的12年或10年。讓它穩定下來，民主步伐放慢一點。慢，是讓資本家也組織起來。當時大陸的左派批評我右傾，現在他們讓董建華出來，讓大資本家出來，這是好事。

### “井水不犯河水”是講不通的

李：您主張香港人不要介入“反中”活動，以換取自主權，是不是贊成江澤民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

許：“井水不犯河水”是講不通的，大陸跟香港，怎麼是河水、井水呢？都是“一國”嘛，雖然是“兩制”，都是一條河、一條船上了。江澤民講的“河水”、“井水”是不對的。我講的是港人自主，應堅持新聞自由。我不顛覆你，但你做錯了，我可以批評你，我有批評權。因為你做錯會影響我。我批評你是善意批評，是想你好，不是希望你壞。香港人要堅持自治、自主，但不是獨立。自治、自主的權力來源於《基本法》——同中央交涉，按《基本法》；你的干預，合乎《基本法》的我執行，不合《基本法》的我不對抗，我跟你溝通。

李：這不太容易。

許：很困難。今後主要的矛盾是中港矛盾。一方面要大陸自覺，另一方面要香港人自主，要有智慧，特別要有勇氣，要勇敢。



李：“六四”集會應是表達自由的部分。

許：這要約制。似可考慮採用變通的辦法。

李：香港不少人認為，1998年若仍有“六四”集會，那就意味著一切沒變，若沒有，就意味著變了。我自己是這個想法。我想，外國也是這個想法。

許：事後想來，“六四”前香港有些人的反應也有些過頭的地方。

### 共產黨在港的角色撤銷？變形？公開？

李：另外一個也可能是難題：您怎麼看7月1日以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角色？新華社現在的功能，或者說是港澳工委（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還要不要存在？有一個說法是，新華社會撤銷，只留下通訊社的功能。

許：我在香港的時候，曾經同姬鵬飛討論過幾次“九七”後港澳工委怎麼辦的問題。新華社是英國人統治時的變通做法。港澳工委是地下黨的領導機關，從香港法律來講是非法組織。為甚麼能存在？是因為背後有強大祖國在那兒，港英沒有辦法。收回主權以後，由於共產黨在大陸不僅是公開的，而且是執政黨，那麼共產黨在中國主權之下的香港，若還是地下的、非法的，這怎麼說得過去？當時我考慮的辦法，不外是或者撤銷，或者變形，或者公開。

李：變形？

許：公開有兩種，一種是領導機關公開，黨組織不公開，一種

是全部公開。變形是說共產黨在香港以另外一個黨的形式出現。公開以後，參選不參選？參選，香港人不放心，不參選，也說不過去，為甚麼不參選呢？假如仍以新華社的名義存在，港澳工委不公開，那實質上的港澳工委的功能是甚麼？你說除了國防、外交由中央掌管之外，香港內部事務全由特區政府負責，那你還有甚麼功能？你說對特區政府只是支持，那是怎麼個支持法？你這個支持會不會成為變相的干預？你說你不會變相干預，人家也不放心呀！怎麼辦呢？這個問題我看很難解決，但一定要解決，而且是要公開解決，公開釋疑。

李：變形是變成以民建聯之類的政黨形式存在嗎？

許：民建聯有些人是不夠格的。共產黨按黨章來講，做黨員有一定的要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

## 各省市、各部門向香港伸手擋不住

李：另外一個香港人關心的問題是：收回香港主權以後，難保中央各部門，地方各省市，都想派人到香港來，現在大陸上許多人似乎已經蠢蠢欲動了。這麼多人要向香港伸手，中央擋得住擋不住？

許：擋不住。明的擋住了，暗的還要來。我覺得不是要擋住，而是他們如要參加香港的經濟活動，就要按照香港法律，不能依靠特權。

李：如果他們習慣了要搞點特權呢？

許：中央要管——就管他們搞特權。各省市、各部門要來香港做生意，你港澳辦怎麼擋得住？當然，中央還是要管，要批准才能來，這是約束的一個辦法，但約束不了。公開不讓它來，它私下來你怎麼擋？來做生意沒問題，但應依照香港法律，依照市場規律。你搞特權就不一樣了。第一不搞特權，第二按法律辦事。重要的是，有了特權，中央不要包庇，應該管它，不讓它使用特權。這一條很難做到，但一定要做，否則會破壞香港人及外界的信心。

### 貪污是“天下烏鴉” 大陸是太普遍太難看

李：另一個問題，是中資機構貪污，會不會隨著收回主權，中資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使貪污之風在香港蔓延？

許：貪污的問題，我看任何社會都有。

李：程度問題，還有廉政公署能不能管的問題。

許：這個也是相對的。我可以舉很多例子。我曾經同衛奕信講，你們只管華人大老闆，不管英國人，這同樣會使香港人喪失信心。

你知道某一時期港英有些大人物為甚麼提前退休嗎？佳宁案為甚麼審不下去？天下烏鴉差不多。除了程度問題，還有技巧問題。大陸現在的貪污太普遍，搞得太難看。大陸現在的反貪污，解決不了問題。監督貪污的機構缺乏獨立性，沒有輿論監督，幹部薪水太低，也無法過日子，故貪污只會越來越普遍。

李：看來難解的結還不少，有支聯會和“六四”集會的問題，共

產黨在香港存在的問題，中央自覺不干預的問題，港人自主及同中央溝通的智慧問題，各省市、各部門向香港伸手的問題，還有貪污問題，但您還是比較樂觀？

許：我是從長遠看比較樂觀。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會變，中國對香港經濟上的利用，大陸政治在種種壓力下不得不改，冷戰後中國參與國際多元化社會所需要維持的國際信用，香港人自主性的提升，根據這些因素，我相信“一國兩制”基本上可以做到。

李：我們都希望這些正面的因素發生作用，我想您的看法，在中國收回主權的日子即將來臨的時刻，一定會受到我們的讀者以至整個香港社會的重視。

## 中國非完全資本主義只是補資本主義課

李：您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目標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員，怎樣看社會主義的前途？

許：對於外界說中國已完全資本主義化，我不以為然。我還是相信共產主義。我想鄧小平說中國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的。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搞的，而是在經濟、文化、物質上仍然落後的情況下搞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先天不足，因此要補資本主義課——這一課，要發展資本主義。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說：“落後地區應該發展資本主義，中國應該發展資本主義。”他認為：“這一部分資本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現在提倡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它是幫助社會主

義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這種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實行資本主義補課，但有區別於全盤資本主義化。因為大陸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驗，原來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若社會效果還不錯，人民也可以接受，就可保留；若原來做過了頭，效果不好，就借鑒資本主義的經驗，把它改掉。經濟改革如此，政治改革也應如此，都需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可惜的是，鄧小平對政治上的改革有想法而少行動，在別人開始後還把開始的人拉下馬。最近吳國光在《信報》上連續發表“趙紫陽與政治改革”的文章，是一篇可信的紀實文獻，可以看出，趙紫陽是怎樣準備實行政治改革的。

李：社會主義對於人性，會不會有錯誤的理解，並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構築人類的理想呢？

許：這是大題目。人之初，是性本善還是性本私？說人性是自私的，完全不可改變，我覺得也不能這麼講。我認為人性可變，但不可能強迫地變，不可能沒有條件地變。假如人性都是“私”，那麼從古到今，有許多人為公忘私，又該怎麼解釋呢？說明還是可以變。也許對大多數人來說，“私”心不可變，或很難變，但對先知先覺的少數人來說，是可以做到公而忘私的。毛澤東在這方面的錯誤，是把共產黨當中最先進最覺悟的少數共產黨員可能做到的標準，拿來作為要求全民的標準並形成政策。這做法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超現實的。

李：《禮運大同篇》的大同世界不過是：“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但毛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則是人不把自己的親人、兒子當親人、當兒子，專門把別人的親人、兒子當親人、當兒子了。這

可能做到嗎？

許：對當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不可能的，比較合理的說法是“公私兼顧”，公、私有矛盾時，能服從公，先公後私，那就了不起啦。

李：周恩來曾說過，大公無私我們做不到，讓先公後私好一點。

### 人應該有點理想但勿把它當眼前的事

許：關於社會主義，鄧小平講過這樣的話，我認為是出自內心的。他說，社會主義到底是怎麼樣，我們都說不清楚。確是說不清楚。原來講的三條標準（生產資料公有，按勞付酬，計劃經濟），實踐結果是行不通的。但是人類社會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找到均富之路。怎麼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理論問題，又是實際問題，不是短時間可以找到答案的。人們要經過很長時間，要通過摸索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原來我們很樂觀，現在看來不是這樣。

但要是完全不想人類的未來，是不是好呢？我看人還是應該有點理想，但是這理想，是未來要實現的目標，不要把它看作眼前的事情。眼前還是務實為好，能做多少是多少，做不到就回頭。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外面批評這觀點，我不能贊同。他們不知道“摸著石頭過河”是總結了過去多少痛苦的經驗教訓才得出來的看法。就是說，過去沒有摸就過河了，結果摔了很多跤，喝了很多水；現在知道要摸著過了，摸著過若過不去，就走回頭。人要是渾渾噩噩過一輩子，好像太現實了。總要有一部分人看得遠一點，

想得遠一點，否則人類社會就沒辦法進步。

李：人的能力有高低，天生也有智愚，分配平等是否對貢獻多的人反而不公平呢？是不是不講分配平等，只講機會平等會更合理呢？

許：機會平等比較容易做到，但也不容易。分配平等是遙遠的事，現在還沒有找到路。我曾在香港跟查良鏞講過，建議他到蘇南（江蘇南部）看看。江浙一帶有“蘇南模式”，有“溫州模式”。“溫州模式”是發展個體經濟，以私有制為主。“蘇南模式”是以發展集體（非全民經濟）為主。文革時，我從1967年到69年，一共關了兩年多。1969年放出來了，仍靠邊站。到1971年才“解放”，恢復工作不久，擔任了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分管農業。回過頭來看，講經濟改革，我在江蘇開始得最早。

李：《鄧小平》這部紀錄片，也強調蘇南經驗，還說跟當時中央的做法不一樣。

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有兩篇文章談及有關江蘇的經驗，其中之一，是有關鄉鎮企業發展的問題。江蘇發展鄉鎮企業的經驗，是從70年代初期開始的，當時還在文革期間，我被“打倒”恢復工作不久，先支持無錫縣搞，而後向全省推廣。當時還是人民公社時期，因此叫社隊企業，搞的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屬人民公社所有，屬生產大隊、小隊所有。鄧小平1983年視察江蘇，我向他匯報時沒有突出匯報這個問題，因為那時正當他提出經濟發展五年翻一番，黨內不少人懷疑能否做到。我向他匯報了江蘇那時已經用六年時間翻了一番，再翻一番可能不用五年，並匯報了翻番的根據。他

回北京向中常委做了介紹，說，許某人“心中有數”。對鄉鎮企業的作用，鄧小平在1987年才重視，認為“異軍突起”，“這個政策是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他“沒有預料到的”。這個經驗，現在看來，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具有中國特色，把中國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經驗。現在，鄉鎮企業等在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其產值已占中國經濟總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當時在政策上鑽了空子，就是發展集體所有制。當時的經濟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交稅之後的利潤，企業不能動，要國家批准才能動；集體所有制，規定企業將利潤的51%交稅，49%留給自己用，企業可以自己支配，不受國家計劃控制。集體有小集體、大集體。所謂小集體是一個鄉一個鎮一個企業，大集體是一個市一個縣。不管大小集體，都是集體，都有49%利潤可以自己支配。下面有了可以支配的金錢，就等於有了自由、可以用於擴大再生產，用於鄉鎮文化、教育、福利設施。特別是上面有些政策不那麼對的時候，下面可以有一定的自主餘地。這就是後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只從負面來批判，其實有其正確的一面。當時我的想法是：地方黨委是中央的派出機構，大政方針要服從中央，向中央負責。但怎樣向中央負責呢？應從地方實際出發，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把地方工作搞好，為地方、為人民興利除弊，同時創造經驗及向中央提供經驗，這就是向中央負責。

這是我採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態度的理論根據。我後來到香港工作也一樣，我膽子大，敢於負責，是因為我有理論根據。

蘇南模式，可以看出在分配上有差距，又較均衡。相當多的鄉



鎮從幼兒園到中學，集體全包下來，不但學費，有的連文具書本，也由集體包下。有的辦得更好的，連上大學都發補助費。男的 65 多歲，女的 44 歲，退休了，獲發工資 60% 至 80%。集體把人民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來。

李：現在還這樣嗎？

許：據我所知，還這樣。它的農業、工業都搞得好，而且是靠自己，有的集體還發小汽車。大陸到現在，沒有看到系統地總結“蘇南經驗”，我在那兒的時候甚至還受到批判，一個時期北京有人批判，省內批判，鄰居上海也批判。

李：當個體的、私有制的經濟活起來之後，是否還能維持集體經濟作主導呢？

許：有個華西村，已發展到去西北宁夏扶貧，支持當地搞“華西型”的鄉鎮企業。實行先進幫後進的活動。華西村也是中國農村企業首先走向都市投資發展的典型，早在 70 年代後期，就到上海、北京投資，這種做法使農村人口就不會外流了，相反地，城市人口還會流向發達的農村。蘇南的經驗之一，就是到上海找退休工人、找技術力量到蘇南農村來幫忙發展經濟。

李：華西村是怎麼解決分配問題的？貢獻不一樣的人，在分配上也沒有差別嗎？

許：是有差別的，但差別不大，比較平等。像剛才說的那樣，教育等等都由集體包下來。

因此，我想，分配平等，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蘇南做過，而且不僅是一個小地方、不僅是華西村，而是比較普遍地去做，農

業、工業、服務業都發展得比較好。所以我對所謂中國完全資本主義化，不以為然，是因為我有這個初步的經驗。

作為一個人，應有理想，不能因為受到挫折，看到蘇聯垮了，就覺得社會主義不行了。我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前進中的一個挫折。要進步，就要付代價。這代價非付不可，以後還要付。

在蘇南搞社隊企業還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70年代後期我曾在《紅旗》（中共中央黨刊）上發表一篇有關發展社隊企業的文章，闡述了這個想法。現在三大差別仍然存在，但是縮小了，變好了。

反看資本主義社會，問題也還很多。從人類發展來看，不同社會制度都有利有弊，而且為求生存都不斷在改，在前進。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這個資本主義，跟過去已不一樣了，也在變，我看它也還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過渡形態。

我仍認為人應有理想，沒有理想，太現實，就會變得庸庸碌碌。

李：看來您雖然經過“六四”這一段波折，但對於自己為之奮鬥一生的共產主義理想，還是挺堅持的。謝謝您給我們的這些意見。

許家屯 / 李怡（採訪），《九十年代》

## 查濟民對中共的兩個建議

最近整理香港時期留存書刊，無意間發現一些資料，可能是當時閱讀時夾在書刊中忘卻的，卻僥幸逃過周南的扣查——筆者當時保存了一部分私人資料，如自己的筆記、講稿、私人通信等。退休離香港前，遭周南無理扣留。

幾件資料中有查濟民先生的兩份：一件是 1983 年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在他居所會見查和筆者時，查濟民向中共中央和廖承志提出的，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建議書。筆者在《香港回憶錄》中提過此事，但當時只憑記憶，“建議”內容卻未能說清。另一件是查在 1989 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在國內設立一、兩個大型特別行政區的建議書。這也是有關香港回歸和大陸改革的歷史資料，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查濟民在 1983 年，中英第二次關於中國收回香港談判前夕，向中共的建議原文摘要於後：

一、英方同意放棄主權，並同意不遲於 1997 年全部交還中國（包括香港、九龍及新界）。

二、中國同意：

1、現有英國公司及個人在港設立公司及進行貿易之方便續受保護；

2、對英國目前享受之權利，例如航空著陸權，將盡少改變；

3、對香港政府有發行紙幣之權利不予改變，並對其準備金之處理，不受干涉，以保持港幣自由兌換之現狀；

4、對香港政府現行的行政與司法各自獨立之辦法不予改變。

三、為保證並保持香港之繼續繁榮，中國政府同意：

1、香港之自治包括行政、立法與司法之獨立；

2、現有社會經濟制度不變，即無意將現行中國國內之社經制度施行於香港；

3、保持居留、資金調動及言論自由不變。

四、雙方同意以國際條約形式公佈上述一、二、三各點，並對香港未來政治及基本法律、規章有所規定，其內容有：

1、對公民自由、人權、物權及各族平等，等等權利之保障；

2、對香港政治制度之規定：

(1) 總督(或相等之名稱)由北京指派。總督兼任立法局主席，如立法局表決對總督投多數不信任票時，中國將罷免總督之職務，另行指派新人接任。

(2) 行政局主席由民選之立法局(議會)議員中選出。立法局議員半數由總督指派，半數民選。政府各部門除部長由行政局主席指派外，其余公務員為常任職，不受選舉影響。行政局主席就各部長中遴選行政局議員，經立法局通過後出任。

(3) 市政局議員三分之一由總督指派，三分之二民選。

(4) 其最後上訴之法庭設在香港，現行英式司法制度可保留。檢查長及最高法官由行政主席提名，由總督指派。

(5) 香港政府享有適度的外交權及必要的保安力量，又可以全權處理經濟財政及內政事務（例如移民法規、民兵等等，可獨立自主）；

五、在訂約後至交還主權前（約 14 年），中國即可指派兩人由港府聘任為政治顧問，交還主權時英國亦可派兩人任港府政治顧問，為期約與英方聘任中國顧問至時期相等；

六、英方同意於交還主權前：

- 1、加強對香港公民之教育；
- 2、加強對工商企業之支持；
- 3、節儉運用資金。節省政府開支；
- 4、促進香港在世界金融經濟地位，維持香港之繁榮，在移交前保持香港社會秩序之安定；
- 5、在選舉如何指導香港民意及向英國國內及國會反映香港民意的問題上，事先和中國協商；
- 6、與對香港有關的重要財貿對手國家協商，取得該對手國家對上述協議的諒解。

查濟民關於收回香港的建議書，是在中國有關政策、方針尚未完整公布之前提出的。查濟民提出維護民族主權，特別是維護香港固有體制的主張，與中共後來公開宣佈的政策方針基本相近。他的建議是在他被鄧小平接見，對中共方針可能已有一些了解之後提的。但鄧不可能過多地透露細節，而且當時中共也不可能具

體到如後來那樣。可見他在這個建議中用的功力。

草擬基本法過程中，政制上出現“雙查”方案，引起很大爭議，可見查濟民在這方面的執著。鮮為人知的還有幾件事：

一是他為助筆者研究世界各國政改經驗，作草擬香港基本法參考。在1987年姬鵬飛同意筆者訪問西歐前，他為筆者安排好訪問瑞典政府及議會，請他們議長及政府主要官員出面介紹經驗。查濟民獲得對方同意後，為此出面宴請瑞典駐港總領事作為答謝，筆者也被邀。席間，相互約好，由查親自陪同訪問。然而，不知什麼原因，當時外交部主管西歐司的周南，否定了姬鵬飛的決定，使這次出訪未能成行。筆者辜負了查濟民的熱心，並失信於瑞典。

另一是廖承志交待，要支持查濟民“組黨”，並指示筆者：要像日本的“經團聯”支持自民黨那樣，香港也要有大財團出面支持。來港後，查濟民告訴筆者，他已找到幾個發起人，擬以“保守”命名組黨。筆者也曾試想將港、澳諸大財團首腦拉進“港澳投資公司”，使其逐步成為類似日本的“經團聯”，但未能成功；後查的組黨活動亦無進展。筆者開始體會到，港澳華人大資本家經濟上互相競爭，政治上欠缺獨立自主精神，要他們從政治上組合起來的困難。查濟民繼而支持另一群社會精英組織政團，筆者很贊同他與眾不同的執著精神。

其三、在基本法草擬過程中，堅持在財經政策方面，“財經預算以量入為出原則，要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相適應”原則，是查濟民提出，並一再堅持的。有草委認為這可能會束縛未來特區手腳，他認為港府財經政策一貫如此，在

過渡期 14 年間，更要以此來防止港英政府不顧後果亂花錢，影響香港未來經濟，給特區政府製造困難。他的意見得到較多人的支持。龍勇貴當時是中英聯合小組財經組負責人，兩次徵詢筆者意見：“英國人有不同意見，我們是否堅持？”筆者支持查的見解，回答：“要堅持”。幾經交鋒，堅持下來。

查濟民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以他與中共的關係，特別與廖承志的深厚交往，應得到港澳辦的尊重。但草委秘書處（實際是國務院港澳辦）連一個小組召集人都未予以安排；他毫不在意，大小會議逢會必到，發言從不落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他主動承擔一部分活動經費。他的這種只付出、不圖名的精神，在 80 年代中期，再次證實。當時新華分社擬推薦他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亦已同意。筆者向他徵詢意見，他誠懇地表示感謝，不肯接受，說：“我會一樣為國家做事，不掛名，效果可能更好。”

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資本主義體制不變，中共原已有這一設想，在廣泛聽取港人意見後，確立成為方針、政策。它主要是聽取了香港資產者的意見，向資產者利益傾斜的結果。這是基本法政制設計中，對基層利益和民主步伐，採循序漸進精神的主要因素。基本法據此制定了一條香港從港英殖民“仁慈”專制統治，經過港人權威、精英與民主共治（行政主導），循序漸進，向民主自治轉型的道路。人們從查濟民的建議中，可以體會出中共制定香港政策、方針的軌跡。可見查濟民等上、中層資產者對中共在制定香港政策、方針上的影響。

查濟民是江蘇省在三、四十年代兩大企業家之一劉國均的快



查濟民

紅衛兵工作，要他們交還抄家物資。時值運動初期，省委還可控制局面，查詢之下，豈知紅衛兵的首腦之一，竟是筆者的時為初中一年級學生的小兒子。1983年到港後，查濟民和夫人劉璧如女士以家宴招待筆者夫婦，他們看到筆者這個小兒子，笑談往事，還戲謔了這個“造反派”一番。

劉國均去世，查夫婦來南京治喪，筆者第一次接觸了查濟民。時筆者已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任省長，他是一個跨國企業集團的國際知名企業家，筆者出席了劉的喪禮（統戰部門建議派副省長出席。為表尊重逝者，查夫婦又是重點統戰對象，筆者決定出面吊唁）。隨後，每年春節，他們伉儷大多回鄉過節，筆者均出面

婿，另一位是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父親榮宗敬。他們一在無錫，一在常州，是江蘇省紡織工業的兩大巨頭，是省內第一、第二的巨富。共和國成立後，劉國均出任江蘇省副省長。文革初，紅衛兵“破四舊”活動開始，第一位副省長被抄家的就是資本家劉國均，引起省委極大震驚。當時筆者是省委書記處書記之一，奉命處理此事，立即派人先將劉國均轉移至上海，保護起來；又派人做



招待，就比較熟識並成為朋友、

改革開放初期，國內開始流行“做生意，就是為賺錢”的看法。在一次與查見面時，便以相問。查濟民的答覆是：“在私人小企業只為糊口時，沒有利潤即被淘汰，利潤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到有了適當規模時，事業的成敗及如何健康發展，就成為最重要的了；而到了企業有更大的發展，則是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才是更重要的。”筆者點頭稱是，但有保留：是自覺，還是一種時尚？到香港一段時間後，知道資本主義社會有一種對社會回饋的思想，這是一種於社會於自己兩利的思想，促使企業社會進步的思想。不同之處在於每個人自覺程度和回饋的素質。查濟民屬於具高度自覺性的一位。茲舉例證之：

筆者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期間（1982年），聞查濟民以兩百萬美元買下香港北角電廠換下的燃油發電機組，三台共15萬千瓦，無償贈送給家鄉。時江蘇正值用電十分短缺，高興異常，便派人赴港聯繫，豈知已為廣東爭得。無奈之餘，既欽佩他愛鄉心切，也體諒他為難之處。後來，廣東省有關方面竟因燃油緊張，廢棄不用，枉費了查的一片愛心。

大公報社長費公彝民相告，查濟民購買愉景灣地皮之事。筆者到港工作之始，正值香港地產市道蕭條，地產經營者多因銀行利息高而困難重重，查濟民也不例外。1977年大嶼山尚未開發，愉景灣是一片荒山，南洋某人購下，開辦養牛場，旋因投資失敗，破產，可能被他的貸款銀行，新加坡的蘇聯銀行接管。新華社香港分社及費公當時為不讓蘇聯勢力在港有活動基地，由費公請出查

濟民，從愛國主義出發，不計利害，投資購得，不意後來也陷入困境。費公出面告訴剛剛上任不久的筆者。筆者找香港中國銀行蔣文桂商量，在不損及銀行利益前提下，貸款協助，渡過了難關，也減少費公等的內疚與不安。

筆者在港任職六年半期間，查濟民為與港英爭奪輿論基地，主動籌劃收購英文《南華早報》，曾在電話中與筆者商量，要與新華社合作收購。筆者當時因不懂香港融資規則，倉促回答：用款過巨，難以籌得，而坐失機會，辜負了查的一片苦心。查濟民捐資兩千萬美元成立“求是”科技基金會，是筆者出走美國之後的事。他早在 80 年代便向廖承志建議，引進硅谷技術和設備。“求是”基金會的設立，說明他對國家科學技術發展的關心是由來已久的。

從筆者這些零星的回憶中，不難看出，查濟民對國家、民族利益的重視。

查濟民對國家、社會進步的關切、貢獻，還表現在政治上向中央的建議上。早在 1976 年，他便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向中共中央建議，開發深圳為特區，當時他稱之為“華僑經濟、居住特區”。經筆者之手，還有 1989 年的“為加速經濟改革”“在國內設立一、兩個大型的新特別行政區”的建議。引用這次發現的資料，他的建議是：

1、為了加速經濟改革，建議在國內設立一、兩個大型的新特別行政區，例如：

（一）在長江三角洲設立長江新特別行政區（簡稱長區）；

（二）在珠江三角洲設立珠江新特別行政區（簡稱珠區）；

以上二者合稱新區。

2、新區要參考香港《基本法》的精神，給予高度自治，並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對經濟問題的終審權；

3、新區行政長官由中央委任，立法委員一半以上由中央委任，另外部分以當地及投資人士中選出。香港或台灣的愛國人士，亦可被選任上述職司；

4、中央對新區的管理辦法要在與中央政策不矛盾下給予較大的自由和民主；

5、新區的經濟政策，是以國營事業為機制，以大集體所有制為未來的目標；在目前則可以放寬外資和個體的私有制；

6、新區要將一部分產業企業化和國際化，以籌集必要的資金，供發行貨幣；

7、在新區的法律未完善之前，尤其是有關經濟方面的法律可暫時參用台灣（在長區）和香港（在珠區）的法律，以增強外商的信心；

8、新區發行可兌換國外的貨幣（長區與台幣聯繫；珠區與港幣聯繫）；

9、新區負擔一部分中央財政開支，新區不依靠中央補貼；

10、新區辦法要 60 年不變。

本建議還希望可以達到下列一些目標：

1、從另一個角度，發展中國式社會主義，相信從這個方向出發，比較快速；

2、利用中國特有的台灣、香港的特殊形勢，超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速度；

3、用“人盯人”的辦法，用“加掛車皮”的辦法，使“長區”與台灣逐步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珠區”與香港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新區範圍也可以逐步向內地擴大；

4、避免全面政改的風險，先行試點，逐步主動開放民主。滿足目前國內人民的要求；

5、目前自香港而珠江三角洲而內地的梯田式的灌溉形勢，已有很好勢頭，只是源頭太小，進展緩慢。如有新區，則灌溉全國，速度較快；

6、新區解決了目前國內一系列的問題：如物價、幣制、官僚架構、特權、民主願望、貪污乃至社會風氣等等；

7、啟發並加強了中國人的歸屬感。對台灣的回歸，用經濟的實質來代替政治的理想，肯定有極大的積極作用；

8、給國內廣大的人民，樹立一個榜樣，樹立一個目標，並給予極大的鼓勵和希望；

9、在國內建立了幾個“大香港”，可以有幫助於扭轉國內目前的貧困面貌，而貧困正是很多問題的來源；

10、新區是在中央直接控制下運作的，希望成為一個新加坡式的區域。

查濟民有關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建議，有膽有識。反映他是企望中共能以國家、人民利益為重，走向富強、民主、繁榮的情懷。

筆者在1989年初收到他要轉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這個建議書，在一些方面建議他略予修改，才於9、10月間轉給鄧小平及中共中央。雖經過“六四”，趙紫陽下台，江澤民當政，懷著對鄧小

平仍存的希望，照樣轉呈，但石沉大海。今予發表，因建議中一些意見，仍可供中共作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民主改革的參考；同時，再次見證查濟民先生對國家、社會貢獻的誠摯之心；也表達筆者對香港、對祖國未能忘懷的一片心情。

許家屯

## 重點統戰對象： 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

鍾士元原屬港英政府行政會議的首席委員。鄧蓮如是英商太古、匯豐的董事。利國偉是香港世家，匯豐屬下恒生銀行的董事長。鄧、利也是行政局的議員。

按中共的階級分析法，他們都屬於親英的大“右派”。我遵照鄧小平指示：統戰工作要敢於做大右派、大特務的工作，所以到香港這塊寶地之初，工作對象的首選便是這三位。

在此之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以貴賓身份在北京向中共負責人反映，香港有些高層對香港新華分社不滿，認為他們不接觸港人，不能反映港人意見，要中共派人去港跟他們直接聯繫，建立聯繫“專線”。

中共領導人接受了楊的建議，派喬宗淮以訪問學者名義，進入中文大學，建立了聯絡專線。我來香港赴任前，萬里交代：“你去了，專線沒有必要了，交給你管好了。”我來港後與喬宗淮接觸，才知楊振寧說的“港人”就是鍾士元等幾位。

我與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位建立了經常的聯繫渠道：大致一兩個月聚一次餐。地點似乎是在利國偉的恒生銀行的俱樂部——但這只是我的猜測，因我一直沒深究那是個甚麼所在。每次聚餐，除他（她）們三位外，跟我一起去的先是喬宗淮，後是李儲文，李離港後又是喬。

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都是香港上層人士，都在行政局任議員，了解英國的政策意圖，也可以影響英國在港的政策意圖，因此始終是我在港期間的重點統戰對象。

我和他（她）們三位的第一次接觸是在中文大學校長馬林的小別墅，馬林是接待的主人。話題是當時流行的“以治權換主權”的一套。我頓即產生一個印象：他們反映的是英國政府的主張，是希望通過我把這種主張作為“香港人的意見”傳到北京。

後來我與他（她）們有了經常的聚會，隨便交談，建立了友情，相互間逐步有所了解，我才發現，“以治權換主權”的想法不一定是英國人的主張，很可能是英國人接受了他（她）們的主張和建議，遂形成為英國人的策略。

由於最初我對他（她）們有些反感，因此我在香港大學的一次演說中，竟用了“孤臣孽子”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其與英國的關係。及至對他（她）們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感到自己用辭過重、過於尖刻，頗為不妥。他（她）們對中共確有不信任的一面，而這並不光是出於意識形態的歧異，也還基於中共對自己諾言不守信用的記錄。

我雖自悔言重，但在中英交鋒之際，勢難改口彌補。只是接受教訓，後來講話小心了。

跟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接觸多了，我感覺這三位作風大不一樣。

鍾士元為人爽直，心直口快。鄧蓮如講話婉轉靈活；同樣一個意見，她表達出來，容易讓人接受。利國偉則比較深沉，不輕易講話。

三個人有共同之點：都擔心香港現局被搞壞，都把香港的利益視作切身的利害攸關（事實上也是如此），他（她）們對來自各個方面的可以影響香港利益的人和事，不論來自中方、英方、官方、民間（包括民主派人士），他們大都持此態度。只是應付方式或有不同，例如向官方是“爭取”趨同，對民間則在評說中予以肯定或否定。我很欣賞他（她）們這種態度。為了爭取他（她）們，我向鄧小平建議接見他（她）們，請鄧直接做他們的工作。

包玉剛曾徵求我意見，鄧蓮如是否可當未來特區政府首長，我表示可以考慮，只要她肯放棄英國國籍。後來，我在與姬鵬飛談論未來特區首長的合適人選時，我說，除了香港人能接受、中國政府能接受這一基本要素以外，最好是個親英的人士，其實就是把鄧蓮如作為潛在考慮人選之一。因當時姬鵬飛沒有表態，這個話題就未議論下去。

鍾士元能參加特區行政首席議員，我相信是他勇於為自己的理想而鼓餘暉於夕陽的豪舉，也是特區首長董建華的知人善任，更



是大陸的“有容乃大”氣度的體現。

我也理解那些批評“忽然愛國”、“過氣電池”者的心情，相信這些批評者會逐步理解這樣做對香港“50年不變”是有積極作用的。

許家屯

# 不尋常的朋友 ——與包玉剛的交往

1991年9月24日，洛杉磯幾家華文報紙同時報導：包玉剛先生在香港逝世！

我驚愕之餘，不敢相信是真的。兩個月前，包先生還通過他的親戚傳言，約我不久在夏威夷見面。這是我被迫去國後，昔日香港友人第一位約見的。

說來也不奇怪，香港新華分社某些人，當時奉北京之命，公然找他們認為幫我去國的某些工商界人士的麻煩，引起恐慌，避我唯恐不及。包先生竟主動約晤，使我感動不已。突聞噩耗，再見無期，哀痛之情，可以想見。我立即給包夫人黃秀英女士發了唁電，表示哀悼。除此，還能做些什麼寄託我的哀思呢？

首先，想到包先生的病。那是1988年間，在一次我們兩人共進午餐時，包先生告訴我，他將去美國治病。他若無其事地告訴我，他不久前在美國檢查身體，發現患了肺癌。他有位親戚，是治療癌症的專家，在美國執業，治療癌症很有把握，在社會上頗有名氣，就請他主治。包先生並表示，有信心治好。

我也認為，癌症已非不治之症，特別是發現得早的肺癌。我慶幸他發現得早，並舉例說：“江蘇前省長惠浴宇，1966年發現患了肺癌，在上海立即開刀，活到現在。”（惠當時尚未去世）。包先生聽了，很感欣慰，高興地說，“醫生都是這樣說的，你的話和他們說的一樣。”

本來，我想建議他去內地治療。內地治癌，特別是治肺癌，很有把握。但我見包對他的親戚有信心，便不提了。

包卻向我提出一個要求：“請你絕對保密！”並說：“我這個病，連家人都沒有說。”我理解包先生說的家人，指的是包括黃秀英夫人在內。我不清楚他為何這樣處理，也不便問。但為何又要告訴我呢？我揣摩，包先生可能要將他的病情告訴北京的某些領導人，便於請假治療，不參加北京的某些會議和活動。後來我向姬鵬飛、趙紫陽匯報後，請他們考慮，是否告訴鄧小平，也轉告了包要保密的要求。在其他場合，我一直守口如瓶。

報紙上報導：包先生因患哮喘病，長期治療無效逝世，與包先生親口多次與我談及的病情不一樣；是包先生本人意願，或是其他原因，已無必要搞清楚。從包先生本人與癌症鬥爭的精神看，還是值得讚揚的。

在包罹患癌症的兩年多的日子裡，我們每次見面，他的病情是必談的話題。每次，包都很有信心地說：“感覺良好，如往常一樣的工作、生活；每天照常地游泳、跳繩。”他說，每天跳繩幾百下，具體數字記不清楚了。我見他臉部氣色，不像病人。我慶幸他治療有效，讚揚他與疾病鬥爭的精神，佩服他對生命的樂觀、豁

達態度；兩人都很開心。

一次，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在美國找到了一種新藥，此藥還在試驗階段，服後，感覺效果還不錯。我也為他高興。1989年下半年，還是在二人共午餐時，包先生告訴我，他要去美國抽肺部積水；並說，半年要抽一次，已抽過一次。說這話時，他仍顯得很樂觀，滿不在乎的神情。我心頭卻撩起一片烏雲。為不影響他的情緒，仍說些安慰他的話。

1990年元旦過後，我在離港退休回內地前夕，兩人又一次共聚午餐，我見他面色雖不差，卻顯得憔悴了。尤其是一雙手，已呈現黑色。在兩人共處的兩個多小時中，他仍很健談，食慾也佳，把最後的甜點，一碗寧波湯圓也吃光了。他樂觀、豁達、信心不改。我曾相信，憑他的毅力，一定能再活一個較長時期。絕未想到，竟這麼快便逝世了。

包玉剛先生的逝世，是他家族的不幸！也是香港、中國的損失！“六四”之後，香港回歸在即，中英、中港關係日見複雜、微妙、緊張，包先生作為香港華人上層代表人物，作為在中、英政府內部，都可以產生一定影響的人物，正可以發揮他的影響，做一些有利於香港穩定繁華，平穩“過渡”的事情。

我和包玉剛先生相識在1983年，我剛來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時。在這之前，已知他是浙江寧波人，靠艱苦奮鬥發家，擁有一千幾百萬噸位航船，是被譽為“世界船王”之一的企業家。80年代初，他擊敗強勁的對手，成功地收購了英商九龍倉企業，打



許家屯與包玉剛夫婦（前左二、三）、董建華（後左二）、周安橋（後左一）等合影。攝於1988年8月19日，香港。

破了英商對香港某些經濟行業壟斷局面；在香港經濟發展史上，乃華人引為驕傲之舉。也知他被英皇“封”為爵士，是一名英籍華人。

來港後，分社原二位副社長，在一次談到包先生時，認為包自稱愛國人士，卻非真心愛國。論據是，包對內地投資並不感興趣；捐助寧波大學三千萬元人民幣，要分幾年分期付款，第一期拿得很少；是“沽名釣譽”。同時，也議論了其他一些著名華商，說他們到內地投資，口頭上講為國家四化做貢獻，實際上是為自己“賺大錢”，賺不到“大錢”，就不幹了！我新來乍到，無法辨別，將信將疑。

不久，見到盧緒章，他1949年前在上海、香港做中共黨的地下工作，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掌管過對外貿易部，時已

退休。我視盧為老一輩革命家，他是包先生的親戚，對包了解頗深。乘他來港之際，向他請教包的為人如何？對國家態度如何？盧緒章力排非議，對包持肯定態度。在與包先生相處一段時間後，更肯定了：二位原副社長對包的看法，是有偏見的。

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是存在戒心的。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看到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方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逐步得到落實，他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政府的態度有了變化：戒心減少了，希望、信心增加了。

但包先生畢竟是一個英國殖民地的華人資本家，他接受了英國的爵士勳位，擁有龐大的私人企業，他的立場、觀點、言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他和共產黨員一樣；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他，把愛國、愛家鄉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混為一談。

在我們交往的六年多中，曾談論、分析過各種各樣問題，有淺、有深；有一般、有重大；有共識、也有歧見，但相互卻能以誠相見。

包先生是一位極為精明強幹、事業巨大有成的現代企業家；是一位具有強烈政治責任感、並參與重大社會政治活動的愛國華人；是一位對中共持友好態度、與鄧小平相交較深的朋友。包玉剛先生當之無愧是一位愛國、愛港、愛家鄉的人士！

包玉剛先生和鄧小平的朋友關係，在香港華人上層中，無出其右。

包是香港華人上層中最早接近鄧小平的幾位人士之一；最早和鄧小平討論香港回歸問題的幾位人士之一；他和鄧小平討論香

港問題次數之多，在香港華人上層中是唯一的。

1983年以前的情況，我不清楚。83年後的幾年，包先生每年與鄧小平必會見一至兩次。這種會見，事先或由香港新華分社聯繫，或由包先生自己聯繫——他經由盧緒章直接與“鄧辦”聯繫。每次會見，大都係包先生出面，請鄧小平全家“吃飯”。這種會見我參加過三次，是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座還有谷牧，他是國務院寧波開發領導小組的組長，包先生每次都請谷參加。

鄧小平到後，先問一些香港事情，多由包先生談，我或作補充，只有一次由我主講。鄧小平和平常一樣，除問話外，很少說話。20分鐘後就席，話題改為“家常”。鄧也隨和大家，談笑風生。

1986年“本子風波”後，席間鄧小平問我：“你不是有一次講話引起爭論嗎？”並表示：“你沒有錯，你假如不講，讓英國人那樣搞下去，香港非亂不可。”

鄧所說的“爭論”，是指我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港英在政制上，“搶步”、“偷步”的行為，有“不按本子辦事的趨勢”，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為此向中央“打報告”，不同意我對這件事的做法。

當時，英國外交部、港英政府反映強烈，這是意料中的事。香港社會則反映不一。股票市場猛跌50餘點，在當時，是一次很激烈的跌勢。但包先生專門跑到新華社見面，表示支持：“你講得好，很是時候”，“不但華人朋友贊成，一些英國朋友也贊成”。還說：“嘉道理也說你講得好！”鄧小平當著包先生的面，談及黨內的“爭論”，明確表態，說明鄧小平視包玉剛先生為信得過的朋友。

看來，也有請他將信息送給香港朋友，特別是英、港政府當局的意思。

80年代初，鄧小平為包先生紀念其父親包兆龍先生在北京開張的兆龍酒樓，寫了招牌。這可能是鄧小平曾為私人企業寫的唯一招牌。

包是寧波人，熱愛家鄉，多年在外，極想為鄉梓多做一些事，可能也希望在家鄉留名千古。鄧小平當面鼓勵包本人進入家鄉投資，並希望包運用自己的聲望，號召全球寧波同鄉回鄉，支持寧波開發區的建設。國務院為此聘請包為寧波開發區領導小組的顧問。國務院國務委員谷牧是這個小組的組長。包每次宴請鄧小平，都請谷牧作陪，即此原因。寧波開發區領導小組，多次由包出錢出力支持，來港考察、開會；會見海外各地寧波僑胞，動員他們回鄉投資，參加建設。包自己帶頭，在寧波籌建年產兩百萬噸的鋼鐵廠。（此項目後來沒有搞成，包花了幾十萬美元的籌建費用。我曾幾次詢問原因，包始終不講。後經打聽，方知內地有關部門所提條件苛刻，而這個廠是包與英商合資的，雙方無法談攏而作罷。）

包先生為內地教育事業，費力不少。捐助上海復旦大學建“兆龍圖畫館”；在寧波家鄉，捐助建立寧波大學及一些中、小學。那年，寧波大學舉行開學典禮，人大委員長萬里、國務委員谷牧、省市負責人等出席，我也參加了，儀式異常隆重。包先生“衣錦榮歸”故里寧波，家鄉同胞，夾道歡迎，著實風光了一陣子。

鄧樸方 1986 年，為全國殘疾人募捐來港，包先生聞訊，專程



到新華分社見我，打聽鄧樸方此行，有何具體要求，如有，願協助其成。我轉告鄧樸方，鄧非常高興，希望包先生支持能募到五千萬港元。我告訴包後，他即刻表示先捐一千萬元。承諾募捐結束時，缺數由他補足。由於包先生的帶頭，香港各方，慷慨捐助，超出計劃。

“六四”後，中英關係惡化，港人對中共及中國政府信心一落千丈。包先生心情也十分不寧。他主動找我商量，如何讓北京知道港人情緒，俾有所改善。我建議他去北京一趟，當面向鄧小平反映。當時，他身體已不如從前，但立即同意。

報經北京同意後，包邀我同行。為讓他們談話方便，我婉辭了。他去見了鄧小平，回港後告訴我：“老人家對英態度很硬，甚至想必要時，不惜提前收回香港。”面對中英雙方強硬相向，無力改善香港當時局勢，包先生和我均無言相對。

後來，在楊洋事件的處理上，新華分社與港府關係鬧僵，我請包先生出面告訴港府，中方強硬，出自鄧小平，希望讓事情適可而止，不再惡化下去。雖然我估計包可能已將見鄧小平情況向港英通報，還是向他提出，包也同意做了。

包先生不僅參與中、港政治活動，也參與了國際舞台上的一些政治活動。他親自告訴我，英國保守黨鐵夫人競選首相，美國共和黨里根競選總統，他都有過捐助。他還告訴我，日本自民黨歷任幾位首相，與他關係都不錯，但他沒有提起是否有捐助的事。因此，我聯想到他對鄧樸方為殘疾人的募款，與上述捐助可能同出一轍，屬政治性投資。

包先生憑著他的這些公誼私交，在溝通中英、中港關係方面，確實起了某些微妙作用。我也運用包先生的這些特殊關係，與港府兩任總督尤德、衛奕信，及某些英籍港商溝通，解決了一些憑公開交涉，公關難以解決的問題。

包先生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工程中，也做出了貢獻。

包先生是起草委員會的副主任。起草委員會會議召開時，設三個小組，便於委員們分組討論議題。包是第一組組長，這個小組的成員有李柱銘先生，小組中分歧意見較多，不易處理，會議時間往往較其他兩個小組長。

包先生在草委會中，特別在後期進程議題繁重時，已知患了癌症，他仍主持小組會，全神貫注，耐心堅持。後期還與胡繩共同擔任草案的綜合小組組長，任務更為繁重。他對會議文件，閱讀仔細，何處需修改，何處需重寫，字斟句酌，認真負責。他話不多，語多中肯。政改方案，他支持查良鏞方案。對一會兩局方案，開始認為也可考慮，社會上有激烈反對意見，他建議作適當修改。並感慨地說：“羅德丞社會上本來反映就不好，為什麼由他提方案呢？”

草委會主任會議決定，委托包先生在內的幾位香港副主任，籌備成立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包先生在這個工程中，出錢出力。我在《香港回憶錄》中，已作記錄。

我們兩人共進午餐時，常對社會上關注問題，交換意見。如首任未來特區行政長官人選問題，包曾問我是否考慮過？這一敏

感問題，中共中央尚未議及，工委也未討論，我與姬鵬飛個人曾議及，但姬不表態。我反問包，有何考慮？

當時，社會上正傳說羅德丞想當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包問我，羅德丞有無可能？我回答：羅與姬鵬飛、李後、周南、魯平關係都不錯，但香港社會上反映不佳，我看，可能性不大。

包又問：鄧蓮如如何？我回答：“她的年齡、地位以及她的人望和各方面的關係，不失為一個可考慮人選。”但我反問包：“她持英國護照，她肯放棄英國國籍嗎？”那時，鄧蓮如還沒有為英皇封為爵士。

包又問鍾士元如何？我認為，鍾士元到“九七”時，年歲大了，也還可能有個國籍問題。我問他李鵬飛怎樣？包先生不表態。

我知道李鵬飛是另一華商大亨支持的，即轉換人物話題，如李柱銘、陳祖澤、李國寶、羅康瑞等，議論一番。包認為除李柱銘外，這些人將來都可能考慮，但還要看他們今後的表現。我對包說，我個人看法，未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應是香港各方面大致都能接受的人。首先要香港社會能接受，中國能接受，這兩條是主要的。其次，英國能接受更好，爭取平穩過渡。我還說：“第一任特區行政長官，可能是一個較親英國的人士。”包不斷點頭，同意這一看法。

在基本法起草特區行政體制過程中，我和包先生議論過關於香港組織政黨問題。包傾向查良鏞的“主流”方案，通過選舉團提名，產生第一位特區行政長官，贊同“九七”後，香港政治體制，以“行政為主導”。

我提醒他，保持行政主導體制，在當前社會議政、參政社團風起雲湧之際，未來必會發展成政黨，逐步走上多元化政黨政治。行政長官沒有政黨支持，在立法局不能獲得擁有多數席位的政黨的支持，他的施政效率必然下降，可能比美國共和黨總統處境更為困難。因此，香港工商界要組織起來，要有自己的政黨，工商界需要有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在輿論上有代言人物。

包先生聽後，不斷點頭稱是，但又表示，“李鵬飛、張鑒泉不是已經在做了嗎？不是也已經有人在支持他們嗎？”顯然，他對組織商界政黨的事，已有所考慮。在輿論問題上，他表示：“可以先辦一張英文報紙，可否由新華社籌備，我可以資助。”我說，由工商界籌備比較好，新華社具體事務上可以幫助。包雖表示贊同，但主張最好多找幾個人。後來因種種原因，沒有辦成。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簽字當天，鄧小平向記者表達願望，1997年當香港回歸中國之日，將來香港看看，引起了參禮的香港人士興趣。

包玉剛、李嘉誠、查濟民等向我建議：“不要等‘九七’，現在就請他來香港看看，如他一時不能來，其他領導人來看看也好。”要我反映。他們希望和中央領導人接近，希望中央領導人多接觸香港實際，多聽聽香港人意見，在考慮香港問題時，能更符合香港實際，照顧香港人的利益。責無旁貸，我為他們反映了。雖未獲肯定答覆，但也不排除可能。

回到香港後，和包先生等考慮了兩個問題：一是國家領導人來到英國殖民地，以什麼方式來？誰人邀請？英國政府、港英政府

邀請，英方可能有顧慮，中方也可能為難。包主張，“由我們個人出面邀請”，我毫無把握，不好表態，只好擱下不論；另一問題，來了住在哪裡？幾位說：“可以住我們的酒店，也可以住我們的家裡。”並約我到他們酒店、家裡看看，是否合適。

於是，包邀我先看了他在九龍倉的酒樓總統套房，又看了他在石澳的海邊別墅。其他幾位也陪看了他們的住所。考慮到北京來人會帶有一批隨員、保衛人員，港英政府也會派出保衛人員，這些住所雖好，都有容納不下或不便之處，便買下了赤柱的房子。很巧，又是包先生的產業，他知道新華分社買房子的用意，很順利地成交了。

1986年，包先生宣布退休，將他的事業分別交給他的女婿、女兒管理。1987年，一次共進午餐時，他告訴我：“我退休了，企業的事務已經不管了。”鄭重地要我向鄧小平轉告他的建議：“最好早點退休，有助培養接班人。不然，將來發生什麼事情，影響太大！”我雖然感到為難，仍點頭同意。包先生的建議是一個對中國政局、對香港前途良好的願望；是包先生愛國、愛港心情的表露；對鄧小平摯友爭友心情的表露。

由於他不了解中共的“脾氣”，可能會產生與愿相違的作用，我“世故”地沒有轉達此意，失信於包先生。

我積極主張中資在香港，要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要改革、開放，內地企業要充分利用香港做“窗口”，了解外界市場供求信息、規律，學習經營管理經驗。從香港繁榮、穩定著想，中資在香港也

需有一定基礎，萬一出現意外，有助於支撐局面。

鑒於香港工商企業界對中資在港發展有顧慮，筆者特別提醒中資負責人注意，不要和港人“搶飯碗”，不搞特權，不作不公平競爭。但是，包先生還是兩次對我提了意見。一次，他說，“中資在香港有些做法，中國政府要注意注意。”我問：“是否有中資做錯了什麼？”他沒有進一步回答。一次，又說，“香港有人反映，擔心中資在香港搞‘聯合國’。”我聽不懂，問什麼是“聯合國”？他解釋，“聯合”指聯合經營，“國”指國營，“聯合國”指先公私合營，隨後再“國營”。包的意思，我當時並未真懂，還解釋說：“這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做法，不會重覆的。”只是聯想到，早先香港新華分社邀請幾個大財團入股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多不積極，原來他們是擔心將來又搞社會主義改造，先“聯”後“合”，又一次“共產”。直至榮智健收購包先生“港龍”股份事發後，才覺悟到包擔心的，是中資可以憑政府特權，作不公平的買賣。而且，竟在包身上發生了。

港龍航空公司，是根據趙紫陽的設想，作為引進外界管理經驗，刺激並改進中國民航管理，在香港成立，以中資為主的航空企業。先從香港飛內地開始，再考慮擴充外埠航線。在向港英政府報批時，曾遭受一再阻撓，港英政府要以英商股份為主，企業由英商管理，方可批准成立。在此情況下，我才出面，與包先生商量，請他參股並主持。這樣，港英才予以批准。

成立後，在航線上，不僅遭國泰抵制，還遭到中國民航的阻撓。經趙紫陽命當時國務院分管民航的副總理李鵬出面，召開會議，批評了民航負責人（我也參加了），才允許港龍飛內地一些航

線。但北京、上海所謂黃金航線仍不允港龍航行。因之，開始幾年，財務上年有虧損。這期間，國泰與中航因香港飛北京、上海航行班次上的糾紛不能解決，想與港龍合作，藉包先生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找尋解決途徑。包先生也已答允與國泰相互換股；國泰並請包任副主席，雙方取得協議。包為尊重中方，徵詢我意見，得知中方可能不贊同後，毅然放棄與國泰合併協議。

至1990年，港龍航務好轉，財務上消除虧損，並略有盈餘。時包先生已將公司董事長的職位，讓給他的女婿蘇海文。他告訴我，蘇海文準備購買新飛機，擴充航線，要大幹一番。我們當時都很高興。豈知，只隔了幾天，包突然告訴我，他要將港龍股份“讓”給曹光彪，再“轉讓”給榮智健。我很詫異地問他為什麼，包也詫異地問：“你不知道？”原來，他以為我已經知道了。便很難過地搖搖頭，不再回答。毫無疑問，包知道榮智健身後的政治背景，他既有憤懣，又顯得很克制，看得出他對“讓”股，既勉強又無奈。我問誰找他談的，他說是曹光彪。我請他暫緩行動，待我查明情況後再議。這時港澳國際董事長張健華也來找我，說曹光彪找了他，要他將港澳國際擁有的港龍股份“讓”給中信榮智健；曹光彪並告訴他，包玉剛已同意將擁有的港龍股份“讓”給榮智健了。張健華並說，他問曹光彪：“你們這樣做，是何打算？新華社知不知道，有沒有經過北京什麼人批准？”曹光彪均不作答。我要張通過關係查詢，張查後告訴我，收購計劃是經楊尚昆同意，李鵬批准。

收購後，榮智健將包玉剛所占股份連同曹光彪的部分股份，一並轉讓給了國泰，榮智健保持港澳國際“讓”出的股份，國泰占

大股。以後港龍業務經營“委托”國泰管理，增添飛機，向國泰租用。國泰原飛北京、上海航線，“讓”給港龍飛行，國泰與民航爭執的上海、北京航線就不飛了。

事情至此，已很明白，是國泰與榮智健合謀，藉榮智健與李鵬的關係，擺脫與中國民航在內地與香港黃金航線上，瀕臨失敗結果的爭執，維持其在香港相對壟斷的特權的一個高超伎倆。

“六四”後，我們在香港，正千方百計為恢復港人對中共的信心，心勞計拙之時，讓包玉剛於此時如此失去港龍股權，對上層港人信心，無異火上澆油。我立即飛往北京，楊尚昆表示，“只是聽了榮智健的匯報，不了解實際情況。”不堅持已作決定。李鵬不肯見面，只派鄒家華聽匯報，凡三次，最後兩人拍桌大吵，也不肯改變決定，不歡而散。包先生知我回港，他可能已知我北京之行結果，見面不等我開腔，便反勸我道：“我已將股權讓給榮智健了（名義上“讓”給曹光彪，再由曹轉給榮），謝謝你的關心，這事就算了。”談著談著，又說：“我平生只做了兩件失敗的事，一件是投資渣打，一件是港龍。”包先生投資港龍是我請出山的，似乎看的是我的面子，實質看的是中共、中國政府的面子；而江澤民、李鵬現在代表的也是中國政府，竟這樣對待一個不平常的朋友！

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滿懷歉意地說：“真過意不去，讓包先生這樣委屈，是我工作沒有做好！”包無奈地說：“過去了，算了！”

1988年初，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前夕，北京正醞釀國家最高負責人的改組。當時，已知道楊尚昆將代替



李先念為國家主席；李鵬為總理；人大常委委員長將由萬里代替彭真；副委員長也將有較大幅度的調整。

我到北京後，有人告訴我這些“內情”，並說：“習仲勛、耿飆向中央提議，推薦你任副委員長”。後遇見兩人，也當面見告，我感謝他們的好意。我心中有數，有資格的老同志很多，我不會排上隊的。

我想到包玉剛先生，他在中英關於收回香港問題的談判上，協調中英、中港關係上，大陸改革、開放事業上，都做出貢獻，如果他能出任人大副委員長，不僅在這些方面更可發揮作用，在增加港人對中共、中國政府信心方面，會有更大作用。因此，我向習仲勛提出我這個想法。他要我找趙紫陽。趙當場沒有表示可否，但看得出，他不反對，要我找姬鵬飛、彭沖商量。姬鵬飛是負責港澳事務的，彭沖是人大的常務副委員長，顯然，趙紫陽要聽聽他們的意見。姬不表態，彭表示“可以考慮”。我估計他們要請示。隔幾天，彭沖告訴我，這個建議還不到時候，看來是他們討論的結論。彭並告訴我：“安排你參加人大常委。”又說：“姬鵬飛對你這個安排，也不肯表態。”我和彭是多年老友，直率地回答他：“不要安排這個虛位了。”

我向趙紫陽推薦包為人大副委員長時，趙問我：“包持什麼護照？”這問題我真的不知道，回答說：“可能是英國護照。”英籍人士怎能當中國人大副委員長？我講了想法：“如果中央採納我的建議，我會和包本人商量，看他愿不愿意放棄英國國籍和爵士勳位。我想，他有可能放棄。”

因為“還不到時候”，我也就未向包先生提及。

我和包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江澤民、李鵬明確免去我新華分社社長，周南尚未到任之前。

1989年11月某日，在佛連卡大廈他的辦公室裡，兩人共進午餐。這些年來，幾乎每季兩人都要進行幾次這樣的午餐。每餐菜只兩三樣，多為包先生的家鄉寧波菜，菜精而味美。兩人邊吃邊談，交換意見。他知道我已決定“退休”，交談的話題，主要是香港社會上正在爭議的未來特區政治體制問題，他贊同“一會兩局”方案的修改意見，不滿羅德丞的做法，而後說：“最後一次草委全體會議不能參加了，要去美國看病，請你代向姬鵬飛主任請假。”

隔年三月的基本法起草全體會議，要逐條表決通過基本法草案，包的一票很重要，但他治病更重要，我立即一口包下：“沒問題，請你安心治病。”當我站起身道別時，包先生突然很動感情地握著我的手說：“我非常欽佩你！”言出意外，我詫異地望著他，他繼續說：“我們相處了這樣長時間，你從來沒有向我提出私人的要求。在我熟悉的中共領導人中，像你這樣很少見到。”這一番話，對我雖是讚譽，卻是對中共某些領導人的批評。我遲遲答不出話來，終於感情地說：“謝謝，你對我過譽了！”

哪知，這次會晤，竟成永別呢！

1990年底，我已到洛杉磯“旅遊休息”，不時懷念在香港的朋友和同事。1991年元旦前夕，我給包先生寄了一封賀年卡，不久，收

到他的賀年卡。3月，中共開除我出黨，撤銷中顧委委員和人大常委委員。不久，包先生通過在美國的親友給我傳信，約不久在夏威夷會面，使我十分感動。想到1990年4月我從北京回到深圳，準備搬家回南京時，新華社有同事告訴我，包先生從美國治病回港後，曾多次向新華分社辦公廳打聽我在何處，都回答“不知道”。打電話給周南，也回答不知道。包先生很生氣，責問：你們到底把許某人搞到哪裡去了！

這樣提問，是否已經聽到什麼，或預感到什麼？當然，斯人已逝，再也不可能搞清楚了。包先生對一個身處逆境的故人，不計利害，殷殷關注，洋溢著的摯友之情，實難忘懷！

仰望長空，疑君尚在；天涯此時，惆悵何似！（1991年初稿，1994年9月定稿於包玉剛先生逝世三周年前夕）

許家屯

## 與香港奇跡中的奇才 李嘉誠相處

和統戰人物相處日久，公誼之餘，會出現私人友情。如果能相見以誠，在相處中的互信便可日益增長。我在香港工作的那段日子裡，曾經結交了一些這樣的朋友，李嘉誠先生算得上是其中之一。

李嘉誠是香港經濟發展奇跡中的奇才。他與香港經濟的起飛同時起飛。憑籍他敏銳的眼光、準確的判斷力、獨到的經驗，驚人地不斷發展自己的實力，推動香港經濟繼續飛翔。他不僅在經濟事務中多謀善斷，敢鑽勇創；在政治上，他同樣具有此種精神。他和他同時代的人物如包玉剛的成功，是英國殖民地香港的一個特有現象：藉助英國殖民地的特有條件，不斷戰勝並代替殖民地特權經濟，使華人經濟在這個國際經濟大都市中，逐步走上經濟主導地位。李嘉誠、包玉剛現象，是殖民地香港經濟發展中的特有現象。

研究這一現象，我現在尚無條件。只能就與李嘉誠相處的二、三事，先寫一些材料，留作今後繼續研究它或有興趣研究者參

考之用。

1983年我到香港後，認識了李嘉誠並首次與其見面。

當時，香港社會上層人士，紛紛邀請我赴宴。他們的目的顯然不只是為了認識、應酬我這個“封疆大吏”，主要希望我在中英談判香港回歸期間能轉達他們的想法，影響中共的決策，同時也試探我的態度。

李嘉誠第一次請我吃飯，在什麼場合，我已記不起來了，——不是在他中環公司的辦公大廈，那是1984年以後，大約每隔一、兩個月在他公司寬敞豪華的辦公廳裡，邀我共進午餐。直至1990年，我離開香港前夕。李儲文未返內地前，有時參加；李回內地後，喬宗淮有時參加。

第一次談話，主題是表達他的愛國愛鄉情懷，及不去內地投資的“苦衷”。午餐兩個多小時，他侃侃而談，占了三分之二時間。

他說：“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國家收回香港，我不會移民，不會遷冊”。“國家搞改革、開放，我高興”，“新華社動員我回內地投資，我去了。誰知，項目未談成，就有人說我想賺多少多少錢，很難聽”，“情願為教育、醫療盡力，投資賺錢只是次要的事情”。接著，就介紹他捐建汕頭大學的情況和打算，以及對內地有關部門的配合不滿的意見。

新華分社沒有人向我介紹過李嘉誠到內地投資的情況，我只能作可能有誤會的解釋；至於他的“不移民”、“不遷冊”，慷慨捐建汕頭大學，我表示欽佩；在他提到因內地有關部門配合不好，影

響汕頭大學建設問題上，我表示願意將他的意見，轉告廣東省負責人，請他們注意改進。隨後，我專門請一位副社長去廣州，向省委、省政府轉告了李嘉誠的意見，建議改善；並將結果向李回報。

與李嘉誠的每次對話，主題多為李提出。他態度坦誠、開門見山、語言簡練，往往一語破的。1984年怡和遷冊百慕達，引起市場遷冊風波。他明確對我講：“我的公司決不遷冊，我對國家有信心！”他在加拿大投資數十億元搞石油、地產後，主動向我解釋：

“投資雖不小，（自己）拿出的數目並不大——多是用銀行的。”

中英關於香港回歸談判開始後，香港人心動盪。港人移民、港資外流成風，中央頗為擔心。我到香港後不久，知道香港人對中共的信心，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後來又了解到，港商在境外設廠、搞企業、跨國投資，是當前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自然趨勢。港資外流，只不過多了一層信心色彩，沒有這一層，照樣也會流出。因此，當新華分社內部評論李嘉誠“不移民”、“不遷冊”時，有副社長說：“他不移民，他的兩個兒子不是移民加拿大了？！”“他不遷冊，他不是在三藩市、加拿大置了產業了？！”我卻認為：兒子移民，也許是“老子”為後代打算，雖也有信心問題，但“老子”不移民，至少“老子”還要看看再定。遷冊和資金外流也還有區別。“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這在資本主義社會雖已成普通常識，但對我來說，還是到香港後才知道的“新知”。投資在外的資金，如未遷冊，還是屬香港公司的，雖然也可以說是買“保險”。“遷冊”，卻是把“根”都搬家了。我們還應肯定李嘉誠，肯定他對國家仍具有信心的一面。當然，還要多做他的工作，克服其搖擺的一面，增

加他的信心，爭取他長留香港。

六四事件他受到很大刺激和壓力。百數十名大學生跑到他公司，要他對天安門學生運動表態。他同意學生運動是愛國的，並表示支持，但不同意“打倒鄧小平”的口號，說：“沒有鄧小平，沒有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從報章和協調部的匯報中，得知李嘉誠這個態度後，我欣賞他的態度，事實上我也有同感。

當時，香港市面又掀起企業遷冊風潮。記者問李嘉誠對遷冊態度，他的回答是：“要看董事會的態度”。表面給人的印象是，他不排除遷冊，與他以往公開不遷冊的答話，顯然後退了。私下，李嘉誠卻託人對我說：“我不會遷冊。遷冊，一對不起國家；二對不起香港；三對不起許社長。”來人還說李受的壓力很大，對外不得不這樣說，“加拿大石油合作伙伴也對李施加壓力，要李的公司遷冊，他對外不得不說些敷衍之詞”。“廣東幫、潮州幫的老闆們，看李的態度，他們與李共進退”。

我認為：李嘉誠的態度是真誠的，對來人表示了對李態度的理解和感謝。

內地在開放前後，向海外僑胞及港、澳同胞募捐，進行慈善、教育事業的很多。改革、開放後，更形成浪潮，動輒向僑胞伸手。據我所知道，港、澳同胞多是慷慨捐助的，但也有勉強或不勝其煩的。李嘉誠基本上屬於前者。但要求捐助者太多太濫，也有無奈情緒。我因此也為他“擋掉”了一些。

李嘉誠捐建汕頭大學，除投巨資（我離港時已屆五億多港元，



左起：邱德根、許家屯、邵逸夫、李嘉誠。

現據說已十億多港元)外,從具體謀劃建校宗旨、工程、設科、師資、管理至經常經費的籌措,都親自過問。他重金聘請港大退休校長黃麗松、莊世平等為建校顧問,還指派秘書等十多人參加籌建工作。另捐助一筆外幣,專作學校聘請外籍教授基金。

我於1989年曾專門到汕頭參觀,時已基本建成,校舍規模的宏大、寬敞,教學設備的現代化,港式的師生宿舍,在我所見過的內地高等學府中,無出其右。我想到李嘉誠曾告訴過我,他要把汕頭大學辦成第一流的大學,困難再多,他也要盡力做到。我敬佩他此舉可與陳嘉庚捐建廈門大學媲美,因而多次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口頭、書面建議,在汕大舉行建校大典時,國家主席或總書記、國務院總理能有一至兩人出席,表彰李嘉誠愛國建校,為國家培養高級人才的識見、義舉,鼓勵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步陳嘉庚、李嘉誠的後塵,熱心捐助國家發展教育,振興經濟。在“六四”



之後，我又做了一次這樣的建議，我以為當時正需恢復港、澳同胞及海外僑胞對中共的信心，如果江澤民、等此時南來參加，順便在深圳多會見港人，可能會產生較好的效果。可是，北京只派了一個李鐵映參典，我很失望，深感新的領導人對香港情況缺少了解、重視。

李嘉誠捐助項目甚多，經我手的即有幾大筆，都在千萬港元以上。一般是他先徵求我意見，捐助與否，捐助若干？我只能提供參考意見，請他決定。他一旦決定，隨即送來支票，由新華分社代為轉交。新華分社文體部為資助內地文化藝術團體來港、澳展覽、演出籌劃搞一個基金，我同意了，由新華分社文體部、協調部出面，向幾位熱心人士提出要求，李是其中之一，他慷慨解囊，捐助了兩千萬元港幣。這是以我個人名義，要求李嘉誠等人捐助的唯獨一次。

代秘書長楊奇匯報了一個情況，新華分社有一項“基金”，數額達兩千多萬港幣，是李嘉誠通過莊世平捐助的（莊世平是李的好友）。這筆“基金”是新華分社主動索取的，還是李嘉誠主動捐助的，楊奇就不知道了。但“基金”沒有名稱，也沒有說明用途，社長王匡批示，作為分社“小金庫”，存在銀行裡。我感到詫異，新華社怎麼可以接受私人的捐贈，成立一個無名“基金”，存在銀行裡，任領導人使用？因才到港事忙，後來也就忘記了，沒有進一步查清楚。

李嘉誠縱橫馳騁於香港國際經濟大舞台上，成功率極高，失

敗率極少，幾乎無往而不利。他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加，不僅很快成為香港華人首富，也名列國際幾百名大財戶之列。我在港六年多，通過我和他的直接、間接的接觸與觀察，我確實從他身上懂得了一些資本主義的市場知識，深感李嘉誠事業上的成功，確非偶然。

王光英自我推薦，來港創光大企業公司，在地產低潮期間，投資李嘉誠經營的城市花園。內地、香港一時議論紛紛。王光英經營什麼項目，從不向新華分社打招呼。雖然國務院有規定，中資在港、澳經營重大項目，要“告訴”港澳工委，徵求意見。李嘉誠卻為此事專門到新華社，告知我這項和王光英的合作項目。李特別告知我：他知道王光英的錢是國家的，在地產不景氣期間，“不能讓國家吃虧”，在他與王的合約中，主動提出，如有虧損，不要光大負責；如光大不愿合作，可以隨時退出；所有損失，不要光大負擔，光大已付的資金，將如數退還，包括利息。並將合約影印本給我。這是他與王光英之間的合約，我無權過問。但我對他的作法表示了謝意。王光英不久卻又毀了約，退出了合作，李果然也如約履行，又通知了我，我都及時報告了北京。不久，港英政府為此找了李的麻煩，對李興起訴訟。李在名義上、實際上遭到了損害，我對李感到抱歉，卻又無法相助。

李嘉誠對中資的“關照”，不僅是對王光英，華潤關於天水圍的開發，中銀關於青衣島水泥廠的貸款，他都做了有利於華潤、中銀的處理。張建華、蔣文桂匯報時，都對我講，“李嘉誠這個朋友不錯！”當時都為他們解決了難題；他們都曾因此遭到過內部責難。

我笑笑答到，“他是個精明人！”我的看法，李與中資的交往，一直是沿著這個思路進行的。

葵涌六號碼頭籌建期間，李嘉誠請我參觀了此碼頭，他親自陪同。介紹情況時，他強調該碼頭占地，較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新加坡面積都小，效率卻較它們都高。靠的是管理先進，全部電腦化、自動化。吞吐貨柜數量占全球第一位。管理單位更作了具體介紹和表演。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自動化高水平的企業管理實況，印象很深。我對李嘉誠突破香港一般華人企業“家族管理”的辦法，聘用“老外”，實行現代企業管理的做法，表示讚賞。

因了解到香港貨柜碼頭發展的情況，在土地委員會中方委員向港澳工委匯報，提出在規定批地以外，額外批給六號碼頭土地的方案時，便無異議地通過了。這也說明，李嘉誠會做工作。

李嘉誠說不到內地投資，經幾年的觀察，在 80 年代中，我已感到他並非真心如此，而是投資的機遇未到。

1986 年，內地開發海南特區尚在醞釀期間，李嘉誠主動向我提出，他準備投資一百億港幣，開發海南，希望我能去海南主持政務，或當他投資公司的董事長。我聽後很高興：他改變主意，願意進內地投資了。我預感到香港大財團進入內地的時機將臨；也感到李掌握機會的敏銳度極高，對內地情況了解的深入。——他要我當海南特區的領導人，或他投資公司的董事長，為他將進入內地的投資計劃“掃障開道”。

他的願望，和我的願望有著不謀而合之處。為內地改革開放引進港資、外資；幫助港資，特別是香港大資本家進入內地，以增

強港人對中共的信心，是我在港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我與李的出發點有異，但能“殊途共歸”。因此，我願意為他及他們進入內地“掃障開道”。我答覆他，我年事已高，不可能去海南擔任職務，也不能當他的企業董事長，但中央可能同意我任其企業的顧問。我立即將李的意圖向鄧小平及中共中央匯報，並建議：海南建省，利用香港經驗、資金和人才，開辟海南經濟特區，得到鄧小平及中央的認同。

由於李鵬的刻意阻撓，海南特區的政策遲遲未能落實；李嘉誠可能因“時機尚未成熟”，沒有大規模進軍海南，不能怪李嘉誠苛刻。當前李嘉誠等華人大資本家，進軍內地投資的事實，可以充分證明這個判斷近乎事實。

李嘉誠參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任委員，對基本法的制訂異常認真。小組會、全體會，逢會必到。李主動參加兩個小組會：經濟、政制。會上，認真聽取、考慮委員們的意見，他雖發言不多，但卻把他認為需要講的問題，都明確表達出來。最後一次草委全體會議，逐條表決基本法條文時，李對“分組計票”持反對態度。姬鵬飛要我“說服”他，改變態度。我與他交談了三次：第一次堅持不變；第二次勉強表示：“可以考慮”；第三次又表示不能同意。表決時出現了七張反對票，估計多是與李持同一意見的香港委員們投的。可見李對自己認可意見的執著。

社會上傳說，李嘉誠支持李鵬飛、張鑒泉在籌組政黨活動，包玉剛及另一些香港草委，也曾和我談到此事，但李嘉誠本人，卻從

未和我談及過。我知道他欣賞並信任李鵬飛、張鑒泉，因此基本相信，也樂見其成。

李嘉誠是位具有敏銳政治嗅覺，和強烈政治責任感的現代企業家。具有愛國、愛鄉、愛港的熱忱。“六四”後，我動員他去北京會見中共領導人，反映港人意見，了解、影響中共領導人的態度。他同意去北京，條件是：“要見就見鄧小平”。我同意並安排他見了鄧小平。他向鄧直言了香港人對“六四”後的憂慮，鄧小平也對他講了對英國制裁中國政策的反應：“以強硬對強硬，不惜提前收回香港。”他回香港後，無奈地對我說：“果如鄧先生所說，非港人之福！”他對我講這樣對鄧不敬的話，雖有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卻是他對香港前途的擔心，是他憂國、憂港的真情流露。我只能勸他“事情總是會變的，還是樂觀一點”。

1989年底，北京公布我調回內地，李嘉誠在他辦公廳大樓裡與我共進最後一次午餐。當時，他正逢喪妻之痛。心情仍很悲傷，多日很少飲食。我見他面色憔悴，勸他節哀、保重。他講了不少動感情的話，說為了紀念他逝去的夫人，準備將她的全部遺產成立基金會，專作慈善事業之用。汕頭大學典禮照常舉行，他照常參加，而拒絕了關心人士的勸告，在夫人舉喪期間，延遲舉行。當我表示，我雖退休，仍會參加典禮時，他連聲感謝，表示將向民航訂用專機，送我去汕頭參典，他將親自迎送。我請他不必如此，他卻堅持不變。當時周南已到港履新，我請他補邀周南參典，他立即同意。談到我退休後去處時，他說：“你如果在深圳作研究，有

需要的話，我可以支助。只要你提出來，我會做到的。”我甚為感動。

鑒於我來美國後，香港有幾位商界人士，曾為此被北京某些領導人及香港新華分社當權者懷疑，受到無理對待。為免使朋友們為難，我雖有困難，沒有主動向香港友人提過要求。只在新年期間，寄送賀卡，以表思念之意。後來也接到他們同樣的賀卡。李嘉誠先生同樣如此。我相信，我們仍是朋友，後會有期。

（1994年7月於洛杉磯）

許家屯

## 海南和梁湘

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十週年了。李嵐清代表中共高層在各界紀念會講話，說建立特區是“鄧小平倡導下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決策”，特區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決策是完全正確的”，並“希望特區人堅持思想解放”，“更上一層樓”。看到這則報導，感慨不已。

80年代中期，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時期，就有將海南單獨成立大特區的醞釀。大約在1986年間，李嘉誠先生在一次和筆者單獨聚會時，談到海南島開發時，他主動提出，有興趣去海南投資，說：“我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元，開發海南，但有個條件：你到海南當領導（你可以兼），或是我組織一個公司，請你當董事長。”這個提議完全出乎筆者意外，因為他曾對前任社長動員他去內地投資事宜有所不滿，因為事未辦成，就有流言，說他要賺國家多少錢。他曾向筆者抱怨：“決定不再到國內投資，要我捐款可以。”因而筆者立即表示贊成，但也解釋，可以出力贊助，但因年老力衰，不能再當海南第一把手和他的董事長，估計中央也不會同意。他隨後問：“李鵬飛當董事長，你看怎樣？”筆者表示：“只要你信任，

就可以。”這事已記載於筆者的回憶錄。要重提的是，李嵐清說到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要決策“完全正確”，當時及後來決策過程中的一些艱難情況。

筆者在海南建省之前，給鄧小平及中常委的建議信上，反映了李嘉誠投資海南的意願，第一次提到，採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自由港的大特區。這是筆者到香港後的新認識，也是在鄧小平及當時中共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思想開放影響下，才有勇氣提出的。鄧小平看到筆者建議信後，即批給趙紫陽辦理，趙紫陽當即又批給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谷牧，請他具體化。趙在筆者的信上批示（大意）：贊成許家屯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現在可以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建省之前，可以把原來給特區，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復。中央旋即任命原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原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為首，成立籌備組，進入海南。

許士傑、梁湘在取得中央同意後，邀筆者為顧問，與谷牧率領的中央、國務院部、委數十名負責人，去海口市開會討論未來特區政策。在此會議上，許士傑、梁湘風聞部委辦負責人對特區向中央的報告頗不以為然，竟要筆者首先發言。筆者也同情他們的處境，將香港如何成為自由港、取得發展，宣傳一通，表達未來特區採用香港經驗的一些想法。許、梁等很滿意，谷牧卻不表態，中央部委辦負責人中，反映意外冷淡。後來，谷牧對中央如何報告，筆者不知其詳，從梁湘等人談吐中觀察，他們是有些失望的。

鄧小平後來提出，在內地“要搞幾個香港”，筆者頗為鼓舞。



不管是否受到筆者影響，至少證明筆者的信中學習香港經驗的建議沒有錯。但後來李鵬去日本訪問時，日本記者問到鄧小平“要建立幾個香港”之事時，李竟回答沒有這回事。

海南建省後，香港熊谷組集團提出要投資海南，開發洋浦特區的打算，趙紫陽口頭表示同意，王震也很支持。但報告送到國務院，李鵬不予批覆。李鵬從日本訪問回來，說在日本時作了調查，“熊谷組沒有什麼資本”，“不同意整塊地批給他們，只能有一個項目，批一塊地”。這成為他後來一再不肯批准開發海南洋浦為特區的借口。

因海南省大特區成立後，開發政策一直沒有落實，不僅影響李嘉誠的投資意願，也影響海外人士去海南投資的意願。洋浦特區能否獲得批准，成為一時的政策方向指標。筆者為幫助海南打開局面，動員在港中資國際投資公司，帶頭去海南投資，以影響港資。時海南缺電嚴重，特別投資先搞海口電力廠。按當時國務院規定用國內設備，因而決定在上海訂貨。為爭取早日建成，決定首先採取承包方式，從設備到廠房，都由上海承包。為提前完成，並予重獎，反之亦有重罰。時江澤民任上海市長，為此在春節除夕夜，開動員大會，要有關人員、單位，爭取提前完成任務。後來果然提前完成，承包單位也獲得重獎幾十萬美元。

許士傑、梁湘與筆者每次見面，都表現出著急、無奈情緒，要筆者幫忙到中央“替海南說話”。筆者受托向趙紫陽反映。趙紫陽時已與李鵬、姚依林在思想政策上分道揚鑣，他要筆者直接找李鵬。為此筆者又專門找了李鵬，向他說明，據筆者在港的了解，

熊谷組企業有一定的實力，其老闖于元平也是善於經營、有信用的。李鵬聽了，輕蔑地笑笑，敷衍地說：“好吧，我們研究，研究。”以後便遲遲沒有下文。

洋浦特區的開發，實際已經開始。許士傑、梁湘處境很難，他們不是“先斬後奏”，因得到趙紫陽口頭上的同意後才開始的，誰也沒有料到李鵬會“打壩”。他們以為鄧、趙等聽得進筆者的反映。但筆者則有顧慮，不能直接向鄧小平反映，打李鵬的“小報告”；趙也要筆者直接向李鵬反映。筆者前後三次向李鵬提出批准洋浦特區的請求，甚至在“六四”前，楊尚昆找筆者“打招呼”，告知中央決定趙紫陽下台，堅決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時，楊尚昆要筆者去見時在黨內紅極一時的李鵬時，筆者再次提請他予以批准此事，他的回答仍是：“以後再說。”言下之意，是當前形勢這麼緊張，你還如此不識時務。

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當選”總書記後，找筆者談話，他初登大寶頗為謙虛，談了一些到中央來後的“心裡話”，筆者又向他提及請中央批准洋浦特區問題，他回答是：“剛才還和李鵬同志談到這個問題，還是按照他的意見。”筆者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他在四中全會的“重要報告”，已使人失望在先。

不久，事情竟演變到江、李發電報給許士傑、梁湘，並派專機要他們赴京，題目竟是“討論洋浦開發問題”。不想梁湘到北京才下飛機，立即被軟禁，失去自由。堂堂大國、大黨，總書記、總理，採用欺騙手段，竟不顧黨紀國法，如此處理一個他們認為有不同意見的黨內高級幹部，實在令人心寒！

李嵐清說，特區十年改革開發的實踐，證明中央、國務院改革、開放的決策完全正確，沒有說錯。只是現時的中央、國務院中有些人與此無干。他們在當時如果不是反對者，至少也是阻撓者，儘管他們現在也不得不承認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人們歡迎他們真能“覺今是而昨非”，為中華民族多做好事。如果他們還自認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唯物論者，他們至少應該修正那部十五大前出籠的，有關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影集。人們在那部影集中看不到當時與鄧小平一起倡導改革開放並身體力行的胡耀邦、趙紫陽的一個鏡頭，卻看到那時尚未進中央決策領導層，今日卻坐享成果的“江核心”不斷露臉。這種唯心的、不符實際的宣傳，實在難獲人們對他們的信任。

在鄧小平、胡耀邦發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解放思想，進行改革開放 20 週年即將來臨之際，人們是不會忘記他們（包括趙紫陽、萬里等）的豐功偉績的。儘管鄧小平在後來處理胡、趙，特別是六四事件中犯有過錯，人們會一分為二看



梁湘在 1988 年海南省成立大會上。他後來被整肅的遭遇是許家屯的前車之鑒。

待他的歷史功過的。

今之中共領導人，要接受經驗教訓，包括他們自己犯錯的教訓，認真解放思想，進行完全徹底的改革，這是人們對他們的希望，只有這樣，中共、中華民族才真正能“更上一層樓”！

許家屯

## 建立海南特區的三位推手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掛牌，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宣告成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從中央決策層面來說，海南經濟特區的籌建決策過程中，經過了多次反覆，有近10年漫長的歷程。在這一歷程中，有很多人成為海南特區籌建的熱心推動者。至今，海南人依然念念不忘王震、許家屯、梁湘等人所做的貢獻。

### 王震受命考察海南

1980年6月30日至7月11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海南問題座談會，就加速海南島的建設集思廣益。會後，國務院批轉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研究海南島的開放開發問題。這一年12月，受趙紫陽總理的委託，王震到海南考察，就海南的開發建設、對外開放提出意見。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王震擔任農墾部部長期間，就數次到過海南。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

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島慰問各族人民。王震和廖承志與各族幹部和群眾進行廣泛交談。座談中，王震多次指出：“海南島是我國的第二大島，地勢平坦，土地潛力很大；它地處熱帶、亞熱帶，氣候溫暖，雨量和日照充足，是理想的熱帶作物種植園；礦產資源豐富，特別是鶯歌海、北部灣油田前景很好；三亞和大小東海等地，風景優美，適合發展旅遊事業。”“有了現在的改革開放政策，又有 23 年的紅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據地的光榮傳統，海南島理應對國家的四化建設作出較大的貢獻。”（何立波：《王震與經濟特區改革》，《黨史博採》2008 年第 4 期）

王震從海南考察後回到廣州後，召開了有廣東省有關方面負責人參加的“關於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座談會”。海南的領導人雷宇、羅天等參加了會議。雷宇後來回憶說：

我們從海南趕來，主要是羅天匯報的，羅天匯報了兩個多小時，等到我說的時候已經沒時間了，要吃晚飯了。最後我就用五分鐘的時間，把海南島的改革開發講了五條意見。王震聽得很清楚，他說，就按照雷宇匯報的五條意見給國務院起草個報告。然後在我匯報的基礎上，寫了一個給國務院的關於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草稿。這個草稿先拿到國務院經濟特區辦，特區辦主任何春林，副主任胡光寶，有一個組長叫張戈，最後張戈要我們一起去北京，去了北京，我就不再參加這個文件的起草了，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林述文和我們海南島的謝汝希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主要是配合工作。後來形成了中共中央 11 號文件。11 號文件嚴格來講就是我匯報的那五條（楊繼繩採訪雷宇記錄）。

王震在會上作了專題講話。通過座談討論，大家對開發建設海南島必須採取的方針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見。王震主持的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中發〔1983〕11號文件），確定以對外開放促進島內發展的方針，授予海南行政區在對外經濟活動方面較多的自主權，並指示中央各有關部門採取積極態度，從人、財、物方面給海南島以必要的直接支持。《紀要》提出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的具體方針、政策、措施和改革海南行政區計劃體制、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勞動工資體制的方案等等。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撤銷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成立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的建議。10月，《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出台。海南島可以自主進口17種國家控制的商品，其中主要是汽車，就使海南得以將國家控制的商品進口，被轉賣到大陸腹地。當年，轉賣汽車可以賺取厚利，海南島成為全國炒賣汽車的“天堂”，釀成了舉國震驚的“海南倒賣汽車事件”。

在中央處理“汽車事件”的過程中，一些緊急措施未免矯枉過正，使得海南的對外貿易全面停頓，《中央擴大海南對外經濟貿易主權八項規定》也幾近收回，使海南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受到了一次沈重的打擊，海南一時失去了改革的動力。

王震對海南的開放依然十分關注。“汽車事件”兩年後，1986年2月，趙紫陽同胡啟立、田紀雲深入海南島考察。10月，王震來到廣東，召見梁湘，交給他一個任務：去海南作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王震說：“歷史上許多有識之士，都提出過海南

建省的設想。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設想均未實現。我看現在條件成熟了，現在委託你考慮一下，提出意見。”

王震是梁湘的老首長，當年在延安時，梁湘是王震 359 旅的部下。而就在此前不久，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的拓荒者的梁湘，被免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的職務，調任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直處於賦閑狀態。王震將考察海南的任務交給梁湘，自然包含著對梁湘在深圳的工作的首肯。梁湘欣然受命，前往海南，並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資、土地出讓或成片開發的新思路。洋浦以其港口條件優越、土地相對平整，原有居民較少和便於封閉隔離等綜合比較優勢，成為實施這一思路的首選之地。王震堅決支持這個新的思路。1988 年 12 月 1 日，王震到海南考察，聽取省領導關於洋浦開發問題的匯報，並題詞：“洋浦開發，前景廣闊”。

不料，海南這種舉措在 1989 年 3 月的政協會上卻被一些認為是賣國行為，發生了始料未及的“洋浦風波”。為平息風波，王震對許士傑、梁湘說：“一些同志反對外商承包洋浦開發，是因為一時不了解，你們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傳嘛！”許、梁上書中央。在鄧小平等人的關注下，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為了表示自己對洋浦開發的態度，7 月 14 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開發商日本“熊谷組”企業在香港的負責人于元平，支持他搞洋浦開發。



## 許家屯上書鄧小平，建議開發海南

海南“汽車事件”前後，原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香港媒體和香港財團對海南的開發抱有極大熱情，許家屯以自己的特殊地位，來推動海南開放的腳步。

1986年2月趙紫陽和田紀雲、胡啟立海南之行見諸媒體後，海南的開發引起海內外的關注。

這一年，許家屯在與李嘉誠的一次單獨約會中，談到海南島的建設時，李嘉誠主動提出，他有興趣去海南島投資，並承諾“一次可以投資一百億港幣，開發海南”。許家屯認為，如果李嘉誠



獨在異鄉為異客。

真能到海南島投資，不僅對開發內地有利，而且可以引發香港、海外大資本進入內地投資的新局面，對穩定香港，也會有很大影響。為此，從未去過海南的許家屯，乘參加全國人大會議開分組會の間隙，請假去海南考察。

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姚文緒陪同許家屯考察。許家屯認為，海南確是中國南方另一顆明珠，地理、氣候、資源俱佳（唯一不足的是人才，教育水平低）。欠缺的是，只待開發。他向姚文緒講了參觀後的設想：擬向中央建議，海南脫離廣東，單獨建省，搞一個全國最大的特區，要求中央給海南特區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區黨委的同志們聽後，都很高興。姚文緒並說，海南從“汽車事件”後，這樣把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都“收”回去了，海南的情況很困難，幹部們情緒也很低沈，希望許家屯的建議能得到中央的考慮。他並說：“在沒有建設大特區之前，最好中央先恢復過去給海南的優惠政策；若是不能全恢復，恢復一部分也行。”

回香港後，許家屯立即寫信給鄧小平並黨中央，把他受李嘉誠要去海南投資的啟發，去參觀海南的感覺，以及區黨委的意見做出反映，建議海南建省，成為大特區，實行貨物、人員、資金進出口自由，成為第二關稅區（深圳要拉鐵絲網，搞“二線”地區，海南無須這樣，因它是天然海島），貨物進出內地，可做進出口處理。許家屯特別提出：採用香港經驗、資金、人才，把海南建成一個大特區，一個自由港。

鄧小平把信批給趙紫陽辦理。趙立即批給谷牧，請他具體化。趙批示的大意為：贊成許的意見，海南建省早就有此想法，

現在可以考慮設特區，建省。在大特區沒有落實之前，可以把原來給海南島的優惠政策先恢復。

海南特區宣告成立後，許家屯被聘請為顧問，他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開發。對洋浦開發計劃，許家屯予以支持。他不僅在香港與于元平交談，而且向趙紫陽陳述這一計劃對海南開發的作用。

“洋浦風波”發生後，梁湘和許士傑向許家屯求援，許家屯直接向王震、趙紫陽反映情況，以求得支持。1989年6月初，許家屯直接李鵬建議，繼續啟動洋浦開發項目。十三屆四中全會後，許家屯趁與江澤民見面的機會，又把洋浦開發問題提出來，建議中央早一點批准洋浦開發（根據知情人的回憶並參見《許家屯香港回憶錄》有關內容）。

### 梁湘赴勾畫海南特區藍圖

1986年10月，領受王震指派的任務後，11月15日至22日，梁湘到海南考察。考察結束後，梁湘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建議，將海南從廣東分出去，單獨建省，並像深圳那樣辦經濟特區。

報告中，梁湘介紹了“三中全會以來海南經濟發展”所取得的“顯著成績”，指出“海南的現狀與它所處的地位仍然不相適應”的情況，提出“加快海南開發建設的幾點建議”：

- 1、要實行更加優惠的政策，允許海南實行類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中央已確定廈門為自由港。海南更具有實行類似自由港的某

些政策的優越條件。它“孤懸海外”，便於執行更加開放的政策；它在地理上靠近東南亞國家和港澳地區，便於發展對外經濟文化活動；它資源豐富，經濟發展潛力很大。海南經濟迅猛騰飛，對於開展兩個大島、兩種社會制度的經濟競賽，促進台灣回歸，實現“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為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作好準備，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建議國務院允許海南島實行類似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如對進口生產用的物質和出口海南生產的產品免徵關稅，資金自由進出，外商來往方便。在步驟上，則可先恢復和落實中共中央[1983]11號文件所給予海南的優惠政策，然後逐步實行上述政策。

2、要擴大自主權，把海南升格為省一級的體制。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個完整的島嶼，為利於實現對全島的統一領導，建議海南行政區人民政府按省一級政權進行組建，並行使憲法規定的省級許可權，直屬國務院領導。其理由：一是全島在總人口、工農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等方面雖遠遠比不上先進省份，但亦相當於青海、寧夏、西藏等省（區）的水平，給予海南行使省級許可權，讓其比較獨立自主地組織領導全島的開發建設，有利於溝通各省、市、自治區以及海外的經濟聯繫、科技文化交流，加快海南經濟發展的速度。二是海南島目前有兩個地級州市，又有一批省廳級的企（事）業單位，還有3個正軍級的駐島部隊領導機關，給予海南行使省級許可權，有利於實現全島的統一規劃，統一領導。三是海南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地區，給予它行使省級許可權，才能按憲法的規定行使立法權，製定和通過地方性法規，以保障外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我國的主權。四是實踐已證明了現行體制不適應海南的開發

建設。五是歷史上海南也曾作過省的管理。讓海南單獨成為一個省建制，有利於海南的開發，無損於廣東的建設。

還要理順海南內部的關係。海南省成為省一級體制後，可以考慮以地域經濟聯繫密切程度為界限，切成東南西北中“五大塊”，分成五個地級市，即加積市、三亞市、那大市、海口市和通什黎族苗族自治州，由海南直接管轄，各縣由地級市管轄。

3、當前要突出抓好交通能源電信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交通方面，成立地方民航公司，大力發展民用航空事業，興建國際機場，把現有5個軍用機場改為軍民兩用；新建擴建深水港口；建成四通八達的公路網絡。能源方面，抓緊興建天然氣發電站、火力發電廠和水電站，迅速提高供電能力。電信方面，大幅度地提高電話線路，儘快實現全島各市鎮自動電話，並能對全國各大城市和港澳地區以及一些外國自動撥號，使電訊網絡內外溝通。交通、能源、電信建設的項目，海南早已上報，希望國務院有關部門儘快批准，以便及早動工。

與此同時，要充分發揮海南得天獨厚、風景優美等自然優勢，優先發展熱帶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加工，海水養殖、捕撈和加工，積極建立橡膠、南藥、咖啡、胡椒、茶葉、腰果、可可、鳳梨、花卉盆景、早春瓜菜、對蝦、石斑魚等農副產品出口生產體系，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道路。要盯著本地豐富的資源，引進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積極發展冶金、礦業、建材、橡膠製品、食品加工、石油化工等工業。還要把旅遊業作為加快開發建設的一大產業來抓，先在三亞周圍建立起一批具有海南特點的避寒、冬泳、度假、觀光的旅遊

勝地。

海南的開發建設要作好規劃，突出重點，逐步鋪開。近期應該著重開發海口市、三亞市和通什市。

當前最大的困難是缺乏建設資金。保障資金的來源，一是實行財政包幹，開源節流；二是積極引進外資；三是大膽利用銀行貸款，建議中央近期每年給予海南低息貸款 1 億至 2 億元，以支援海南建設；四是發行開發股票債券，向社會集資；五是加強橫向聯繫，某些企業採用國家地方聯合經營，利益均分，通過大力發展內聯企業的辦法，來籌集資金。

4、充實調整各級領導班子。政策確定之後，關鍵在於領導班子。加快海南開發，進一步開放、改革、搞活，需要更多能正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懂得商品經濟，善於與國際資本打交道的幹部。海南升格為省一級體制後，行政區的領導班子先要加強。鑒於海南基礎差、人才缺，各級領導班子要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搞五湖四海。要把一批符合幹部“四化”條件的、真正有獻身精神、有膽識、有才幹並能團結同志一道工作的幹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可從廣東省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抽調一批優秀幹部支援海南建設，也可到全國各地公開招聘一批幹部，以調整充實海南各級領導班子。

最後，建議中央成立一個加快海南開發領導小組，以實行強有力的領導，提高工作效率。

梁湘這份沒被公開披露過的報告全文 5000 多字，是研究海

南經濟特區發展的重要文件。報告沒有一句空話，既客觀地分析了問題，又科學地提出了辦法，勾畫出海南特區發展的藍圖。

王震看到報告後很讚賞，立即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閱示。王震還把梁湘來信的副本轉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

榮毅仁很快回信：“海南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要是從體制上將海南升格為省一級建制，實施一些特殊政策，是會有利於加速海南經濟發展速度的。”

1987年5月2日，正在新疆考察的梁湘被總書記趙紫陽召到瀋陽談話。趙問：“你對開發海南有多大把握呢？”梁湘說：“只要國家能給海南以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我對加快開發建設海南前景是樂觀的，我滿懷信心！”趙說：“你已名聲在外，是急流勇退，還是去海南工作？”梁湘答：“我服從組織的分配，聽從黨中央意見，不計較個人得失。”幾天後，廣州市委書記許士傑得知中央要建立海南省和經濟特區的消息後，主動上書趙紫陽，請求到海南工作。這樣，許士傑和梁湘就成為海南建省籌備組的一二把手。

海南特區成立後，梁湘擔任海南省省長，直到1989年被免職，他為海南的改革開放作出了令人感念的貢獻。

徐慶全，《八十年代》



許家屯與 Helen、許建在華盛頓國會山莊前合影。



與許建在加州大熊湖。



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前。



上個世紀 90 年代初，拉斯維加斯附近還是一片田園風光，驢子也上了公路，讓許家屯想起故鄉早年時光。



在蠟像館裡與甘地合影。



在阿拉斯加遊輪上。





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部下在美國街頭留影。



許家屯參觀羅馬鬥獸場。



在異國他鄉見到中國書法，仿佛邂逅故交。



許家屯(左三)在法國與范曾(左二)夫婦和Helen合影。



在英國倫敦北部的海格特墓地拜謁馬克思的墓。



在意大利威尼斯。



許家屯最愛鴿子，意大利威尼斯的廣場上有成百上千隻鴿子。



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



與《中國時報》駐洛杉磯特派員卜大中一起參觀盧浮宮。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許家屯與老友、外號“大聲”的著名記者陸鏗（左三）在歐洲遊歷。



2009年7月，93歲的許家屯跟幾位年輕朋友一起乘坐遊輪前往墨西哥。（李大明攝）

第四輯  
革命初心與政治領袖

## 差點當上了一名作家

從前某位高僧有“桑下不三宿”的說法，因為修佛求解脫，在同一棵樹下不要連睡三宵，以免對樹產生擺脫不掉的情緣。這位修行者的說法有點道理，在這世界上，人事關係和朋友交誼的相互牽引，往往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而果又生因，因後成果，以至無窮。

現在我在《蘋果日報》、《信報》開闢專欄，是自己從未想到的。不過細思起來，有許多前因後果，似乎注定我非寫專欄不可。

1983年我到香港後，由於工作的職責所在，當然要接觸新聞界。我對人喜歡坦誠相見，太史公所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真是一點不錯，我因此就跟一些傳媒人士成了好朋友。他們不僅臨走時給我送行，我不在其位後他（她）們經常關心我，不能不使我感動，這種“人情債”我是樂意要還的。香港回歸前夕，《蘋果日報》陳慧兒小姐專程來美，我豈有不接受她訪問之理？接受了，報社黎老闆請她轉告，邀我寫專欄，言辭懇切，叫我說“不”也難。與《信報》的關係，我另文介紹。

發餘暈於夕陽，老來還要做爬格子動物，實出意外。繼而一想，不也是個絕好的體育活動嗎？當然，還可添些“旅行休息”的餬

口之薪。況且，逢觀兩岸，確有欲吐之言，也可略釋一二。既釋己懷，亦可遠告香港故人：賤軀無恙。內心不受時限，屬隨感隨筆性質，對自己言不甚吃力，對讀者言不致太過無味，《蘋果日報》專欄名曰“說故談今”，說“故事”談“今事”之謂也。

爬格子，對我來說，也還有點“前緣”。

我的學歷很淺，文化水平很低：六年制小學。祖父是前朝大清皇帝治下科舉時代的“槍手”，代別人考中的舉人，有實無名的讀書人。我小學畢業後因家貧而輟學，跟著其時已經為揚州鹽商子弟當私塾老師的祖父讀了兩年古書。祖父去世，我讀古書也就基本停止了。但我自幼喜歡看祖父輩所不喜歡我看的“閒書”——小說，他們對此既喜又怨，喜的是我斯文好學不頑皮，怨的是我“不看正經的東西”。

我十歲開始看章回小說。第一部是《精忠岳傳》，手不釋卷，幾天就看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三國》、《水滸》、《西廂》、《紅樓》、《封神》、《蕩寇》、《彭公案》、《施公案》、《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江湖奇俠傳》、《九尾龜》、《啼笑姻緣》，等等，等等，從古典到現代，五花八門，數百部之多，只要能到手，便生吞活剝，讀完方休，不管它是寶是草。

常聽人說，讀書可到廢寢忘食的程度。這非我所知。我的經驗是讀書可以代替吃飯，那倒是真的。我那時家裡窮，有兩年一日三餐不繼，早上不吃早餐就去圖書館看書，用母親給的兩個銅板（當時的銅板，不知值現在港幣多少，只記得那時一塊銀元可換三百枚

銅板)到中午才買兩個燒餅充饑。有時身無分文,也就空腹堅持看書,到圖書館關門始回家,吃幾口稀飯上床。

“閒書”其實不閒。它以情節引人入勝,使你欲罷不能,一口氣讀下去,表面上是消閑,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之間增進了智識,開拓了眼界,啟發了思維,最低限度是熟悉了文字,可以由此偶爾動筆。寫點自己所謂文章,自我欣賞一番。

17歲是我人生歷程的一個轉折點。在如皋縣城農民銀行當行長的堂叔,見我失業失學還肯自學向上,認為孺子可教,便介紹我到縣立的“貧民工廠”去當造手紙的學徒工。那是一個基本上憑體力勞動的作坊式的工場,管理上雖有別於私人作坊,雜亂蕪糟則沒什麼不同。我當時的感受,雖比失學失業強,卻不是理想的出路。

在衣食有著而生活苦悶之餘,手癢起來,寫了一篇小文章,投給《如皋導報》的副刊,發泄內心的不滿。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刊登了出來。第一次看見自己手寫的文字,排成了鉛印文字進入千家,那種滋味大概是今天用電腦打稿的後生們所意想不到的。於是又連寫幾篇,雖然沒有稿費,仍興奮得不得了。那篇處女作是什麼內容,怎麼想也想不起來,連題目也不記得了。署名倒是記得的,是本名“許元文”。

古人把“小說家言”看作歧途,把從政當作正途。如照這樣講,那末我就是被歧途引向正途的。

我第一次爬格子由報紙發表後,就被吸收進了一個自發組織起來的叫作“春泥社”的文藝青年團體。其成員是一群大中學生和

一些在公私機構及學校任職的青年教職員，也有賦閒在家、比較富裕的青年，大多思想左傾、追求普羅文藝。我是他們這群人內唯一的“工人作家”。

說實在話，我這個“工人”並沒有“領導”他們，倒是他們引導我開始接觸左傾文藝作品。在他們著意“培養”下，我才真的廢寢忘食地大量啃讀托爾斯泰、高爾基、大小仲馬等的名人名著，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的著作更是必讀的瑰寶。並由文藝作品開始涉獵文藝理論，再進而從文藝理論闖入了哲學的領域，結果就開始踏進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殿堂。

這時，正值日本軍閥逐步侵犯我國領土，國民黨當局奉行“不抵抗主義”，“先安內，後攘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民族危亡，國無出路，結合著個人的不滿，我思想急遽左傾，不僅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理想，而且自發在“春泥社”內秘密組織“左翼作家小組”，與中共上海地下黨取得聯繫。這就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春泥社的成員中有位葉胥朝，是一名資深國民黨員，當時他又是共產黨員，是“跨黨”黨員，解放後任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他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是如皋縣黨部常委兼黨報《如皋報》的總編輯，他把編輯的實際工作交給春泥社另一成員吳健。吳健後來曾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當時在一個中學當小職員，家境貧寒。他接受《如皋報》編輯工作是左翼作家小組的主意，公私兼顧，既可掌握“如皋報”編輯大權，又可稍紓吳的困境。他白天在學校上班，下午5時下班後到報社上班。單槍匹馬編一份對開大張報紙，記錄中央社的電訊新聞，剪貼上海、南京報紙，還要撰寫

社論，編副刊……實在忙不過來，我就自告奮勇，成了他的幫手。兩人合作了將近一年。

其間，我已從貧民工廠的學徒，調為工廠門市部小職員，每天下班便趕去報社。晚上11時截稿，否則來不及清早出報。兩人輪流記錄新聞。社論可不每天寫，副刊必須每天出，為爭取青年、婦女讀者，除文藝副刊外，還有青年、婦女副刊。既要處理來稿，還要編稿發稿，填不滿篇幅得自己動手寫。後幾個月，我曾在文藝

副刊上寫過一個長篇連載小說，每天四五百字，內容現在卻一點也想不起來了。我的收穫是由此學會了爬格子。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一派把報紙作為材料，告到省黨部，說管報紙的一派宣傳“赤化”。後來他們內部運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沒有深究。但吳和我也就退出《如皋報》，結束了藉國民黨陣地作“赤化”宣傳的這段經歷。

抗日戰爭爆發後，春泥社的左翼作家小組部分成員，共十人，組織抗日流亡宣傳隊，從如皋出發，想經過徐州、西安，去延安“找黨”，幾經曲折，延安未去成，我在國民黨抗日第五戰區長官李宗仁



《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明鏡出版社）



的潢川青年軍團加入了共產黨。參加徐州保衛戰後，返流回蘇北灌雲縣，辦了一個八開《灌雲日報》，宣傳長期抗日思想，積蓄力量，籌組敵後遊擊戰爭。當時日寇雖已占領上海、南京、濟南、徐州，但連雲港尚在東北軍手中。

在與一個國民黨內有左傾思想的退職官員合作下，藉灌雲縣城板浦鎮郊一家糧食坊，辦起一份報來。從編輯到印刷，不足十人，吃睡工作都在一起。我是主要負責人兼總編，吳健副之。日寇飛機幾乎每天必來空襲、轟炸，交通不便，新聞主要靠記錄中央社電訊，也常摘用上海租界上出版的一些中國書報。

來稿很少，主要靠吳健和我兩人每天爬格子。副刊還可利用空隙預先編寫，每天四五百字的社論則由我主筆。每天都必須在記錄了新聞電訊以後始能動筆，而時間往往已在晚上 11 時之後。在這種艱難處境下，逼得我學會了一面撰稿一面交排的爬格子本領。具體寫了些什麼，也記不得了。記得的是，居然不時獲得一些讀者的好評。

回想當時那種什麼也不怕的積極而又幼稚的行徑，情緒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那時所積累的基礎，對我這個旅居美國的人來說，還頗有助益，否則難有《蘋果日報》、《信報》的專欄，也難有一部《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交由明鏡出版社出版。（1999 年 12 月）

許家屯

## “放下你的鞭子”抗日找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為占領中國並獨霸亞洲，詭稱在北平近郊蘆溝橋失蹤一名士兵，發動了對中國守軍的進攻。中國守軍29軍219團奮起抵抗，蔣介石政府這才結束了1931年“九一八”以來的“不抵抗”政策，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

當時蔣介石還心存僥倖，他在7月17日的廬山“最後關頭”講話中還說：“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但他也作出號召：“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當時，我已在如皋農民銀行當一名抄寫的職員，月薪有15塊銀洋。這是我堂叔許五章察看了我幾年之後，認為我“有出息”，有意提攜我，故在他銀行裡給我這個差事。我在打工之餘，則仍然從事春泥社和左翼作家小組的活動。我們春泥社的人，對蔣介石的講話既興奮又不滿。興奮的是：他要抗戰了；不滿的是：他還

幻想和平。當時因“赤化”事件已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了，但我們還是要宣傳抗日，不能寫文章，就口頭作宣傳。

緊接“七七”事變之後，8月13日，日寇又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揚言三個月滅亡中國。

蔣介石在其統治地位直接受到威脅時才宣佈：“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他先後調動 73 個師，堅守上海達三個月之久，使日軍從八、九千人增加至 20 萬人，傷亡四萬多。中國軍隊在武器劣勢下，抱定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英勇奮戰，傷亡更多，約 30 萬左右，出現大量可歌可泣的故事，如眾所周知的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在四周全被日軍占領、孤立無援情況下，由謝晉元副團長率領，不退讓，不投降，激戰四晝夜，打退日寇飛機、戰車、大砲的輪番進攻，最後奉命退入英租界。

全面抗戰開始了。我們春泥社的左翼作家小組同人還通過上海地下黨獲得消息：國共兩黨合和有了進展，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日。大家聞之十分興奮，摩拳擦掌，士氣高昂。

另外獲得兩個文件。一個雖是公開發表的，但在如舉一般民眾是看不到的，那就是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另一個是秘密發行的、王明《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當時我們不知道王明與毛澤東有路線鬥爭，因而視為至寶。

抗戰槍聲已響，作為滿腔熱血的青年渴望報國。前此從事的報紙因為“赤化”案不能再使用了，我們“左翼作家小組”成員就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編寫成宣傳品，油印小冊子，通過郵局，

散發給一些熟人，或給一些關心時局、對抗日比較積極的人。

這時上海有一批青年組織的抗日流亡宣傳隊，經過如皋，北去隴海路，我們配合他們做街頭宣傳，得到啟發，在他們走後，我們也自組宣傳隊上街。幾乎每次都是演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

時間已久，現已想不起詳細劇情，只記得梗概是表現一對父女從東北淪陷區流落街頭，靠賣藝維生，父親怪女兒演出不力，用鞭子抽打她，有一觀眾路見不平跳出來大喝一聲：“放下你的鞭子”，並責怪老頭子不應虐待弱女，父女便將家鄉被日寇侵占，亡國亡家的悲情訴說出來。

演老人（即父親）的是後來曾任華東宣傳部、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的俞銘璜，演女兒的是後來成為俞銘璜夫人的沈絮，演打抱不平的莽撞漢子的就是今天在爬格子的許家屯。大家全心投入，精神飽滿，演技水平則參差不齊。俞沈二位雖也屬於外行，但跟趙丹、顧而已這些名演員常相切磋，所以演來很夠味，尤其是沈絮每場必真哭，引起不少觀眾流淚，效果很好。我則自知最差，談不上什麼演技，實際上只有一句義正辭嚴的“放下你的鞭子”，八成還是靠我的身體好、中氣足，一聲大喝，聲震街頭。

50年前要老人“放下鞭子”，50年後要洋人“按照本子”，靠的是同一股中氣。投筆從戎，我不但演戲（演只有一句台詞的戲），也會唱歌（跟著大家唱）。每次街頭劇演完後，便合唱抗戰歌曲。最打動人心的是“東北流亡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及“大刀歌”：“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反映了我們民族即使用落後的大刀也要抵抗日寇飛機大炮的勇氣和必勝的決心。

但當時社會上各種人對自身的生活各有不同考慮。我堂叔許五章從他在如皋高層朋友處獲悉我參與了《如皋報》的“赤化”活動，又積極參加抗日活動，怕我出事，就找我談話，說：“你喜歡讀書，我預備在海邊找個地方，讓你好好安心讀幾年書。”長者之言，當面不敢違，我什麼也沒說，但這成了我一生的轉折點。

抗日和革命已成為我的血肉和靈魂，要我停止抗日不革命，那無異要我不呼吸，辦不到的。但堂叔確是一片善意，我不忍峻拒，還不光是礙於長輩安排而已，所以必須撤出他的感情所及才行。

上海撤守後，以左翼作家小組為主的春泥社成員十人，在潘也如（他原是中共黨員，南通大生紡織三廠的職員，是小組的領導人）和俞銘璜的積極推動下，組成一個抗日救亡宣傳隊。這既遂我抗日革命之宿志，又能藉此擺脫堂叔真誠的好意，所以我特別積極參加。

抗日救亡宣傳隊終於組成，大家對父母都沒有告別，放棄了各自的職業和家庭，離開如皋。目的地是延安，口號是“找黨，抗日”！

許家屯

# 我與顧逸萍 一同走進抗戰隊伍

2005年3月底到4月初，時年89歲的許家屯，與何頻、高伐林長談六日，經許家屯同意，談話全程錄音，部分整理稿交由許家屯本人過目訂正。

現摘錄其中回憶早年參加進步文學活動到投身革命，以及與夫人顧逸萍（顧梅）相戀成家經過的部分內容。

## “金如皋，銀泰興”

我家在如皋縣的一個鎮上，叫李堡鎮。國民黨時期有個說法叫“金如皋，銀泰興”。為什麼呢？因為如皋的地位重要。那個地方地主都有錢，“金如皋”嘛！當時南京是全國的首都，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民政廳賣縣長，三萬五萬塊錢就可以買到泰興縣的縣長職位；如皋縣呢，百萬大洋才能當縣長，一年可以賺回80萬。你看富不富！

二十年代後期，我當時十歲出頭，泰興如皋紅軍暴動，在那個地方成立了蘇維埃。

(何頻: 領導人是誰?)

主要領頭的, 名字一下子想不起來了, 領導人中有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 當時他是中共泰興如皋特委的, 張愛萍在那兒打過仗負了傷。抗戰以後在建立游擊根據地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它劃成兩個半縣, 為了什麼呢? 為了堅持鬥爭。(展圖) 這是如皋縣, 這是海安縣, 這是南通、上海, 南通就在長江邊上。這邊就是泰興縣。李堡現在歸海安了, 我家就在這個地方。李堡當時算是個比較大的鎮, 我現在估計, 當時有幾千、近萬人口。

我出去以後沒有回去過家鄉, 在省裡工作的時候迴避。這一個是受了舊小說影響, 一個是受了周恩來影響。我只是有一次下去視察時經過我家鎮上, 轉了一下, 任何人都沒找。

我祖父許祖義, 在前清最後科舉考試, 替人家考試中了舉人……(高伐林: “槍手?”) 對, 他就是個“槍手”! 比較有學問。他那時在揚州住在鹽商家, 給十幾個富商子弟教書。

他兄弟二人, 一共大概養了六個兒子, 還有大概兩個女兒, 在鎮上算一個中上層家庭。鎮上最出名的地主有兩家, 一個姓唐, 一個姓楚, 祖父有個女兒就嫁給楚家。

我父親這一輩是“伯、仲、叔、季”這麼下來, “伯”是老大, 我父親叫許友叔, 是老三。我出生的時候, 父親是李堡鎮上警察局裡的一個師爺, 動筆杆子、出主意的。警察局那時候只有不到十個警察, 實際上又是地方的司法部門, 師爺比較有地位, 我記得他對人家講, 他改一個字, 就讓人家一場官司打贏了。

母親李壽琴, 是南通縣糧商的女兒, 她兄弟七八個, 弟弟主要

做糧食生意。我父親大概地位還比較高，能夠娶上糧商家的女兒。

我們姐妹四個人，兩男兩女，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祖父這一房裡，伯父和叔父都沒結婚，就是我父親結了婚，生了我，我是二房長子，年輕的時候很得家庭寵愛。我祖父那個兄弟的家境比我祖父要好，他們家的孩子都結了婚，都受了高等教育。我家不一樣，伯父和叔父都沒出去做什麼事，就是我父親做事。

我六歲就進了李堡鎮的小學校，讀了初小四年，高小兩年。高小的時候就有英語課，我讀了兩年英語，學了英語模範讀本。

## 全縣小學國語比賽得了名次

我家住在鎮東——等於就是郊外——的一個廟，叫東嶽廟，東嶽大帝嘛，我們住了東嶽廟的三間房子，在大殿西邊，是租的。廟看起來也沒落了，所以把西側原來和尚住的地方租給我們住。我出生時住廟裡，一直到上完小學都住廟裡。12年中，開始家裡還不愁吃穿，到後來就漸漸窘困，生活困難了。什麼問題呢？主要是父親母親吸毒——不是吸鴉片，當時叫“紅碗”“白碗”，一種這麼大的碗，就像鴉片煙槍一樣，用那個燈，用針穿一個孔，把紅碗連到煙槍上。當地的風氣就流行這樣的應酬，價錢相當貴，也沒人講有害。吸那個東西，就逐漸沒落了。到了高小要畢業時，我父親在當地就不行了，就一個人到揚州去了，在祖父的幫助下，到了一個錢莊裡頭去做師爺。

我小時候喜歡讀書。學校裡有個小圖書館，除上課以外我就



到圖書館裡去看書。十歲開始看第一部——《岳飛傳》，讀了不到十天就讀完了；然後看《水滸》，看《三國》，這叫正書——正書者，小說裡面比較正派的書。我祖父又高興又不高興，他認為，讀書是好的，而且我讀書比較快，能夠領會；但他認為我不應該讀這些書，應該讀經書詩書。那時候家裡希望我將來能夠進高等學堂。都說我將來有出息的，說我長得好啊，“方面大耳”啊，哈哈哈哈哈。

讀小學對時事也不是很清楚，印象裡邊，曉得北伐，曉得孫中山蔣介石，我們唱“打倒軍閥，打倒軍閥”。小學裡邊也遊行啊，拿個小旗子，濟南事件之後抵制日貨，拿個小旗子上李堡鎮街轉一轉。

（高伐林：那個廟還在嗎？）

沒有了。我曾經寫過文章的，門口有兩棵白果樹，一般兩棵白果樹應該是一公一母，它兩棵都是公的，奇怪。白果樹後來也沒有了！我特別留戀那兩棵樹。站在那個地方我想，怎麼鄰居也沒有了？鄰居都是農民，也沒有了。我問了什麼道理？就說開湖開掉了，後邊有個湖，搞水利，正好在那個地方通過，把廟拆掉了。

我和最大的弟弟隔了四五歲。後來我弟弟，他原來在店裡做職員，後來，我到福建去的時候他也到福建去了，不是我介紹他去的。在我到南京以後他死在福建了。我姐姐、妹妹也去世了。

（何頻：你解放後有沒有幫助他們找過事情？）

我沒有幫過他們。

（何頻：為什麼共產黨的官吏那麼無情無義？）

公私分明啊。

兒童時期最輝煌的，就是我們如皋縣教育局辦小學國語演講

比賽，我代表我們學校去參加比賽。我們校長叫劉西昆，陪我到縣城。我們這個地方到縣城是四十五華里，校長用獨輪車，中間突出，兩邊坐人。家裡特別做了袍子、馬褂，當時是最正式的禮服了嘛。去參加比賽，得第五名，哈哈，不錯了！

## 20 歲當了造紙技師

小學畢業以後，就失學了，因為上中學要錢，一年要幾塊大洋。我母親就帶我們一起到揚州找我父親。我就到我祖父教書的那家，是個很大的鹽商，家裡很大，進去好多進，學生老師混在一桌吃飯，學生一開都是幾桌飯。

那個鹽商家裡對祖父很恭敬，對我也就很照顧了——老夫子的孫子嘛，所以一起去讀古書。《論語》、《孟子》，講《綱鑒易知錄》，讀《古文觀止》，從盤古開天地這麼下來。“革命”一詞，我就是從我祖父那兒得來的。“成湯革命”。就這麼，接觸一點古書，搞了兩年多。接觸古書就是從這兒來的，從我祖父那兒來的。我祖父去世了，沒有多大年紀，那個年代，四十幾歲就算是老了。鹽商子弟有錢嘛，把老師也帶到戲院裡去，他們打茶圍，老師就抽鴉片煙。也把我帶去，我就坐在那兒目不斜視，還找點什麼書來看一看，哈哈……祖父去世了，我就搬出去了。這時我父親還在錢莊裡，還有點事做，不久呢，因為祖父去世，靠山沒有了，也失業了，家裡吃飯就困難了。我就到了一個遠房姑夫家裡去了，家裡少了一張嘴嘛。

我姑夫也在揚州，夫婦兩個，兒子在郵局裡工作，那時候在郵

政裡工作是很不錯的，所以他們就收養我了。收養我很客氣，我不上學，又不要我做事，我就怎麼辦呢？街上有個圖書館，所以我一早起來就到圖書館去，晚上回來。中午怎麼辦呢？或者不吃，或者兩個銅板買個燒餅，就這麼搞了大概有一年多。大概十四五歲的樣子。

後來我又回自己家，我祖母已經去世了，父親失業，日子就苦了，靠我母親替人家做針線。最苦的時候，一天三餐不繼。我母親到人家做針線，晚上吃飯，用手絹包一手絹飯回來，再煮點稀飯過一天。實在沒有辦法，我父母要我回如皋，去找我五叔，他在做銀行行長。給了兩毛錢做盤纏。揚州到南通有條小運河，叫通揚運河，小火輪上要買票上去，我就混在旅客裡邊，沒有買票就上去了。船開了以後查票，我沒票，要把我趕走，要我下船。我不說不下，也不說下，也不哭不鬧，十幾歲了也不好意思哭。乘客替我講情，小孩子嘛，這樣子沒把我趕下去，到了如皋。你看可憐不可憐？船上賣蛋炒飯，兩毛錢一份，我捨不得錢，餓了一天一夜。叔父不錯，看了我那個樣子，就收留我了。平時知道我喜歡看書，但是不曉得我實際到底怎麼樣，就讓我在家裡，帶他的小弟弟。我當保姆當了半年多。他是高層了，銀行行長，來往的都是高層，縣城裡的高層。

取得他的信任，就把我介紹到如皋城裡邊一個貧民工廠，做學徒工，是生產草紙，比馬糞紙好一點：稻草用硫酸漚爛，搗碎了以後變成渣了，用簾子把它撈起來，一張一張，擦起來，再榨乾了，把它一張一張揭開，貼在板上，乾了再取下來。要有一定體力，要挑水，要擔缸，用簾子出紙要點技術。搞了一年多，他們覺得不錯，就

把我介紹到東台縣當技師——跟如皋一樣要辦一個貧民工廠，也有造紙這一項。這個時候大概是西安事變這一年，我 20 歲。

## 加入春泥文藝社

此前在貧民工廠做苦工，我就開始給如皋一家報紙投稿寫文章。縣裡有兩份報紙，一個叫《如皋導報》，一個叫《如皋報》，一家是國民黨縣黨部的報紙，黨部書記長叫余世中，是 CC 派的；一家是如皋縣國民黨監察委員羅亦明辦的，我當時哪知道這些，就開始投稿，這個時候我大概 19 歲，《如皋導報》登出來了，第一篇文章用的名字是許元文。同編者通信，他們就約我見面。

這些人是什麼人呢？是如皋的文藝青年，組織了一個“春泥文藝社”——不是有句詩“化作春泥更護花”嘛。這批年輕人，有高中生，有高中畢業以後當教師的，有畢業以後在家裡的。他們熱衷研究普羅文學，我當時一投稿，他們發現了：是個工人！他們都是少爺、是小資產階級，我是工人階級嘛，就要我加入春泥社。我當然很高興了，他們借很多書給我看。當時普羅文藝最崇拜的是魯迅啊、巴金啊、郭沫若啊、成仿吾啊。也接觸到世界名著，大仲馬呀，托爾斯泰呀。我就開始從短文改寫小說，他們稱我是“春泥社的高爾基”。

（高伐林：這個文學社，有沒有任何政治背景？）

開始還沒有，只是接觸到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藝理論。我到東台時，已經是春泥社成員了。我寫了一篇二三千字的小說，想不

起來標題，也記不起來具體時間了，是仿照張天翼的筆法寫的，投到上海一家什麼戰時文藝刊物，登出來了。我到了東台，稿費寄來了，是聶紺弩當編輯。一篇小說，12塊大洋，不得了啦，哈哈！在東台做技師，一個月薪水大概七八塊錢，一個月大概要花五六塊錢，當時小學教員最多大概也就是12塊錢。

那個時候，蔣介石從西安脫險回到南京，各個城市都舉旗遊行啊，委員長出來了，都慶祝嘛。但我們已經不以為然了。這時候共產黨已經發表了“抗日十大綱領”。

在東台幹了不到一年，我主動向叔父提出要求，不想再幹了，要回來。我叔父對我已經很信任了，同意了，讓我到他的農民銀行的磨頭辦事處去當職員，我就同我們這群“狐群狗黨”搞到一起了。朋友裡面。後來成為共產黨幹部的，有一個俞銘璜，他解放以後，當了江蘇省委宣傳部長，還是南京大學教授；還有一個吳安順，後來改名吳健，當了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

回到如皋，但磨頭離城還有幾十華里呀，不方便，我又提想回城。叔父是農民銀行如皋分行行長，把我弄到分行，這樣我就每天同我的朋友在一起了，住在我叔父家裡。他知道我同這些人來往，同我講：你喜歡讀書，我到海邊上搞一個房子給你，你住到那兒去讀。叔父是什麼意思呢，後來我想，是他聽到一些風聲，春泥社這些人，那時候叫“危險分子”，想讓我與春泥社離得遠一點。

當時我對國民黨很反感，一個，東北淪陷以後，蔣介石不抗戰，張學良被人叫作“不抵抗將軍”，打嗎啡，嫖女人；第二個，我叔父當銀行行長接觸的如皋上層的那些人，在一起談的，我在旁邊聽到

的，都是怎麼賺錢，哪個人搞多少錢，他們不管老百姓苦不苦。

## 自命“左翼作家”

這個時候，我們有意識地搞左翼活動了。我們這個團體同南通的文藝青年都有來往，俞銘璜的愛人叫沈絮，同趙丹、顧而已他們都是一起活動的。南通大生衣廠有個高級職員叫潘也如，他是共產黨員，暴露了，回到如皋參加春泥社，他同上海黨還有聯繫。他出面，我們在一個會員馬光曾家裡，他家是個地主，六個人組織了一個“春泥左翼作家小組”——我們也自稱“作家”了，哈哈！這六個人是潘也如、俞銘璜、吳安順、馬光曾、我，還有一個誰，忘了名字……六個人準備出一個刊物。

這個時候，有個大哥叫葉胥朝，是大革命時代如皋國民黨縣黨部的文員或者更高一點，他是跨黨黨員，又是共產黨又是國民黨。

“四一二”國民黨蔣介石清黨，他坐牢了，大家崇拜他，因為他是“老黨員”，又坐過牢。我們春泥社有人到牢裡去見他，他出了牢以後就自然成了我們的領袖。

（高伐林：春泥社有沒有社長？）

沒有。各人有各人特點，俞銘璜，是學寫魯迅式的文章；我主要是寫小說……各種人都有。我們占領了《如皋報》這個陣地，葉胥朝當主筆，是我們的領袖；誰來編呢？就是吳安順。吳安順家境貧苦，中學畢業以後到一個中學裡做職員、刻鋼板，薪水很少，家裡負擔比較重，因此大家就推薦他到《如皋報》去兼職。他一個人編

太苦了，我在銀行裡，下了班沒有事，就到報社去幫忙，兩個人編一個報紙。是日報呀，天天下了班以後就去，搞到12點多鐘看了大樣以後才回家。國民黨廣播電台播送供記錄的新聞，播音員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讀三遍，我們記錄下來以後就編，再剪一點上海的報紙。副刊呢，我們有好幾個，有文藝副刊、婦女副刊、兒童副刊……接受外面投稿，主要的是我們春泥社社員的稿子，我還寫過長篇小說呢！連載，當天寫當天登。

（高伐林：報紙是多大開本？）

對開。一大張，四個版，就我們兩個人。廣告很少。編了好幾個月，差不多快一年。後來為什麼不編了呢？不是有兩份報、分兩派嗎？國民黨那個派別就告到鎮江的省黨部去了，說是葉胥朝在這裡“宣傳赤化”，這還得了？這邊他們就不要我們編了，那邊就去上面活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叔父大概就是為這事，要我離開如皋，怕我“赤化”了有風險。

我們六個人成立左翼作家小組，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什麼？一旦暴露了，要殺頭的呀！一則以喜，是我終於找到共產黨了——成立小組，就是加入共產黨了，我們當時就是那樣想的，後來的說法叫作“思想上入黨了”，組織上當然沒有加入。這是後來的說法，當時不懂啊。

## 抗戰戀愛兩不誤

我們有這個組織，出小冊子宣傳抗日，“糞土萬戶侯”啊！都是

年輕人，也幹了許多荒唐事，如皋縣城是石板街，我們晚上三五個人、十多個人，在大街上橫衝直撞，這麼晃，這麼唱——很多抗戰歌曲我們都會唱；哪個街上有個漂亮姑娘，大家就去看；更荒唐的是晚上，到城外去把土地廟砸了、把菩薩給砸了。另外就是談戀愛。

（高伐林：春泥社裡有女社員？）

有女社員。我那個老太婆就是那時候認識的、愛上的。她在中學裡上學，投稿給《如皋報》，撞上了我。她那時候叫顧梅，後來叫顧逸萍，是個大地主家的女兒。她就加入了春泥社——也無所謂正式不正式。

我們的左翼作家小組成立以後，就同上海建立聯繫。上海的黨組織已經給破壞了，正在重新建立，派來人考察我們，帶來份文件，就是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王明的東西、第一份中共文件。

“八一三”上海抗戰，上海有一批文藝青年，組織了一個抗日救亡宣傳隊，到下邊去，經過如皋，我們找到他們。俞銘璜我們這幾個人，也要救亡，醞釀也搞一個宣傳隊。當時的口號是“去找黨”——上海黨只是聯繫而已，沒有承認我們是黨員。潘也如可能是個共產黨，但是他也沒有成立黨組織。這個找黨的宣傳隊最開始組織的時候，有12個人，本來有潘也如參加，他正同俞銘璜的姐姐談戀愛，後來潘生病，俞的姐姐也就留下了，就成了十個人：俞銘璜，吳安順，我，沈絮，顧梅，沈絮的弟弟沈霧，還有人一下想不起來名字了。

我這個老伴，家裡是大地主，已經替她訂了婚，但她弟弟思想



比較左傾，同情她，就幫她秘密出走。分兩批走的。我同我老伴這一批先走，從如皋縣走的。

（何頻：她當時願意出走嗎？）

願意呀！逃婚嘛！我們坐黃包車先到海安，十個人會合齊了，就雇了一條民船。一百多二百里，在船上，很浪漫的！我同我老伴是逃跑的呀，不敢露面。我們十兄弟，老大姓徐，徐靜漁，歲數最大，是個小學教員。錢都拿出來“共產”，我的老伴顧梅逃出來帶了很多首飾，其中不少金首飾，我們許多開支，主要靠她這個首飾啊。一直到阜寧不通船了，上了陸路，想向隴海路的海州走，江蘇北部這一帶都非常荒涼，我們向連雲港的方向走。打算第一步到了隴海路，再向西北到延安去。到了一個鎮，叫東坎，我們就開始宣傳了——《放下你的鞭子》，我演那個最後大吼一聲衝出來的莽漢，俞銘璜演老漢，沈絮演女孩子，他們同趙丹顧而已一起演過戲，有經驗，我台詞不多，就大吼一聲：“放下你的鞭子！”我們還唱救亡歌曲。每天就在大街上演一兩場。

## 別去延安找黨，這兒就有黨

演《放下你的鞭子》，大街上看的人不少——外邊來的學生演嘛，很轟動。宣傳抗日，不分老少，共產黨的東西也講，國民黨的東西也講。記得那是“八一三”以後，上海已經打起來了，已經入秋，比較冷了。從東坎到了灌雲縣的一個什麼地方，也演出了。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裡，來了一個人，叫徐繼泰（音），自稱是馮玉祥部下軍

官，來拜訪。他有個哥哥在當地當國民黨的區長。他說，你們抗日，我也抗日，我是從馮玉祥那兒回來組織游擊隊的，希望我們留下來，同他一起合作發動游擊戰。

他走了以後我們十個人一討論，開始一致同意留下：到延安去找黨是爲了抗日，在這兒也一樣抗日啊。但留下來住了兩三天，俞銘璜同他接觸的結果感覺到不對味兒，覺得這個人不是個好的合作對象，他有個人野心。這樣我們內部就發生了分歧：到底是留下來合作？還是繼續上路？大哥、吳安順幾個人主張留下來；俞銘璜和我主張繼續走。誰也說服不了誰，就分道揚鑣。徐繼泰後來成爲這一帶的一個反共大司令了，那是後話了。

我同俞銘璜、沈絮、顧梅等五個人離開了，晚上在海州響水鎮（現在是響水縣了）上火車，記得是個雪夜，已經天黑了，有月亮，照得雪野很亮。當時濟南已經失守了。火車很破爛，不是客車，是敞篷車，窗子也沒有，但是還有座位。另外有批人也上了車，我們坐在這個角落，他們坐在那個角落。冷得不得了。我們就唱歌。我們唱，那些人也唱；我們唱一個，他們也唱一個。後來就比賽唱，看哪個唱的多，救亡歌曲。這麼唱了七八個歌，他們就過來問，你們是什麼人？我們也問他們，他們是平津一些大學生，從平津流亡下來的，到濟南，濟南失守了，繞過濟南到了海州。談起抗戰，大家都志同道合嘛。俞銘璜當時比我們懂得更多一點，跟他們談得更深。他們問我們做什麼的，我們說我們到延安找共產黨——公開地講！他們說，你們幹嘛要到延安去找，共產黨到處都有。在火車上，他們就介紹俞銘璜參加了民先隊——共產黨的外圍，民主解放

先鋒隊。

（高伐林：為什麼只介紹他一個人參加？）

俞銘璜單獨與他們交談的。到了徐州我們兩撥人就住在一起了。他們那時是建立了黨組織還是聯繫上黨組織，我就不曉得了。

俞銘璜在徐州就加入了共產黨。

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蔣介石讓他管江蘇、安徽、山東這幾個省，他想把這幾個地盤全拿下來，就開始組織一個青年軍團，訓練幹部，當時大批流亡青年學生，還有些政府職員都在徐州，他就想招這些人。青年軍團等於是一個幹部訓練班，管青年軍團的是姓張的一個中將。

我的人黨介紹人蒲思澄是北大的，他說服我們，別去延安找黨，這兒就有黨，向我們做保證：你們的黨籍問題我們來解決。現在黨要你先做工作。

（高伐林：他們並不是到西北去？）

他們不去西北，沒有目的地，就是到後方宣傳。我們那個青年時代，說浪漫也很浪漫的呀，看你們這個年代的浪漫算什麼！那時候，民族危亡關頭，吃什麼苦都不在話下，獻生命也不在話下。置之度外！大家都意氣風發！

## 編入青年軍團為中共工作

我們就編入青年軍團，從隴海路轉到京漢路。那時日本人已經在那裡轟炸了，那個火車很難描寫：車頭車頂車尾到處都爬滿了

人，不堪設想啊。一聽到警報知道敵人飛機來了，車頭就開走了，把車廂丟下了，人被打到了就往下滾……慘不忍睹啊。到處是逃難的人，就這樣到信陽，住在一個大地主家裡，都睡稻草地鋪，發了軍裝，發了步槍，不給子彈。從信陽就步行到潢川——軍團的總部設在潢川。這一路經過好幾個縣，都是老蘇區，牆壁上“打倒蔣介石”的標語都還在呢。

青年軍團有女大隊，沈絮和顧梅她們編入女大隊，我們是男大隊。我編入四大隊，俞銘璜在另外的大隊。

（何頻：你們加入國民黨軍隊，是不是比較模糊、比較被動？）

不模糊、不被動，我們是有意參加的，是去做工作的。做什麼工作呢？一個是宣傳抗戰，一個是發展共產黨，我們先發展文藝青年。當時國共合作，國共兩黨合作的空氣非常濃厚，國民黨好像很贊成的樣子——從我們看來是這樣，上邊鬥爭我們不清楚。

（高伐林：這個時候你也已經是民先成員了？）

我到青年軍團已經是民先了。

（高伐林：是在徐州呢，還是在到信陽的路上？）

是到信陽以後。替黨工作了嘛。民先的身份在當時周圍人中沒有公開。

（高伐林：當時很明確知道民先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你目標很明確，就是爭取加入中共？）

對，就是要入黨啊。

當時八路軍已經有了武漢的辦事處，有了中共的報紙，登的消息我不能馬上看到，但是隔一個時期都知道。常能讀到中共的傳

單，有什麼主張都公布。我們的大隊長，是四川的一個少將旅長，他親自叫操：“立正！稍息！開步走！”從這一套開始，練瞄準、跑步，訓練很嚴格。抗戰初期物質條件很差，睡的稻草，沒有褥子，只蓋一床被子。但吃飯還可以，兩乾一稀。早上天不亮，一吹號就都起來了，晚上早早睡覺。

我還挨了大隊長一頓訓：有一次立正稍息不合規格，他要我出隊，二話不說，“跑步走！”一個人背槍跑步，跑了若干圈。

學校設政治課，除了講一般的抗日道理以外，主要是廣西桂系的一套自治理論，講李宗仁那一套。時常請來進步學者，有著名的，有一般的，有軍隊的，也有民間的，象匡亞明，後來做了南京大學校長，那個時候，我們認為他是個進步的著名經濟學者。校方不會教馬列主義，但我就自學、看書，這之前我在如皋時就接受了馬列主義。

一個大隊三個連，相當於一個營；培訓的就是基層幹部，等於一個軍校——不完全是軍事，他是政治軍事並重，培養將來軍隊和地方上的基層幹部，出來就可以當什麼區長縣長。兩黨的人都認為我很優秀，大隊長非常看重我。

（高伐林：這一階段對你世界觀形成很重要？）

基本上這段日子是個啟蒙階段，還談不上有什麼很深的了解，只是接受一些概念，比如說，階級鬥爭，要用暴力取得革命勝利，接受了這些概念。

我怎麼離開的呢？在潢川學了三、四個月，台兒莊會戰打了大勝仗，國民黨這時想組織一個徐州大會戰。那個時候“速勝論”抬

頭，認為在徐州組織一次大會戰，可以把日本人打敗，就調動各路大軍。第五戰區要組織一個“戰地宣慰團”，宣傳慰問，就在校園裡邊選出幾十人參加戰地宣慰團，我被選上了——是被國民黨選上的。

## 一下子就入了黨

（高伐林：您是在潢川受訓期間加入中共的？）

我去問蒲思澄和俞銘璜，我說他們國民黨挑選我去宣慰團，已經公佈了。他們也知道了，他們幾個沒被挑選上。我問，我去不去？他們說“你應該去呀”！我說，那我的黨籍問題怎麼辦呢？他們說，這個沒問題呀，我們兩個介紹你入黨，馬上就辦——很簡單吧？我告訴你們這些年輕人，我們那時候就這麼簡單，革命時期、抗戰時期、非常時期麼，不像後來，還要掛個旗子。我說，可是明天就要走啦呀，今天宣佈名單，明天就要出發，怎麼辦呢？他們說，沒有問題，我們給你寫個介紹信。他們就告訴我：你到了徐州，去找這個人——他的名字我現在記不得了——他會幫助你具體解決這個事。

我跟著宣慰團，就從後方到徐州戰地第一線了。我就找了這個人。這個人給了我一個共產黨章小冊子，我記得是在一個小學裡他給我的。他說，你自己一個人看，看完了還給我。我就拿了這個小冊子，找到一個沒人的地方讀了。上面主要是說入黨的條件。其

中一條，叫“為了黨的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現在黨章上有沒有這一條了？我們當時有這一條，我記得很清楚。我把小冊子還給他，當時沒有其它手續，就這樣認可我是黨員了。他說，我把你編在宣慰團的哪個黨小組裡，黨小組是誰負責，等等。

（高伐林：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也是秘密的？）

當然，沒有公開。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中共地下黨嘛。

到了徐州就這樣入了黨、編入黨小組了。但是黨小組一次會都沒開，負責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宣慰團沒有幾天就分散開到前線去了。當時日本人沒有正面進攻徐州，從魯東南那兒向海州、徐州以東這邊進攻。

國民黨腐敗到什麼程度呢？前方在打仗，後面的縣黨部、縣長、區長都找不到。我們這個第五戰區宣慰團，招牌很大，但找不到縣長、找不到區長，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難民往下跑，傷兵往下撤，都沒人管。我們宣慰團的領導也沒主意，忙不出個名堂來。我就寫了一篇戰地報道。那個時候，鄒韜奮在徐州搞了一個日報，報紙就登出來了。登出來後大概就引起第五戰區的人注意了，就責成地方趕緊行動，當地國民黨政權才稍微做了點工作。

沒有幾天，宣慰團組長忽然找到我，說是現在日本人已經包抄過來了，我們大軍已經突圍，撤了。所以宣慰團解散，讓我們各奔前程。我到了宣慰團、上了前線之後，潢川的青年軍團也分赴各地了，俞銘璜和我老伴顧逸萍他們那些人都回到江蘇，到了徐州南邊的一個縣，已經告訴我了，我們這邊一解散，我就決定去找他們。

## 什麼時候結的婚？

我到了那兒，跟老伴團聚了，但下一步怎麼辦？日本人若攻占了徐州，這個地方離徐州不遠，也就不安全了；再說，我是黨員了，我們還要找地方做工作嘛，我們不會逃難的。俞銘璜決定，回如皋。本來我們也想一起回如皋，可是當時我老伴是逃婚逃出來的，回去有這麼個問題。所以就決定，我同我老伴去找吳安順，吳安順同徐繼泰已經不和了，分裂了，他們也正在苦於不知下一步怎麼辦，我倆就去同他們匯合。與俞銘璜一起走到淮陰，在那裡同俞銘璜告別。

（高伐林：你跟顧梅到底算什麼時候結的婚呢？舉行過戰地婚禮嗎？）

哪有什麼婚禮，也沒有法律手續啊。我們也不是無法無天，但從家裡出去，兩人在一起，那就算結婚了嘛。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愛人”這個說法，沒有形式，只有內容，大家都承認她是我老婆，我是她丈夫。兩人生了八個孩子，老大是在灌雲生的。這個叫不叫革命浪漫主義？

當然，後來老伴還是回了家。幾年後，我到如西縣做縣委書記，當時地委機關都在如西。如西是個地主集中的地方，有些人家裡還有槍。我的丈人是大地主，家裡就有十幾條槍。我這個老伴，養孩子還得回家去養，因為我們經常轉移嘛。我也就去見了地主老丈人。不清楚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有天在百十多人的幹部大會上，地委書記批判我是“地主路線”。很嚴重啊！“地主路線”，“地主”成為“路線”還得了呀？我們當時都不曉得黨的鬥爭中“路線”



的分量不得了，所以地委書記批了我以後我也並沒感到嚴重，我感覺我沒有做錯什麼事呀。但是會後，我就調工作了，離開縣委，調到地委做農工部部長。

不過後來葉飛前來對這個“地主路線”問題做結論，我就感覺，批評好像又不那麼嚴重了！他是一直非常器重我的。

許家屯口述，何頻、高伐林採訪，高伐林執筆整理，《中國密報》雜誌

## 真假黨員從頭說

1969年，中共中央（筆者認為主要是周恩來）欲將筆者從“走資本主義死不改悔的當權派”隊伍中“解放”出來，當“革命幹部”。南京的紅衛兵“好派”，說筆者是“假黨員”，“國民黨的特務”，並提出一些所謂的根據，因而未獲“解放”；“屁派”紅衛兵，是支持革委會的。他們在省革委會的示意下，對此問題進行了調查。（南京造反派分成兩大派：“好派”，稱革命委員會“好得很”；“屁派”，稱革命委員會“好個屁”。兩派據此命名。）

“屁派”的主要成員是以南京大學學生為主的一大群學生，以及省級機關的一批幹部。他們花了近一年的時間，找到了筆者的入黨介紹人，使筆者1970年得到“解放”。“好派”同時也進行了調查，是否也是省革委會示意而行，就不得而知了。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好”、“屁”兩派造反派紅衛兵的主要頭目，都被“結合”進革委會為委員。這是江蘇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的策略，表示對兩派一視同仁，沒有“打一派，支一派”。

筆者家貧，在小學期間成績優秀，曾代表學校赴縣城如皋，參

加全縣小學生國語演講競賽，取得第三名。高小畢業後，無力跨進中學大門，長期失學，苦無出路，對家庭、社會滋生不滿。17歲投靠擔任如皋縣農民銀行行長的堂叔許五章，他為觀察孺子是否可教，留在他家，幫助叔母帶孩子，照顧一歲多的小堂弟。

筆者戰戰兢兢，獲得堂叔及叔母好感。堂叔介紹進了縣立的貧民工廠，當造紙徒工。那是手工造大便紙的粗活，既要擔水，又要踏碓，雖是苦活，但可維生，筆者一樣一樣都吃苦學會，獲得工廠官員好評。

工廠屬縣辦公立，負責的都是國民黨的官員。他們也看在堂叔份上，還未畢業，便介紹筆者去東台縣新辦的貧民工廠當造紙車間的技師。半年後因工廠經費無著，停辦，又回到如皋縣貧民工廠，任販賣部的職員。就在這期間，筆者開始向縣報屁股投稿，刊出後得以認識了春泥社的一幫文藝青年，他們把筆者當作工人作家、當作“春泥社的高爾基”，熱情幫助。筆者因而得以接觸普羅文藝理論文章、書籍，接著接觸共產主義理論著作，思想左傾起來。

當時正處國民黨幾次“圍剿赤匪”高潮時期，中共在上海及江蘇地區的組織破壞殆盡。如皋縣西鄉與泰興、泰州邊界農民，舉行武裝暴動，成立了紅14軍和蘇維埃邊區政權。張愛萍當時是紅14軍的指揮員之一，在進攻如皋縣一個地主莊園老虎莊時，因負傷未曾攻下。暴動不久即為國民黨撲滅。

幼年的記憶裡，如皋西門外的刑場上，槍斃了不少共產黨人，砍了不少共產黨“匪首”的頭，將頭掛在城門上示眾。說故事的大

人，還說被槍斃、砍頭的“共匪匪首”，被押赴刑場時，一路還高呼口號。幼小的心靈，聽後懼感已很少，還有一些佩服之情。

筆者思想上的日益“左傾”，引起堂叔的擔憂，他要筆者去如皋南鄉，離城二十多里的磨頭鎮，農行的辦事處當職員，讓筆者少與春泥社接觸。“雙十二”西安事變，全國抗戰高潮又起，筆者不甘寂寞，不時回城參加活動。堂叔擔心出事，主動找筆者談話：“在海邊上替你找個房子，到那裡去好好讀書。”

筆者不知哪裡來的膽量，竟不肯應命，而要求堂叔讓筆者回城做事。堂叔竟同意調筆者回城，在他分行裡當了一名文書，生活大大改善。

這時，在上海地下黨組織被國民黨破壞後，南通共產黨地下組織也遭破壞。在唐家閘紡織大生一廠當職員的共產黨員潘也如逃回如皋，參加了春泥社，又與上海殘存的共產黨員取得聯繫，在春泥社基礎上成立了“左翼作家小組”。

成立地點，在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馬光曾家中。馬光曾後來落伍、“掉隊”了。參加的有俞銘璜（後任中共江蘇省委、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吳安順（後改名吳健，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徐靜漁（後任如東縣某區區長），連筆者共六人。

潘也如宣佈成立小組，說明“宗旨”時，筆者當時情緒既興奮——真的找到共產黨了；又擔心：五叔（即堂叔）知道了，不知會出什麼事？剎那間，便找到了答案：“出事也無所謂，獨立自主嘛！”這一天就成了筆者人生的轉折點：與舊社會決裂，尋找新生活的起點。遺憾的是1936年的哪一天，怎麼想也記不清了。

左翼作家小組成立後，便開始了一些活動；經常作理論探討，時事評論，出版油印地下刊物。吸收文藝青年，擴大成員等，也作了一些幼稚的活動：夜間將土地廟裡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打碎於地，“破除迷信”。是時也，這一群正是“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毛澤東詞）的年華。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華北，“八一三”又將戰火燒到上海，全面抗戰開始。全國抗戰情緒空前高漲，戰區青年少數就地參與抗日活動；多數走向後方，這股浪潮中有逃難的，也有奔赴國難的。奔赴國難的又分別為奔赴國民黨大後方（這是多數）和奔赴延安的（這是少數左傾青年和人士）。

小城如皋雖離戰場尚遠，影響所及，左翼作家小組成員對國民黨在大敵當前仍不發動群眾起來抗戰，深為不滿。潘也如、俞銘璜倡議“組織抗日戰地救亡宣傳隊”，沿途宣傳抗日救亡，去延安找黨，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發動全民起來抗日。

筆者成了奔走籌組的積極分子，動機一方面是抗日、“找黨”、為國，也為自己找出路，另一方面與顧逸萍正在熱戀中。她是如皋近郊一個大地主家庭的小姐，不滿家庭為她訂的婚約，因投稿加入春泥文藝社，與筆者相戀。她的父母雖對筆者也有好感，但又堅持原婚約不改，筆者與她正處在兩難之際，一同出走，就成為完滿解決問題之道。

戰地救亡宣傳隊一共徵得十人參加，倡議者之一潘也如正與俞銘璜之姐戀愛，她生病在床，大家勸潘暫時留下而未同行。後來

他們直接去了延安。我們出發的那天，由吳安順先去離如皋四十多華里的海安僱船，決定沿通榆運河北去海州，再乘隴海路火車去西安，轉赴延安。因為筆者與顧逸萍係“私奔”（其他八人大都取得家庭同意），便雙雙乘人力車，先一天去了海安，在船上與大家會合。

十人中，八男兩女，另一女是俞銘璜的戀愛對象沈絮。兩對便在旅途中“結婚”，成為一路上大家戲謔的對象。十人中徐靜漁年長，公推他為“大哥”，其他按年齡排列。沈絮弟沈霧最小，成了“十弟”。臨時組成了一個“家庭”。徐靜漁既為大哥，就是“一家之長”，“家庭”一致通過：“眾弟妹一律服從，聽大哥指揮。”封建傳統（拜把兄弟）與現代民主結合組成了一個新式“家庭”，對這一“創造”，大家頗為得意。

時值隆冬，河枯水淺，船行不易，大家便上岸揩繃，除兩個女同胞外，分兩組輪流。揩時一路高歌抗日歌曲，居然滿身大汗，這是筆者一生中最羅曼蒂克的一段故事。

船行到阜寧，向北到海州，只有陸路可通。當即棄船上岸，步行到灌雲縣的響水口。（灌雲現已一分為二，響水現屬灌南縣），上岸後逢鎮便作抗日救亡宣傳，演“放下你的鞭子”，唱救亡歌曲，作抗日演說。在響水口亦然。

一位自稱從馮玉祥軍中下來的上校軍官名叫徐繼泰，找上門來自我介紹，他是主動要求回鄉，準備日寇侵犯時，組織家鄉父老抵抗日本鬼子。他正感缺少幫手，“你們有志抗日，可以和我合作”。

他介紹：他兄長是這裡的區長，有一支近百人的自衛隊，民間

槍枝也多，以他的關係，日寇來之前就可以組成一支抗戰隊伍。他並從日本國情、軍情分析起，分析到他在家鄉發動游擊戰爭的條件、前景。一席話使聽者都一時認為他是一個極有政治、軍事修養，熱情愛國的軍人。一群剛出茅廬的青年人感到沒有理由拒絕他的要求。雖沒有立刻同意，回到駐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對徐本人都沒有表示懷疑，主要不同意見是，出來目的，是去延安“找黨”的，留下就一時做不到了。

經過一番爭論，最後一致同意：不走了，留下打游擊。

俞銘璜觀察敏銳，他善寫雜文，文風酷似魯迅。留下約半月多，他發現徐繼泰思想上與大家差異太大，不是一條道上的人（海州淪陷後，徐繼泰成了當地國民黨堅決反共的游擊司令），爭取的可能不大，主張還是繼續前進。十人成為兩派，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決定，吳健等認為徐可“統戰”，決定留下爭取。俞銘璜說服不了他們，妥協說：“可以一試，成功了將來我們和你們會合，不成功，你們來找我們。”

那時，俞銘璜是筆者的“偶像”，因此兩對加上沈絮的弟弟沈霧等六人，成為繼續“找黨”派，吳健等四人便留下準備打游擊。

六人到海州，好容易爬上開往徐州的一輛火車。時值深夜，大雪之後，慘淡的月光下，遍地白茫茫一片。車廂經歷戰亂，窗戶上的玻璃多破碎掉落，車行中，寒風不斷襲人，六人只好高唱抗日歌曲驅寒。車廂另一角，在筆者們登車之前已有人坐在那裡。因防日寇空襲，火車熄燈行進，彼此都看不清。他們那一群聽到歌聲，也

唱起來。大家年少氣盛，先是唱和，發展到後來，成為比賽，看誰的歌多，唱個不休。直到天明，相見都是青年學生模樣，互道原委，才知對方是平津流亡學生。濟南失守，日寇沿津浦路南下，因而他們繞道魯南經海州去徐州。他們知道筆者們要去延安“找黨”，就說：“哪裡都有黨，何必去延安？”俞銘璜給他們的暗示打動了，相約到徐州後再商量。

和俞銘璜談話的那位平津流亡學生，就是後來和俞銘璜一起介紹筆者入黨的蒲思澄，是北京大學學生。俞銘璜和他接觸後不久，便經他介紹參加了共產黨。可能還要對筆者考察一段時候，介紹先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六人又給他們說服了，“留下工作”。

徐州已臨前線，蔣介石委令桂系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長官公署設在徐州。濟南淪陷敵手後，日寇沿津浦路南下，暫時被阻，中日雙方均在調兵遣將，準備再戰。八一三日寇侵犯淞滬，也暫時被阻。因之，北方諸省國民黨黨政機構人員，大中學校學生等南逃，徐州成了集散地。第五戰區長官公署又在此建署，一時徐州成了戰時重鎮，大街小巷，充滿軍民各色、各方人士，熱鬧非常，哪裡像是一個面臨大戰的城市。

筆者趁俞銘璜與平津流亡學生接觸空隙，也上街見識見識戰時重鎮景象，買些日用品補充。街上雖不時響起警報笛聲，行人卻很少在意，照常行走。街上維持秩序的多為憲兵，也不加阻止。竟有一派視戰亂如不見的雍容氣勢，使人增加了不少抗日勝利的信心。李宗仁為擴展勢力，成立“第五戰區青年軍團”，各地流亡學



生，青年結集徐州，李宗仁乘機吸收，準備經半年軍訓，成為他的基層骨幹。共產黨以北京流亡學生中的黨員為骨幹，在徐州也成立臨時組織。蒲思澄是這個組織中的成員。他通過俞銘璜動員筆者等說：“黨需要你們留下，到青年軍團去工作。”“你們的入黨問題，到那裡會解決。”這樣，又全部報名參加了第五戰區青年軍團，成了李宗仁部下的學員。

青年軍團決定到第五戰區管轄的後方河南潢川集訓。從徐州到潢川，先坐火車從徐州到鄭州，再轉京漢路到光山下車，行軍去潢川。在徐州到鄭州的列車上，塞滿了學員和逃難者，車廂裡擠得人疊人，要走動大小便都不能。車頭前的橫杠上、車頂上，都擠滿了人。難民拖家帶眷，老的小的，大包小包，沒吃少喝。車行中，不時有人不知因病還是凍僵從車頂上掉下去，轉眼間便不見了。一路有人哭喊，慘不忍睹。白天行車還不時傳來空襲警報，“車頭”便解離車廂，開出老遠，列車上也無人躲避，擔心車再開時擠不上來。幸好只聽警報響，日寇飛機一次也未臨頭。一幅戰時難民逃亡的淒慘景況，至今歷歷在目！青年軍團的學員，從光山下了火車，便列隊行軍到潢川。

潢川位於鄂豫皖三省邊界，有新舊兩城，分列在潢川河的兩岸。國共內戰期間，是赤白兩軍爭戰之地。城牆路邊，尚見雙方殘存標語。一邊是什麼“擁護蔣委員長”、“剿滅赤匪”，一邊是什麼“蘇維埃萬歲”、“打倒土豪劣紳”等等，字跡多已模糊，字體缺腿少腳，還有一句少掉幾個字的，但總還可以推想出是寫的什麼。青年軍團

的學員，政治上什麼觀點都有，有人看了一聲不響，有的看了便議論起來，甚至還引起爭執。筆者一行人從中勸阻：“國難當頭，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救亡，不要再打內戰了。”

青年軍團幾千人駐滿兩城，不僅占據了中、小學，廟宇等公共場所，城內不少大戶人家也成了臨時“校舍”。筆者編為第四大隊學兵。到了潢川，脫下便衣，換上軍裝，開始雖有些不自在，不久便習慣了。洋相出在綁腿上，怎樣綁都不及格，老是鬆鬆垮垮的，一直到離隊。睡的是稻草地鋪。一支老式步槍，有子彈帶，卻不給一粒子彈。每天出操，從立正稍息學起。

四大隊隊長是一位少將，據說是李宗仁的愛將，專門調來培養親信的。為人和藹可親，沒有官架子，“視兵如子”，和學員們合得來。遺憾的是記不起他的姓名了。教官很認真，一絲不苟。筆者兩次出操犯錯，被罰持槍跑步一小時。政治課講的是三民主義，抗日理論，還有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自治經驗。

政治教官中，李宗仁桂系的多，也有老蔣的人。思想左傾的也有，如翻譯《資本論》，後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匡亞明。四大隊的政治教官名胡灝，是江蘇灌雲人，和筆者認了“老鄉”。他為人直率，熱情，思想左傾。他一直不介紹自己的過去，後來知道，他原來加入過共產黨，又脫黨加入了國民黨。因筆者是四大隊的活躍分子，得胡灝賞識，便由師生成了朋友。他知道筆者還有朋友留在灌雲，相約畢業後一同回灌雲打游擊。

學習期間，台兒莊大會戰取得抗戰空前大勝。李宗仁亢奮過度，“速勝論”抬頭，調軍 40 萬餘，組織徐州大會戰，宣稱“三個月

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命令從青年軍團抽調學員，組成“戰地宣慰團”，提前畢業，去徐州戰地服務。團員規定40人，抽中筆者。校方公布名單後，筆者找蒲思澄徵求他的意見。

三個多月來，他交代筆者發展“民族解放先鋒隊”新隊員，傳達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的文件，及《新華日報》的消息，等等，筆者已知他是共產黨在青年軍團的負責人之一。他同意我應徵。筆者問他：“我的黨籍怎麼辦？”他隨即說：“我與俞銘璜已經商量過，我們兩人介紹你入黨。解決了（黨籍）再去！”筆者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交給他，一天後便通知筆者：“你的申請批准了，來不及舉行儀式了。你到徐州後找韓××，他會有交代。”

就這樣，筆者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員！

到徐州後立即找到蒲交代找的人，他給了一個油印小冊子：中國共產黨黨章，要筆者在兩個小時內讀完還給他。會見的地點在一個停了課的小學校裡，筆者拿到了這小冊子後，就在小學校的操場上反覆閱讀了多次。第二天，宣慰團又分成幾組，筆者分配到邳縣戰地組，立即出發。筆者無法找這位聯繫人，就此與他失去了聯繫。

時值日寇侵略軍正向臨沂一線國軍張自忠部進攻，張自忠頑強抗擊，日寇正面攻擊無效，向東延伸，企圖迂回突破，又為張自忠所阻。前方戰況激烈，補給、傷員等，均需後方支援，當地國民黨、縣黨政官員，多已逃散，宣慰小組找不到他們，連地方上鄉保長也很難找到，組長毫無辦法，只得讓組員們閒坐聽前方炮聲。筆者忍無可忍，寫了一篇“戰地見聞”，揭露、批評官員不顧國難，聞風逃跑，

不動員群眾支援前方抗戰將士的現象，呼籲戰區當局注意改善，在徐州《動員日報》刊出。

就在這時，日寇侵略軍部署合圍李宗仁準備進行徐州會戰的40幾萬大軍。李宗仁發覺後，緊急部署分散突圍。那天邳縣前線炮聲忽然停止，組長告訴組員們，部隊突圍，回不了徐州了，要大家“各奔前程”。這時筆者已知俞銘璜與顧逸萍因潢川青年軍團停辦，學員分配赴五戰區各地。他們選擇了回江蘇，已經徐州在睢寧待命。筆者便去睢寧找到他們。徐州淪陷在即，睢寧也不能久留，俞銘璜決定回如皋。因顧逸萍與筆者是“私奔”，不知道她父母持什麼態度，俞銘璜主張筆者與顧逸萍去灌雲，與吳健會合。筆者與共產黨的組織聯繫就此中斷了。

到灌雲與吳健等會合不久，胡灝也回到他家鄉。胡灝的大哥在灌雲縣城的板鋪區當區長，他動員筆者一千人到他那裡，一同抗戰。吳健等在響水，也遭到徐繼泰的冷遇，便一同去了板鋪。胡灝及他大哥熱情接待，將他家離板鋪不遠，一間停辦的油坊作住地，辦起《灌雲日報》。胡灝大哥又將筆者等介紹給灌雲縣縣長吳某認識，取得縣長支持，組織灌雲的抗日救國會、青年團、婦女會等群眾抗日救亡團體，進行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日寇占領徐州，但未東進。占領連雲港市區之敵，與東北軍繆徵流部隊相持於市郊的雲台山。日寇因兵力不足，很長時間沒有進攻，只每天派飛機到海州、板鋪等地轟炸。胡灝大哥與縣長明知筆者等左傾，大敵當前，仍支持筆者等的抗戰活動，這樣，板鋪成了海州地區抗戰救亡活動最活

躍的地區，吸引了當地抗日青年踴躍參加，團結了不少當地“老革命”，一起活動——蘇北徐州、淮陰、海州一帶，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活動的基地之一，後為蔣介石撲滅。許多與中共失去聯繫的脫黨黨員，抗戰起後又想“回到老家”，地方上稱這些人為“老革命”。

筆者當時活動範圍，擴展到漣水、海州、阜寧一帶，為準備發動抗日游擊戰爭，筆者還深入到“大刀會”的老巢阜寧，遊說其會首共同抗日。漣水、阜寧是蘇北極貧困地區，多為鹽鹼地，十分荒涼，民不聊生，“盜匪”活動頻繁。

那一帶太陽尚未落山，路上就少有行人。這時行路，可能遇劫，甚至連性命也難保。不僅地主富農築圍子（為防盜匪，都築有土圍，聚住圍內），有自衛槍，散居的農民也有置槍的。當時淮海地區，民間擁有槍枝不少於四、五千支。大刀會是土圍之外，私販鹽農民的自衛組織。他們信神靈，講義氣。為爭取他們參加抗日救亡，筆者孤身從灌雲到阜寧北鄉，做爭取工作。兩地相距百餘華里，騎自行車獨自行走，幾十里路見不到一人，多為蒿草不毛之地。

大刀會首領見了筆者，非常熱情，聽筆者介紹八路軍積極抗日情況，講八路軍是窮苦人民的隊伍，和他們大刀會的利益是一致的，希望大家能合作抗日。會首完全同意。遊說成功，便與其拜神結盟。這個會首統率會眾四、五千人。後來雖沒有派上用場，也增添了一份經歷。

在連雲港、海州與日軍對峙的是東北軍的繆徵流部。經朋友介紹，筆者見到了其屬下的唐君堯旅長。筆者已知東北軍中有共

產黨的地下組織，但不知哪幾位是共產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方知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是該軍地下共產黨的負責人。

唐君堯在西安事變時是奉張學良之命，活捉蔣介石的“英雄”，他抗日積極，思想左傾。他在駐地會見筆者等，詳細介紹當前敵情，對抗戰勝利甚具信心。他詢問當地抗日救亡團體活動情況，表示願意相互支持，合作抗日，他關心群眾疾苦，詳詢生活情況。他給人的印象，是一派儒將之風，不似一個曾經敢捉蔣委員長的英武軍人。他殷勤招待筆者們“吃便飯”，竟是饅頭、湯面，兩盤醬菜。食後親自送客出戶，沒有將筆者等視為青年後輩，獲得我的好感。此後取得他在抗日救亡事業上的支持。連雲港、灌雲、海州相繼淪陷後，他在撤離海州地區之際，贈送給當地抗戰青年組織的游擊隊機槍一挺，步槍數十支。隨即，這支游擊隊便在灌河邊伏擊日寇船隻，打了一個勝仗，打死打傷日軍十餘人，自己無一傷亡。

這支游擊隊是上海流亡宣傳隊隊員陳飛（不久病逝）、馮國柱（後任上海市政府某局長，文革中與“四人幫”結成一伙）和當地青年、“老革命”組成的，他們原來與筆者，一個在灌雲，一個在東海（即海州）相互呼應。因為他們與八路軍南進支隊先取得聯繫，因之“老革命”多靠近他們。海州、灌雲淪陷後，筆者這一伙也拿起槍，和區自衛隊一起組成了近百人的游擊隊。在陳飛等打了勝仗後，吳健等主張與他們合併行動。

這本是好主意，但筆者這支隊伍，是以胡灝的大哥的區自衛隊為基礎組織起來的，胡灝還一起行動。胡灝在某些“老革命”眼中

是“投機分子”，因之，胡灝是不會同他們會合的。胡灝不走，隊伍能帶走嗎？筆者知道，“老革命”們在陳飛他們與南進支隊取得聯繫後，紛紛走向他們，因為他們有了“八路軍”的關係，可以遂“回老家”的志願。因此提議：南進支隊在蘇皖邊區活動，離灌雲遠；八路軍過了隴海路即可找到，不如北越隴海，去找八路軍。一面解決筆者的“組織”問題，一面爭取他們南下，開展徐淮地區的游擊戰爭。主張獲得了大家的同意，胡灝也贊同，於是筆者便又孤身上路。

因日寇已占領海州，隴海鐵路成為南北間的封鎖線，日間很難通過，便於夜間偷越。走了兩天，連地圖也沒帶，只憑方向，邊走邊打探：哪裡有八路軍？果然，在閭縣大閭鎮找到了八路軍南進支隊的司令員鍾輝。

這位司令員看起來和筆者年齡差不多，農民模樣。知道筆者的來意後，他似乎已知底細，告訴筆者：“你的組織問題已去河南查過，找不到你的介紹人。我們可以先和你接上關係，或者重新介紹你入黨，待找到你的介紹人證明，再補‘黨齡’。八路軍南下問題，已有考慮，不過要等待時機。”

他要筆者先回灌雲，隨後派人來聯繫，又說：“據說新四軍已過了江，在泰州、揚州之間活動，如有可能，你最好代表我們去和他們取得聯繫。”筆者不願重新入黨，願意再等一下。因問題解決了，高興地答應了找新四軍取得聯繫的任務。那時沒經驗，竟沒有要求他們給一個委托書，或證明文件。

他熱情邀筆者共進午餐，吃的是一種搖著頭使力才啃得動的

山東大餅，名曰“鍋盔”，外加甜醬、大蔥。在魯南這算是高規格的招待了。

回到灌雲後又過了一個多月，鍾輝毫無動靜。游擊隊雖然拉起來了，地方勢力多依附灌雲縣長搞起來的隊伍，無法擴大。胡灝主張找國民黨關係，打開局面比較容易，八路軍來了再合併不遲。大家認為是個好主意。而且鍾輝還有交代去泰州、揚州地區找新四軍聯繫的任務。便同意南下去興化（國民黨江蘇省政府原駐省會鎮江，日寇侵占鎮江後，便移到江北興化），找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的民政廳長王公嶼。

王是蘇北沭陽人，也是潢川青年軍團的政治教官，胡灝和他有私交。胡灝要筆者以青年軍團學員名義去找他，活動他委胡灝一個職位，號召地方勢力，擴大游擊隊。筆者去了興化，找到王公嶼。王第一天見面聽筆者敘說，雖未表態，但很感興趣，第二天便不見面了。

等了幾天，仍未見覆。在筆者催促下，他要秘書轉告：“你先回去，廳長如有吩咐，再告訴你們！”看來活動無望。筆者便去泰州，找到俞銘璜，他已是中共蘇北工委的宣傳部長，在泰州西鄉吳家橋一帶活動。那裡是新四軍挺進縱隊的游擊根據地，方園不足百華里，是新四軍挺進蘇北的“橋頭堡”。

俞銘璜帶筆者見到了工委書記惠浴宇，他們動員筆者不必回灌雲了，留下工作。筆者不肯，說，“吳安順他們還在那裡，已搞起了游擊隊，我留下也對不起胡灝。特別是黨籍問題沒有解決，鍾輝



也答應替我解決，鍾輝還交代代表八路軍與新四軍聯絡的任務。”惠浴宇說：“胡灝嘛！我知道，不能相信他！”筆者頗為意外。惠又說：“你回來，黨籍我們替你解決。”

筆者堅持要回灌雲，但也未回絕留下工作的事，相約先回去，以後可再來。要求他們介紹筆者見挺進縱隊司令員管文蔚。挺進縱隊的副司令員葉飛當時已在吳家橋，化名聶×，是挺進縱隊的實際指揮者，筆者不知道，惠浴宇他們也未做介紹，便介紹筆者去揚中見了管文蔚，取得了聯繫。

回到灌雲，游擊隊已走的走，散的散了。原來王公嶼在聽了筆者敘述後，立即向仍在灌雲鄉間活動的縣長吳某打聽到，胡灝拉的游擊隊已經散了，這便是他打發筆者走路的原因。

在筆者南下後，陳飛便動員吳健，帶了一部分隊員與他們會合，他們已打出八路軍的旗號，叫八路軍淮海大隊。當地地主、富農出身的青年，不願參加八路軍，便回家了。原來的區自衛隊也不願去，拉出去自立了山頭。

筆者回來不到一個月，遭此變化，十分氣憤。胡灝安慰筆者：



許家屯去世後，新四軍黃橋戰役紀念館敬獻花牌。（高伐林攝）

“我們還可重來!”不贊同去淮海大隊與他們會合。筆者聽說八路軍已派人來到淮海大隊,可能是鍾輝司令員派的人,便說服胡灝,“去淮海大隊看看再說”,去海州地區找到了淮海大隊,見到八路軍派來的代表、特派員張彥(後任國務院外辦主任),他是中共蘇皖邊區特委的特派員。

他說他早就知道了筆者的情況,動員筆者留下,繼續在淮海地區工作。當時年少氣盛,既不滿他們乘人不在,拆散胡灝拉起的游擊隊,也不滿他們過早扯起八路軍旗幟,以至游擊隊遭當地反共勢力瓦解,使參加游擊隊的地富抗日子弟離開,淮海大隊因之也很難繼續在灌雲海州地區活動,不得不向西轉移到沐陽、宿遷一帶。筆者認為他們“左”,也風聞他們在批評筆者“右”。筆者估計與胡灝“重來”的可能已很少,決心南返與俞銘璜會合。要求張彥解決“組織”問題,同意筆者南下。張彥幾次動員未果,便要筆者去特委找特委書記金明(後任國務院財政部長):“你的要求去找他解決。”

時值盛暑。游擊隊走到哪裡便分到每戶居民家吃“派飯”。農民本已艱苦,還要供養游擊隊。多用地瓜乾(曬乾的紅薯)煮粥,最好的也僅是紅高粱做的餅,僅有的菜是青椒,切碎在鍋裡炒熟,油都沒有。這多是從農民口糧裡挖出來的,雖也是為支持游擊隊打鬼子,多數都是不得已勉強供應的。看到他們家徒四壁,存糧無幾,還要吃他們的飯,一家老小一臉無奈的情形,心中也很難過和無奈,更加仇恨侵略的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腐敗。游擊隊自身也很艱苦,每人除穿的衣服外,沒有換洗的第二件,大多數人都沒有被

子，有的連洗臉毛巾也沒有，更談不上牙刷牙膏了。

游擊隊才拉起來，還不懂得怎樣搞錢，因此根本說不上發津貼，多數人身上一文莫名。筆者當時已接近這一地步，相互戲謔，真成了“無產階級”了。從游擊隊活動地區，到蘇皖邊界有百餘華里。筆者頭戴竹笠帽，一身輕裝，白天遮體，夜當被，一條毛巾搭在肩上，隨交通員上路。（八路軍和游擊隊相互之間聯繫的人員叫交通員，中途落腳的住戶叫“交通站”。）

蘇皖特委時在蘇皖邊界的泗洪、泗縣一帶活動，地臨洪澤湖邊，正值洪水肆虐，遍地盡成澤國。找到了特委，正值安徽國民黨省政府主席廖磊因不滿蘇皖邊區的專員盛子瑾與八路軍合作，下令撤換盛，派人帶兵接替，八路軍支持盛，鬧起“摩擦”。部隊為尋找戰機，不斷移動。

金明見面了解來意後，一时无暇解決，要筆者隨軍行動。每天在水深及膝的泥濘中行軍，宿營時無法洗澡。日間行軍，頭頂烈陽，腳踩泥水，汗流多遍，頭兩天還感遍體難受，多天下來也就習慣了，到宿營地倒頭便睡。

有一天，宿營地僅七八戶人家，安排了首長的住地後，已無餘房，部隊只得在打谷場上露營，以天作幕，以地作床。筆者是“客人”，得到“優待”，分在打谷場上一個小土圈裡，天黑看不清，躬身入內，蜷曲睡下，第二天醒來，爬出一看，是一個豬圈。這一帶養豬和長江一帶不同，長江兩岸豬圈有糞池，積聚豬的糞尿用作肥料。淮海習慣用乾糞，豬可以到處跑，叫“散養”，豬便隨地拉糞。豬在圈內雖也拉糞撒尿，卻是乾的。睡了一夜，未聞糞臭，可見當時生

活習慣與豬的差距多麼接近了。

隨軍行軍十多天，“摩擦”仍未結束，金明抽空找筆者談話，同意恢復黨籍。因筆者堅持南回，金明說：“那裡不屬特委管轄範圍。”要筆者考慮仍回灌雲、海州工作。又過了幾天，金明似乎感覺無法挽留，便說：“你既然一定要回去，黨也需要開闢那裡的工作，就派你去如皋開闢工作。”遂了心願，當然高興，便一口同意。

金明寫了一個“委任書”：內容是：“委派許家屯同志為如皋縣工作委員會書記，開闢如皋、南通等地區黨的工作。”筆者帶了這一紙委任，回到灌雲和胡灝告別，會合顧逸萍一同回到泰州。從此再沒有見到胡灝。聽說八路軍三師黃克誠部隊到蘇北後，他去了國民黨的大後方，筆者常想念這位抗戰初期認識的朋友。

灌雲階段全憑一股熱情，橫衝直撞，初生牛犢不畏虎，根本沒有想過什麼叫苦，什麼叫生死，事情只要認為“對”，就一股勁努力實現。這一段，在與國民黨官員不斷接觸中，懂得了一些“統戰”知識和方法。拉起了一支小小的游擊隊，雖然沒打仗，也積累了一些經驗。辦報紙，組織群眾抗日救亡團體，以至做“大刀會”工作，都有所接觸，為筆者獨立自主工作打了基礎，這是正面收獲。負面是意識上滋生了“個人英雄主義”。

又在吳家橋見到惠浴宇、俞銘璜。惠浴宇看了金明的“委任書”，說：“我們派你去泰興當縣委書記，兼管如皋、靖江工作。”筆者說：“那怎麼行？我不好向金明交代。”惠說：“不要緊，有問題我們負責，沒你的事。”又說：“如皋歸我們管，金明管不到。泰興已有工委組織，你去後正式成立縣委。現在急需打開局面，你去我們

放心。”俞銘璜似乎避嫌，在一旁不發一言。筆者無奈地看著他求援，他一臉嚴肅，向筆者點點頭，催筆者同意。就這樣筆者接受了任務，“委任書”給惠浴宇留下了。

泰興乃為國民黨控制區，是“白區”。筆者在吳家橋閱讀了一些黨的文件，就與顧逸萍去了泰興城區，住進地下黨預先租好的住房，開始了地下泰興黨的工作。時為1939年冬。

“好派”造反派說筆者是“假黨員”，確屬“事出有因”，但“查無實據”——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感慨的是：筆者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50多年，歷經千辛萬苦，置生死於不顧，不想竟被“江李體制”的中共，開除出共產黨；但又想到，可以不與“六四”犯者為伍，便淡然了。

許家屯

## 文革中周恩來 向我交代任務

坊間有關周恩來著作不斷出版，觸發筆者對周恩來的回憶。

1954年，筆者從福建調回江蘇，任職南京市委書記，1956年調任省委書記處書記，開始接觸較多中央負責人。

第一次接觸周恩來，是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後不久，在上海錦江飯店街對面原法國的一個俱樂部，當時華東局召開華東地區的書記會議。

那一天在俱樂部舉行一個舞會，招待中央負責人。筆者將進入舞廳前，碰上華東局書記柯慶施與周恩來，柯當即向周介紹：“他叫許家屯，是你家鄉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恩來與筆者握手之際，笑著說：“我知道，我知道，毛主席不久前在常委表揚過你。”又詢問筆者：“你是哪個縣人？”筆者答：“如皋。”周回頭與柯慶施高興地說：“噢，我們還是小同鄉呢！”

當時，國際上繼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之後，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蘇聯和波蘭事件的教訓為：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是“矛盾消失了”，還

存在各種矛盾。“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失當，甚至會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當時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如罷工、請願等，南京市也發生中學生遊行到市政府請願。筆者當時是市委書記，和市長彭沖出面會見學生，平息了事件。毛澤東知道後，表揚了筆者和彭沖，認為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典型。

周恩來和藹親切的第一次接觸，使筆者至今難以忘懷。

與周恩來接觸最多的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時在1967年1月，南京紅衛兵強占開往北京去的列車，要去京請願，控訴省委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列車長不肯開車，相持了一晝夜。中央、國務院要省委派負責人去車站“說服”造反派不去北京，要省委負責解決紅衛兵提出的要求。

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指派筆者執行中央指示。這在當時，是明知無法解決的事，也只有從命。筆者隨即撿起牙刷、毛巾塞進軍大衣口袋中，與秘書、警衛員去了火車站與造反派見面。

一見面，果如所料，他們不容分說，便將筆者一人拉上了火車，挾令筆者下令開車，並將筆者一同帶往北京。到京後，紅衛兵多次帶筆者到中南海請願未獲接見。時值文革初期，造反派尚未將省委負責人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比較客氣；筆者除參加批判大會接受批判外，比在南京反而悠閒，日間與造反派“和平相處”，夜間與他們“打地鋪”，同居一室。

就在這時，上海發生所謂“一月風暴”，以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成立了上

海人民公社。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傳遞毛澤東的意見，認為“奪權”完全正確，並號召各地學習上海的經驗，“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裡，自下而上地奪權”。因為將市政府改為“人民公社”，涉及改變國家體制，毛澤東主張“叫革命委員會好”。這就是“革命委員會”的原由。

風吹到南京，造反派也起來“奪”省委的“權”，發生了“江蘇飯店事件”：因省委書記們聞風避開，找不到人，造反派上街遊行示威，在江蘇飯店碰到一位副省長，造反派要帶他走，公安廳長為保護這位副省長，強行將其護送出圍，而鬧出一個所謂“江蘇飯店反革命事件”。

造反派向中央文革告狀，中央找江渭清等也找不到，一時間，江蘇進入無政府狀態。

造反派到北京後，因屢次請願未獲中央接見，要筆者出面找中央負責人。他們把筆者送到中南海，見到譚震林，譚將中央文革給江蘇省委的電報拿給筆者看。

那是一篇對省委的“最後通牒”，充滿批判語言，說省委搞“反革命白色恐怖”，限期要省委作出“交待”。譚震林也向筆者打官腔說，江渭清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其他書記們也找不到。省委犯了錯誤，要進行檢討。

筆者知道他也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滿腹牢騷，他這樣說話，我理解是保護省委的，因為他並未認同中央文革指斥省委搞“反革命白色恐怖”，只說省委犯了錯誤，因而點頭表示同意。隨



即告訴他，造反派放筆者出來找中央的來意。譚表示，待中央研究後再說。筆者又被造反派帶回臨時駐地。

隔天的晚上，筆者和造反派已經睡了，周恩來派他的秘書找造反派，要他們放筆者出去，說：“中央有事要許某人辦理”。造反派先是不肯，後又同意派代表和筆者一起去中南海見周恩來。

周見面後，先讚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隨即提出要筆者出來辦事的要求。造反派說：“許某人不肯檢討，不能放人。”周說：“你們先放他出來，中央會要他向你們做檢討。”周還答應同他們繼續商量南京文化大革命的事。幾經糾纏，造反派才同意放筆者出來。

第二天，周找筆者去了他的辦公室，告訴筆者南京造反派要“奪”省委的“權”，但找不到江渭清等人，要筆者回南京“收拾局面”。

筆者對文革一樣“不理解”，當即答：“總理，我沒有本領完成這個任務。”周安撫說：“你可以在游泳中學游泳嘛！”筆者說：“還是請中央派人去的好。”周無奈地說：“中央哪裡派得出人啊！副總理只剩了一個譚老板！”筆者堅持說：“請春橋同志去嘛。”周先說，“春橋已去上海，”接著說：“那也好，南京的事就是上海的事，待春橋處理上海的事告一段落，再去南京。你先回去，我會叫春橋去的。”到此，我再無話可說，只能領命。周又說：“你再待幾天，南京造反派都有人在北京，我找他們做工作，再讓他們和你一同回南京。”

周恩來的辦公室在他住房西華廳的西側，面積約四、五十平方

米。西側一張特大的辦公桌上，文卷堆滿全桌，每堆約有半尺高，幾無空隙。筆者見周要秘書找一件公文，秘書翻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周便親自動手，沒有翻找便揀了出來，筆者看了，十分佩服他的細心和記憶力。

在辦公室的正中，還有一張長桌，上面什麼也沒有，只放著一本毛的語錄。桌的兩側各有兩張座椅，筆者就坐在這長桌一側，室內有四、五個電話，一張籐睡椅，據說周疲倦時，便在這椅子上休息一會，再起來工作。

在筆者方踏進他的辦公室時，周正在通電話，他示意要筆者坐下，繼續通話。原來他正與江青通話，說的是清華的造反派騙劉少奇夫婦，說他們的女兒病了，要見父母。周在電話上說：“他們不聽勸告，被騙去了清華，我已派人去做紅衛兵工作，讓他們回來。”他們通話約半個鐘點，說的就是劉少奇被騙去清華，被造反派批鬥的事。

通完話後，才同筆者談話，吩咐回南京的事，談話後還要筆者再等一等。不久便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匆匆到來，他們低聲商量了一會，周對他說，“請你就回去吧！”許點頭表示同意，又匆匆走了。後來方知道，許世友是周特地用專機接來，請他支持筆者回去工作的。並要他幫助中央找江渭清。

隨後，譚震林又來了，周與他談了一陣劉少奇被清華紅衛兵騙去批判的事後，便要譚和筆者一同去見南京的造反派。譚不肯去，說：“我不去，送去給他們鬥？”周恩來很生氣地說：“你們都不去，讓我一個人給纏死了算！”譚不再說什麼，一同走出辦公室，筆者見

他們兩人一臉無奈，更為憂鬱。果然，造反派見到譚，就要他交待“反革命罪行”，譚一言不發，還是周恩來打圓場說：“今天不談這事，今天討論江蘇省委的問題，”才解了圍。

南京造反派當時還沒有分裂，代表大約十餘人，分坐在一張長方桌兩側。周坐在桌的頂頭，譚坐在周的旁邊。筆者是“被告”，坐在桌的尾端。第一天的商談，造反派提出十多個條件。周對造反派真是平等相待，耐心聽取意見，不時做些筆記，一邊解釋，一邊相商；造反派總是堅持已見，談不出結果。從下午6點一直談到次晨6點，周宣佈：“明天再談，還是一樣的時間。”他宣稱的“明天”，實際是當天的下午。

下午同樣從6時開始，又到次晨6時。譚震林再沒有參加。中間一個秘書走來（商談時沒有秘書參加），要周去接電話。周離開後，一個造反派頭目，便坐到周的座位上，翻閱周的文件。約十分鐘左右，周與秘書回來了，只聽周對秘書說：“你們幫幫忙好不好，不要給我再添麻煩了。”看到造反派在他的座位上翻看文件，卻一聲不響容忍了。筆者感慨萬千：一個堂堂大國總理，都如此無奈，想到自己，就更不用談了。

以後四天，每天都同樣時間開始，同樣時間結束。白天周要處理大量事務，晚間還要為南京事件如此勞累，直到次晨五、六時，他一臉疲勞，似難以支持時，就要秘書給他一杯白酒，再繼續商談下去。看了實在說不清楚是怎樣的一種複雜情緒，和後來被造反派大會批鬥時一樣難受。

最後一天，周與造反派約法八章，要造反派回南京後，協助筆

者處理省委反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周恩來說服他們：“你們還年輕，經歷不多，將來會要你們接替他們，做領導工作的。”派了專機，將筆者和另一位也被造反派帶來北京的省委書記彭沖，及這批造反派，一同送回南京。

開始幾天，造反派還“協助”筆者處理一些事，三天後，南京各派造反派在南京大學與筆者開“聯席會議”，逼問筆者：“江渭清是不是走資派？要不要打倒？”反覆問了多次，筆者同樣答道：“揭批下來看，如果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當然要打倒。”造反派不滿筆者答覆，認為也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次日便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了幾萬人的大會，將筆者和省委、省政府幾個負責人，一起戴了“反革命走資派”的高帽子；胸前掛了寫著“打倒反革命走資派許家屯”並畫叉的牌子，帶到大會上“坐飛機”批判。會畢，又將筆者等拖上無篷卡車，隨著他們示威遊行，遊走了南京主要街道，再將筆者帶到南京大學關押。從此我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了屈辱、難堪的批鬥生涯。

文革前，和周恩來的接觸多是間接的。他在台上講話或主持會議，筆者是台下聽眾。周在50年代，因“反冒進”等連遭毛澤東的批評，周也曾多次在大會作檢討。一次中央召開的會議上，筆者親耳聽他檢討說：“我犯過反對主席的錯誤，主席對我的批評是正確的。”（當時中共黨內，稱毛澤東簡稱主席，對周簡稱總理）“我是主席的管家，沒有認真地領會主席的指示，沒有管好家。”倍增筆者對周的敬佩。中央黨內高級領導人，在大會佈置一般工作時，多次主動作檢討的，筆者印象中僅周一人。

周恩來事必躬親，考慮問題十分細致，記憶力驚人。筆者 60 年代初，參加了一次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周恩來在大會之外，還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召集地區和省、市負責人，會同中央有關部委，落實具體措施。筆者參加的是華東地區會議，周主持，他在與會者匯報工作時，經常插話、詢問，涉及數字時，非到他認為準確時不會停止，真似進考場一樣，絲毫不容半點馬虎，令人生畏。

周會外與人相處，卻平等相待，和藹可親。就在這次會議結束時，周和華東各省市負責人一齊從廬山來到南昌，在南昌賓館設宴答謝江西省在廬山會議期間的服務人員，包括廚師、招待人員，華東各省市負責人也參加了。席間，談到會議期間一些“趣聞”，說到哪些人喜歡打牌，哪些人逢舞會必到，柯慶施笑著指筆者說，“許家屯也是舞迷，每場必下。”引起鬨堂大笑。周卻笑著為筆者辯護：

“我看到了，他坐著看的次數不少。”又引起一陣鬨笑。席間，周不斷起身到各桌向所有人致謝敬酒。喝的是茅台，筆者興奮之餘，不覺大醉，先行退席。席散後，各省負責人都上了火車，獨缺筆者，著人趕回飯店找尋，筆者還醉倒在客房地板上酣睡。

文化大革命中，筆者“解放”後任省革委會副主任，赴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一次安排全國農業的會議。周恩來在大會上作報告，原是對農業生產作指示，忽然講到幹部問題，說：“在黨的歷屆運動中，能堅持原則，不為歷史所淘汰的，是黨的寶貴財富，他們是當前工作的希望。”這是他對參加會議的“解放”出來的幹部的很高褒揚和鼓舞。筆者聽了，由衷感到溫暖。

會議後來改到中南海開，只有各省市革委會負責人和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會議開始，周忽然問：“許家屯來了沒有？”筆者站起來回答：“總理，我來了。”他對筆者笑著點點頭，回首作工作指示。筆者激動得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這次會議適逢十一國慶節，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慶祝，筆者得到邀請去參加，被安排在主席台前一排的餐桌就坐。筆者推測這是周的安排。這一排，除中央負責人外，多是全國性的代表人士。因為筆者曾聽周講，會議或宴會的名次安排，是一門“學問”，而這些活動，又都是由他親自動手的。

筆者在文革中獲得較早“解放”，也與周的關懷有關。1970年，中央指名，要筆者與彭沖及江蘇兩派造反派代表赴京。時省革委會的主任是許世友，由他的一個副手，省革委會副主任率領。筆者與彭沖，在省革委會成立後，由革委會與造反派交涉，關押在革委會臨時設立的“牛棚”裡。一星期六天，三天被“好派”帶去批鬥；三天被“屁派”帶去批鬥，星期天“休息”。文革初期，由周恩來提出名單，毛澤東批准“保護”的一批中央及省的主要負責人，有江渭清在內，因此省委被“奪權”後不久，江渭清就由中央“保護”起來，離開南京，不知去向。其他幾位省委副書記，或因年老，或因支持造反派某派，批鬥的場次都很少。

唯獨筆者和彭沖，因較年輕，文革初期，受江渭清指派代表省委出面與造反派“周旋”，因而後來成為造反派批鬥的重點對象。兩人在大小場合，被批鬥都在二百場以上。這次獲得指名赴京，與會者都預測是中央要“解放”二人，筆者也同樣作此估計。筆者

在批鬥中，不知什麼原因，成為“好派”非要“打倒”的對象，因此到北京在中央未開會前，“好派”即造出筆者是“假黨員”、“國民黨特務”的輿論，並稱握有“證據”。

中央的會是在京西賓館禮堂開的。由周主持，江青等“四人幫”都坐在主席台上。會開始後，周先要江青“指示”，她發了半天的瘋，聲色俱厲地指名大批譚震林。張春橋等接著“指示”，因筆者對他們已有反感，他們的“指示”根本不想聽，現已記不起他們講些什麼

了。周最後講話，宣佈“解放”彭沖，要彭到台上就座。筆者便又被帶回南京，關入“牛棚”。彭沖旋即被中央委任為省革委會副主任。

筆者獲得“解放”，是幾個月以後，從“牛棚”轉到“五七幹校”。能進“五七幹校”學習的，多為省級機關的“走資派”和造反派。主持校務的是人民解放軍的“支左”部隊。與居“牛棚”時期不同的是，“走資派”和造反派，都是學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但“走資派”還免不了要接受批判。開批判會由校內的造反派主持，外面的



2016年7月10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的二兒子萬仲翔前來弔唁許家屯並慰問子女親屬。  
(高伐林攝)

造反派不讓參加。批鬥的次數也減少了，一個月僅一、兩次。筆者與 40 多個“同學”，同住一間 20 多平方米的農民畜養牛羊的茅草屋，一列的上下鋪，塞滿了一屋子。“同學”們表面很冷淡，保持距離，單獨接觸時，則問寒問暖，表示關心。勞動時主動不讓筆者搞重體力勞動。就這樣，筆者還是在下水田插秧時，受了感染，患了血吸蟲病。

在一次批鬥會上，“好派”與“屁派”發生爭執，“好派”竟稱：“不好好批鬥，不讓他認真改正錯誤，將來會影響江蘇的工作。”——他們無意間竟洩漏了一個“好”信息給筆者。批鬥會也不再喊“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與在“牛棚”時候“待遇”很不一樣。

獲得“解放”，也是在校內。兩派造反派批判了一番，由革委會的代表宣佈：筆者的入黨介紹人已經找到，證明筆者不是“假黨員”、“國民黨特務”，是革命幹部。“解放”、“結合”，即被委派去洪澤湖畔，任“入江水道”，一個大型水利工程的副總指揮。總指揮由一位團級軍代表掛名，但人不到任，實際工作由筆者負責。在“五七幹校”前後半年多，看來是省革委會刻意安排的。後來，有曾任省辦公廳秘書的一位“屁派”造反派“頭頭”私下告知，這一切確屬省革委會的安排，據說，是筆者在北京沒有獲得“解放”後，周恩來吩咐許世友這樣做的。

周恩來逝世那年，筆者已獲中央委任為省革委會副主任，在京西賓館，參加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周身患癌症，高幹中已較普遍知道，是周文革中過於積勞所致。筆者屢次赴京，都想去看



看他，又無由提出。

他逝世的當天，筆者在晚間 11 點左右，由一位計委副主任私下告知，筆者偷偷地流了一陣淚。會議旋即宣佈終止，在回南京之前，北京市民已在天安門廣場，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獻花，並在紀念碑周圍一圈樹木繫上細繩，在繩上掛上白色紙花，以示悼念。

筆者兩次悄悄地去了廣場，在場邊憑弔，並在肩上纏了黑紗。“天安門事件”後，仍不願拿下，後經一個幹部勸說，才拿掉。

不久，南京發生大學生舉花圈遊行全城，到雨花台舉行紀念周逝世的集會，呼出“打倒張春橋”的口號；繼而北京出現了天安門事件。為此，彭沖被招到北京，受到江青等的批評。時許世友已調離南京，彭沖接任省革委會主任，筆者成了彭沖的主要助手。周恩來的喪禮，中央通知革委會的主任彭沖和筆者，作為周的家鄉代表參加。那天先在北京醫院的太平間，瞻仰周的遺體。狹小的太平間，使瞻仰者只能在外排隊，等候入內。

筆者見中央竟如此對待周恩來，不平之感，忿然而生。隨即乘車送周遺體至八寶山火化。靈車出北京醫院，見到北京市民、機關人員，沿大街直到八寶山，兩側站滿送靈人群，心中大為寬慰，感到公道自在人心。——後媒體報稱有“十萬人”，筆者認為報少了，聯繫到對周喪禮的簡陋，都可能是“四人幫”的主張。

周恩來逝世前遺言不保留骨灰，將骨灰灑在祖國山河間。顯示其智慧與對人民的愛心。

許家屯

## 防止“四人幫”餘黨 兵變的佈署

1976年10月6日是個難忘的日子。筆者當時是江蘇省革委會的副主任，正在蘇北鹽城視察工作。晚間11時許，接到南京省革委會電報，要我連夜趕回南京，次日中午北京有專機來接，去北京開會。

鹽城離南京約400多公里，公路不太好走。為了趕路，開了兩輛房車，三個駕駛員，防止一人開車久了打瞌睡，走了七、八個小時，次日近午到南京。

中央指定革委會主任彭沖和筆者二人去開會，與彭沖見了面，他也不知道開什麼會，這麼急。下午2時左右，專機到了。知其先已去過杭州、上海接人。登機後，見有上海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周傳麟，杭州方面則是浙江省革委會兩個負責人。筆者跟彭沖私下交換看法：怎麼都是“老家伙”，沒有“造反派”？

5時左右抵達京西賓館。才進了房，中央辦公廳便來人，要筆者和彭沖到中央開會。馬天水等則未同行。車出京西賓館，不

向東去中南海，卻西駛西山。出了市區，幾乎是十步一哨，感到很不尋常。到玉泉山別墅下車，仍不知出了什麼事。

進入客廳坐下後，並無人接待。幾分鐘內，見人來人往忙個不停，其中包括紀登奎、耿飆等，他們手裡拿著什麼文件，只匆忙跟我們打個招呼，也無言語，益增神秘。

李先念、汪東興出來了，只握手問“來了？”就坐下。接著華國鋒出來，含笑握手，也是“你們來了？”就坐下。最後，葉劍英含笑出場，大家起座相迎。華國鋒這才開口：“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已被中央依法逮捕了。”他不等我們表態，接著就說：“你們來，是領受任務。”他於是面向葉劍英：“請葉帥指示吧。”

葉興高采烈而又慢條斯理地說：“昨天中央將四人幫逮捕了，你們高興吧！這將是全國人民聽了都高興的。”彭沖和筆者都含笑點頭，表示贊同。

葉又說，請你們來，是為了防止“四人幫”在上海的那幫人，他們已經在上海發放武器給造反派，有可能興師到北京來鬧事。中央已令南京軍區調軍隊去上海周邊戒備，並要鐵道部控制了鐵路。為了防止他們乘汽車北犯，你們江蘇要組織地方武裝和民兵，沿上海週邊禁戒，阻止他們。

葉並說：“馬天水也和你們一起來了，等一會找他做工作，要他顧大體，勸上海那幫人服從中央的決定。”

華國鋒要我們明天便趕回南京，執行葉的指示。

我們回到京西賓館，馬天水等始去同樣地點。晚飯後知道，中央決定他留在北京，要他在電話中召徐景賢、王秀珍來北京“開會”。

上海的“四人幫”餘黨的垂死掙扎未成氣候，就為北京瓦解了，我們在江蘇的防阻活動算是白忙了一陣子。

許家屯

## 崇拜華國鋒的“池魚之災”

1978年初，華國鋒訪日歸來，經上海，江蘇蘇州、無錫，後到南京視察工作。

筆者時為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為陪同華視察，先去上海等候，陪華一同乘汽車到蘇、錫。於是親眼看到華在上海視察寶鋼時，群眾熱烈歡迎，把華國鋒和上海市委負責人同乘的麵包車，擁擠得抬起來，幾乎翻了的危險情況。

華國鋒在南京參觀視察時，要乘火車回北京。他下榻的賓館在中山陵，火車站在下關，行程幾乎穿過大半個南京城。為防止類似上海情況再度出現，公安局沿途佈崗，不料卻恰好告訴市民，華國鋒要走這一條路線。

時值粉碎“四人幫”後僅一年多，中央宣傳部門在全國大搞擁護“英明領袖”活動，在華經過時，形成夾道歡迎之勢，華向街道兩側頻頻招手，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筆者對此雖出乎意外，但也未曾感到有何不妥。

半個月後，中共中央來了指示：江蘇省委在“華主席視察南京時，不當地搞全城夾道歡迎，違背了中央不搞個人崇拜的指示，要

認真檢討”。中央為此事作專門指示，說明“錯誤的嚴重性”，筆者先在常委會上做了初步檢討，及時表示接受批評，先據此寫了書面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待後再進一步作檢討。

省委常委中包括省長在內的幾個資深常委，正從日本訪問歸來到蘇州休息，筆者請省委副書記胡宏親自去蘇州向他們報告。這幾位常委中有一位是筆者的“反對派”，料他可能會藉機大做文章，不會輕易放過此事。

不久，中央開會，筆者去北京與會。會中胡耀邦召見，筆者估計是談關於華國鋒在南京的事，不等胡耀邦開口，筆者先表態：已上報書面檢討外，還擬作進一步檢查。哪知胡耀邦竟說：“不用了，你的檢討已作了，以後是中央的事了。”

筆者才覺悟，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他們中央鬧爭鬥，殃及池魚。筆者向胡抱怨說：“你說不用了，我們那裡還有人會不放手呢！”胡知道省裡的矛盾所在，說：“不要緊，你相信群眾嘛！”

筆者報告胡，不久將召開全省縣委書記會議布置夏收工作，準備順便在會上對此作檢討，屆時估計這名省長仍會抓住不放。胡聽後表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你打電話給我，會替你作主。”

後來，果然被抓住不放，筆者為此做了五次檢查，仍不得“過關”。這名省長多次親自到各地、市小組做動員揭批筆者“錯誤”，遭到大多與會者的抵制。他不甘就此罷休，要搬“援兵”，擴大與會者，要省裡處以上幹部都參加會。

當時，市、地、縣書記對筆者都比較滿意，特別是筆者權力下放之舉，甚受歡迎，因而對筆者挨批判多採抵制態度；而省級機關

相當多幹部因此有意見，如擴及省裡處級以上幹部，將會有上千人以上與會，這些人也較易被動員，會議還會糾纏下去。筆者當即打電話給胡耀邦，胡果然立即打電話給這名省長，要他立即結束會議，理由是“夏收在即，不要誤了農時”，這省長有了“面子”，也只好就此收場。

中共在十五大前後，動員全國擁護江“核心”，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稱江“核心”為執行鄧總設計師的總工程師，要求全黨全軍全國都擁護黨中央的“核心”江澤民。在十五大召開前，播出大型記錄影片《鄧小平》，在反映鄧小平改革開放過程的畫面中，竟沒有一次出現鄧小平搞改革開放的“左右手”，實際是這項政策創始人之一的胡耀邦、趙紫陽的鏡頭，而當時還遠離權力中心的江澤民卻頻頻出鏡。人們看後，自然明瞭影片看似宣傳鄧小平，實是吹捧江“核心”。

在紀念紅軍長征 60 週年的晚會上，將江澤民的巨大畫像與毛澤東、鄧小平的畫像同列。最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印發行的《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書，參與全國掀起的學習“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報告的“熱潮”，更明顯地將“江核心”提升到與毛澤東、鄧小平並列的地位。中共對“江核心”個人權威的大樹特樹活動，正方興未艾。

可是，正是“江核心”極力尊崇的鄧小平理論，是反對宣傳個人的。

就在筆者為華國鋒的個人崇拜遭“池魚之災”之後，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不掛領導人像的決

定”，指示中包括領導人不允題詞等具體規定。這都是在鄧小平復出後，反對個人崇拜，改革黨和國家體制的產品。

當時宣傳華國鋒是“不愧為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不愧為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要人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中共今日擁護“江核心”，搞宣傳個人的口號，有什麼兩樣？“江核心”又為什麼不按鄧小平理論行事？！

許家屯



## 像周恩來那樣迴避故里

蘇秦六國封相，榮歸故里，人們空巷相迎，一向瞧不起他的嫂子也負疚出迎。人生至此，一大快事也。

中國歷朝也有做官須迴避故里的，但那是對小官的限制。例如，周恩來的祖父要當三河縣知事，三河縣即淮安縣，他就申報祖籍是浙江紹興縣，其實他家早就遷居淮安縣了。這一“官事”延伸至周恩來當上了共和國總理，江蘇引周是江蘇人，浙江則引周為浙江人，爭相引以為榮。雖然沒有鬧上公堂打官司，可也曾糾纏了一陣。現在周恩來的紀念館則建在淮安。

筆者一九五六年起從福建調回江蘇，一直在省裡工作，直到周恩來去世，記憶裡周恩來一次也沒有來過江蘇。浙江他倒經常去，就是江蘇沒來過，遑論回他故里淮陰了。他的迴避，真是很到頂了。

迴避故里，周恩來堪稱表率。筆者在江蘇工作了幾十年，開始因戰爭無法回故里如皋的李堡鎮看看（現在劃歸海安縣轄，筆者實際已是海安縣人了）。只有一次，因作戰行軍，經過離李堡幾里的外面，只能遙望，因鎮裡駐著將介石的軍隊。一九四六年回省工作

後，也因周恩來的影響，迴避故里，有十多年之久沒有回去。後來因分管農業，一次經過時，沒有驚動鎮上任何人，停車在故居，找老鄉聊天。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那些老鄉一個也不認識了，只當筆者是省裡下來路過的“首長”——因為座車是“皇冠”，地、縣負責人用不上。

筆者的老家原是一個叫東嶽廟的廟產，在廟的隔壁，屋前有兩棵銀杏樹。幼年的印象，兩棵樹高大，枝葉茂盛，但不結果。筆者找來找去，廟看不見了，銀杏樹也看不見了。以為找錯門，但按記憶衡量，似乎沒錯。問老鄉後，方知道因興修水利，開挖了一條幾十里的河道，那廟和筆者的故居正在河道的中線，都拆掉了。

但老鄉還知道，拆掉的這屋子出了個“首長”，他不知道便是筆者，還發了些牢騷：“做了那麼大的官，也不回來看看！”筆者不敢再問下去，怕他提出什麼要求，不好辦。

看到一篇回憶周恩來的文章，才知道周當總理後到過一次南京，也回過一次淮陰。那是在筆者回江蘇工作之前，周到南京公幹，天晚後秘密乘車回淮安，天亮之前又趕回南京。南京距淮安有二百多公里，當時公路路面很差，一夜趕個來回是很辛苦的。周在淮安有個叔母，是她從小將周帶大的，周視之如親母。還有兩個侄兒。周一直沒有將他們帶去北京，也不讓地方對他們給什麼特殊照顧，一直要他們“自力更生”，但他也經常寄錢給他們。據回憶說，那次周回去，是開“家庭會議”，說服叔母等響應政府號召，將祖墳深埋，以擴大農田耕種面積的。

“大躍進”期間，淮陰地委書記奉召到北京參加中央的會議，

他知道周恩來喜歡吃家鄉的特產，特地帶了一些去北京，通過國務院秘書處送給周恩來。今天送進去，明天周就將這個書記招去，非常客氣，問他淮陰專區的情況，從農業生產問到農民生活。最後，周向這位書記說到送特產的事，先謝謝他們的關心，知道他小時的嗜好，他現在北京也有得吃，因為他的廚師會做。然後叫秘書拿來國務院的不許幹部接受任何禮品的規定的文件，問這位書記看過沒有，而後將禮品退還。整個談話過程，周都是面帶親切慈容的。最後親自送這位書記到客堂門口。

許家屯

## 中國兩大亨： 王光英和榮毅仁

“大亨”，既不是舊式的財主，也不是現代意義的大資產階級，可是又兼而有之。這種人是中國這個特定社會在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所以“大亨”二字傳神得很。

中國近年來，南北二大亨最為顯赫。北有王光英，南推榮毅仁。南北既別，作風亦有異。

王光英到香港搞“光大實業”，最後灰頭土臉，此中原因很多，主要在於同國內來的幹部鬧翻了。初創之際，他從國內要了不少幹部，他最熟悉的是天津，尤其是天津統戰部的幹部，任由他點將。

但這些由他自己挑選來的得力幹部，來港後他竟無法好好合作，要一切都聽他的，稍有不同意見，他不僅是一般的批評，有時甚至把大陸文革中那套批判、聲討之類全用上了。結果不是搞翻了個別人員，而是跟他原來自以為很好的也翻了。最後公司改組，他也回去了。

榮毅仁作風不同。畢竟是無錫麵粉大王、棉紗大王之後，得剛柔兼濟之妙。他辦中信，國家派給他的幹部，他自己要來的幹部，

一律都很尊重，物質上滿足，禮貌上周全。

中信要到香港設分公司之前，榮毅仁徵求我意見，我當然很贊成。他遂敦請了重量級人物，原冶金部長唐克來當董事長，他兒子榮智健任總經理。

唐克初來時跟我見面，極為興奮，表示要大幹一番。但不久之後再見面竟意志消沉，細加詢問，才知榮家父子對他都很好，安排的房子車子都是第一流，可是業務上向他封鎖消息，什麼情況都不讓他了解，充其量有些重大事件在決定後知會他一聲，如此而已。

既然不能有所作為，不久他就打道回府了。

萬里的二兒子也在此公司，人很老實，也很正派，但也一樣的被奉為上賓而遭冷凍，最後也脫離了。

許家屯

## “新聞界霸主”胡喬木 其實是政客

胡績偉在他《從華國峰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中，對他的老上司胡喬木，稱之為“新聞界的霸主”，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揭露了這位中共“左王”的面目。

胡喬木長期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為毛澤東草撰講稿、整理講稿，是中共的理論權威。他是江蘇鹽城人，與喬冠華同稱“鹽城二喬”，鹽城人引為驕傲；鹽城人在他死後，為之開建紀念館。筆者對他卻沒有好感。

和胡喬木認識，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在中央的會議上，彼此見面，只是點點頭，從未交談。他那種高傲的理論權威的樣子，使人望而生畏，不願高攀。

華國鋒搞兩個“凡是”，胡耀邦發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筆者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該文是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所作，發表之後，與後來羅瑞卿在《解放軍報》上呼應的文章，筆者都很讚賞。

有些省委當時在報上公開著文表態，響應。省內也有人向筆

者建議，寫文章響應，筆者不以為然：對一篇理論性的文章，為何要作政治表態？

當時，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層發動的反華國鋒行動，已經傳播較廣，筆者卻還蒙在鼓裡，一心鑽在省裡的工作裡。省委幾個秘書，他們可能聽到什麼消息，但又不便向筆者透露，都很著急，他們只說已有好多省表態了，一再建議，筆者才同意要他們擬稿，以筆者署名發表。後來才聽說，北京有傳說，江蘇、上海對這場運動不積極。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會上陳雲帶領提意見，要鄧小平出來工作，華國鋒很被動，筆者這時雖已知道中央有鬥爭，但並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會上要討論農業問題，成立了一個小組，為大會擬農業方面的文稿，筆者和胡喬木都被指定為這個小組的成員。

在開會期間，筆者介紹了江蘇採取集體所有制，以農業為基礎，發展社、隊企業，從事多種經營的經驗，與當時北京正在進行的鬥爭顯然不相吻合，胡喬木便很嚴肅地批評：“怪道有人說你屯兵不前。”筆者不懂他說話的意思，聽了未予理睬。好久以後，才知他所指“屯兵不前”，指筆者在鄧小平、華國鋒爭奪權力鬥爭中，置身事外的態度。

到香港後，與胡喬木有幾次接觸。他那時主管宣傳工作。港澳工委為加強在香港的宣傳工作，準備辦一個理論刊物。宣傳部長楊奇建議，刊物要爭取香港讀者，最好“吃小灶”：中央、國務院有關政策決定，在公開發表前，能給這個刊物先發表。

筆者也認為是一個好主意，專門為此事去北京向胡耀邦、胡啟立提出，他們都表同意。胡耀邦還指示，中共中央有什麼文件要發表，由胡啟立辦理；國務院的文件，也請胡啟立和李鵬聯繫。筆者便回港籌備。過了幾個月，卻不見落實。

筆者去北京開會，催問胡啟立，他要筆者找胡喬木商量。那天約好時間，會見了胡喬木、鄧力群，他們勸說筆者放棄辦刊物的打算，說：“你要辦個刊物，困難很大，‘吃小灶’也難，太敏感，搞不好，很不討好，麻煩可能很多。我們的意見，還是不辦為妥。”

他們似乎從關心出發，擔心工委會出錯，筆者只得同意，放棄不辦。想不通他們是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為何竟不支持向港澳同胞宣傳中共的政策、方針，減少人們對中共的疑慮。

《鏡報》月刊發表了王若水關於“人道主義”的文章，時王若水已在反“精神污染”鬥爭中成為被批判對象。文章發表後，中宣部向工委宣傳部打來電話，傳達胡喬木的指示，要工委宣傳部調查《鏡報》怎樣得到王若水文章的。

工委宣傳部長問筆者怎麼處理。事情很清楚：《鏡報》的徐老闆徐四民，是高級統戰對象，向他調查，不僅不會得到回答，反而會弄巧成拙。筆者主張不要調查了，也不必馬上給中宣部回話。後來中宣部雖有過催問，以查不清推托了事。

就在胡喬木、鄧力群說服筆者不辦刊物那次，他們還向筆者查問香港《爭鳴》、《九十年代》等雜誌，刊出大陸的“那些消息，是怎麼來的”？筆者回答他們：“不知道。”事實也是如此，確實我不知道。



不久中央批准中宣部成立一個專案小組，由胡喬木負責，包括公安部、安全部及筆者為小組成員，負責清查兩個“反動刊物”如何從大陸“獲取情報”的。胡喬木是這個小組的召集人。筆者只是參加了第一次的會議，會上公安部匯報了一件事：《爭鳴》在北京的一個“記者”，進羅湖海關時帶了一批電器，被海關扣留。這批電器上，每件都貼有收件人的姓名，海關人員作為走私物品，沒收後都扯毀了，失去了一次偵查的機會。胡喬木聽了後，很不滿海關人員所為，吩咐公安部，要海關接受教訓，“不能再犯錯誤”。

胡喬木在筆者腦裡，原是個不易理解的人。他在鄧小平後復出，儼然是鄧陣營反“左”的“主帥”，但同時又傳他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中，揭批過鄧小平。他在反鄧鬥爭中，列舉鄧小平反毛澤東、反文革的十多條“罪狀”，也是這次從胡績偉文中方知的事。不知他後來怎樣又取得鄧小平的諒解，成了鄧小平的“大秘書”；“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鬥爭中，又成為健將。他這樣“左”“右”逢源，實難理解。閱讀了胡績偉和王若水兩位的文章後，才恍然大悟，原來胡喬木那副深不可測的理論權威面貌，只是他的表面，私下卻是個不擇手段，追求個人名利的政客。

許家屯

##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前車之鑒

明鏡出版社贈送原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先生所著《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原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王若水先生著《胡耀邦下台的背景》兩書。筆者接到後，不能釋手，一日夜讀完，思潮翻滾，無法成眠，遂草此文。

胡績偉、王若水均為中共資深高級幹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中共“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一為提出“人民性高於黨性”論點；一為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都成了被整肅的重點“典型”。他們的這兩部書，以親身經歷，翔實的史料，詳述了在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復出，總結批評了毛澤東極“左”路線之後，又“借屍還魂”，重返極“左”路線的始末。

他們的回憶文章，雖然只揭露了鄧小平極“左”路線的部分側面，卻是主要的側面。可以看清楚鄧小平怎樣在政治路線上，從糾“左”，又回到了“左”傾路線的軌跡；看到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後，為中共的改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因不為中共黨內的保守勢力所容，終遭排斥的背景。

胡績偉文章的重點，是以揭露被他稱為“新聞界霸主”，世稱“左王”的胡喬木展開的。兩文也較多涉及另一號稱“左王”的鄧力群。從兩文中看出，胡喬木是“霸主”，他又是發動這場運動的“白衣秀才王倫”（運動的另一受害者，周揚夫人蘇靈揚語），鬥爭的總目標，是推翻在改革開放中建立豐功偉績的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勢力。

運動主帥，文中指明是鄧小平。胡文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說起，稱“四項基本原則”（即“四個堅持”）是林彪在文革中一次講話中提出的“四個念念不忘”的翻版——“四個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又稱：四個堅持是“四根棍子，以此來發動政治運動，來打擊那些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好同志”。四個堅持，“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大會上，代表中央作的報告中提出來的”。“當時一些同志認為，就是要用這作為棍子來打擊堅持真理標準的同志，把中央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反右為主的方針”。“好心的同志認為：起草講稿的同志提出來，小平同志沒有注意，是上了當！”但胡認為：“不能這樣說。英明的鄧小平同志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可能馬馬虎虎，不可能不注意，不可能像一般大官僚主義者那樣，只是唸唸稿子。”

胡績偉沒有寫鄧小平這篇講話稿是誰起草的。筆者的記憶，就是“霸主”胡喬木。因務虛會議第一階段中，與會者思想解放，批判毛澤東極“左”路線，胡喬木認為過頭了，為鄧起草的講稿中才出現了“四個堅持”，使會議從反極“左”轉而反“右”，“借屍還

魂”，又搞極“左”。

胡喬木不僅為鄧起草講稿，也曾是毛澤東的“大秀才”，為毛澤東起草講稿，整理講稿。胡文以較大篇幅，敘述胡喬木如何在編輯“毛選”五卷時，“篡改”毛澤東著作，“以他極左思想的尺度來取捨、刪節和修改五卷的文稿把主席反左為主的精神篡改為反右為主的精神”。

胡績偉列舉了較多的例證，說明胡喬木如何“篡改”毛澤東的論述。因為胡績偉參加了編輯毛選五卷的工作，看到了毛講話的原始記錄，故對胡喬木的“篡改”知之甚詳。這些故事，筆者也是讀了胡績偉著作才知道的。舉兩例以見其大概：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原稿中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是一個新問題。”“社會主義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矛盾是存在，基本矛盾就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胡績偉指出，胡喬木把前一段完全刪去了，後一段只留下“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偏偏把緊接著的“這些矛盾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這一關鍵性的話刪去了，而且把為什麼“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理由也全刪去了。至於那篇文章中那段畫龍點睛的關鍵話：“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鬥爭基本結束了，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主席在講話中完全沒有說，記錄稿中也沒有，是修改中新增加的。胡績偉認為：“這一加，表明在社會主義社會



許家屯家“讀報角”的茶几上堆滿正在看的書報。(高伐林攝)

中，‘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重點也就變了。”

毛澤東在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原記錄稿說，“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長越好。七鬧八鬧是要鬧出名堂來的，可以弄清是非。不管怎樣鬧，不要怕，越怕鬼越來。但也不要開槍，什麼時候開槍都是不好的”。可是在改成文章時，又偏偏將這段改寫為：“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動必需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把“什麼時候開槍都是不好的”也改掉了。

胡績偉文中又說：“據喬木自己說，毛澤東曾經批評他：‘主觀主義，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動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的思想，可是為什麼喬木被批評後，還敢‘篡改’呢？”胡說：他並不是要把這筆帳全算在胡喬木身上，“因為這實際上也是毛澤東

本人觸目驚心的一筆血淚帳。是他多年來堅持培養出來這股頑固的左傾勢力，是他扶持培育出這位‘功勳卓著’的政治秘書，終於成為這股勢力的掛帥人物！”

胡績偉文中說，胡耀邦在某些中共權威人物“心裡”，是“一個又可愛又可恨的人物”。他說：“說他可愛，當年反‘四人幫’，反對‘兩個凡是’，堅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錯案，這樣他們這些大人物才能從‘四人幫’的迫害下解放出來，而且重新登上高位。他們當然深感耀邦之可愛，甚至很可愛。”“說他可恨，因為耀邦主張我們的黨，我們的幹部不僅要從‘四人幫’統治下解放出來；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他們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換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樣，在他們心目中，他的可愛之處減少，可恨之處則在增加，甚至成為他們執行新專制主義的政敵。經過幾年的發瘋較量，他們終於下狠心，用宮廷政變的手段把他打倒。”“昨日功臣，一日之間被打成‘今日禍首’，最後雖是病逝，實際是‘屈死冤死’。”

胡績偉對在他被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過程中，一再保護他的胡耀邦也有批評。他批評胡耀邦1985年2月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講話，為此寫了一封長信給胡耀邦，提出不同意見。胡績偉認為，胡耀邦的這篇講話，為了“顧全大局”，雖作出“很大妥協”，但“胡喬木等人還是放不過他”，是“在耀邦難於招架的情況下”不得已作的。因而，胡耀邦“這些陳舊觀念又沉渣泛起”。在胡耀邦被打倒後，胡績偉曾給他寫了一封信，但沒有發，直到後來見到

耀邦時，當面將“這封信的意思告訴他”。“他很沉靜地聽我說，但沒有正面地答覆我的問題，只是搖搖頭，連說兩個‘難呀！難呀！’使我感到悲劇沒有完。”他在那封未發的信中，提了許多胡耀邦認為“難呀”的問題，如：“主要應該是反極左還是反極右？”“反封建主義還是反資本主義？”特別是要胡耀邦“認真研究一下黨的改革問題，這是政治改革的核心”。他批評胡耀邦“在你當總書記的任內，沒有組織大家並親自動手來研究黨的建設問題和黨的改革問題，這是你的失職，是自食其果”。他要下了台的胡耀邦“能像一般學者那樣，自由地研究問題，自由參加社會活動”，說：“我們對國外的前首腦是那樣地尊重，以禮相待，對自己的前首腦，是不是也應該同樣寬容呢？”作者也知道他自己的這些想法“太天真了，總幻想當今的權貴還會賜給人民一點點民主”，感嘆：“用政變的辦法，把一個黨國首腦推下台，還談得上什麼民主？”“我們的國家是黨領導一切、決定一切、指揮一切、統治一切的，由黨中央帶頭來搞這種無法無天的大禍大亂，公然整到黨的總書記頭上，要整其他什麼人，就更是在劫難逃了。”

胡績偉在他的書的結尾評論鄧小平說：“鄧小平在十年內亂中，一再被打倒，威信很高。他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瀕於滅亡的黨和國家得到恢復，開始更新，他的威信更高了。可惜，他也像毛澤東一樣，也慢慢形成個人迷信，形成一言堂！”“左傾勢力先利用他的左手，砍掉他的右手（胡耀邦），然後又迫使他把自己的左手（趙紫陽）也砍掉了。到了‘八九民運’時，公然動員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說明這位最高領袖也走到獨裁專制的頂峰了！”

筆者大段抄寫胡績偉先生著作，抄寫王若水先生著作甚少，非有意冷落王文，其實一樣精彩。僅擇兩位著作中自認為較核心部分抄之。對筆者來說，也是第一次見到。願將之介紹給中共今之各級當權者，特別是今之“核心”，希望他們能抽空閱讀兩位原著，從中吸取教訓。

任何人做了對人民不起的事，儘管他一時權勢熏天，不可一世，歷史不會饒人，終究會作出公平的結論。中共今日之當權者如何從兩位的著作中吸取教訓，收起仍在進行的種種“左”的劣行，實行黨的民主改革，不再重蹈毛澤東、鄧小平專制獨裁的覆轍，避免胡耀邦、趙紫陽、周揚、胡績偉、王若水，以至許家屯等悲劇在黨內重演，仍是當務之急！這並非杞人憂天，請看“江核心”八年施政路線之搖擺，個人崇拜之風再興起，不都有跡可尋嗎！

許家屯



## 無奈和悲情：悼尚昆老人

尚昆老人逝世了！他帶著榮譽而去（中共尊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也帶著無奈與悲情而去！

尚昆是中共建黨開國元老，有名的 28 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建國後曾任過黨的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共和國主席等要職。如此資深位高，盡忠職守的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自己的政治命運，一樣無法自主，這是老人的不幸！

筆者首次接觸尚昆，是他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時期，是在中央會議期間，見他為會議忙碌，碰到時，只相互點點頭而已。1966 年他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罪名之一是私自對毛澤東錄音。在那個年代，凡毛澤東到過、住過的地方都奉命檢查，是否被尚昆命人放置過錄音機，江蘇也不例外。毛澤東每次來江蘇，多由筆者和同是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彭沖、公安廳長洪沛霖負責。筆者那時根本不相信有這類事的可能，也只好認真地和洪沛霖，在毛住的中山陵園五號別墅，翻箱倒櫃，搜查一遍，哪有錄音機的影子。尚昆一貶 15 年，文化大革命後，在鄧小平、胡耀邦掌權時得到平反，分配到廣州任書記、市長、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

筆者直接接觸尚昆，是在奉命至香港任職，未到差，在北京仍以江蘇代表身份出席全國人大全會時，因任職已公佈，便列席人代、政協港澳區代表組，了解情況。

時已從廣東到京，任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找筆者談話。習在廣東任書記時，就已接觸、熟悉港澳一些人士和情況，到中央後，在書記處又分管常務。他專為香港新華社的統戰部長在港澳地區小組會上，對某香港聞人的不當、不禮貌批評而來，他生氣地說：“這樣水平的人，哪能當統戰部長！你去（香港）後，把他換掉。”還說：“尚昆也是這個意思，他可能也會找你。”

果然，同一天，尚昆的秘書給筆者秘書打來電話，說：“楊老約見你。”筆者告訴秘書，“請楊老定時間，我去見他。”秘書回話後，告訴筆者：“楊老說不必了，明天上午他來看你。”還沒見面，已使筆者有了親和之感。

第一次直接接觸，首先的感覺是平等易處，不以老前輩自居。他談了一些對港澳的觀感，便談到對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上的不滿，他說：“他們搞的那一套，一左二窄，宗派情緒很重。”最後，才提到那位統戰部長，認為他在小組會上不是批評，而是訓斥統戰對象，說：“現在回歸問題才提出，香港人心動盪，他們這種態度，怎能做好工作。”最後他說：“我的意見，做你的參考。你到香港接觸實際後，再作決定。”他老馬識途、循循善誘的精神，使筆者感到，是位可親的長者，對他建立了可信的基礎。

他當時是軍委副主席、軍委辦公廳的秘書長，也是和筆者工作有關係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但與筆者談台灣工作的問題，卻

是筆者去港半年以後的事。

香港可以和台灣直接交往，香港的台灣“右派勢力”也較龐大，“五臟俱全”，幾乎隨時可見到台灣的報刊，取得台灣各方面的訊息。筆者當時感到，內地應當充分利用香港，對台灣進行工作。將此想法，面告了尚昆，他很贊同，交待楊思德找筆者商量，將之具體化。

楊思德是尚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辦公廳主任。他對台情況比較熟悉，思想開放，辦事細緻認真，待人寬厚，是尚昆對台有力的第一助手。他同意筆者意見，主張新華分社重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筆者兼任組長，將香港有關力量統組起來，原對台工作部部長可參加為組員。後來在多次接觸中，筆者發現他們對分社的對台工作部長，有負面評量，嚴重到楊思德轉達尚昆囑咐，對某些台灣重要關係和情況，“不要讓他知道”。

在蔣經國尚未去世之前，台灣和海外某些人自稱是小蔣的“代表”，前往大陸，尋求與對台有關部門接觸，大陸在這方面自然也有尋求。其中真真假假，不少關係後來被證實是騙取大陸錢財的政治騙子。

筆者在香港利用當地關係，直接與台灣當政的某些高層人物有了接觸，還在獲得尚昆批准後，派自己的一位秘書，三次赴台，作了直接接觸。這也就成了筆者從香港退休後，在短短不足一個月內三次回到香港，不讓周南知道的原因。那次尚昆交待，這些關係不向周南“移交”。同時，也向新華分社發了電報，告知楊思德要到香港與筆者碰面，處理“某些”事務。這個對周南也“不讓他（周

南)知道”，引起周南的極度不滿，向江澤民、李鵬打小報告，告狀，殃及副社長余孟孝，被誣無辜調回內地。

尚昆在廣州工作期間，與港澳人士頗多接觸，因工作需要，對某些人士做過承諾。如利銘澤在世時，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他首先到廣州，與廣州市合作投資籌建花園大酒店，便是尚昆出面，請利銘澤合作的。利銘澤八三年病逝，由利太接管。時廣州市對此項目，意欲撤回與利家的合作，單獨籌建。尚昆親自找筆者，要筆者與廣東方面商量，維持原議。他對國務院負責領導特區工作的副總理谷牧，也作了同樣交代。這不是個人信用問題，而是有關中華國家與外方交往的信用，且和筆者工作有關，便立即為此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林若，省長葉選平，以至廣州市長等人商量，取得他們的同意和支持，維持了原議。

胡應湘的弟弟在澳門經營房地產，向內地推銷，承諾內地購房者，可以批准出境定居。得到當時在廣州工作的尚昆、仲勛同意。公安部後來向趙紫陽打報告，要否定這件事。尚昆感到為難。筆者知道了，認為這也非個人信用問題，便向趙紫陽反映。紫陽權衡再三，說：“那就只此一回吧！”這可能成為後來，紫陽認為，筆者和尚昆“比較熟，說得來”的原因。

“六四”之前，趙紫陽從朝鮮回京後，找筆者交流對學生愛國活動的評估和對策，兩人意見一致，紫陽即要筆者和尚昆商量，請他說服鄧小平，改變對學生愛國活動進行鎮壓的決定，代之以疏導方針。筆者已在《香港回憶錄》中，有較詳細的記載。需要補充的，當時尚昆是鄧小平指派的參加中常委的私人代表，十分信任的

助手。尚昆聽筆者匯報後，明白表示，完全同意支持紫陽的意見，並說幾位老師，向中央也提出同樣的建議。他十分欣賞當天（五月四日），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人士的講話，反覆說“講得好！”還說：“喬石也說，不錯！”因為趙的講話中表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而“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卻說這是一次“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尚昆說講得好，顯然他同意和支持紫陽的意見，是真誠的。當然，他同時也和筆者講了：“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可能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去。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筆者隨即告訴他：“外面有傳說，這次不是趙倒，就是李下台！”他斬釘截鐵地回答：“一個也不下！趙、李都不下。”

後來的情況，不重覆了。要補充的是：五月十九日晚，李鵬板著恐怖的面孔，宣佈北京市戒嚴的那個會上，尚昆也講了話，不僅口氣比李鵬緩和，還講了戒嚴不是針對學生的話。筆者在香港從電視上聽到這句話，感到他當時心情是矛盾和無奈的。二十五日，尚昆奉命向筆者打招呼，其無奈之情也暴露無疑。一見面就解釋：

“常委決定，我和你及幾個人熟悉（筆者估計大概是兩廣的負責人），要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紫陽已停職！小平同志講，已經沒有路可退了，才採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他和平常不一樣，面無表情，眼睛卻不看著筆者說：“希望能理解、支持中央決定。”筆者也和他一樣，眼睛看著上方，半晌才講：“動用解放軍，千萬不要流血啊！”他才面向筆者答道：“不會的，不會的，幾位老師，徐帥、聶帥也是這樣意見……”可見那時他還沒有想到，

“六四”，人民解放軍會向人民開槍。

究竟是誰下的對人民開槍的命令，問題提出是多餘的。尚昆是鄧小平以下，解放軍的最高負責人，說他應負責任，是執行“非命”的責任。但他內心可能是矛盾的。現在他去了，時間沒有來得及讓他有機會表達他內心的真實。他的錯，他的罪，也沒有機會讓他懺悔了！

中共對尚昆逝世的訃告中提到：1992年10月、1993年3月，他分別從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和國家主席的職務上退休，說他仍繼續對黨和國家作出貢獻。顯然是“公式語言”。海外較普遍傳說，尚昆的“全退”，是受他弟弟楊白冰，在“軍中勢力日增”的影響。筆者得到的訊息，卻是相左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尚昆基本上全程陪巡。鄧小平不滿江澤民、李鵬當政後，經濟上的“整頓”倒退，沿途批評，甚至放話：“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其矛頭，知道內情的人都理解，是對著江、李，主要是對著江澤民的。時十四大將臨，鄧小平要尚昆、萬里等負責籌備十四屆中央班子名單。鄧小平的批評放話，尚昆根據自己的理解，與鄧小平交換意見，提出江、李兩人都不再任原職的建議。鄧小平同意李鵬“下”，不再任總理，對江澤民是否“下”，沒有表態。尚昆據此便與人商量，對未來“班子”作準備。後來便發生喬石、田紀雲在中央黨校批“左”講話，錄音帶在全國傳播的事件。喬、田批“左”，其內容也是針對江澤民、李鵬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要將個體和鄉鎮經濟“整頓”到“傾家蕩產”，搞極“左”路線的那個報告。引起江澤民、李鵬的警覺，立即改變態度，

擁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又秘密組織材料，通過鄧小平某位親信，向鄧小平誣告楊尚昆、萬里，為未來翻“六四”案，搞一個“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班子”。這樣，鄧小平聽進去了，於是改變初衷，維持江、李地位不動；反而決定尚昆、萬里“全退”，避免他們在自己去世後，成為又一個“鄧小平”。

筆者的這個訊息，在十四大前，即已得知，曾告知新聞界的兩個朋友陸鏗和卜大中，他們當時出於對讀者負責，陸鏗在他一篇文章中稍有透露；卜大中也撰文，編輯根本不信，未予發表。後來的事實如何，不用再費筆墨了。

尚昆雖屆高齡，其身體一向健康，異於常人。去年仍見有他巡視的報導。得到他逝世的訊息，未見預報他生病；中共的訃告，也未言明病情，太突然了，總不免令人有一些扼腕。斯人逝矣，他退休後的餘年，雖然比被貶的十六年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共的“傳統”——這個一人專制的傳統應該早就廢棄的——尚昆被迫“全退”，和退後實際被當政者歧視的處境，則依然是無奈和飽含悲情的。

這是中共黨內缺乏真正的民主體制，一人專制的必然結果。不僅是尚昆一個人的不幸，也是絕大多數共產黨人的不幸！（1998年9月15日）

許家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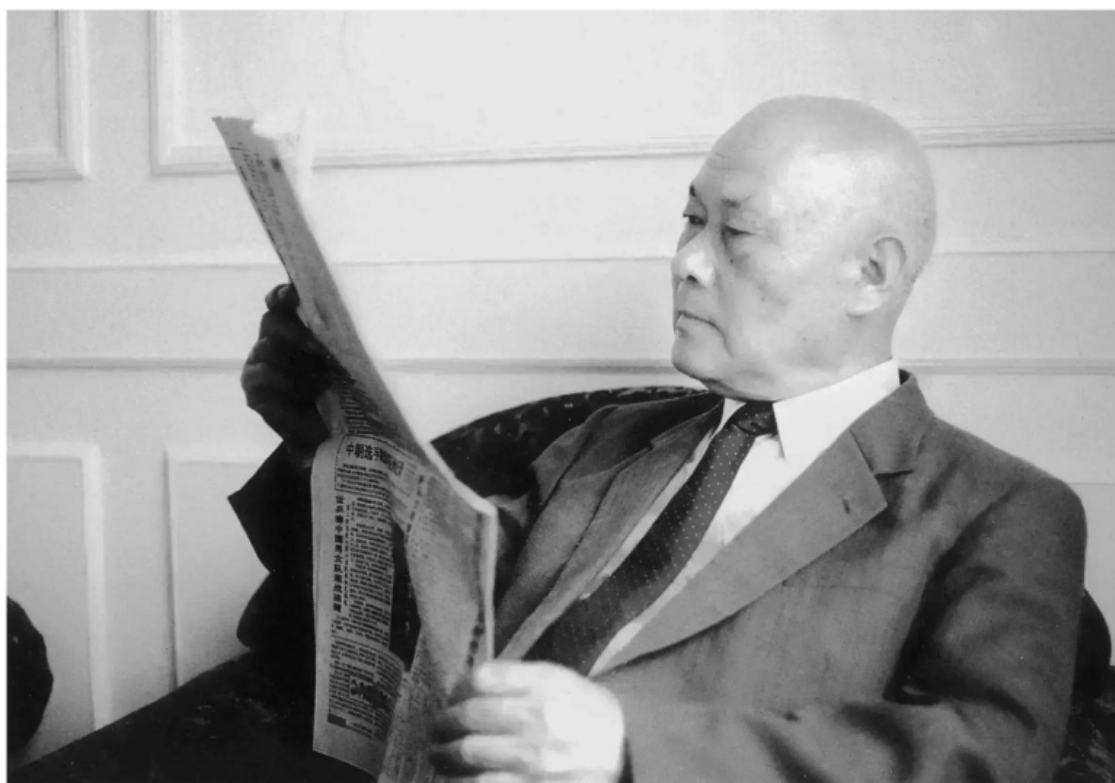
## 項南之冤

驚見項南病逝的報導，遙望故國，茫然久之。

認識項南，是在他任農業部副部長時，他從美國考察回來，路過南京。談到美國農業從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百分之二、三，由於採用機械化和科學生產，糧棉不但自給有餘，還成了出口換取外匯的重要產品。他主張中國農業必須找到擺脫小農經濟的落後生產方式，才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不至再拖建設的後退，重蹈“大躍進”失敗的覆轍。筆者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項南一席話，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

項南出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後，對福建的開放改革，大刀闊斧，建樹突出，不亞任仲夷在廣東的作為。他對廈門特區的開發，設想十分大膽，曾主張採取香港的經驗，成為大陸第一個自由港；他是大陸第一個利用外資，建成廈門飛機場的嘗試者；他為海外著名僑商胡文虎平反，除發還胡在福建的財產外，還商請廣東省也發還胡在廣東省的產業。當他知道筆者陪霍英東去福建參觀，意將陳嘉庚創立廈門大學，及將其故里集美建為“教育城”的經驗，以影響霍英東時，他全程陪同，遊武夷，參觀廈門集美，介紹





項南

陳嘉庚造福鄉梓，留名後世的經歷，絕口不提原希望霍英東到廈門投資之事。

項南被劃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青年團中央工作過，因之也被納入胡耀邦的“團派”之列。加之他的改革開放行為，引起北京及福建一些黨內守舊者的敵視，並得到陳雲的支持。他們羅織項南的“罪狀”，尤其是抓住閩南晉江縣一個鄉鎮企業造假藥事件，大作文章。

這一企業曾經項南表揚過，列為典型，是項南工作上的一項錯誤，但黨內守舊者竟誣蔑項南“有意藉此”“弄虛作假”、“圖取

虛名”，並出動了以中央紀委書記王鶴壽為組長的調查組，竟在所謂“調查”後，處分了項南，成為一宗冤案。

在項南與黨內守舊者的鬥爭中，胡耀邦維護了項南，後因反對者得到陳雲的支持而未果。最後，不得已將項南調回北京，使其正當有為之年，被逼退休。

大陸的改革開發事業，歷程艱辛，項南是中共黨內少有的有理想、有勇氣開拓新路者之一；但他不能見容於黨內的守舊力量，最終走上了與胡耀邦、趙紫陽同樣命運之途。看今天中共某些當政者，原係守舊之輩，因善於取得“老人”好感，善於變化，卻能掌握大權，遲遲不作政體、黨體的民主改革，固然是改革者的悲哀，更是中共的悲哀！

筆者“獨在異鄉為異客”，故人西去，遙望故國，“孤帆遠影碧空盡”。

中共黨內有勇氣敢開拓新路的改革者們，又有幾個得到好下場！

許家屯

## 江澤民的政治報告

中共十五大開過了，各方對江澤民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褒貶不一。筆者認為，報告深具江澤民高舉的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一個經濟改革跨步，政治改革保守路線的報告。從而初步鞏固了江澤民在鄧後的統治地位。

經濟改革上跨了新的一步：國有企業改革可以觸及所有制，為此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的命題，對以公有制為主體有新的詮釋：“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因而對股份制有了新的詮釋：“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同時，對私有制的合法地位，作了比“補充”更新的肯定：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重申了鄧小平的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點。可以預見，大陸經濟將會出現新的一波發展高潮。

政治體制改革，“報告”說要“繼續推進”，但理論多，而具體實施辦法不詳。在“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之後，強調“健全

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制國家”。把民主規範進“法制”之內，把“法制”又規範到“黨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權力”之內，與報告中同時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相矛盾，完全是黨在製法，黨在“為人民作主”。報告在詮釋政治改革上，華而不實。除“依法治國”略有新意外，基本上原地未動。報告更未提及中共黨的民主改革。這是一個在政治改革上保守的路線，與經濟改革的跨步趨勢極不吻合，它將深化大陸政局不穩及中共前途的隱憂。

江澤民報告在“健全民主制度”的標題下，主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講得不錯，但其主要內涵則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後提了要求，“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國家權力機構的職能”，具體實行的舉措卻欠奉。人們可以不反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包括香港回歸後的香港民主黨，都派黨員參選香港的人大代表，但人們對人大的擺飾性多於實權，基本上是黨的“橡皮圖章”的實質卻很有意見。主要問題在於黨的干預太多，黨政不分是關鍵。從人大代表的提名、選舉、開會的議題、報告，到人大的立法，與黨領導政府模式一樣，不僅政務上，甚至日常事務上都要領導。政府人事管理上基本也不例外。從縣、市到中央，概不例外。中共黨的機構的龐大，也源於此。幾乎政府有一部門，黨委就相應有一部門，至少黨委有人分工，進行領導、管理，黨委的領導是無所不在的。黨號稱代表人民，實際是代替了人民；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實際是黨代替人民，為人民作主。這種以黨代民、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

制，不改革，有什麼民主體制可“健全”？

黨政分開，不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而是規範到報告中所說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法制的特權”，中共可以通過人大表決，將自己的路線、政策制成憲法、法律，實現黨的領導，而不能像現在直接控制的模式領導。像領導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基本法》實施領導，而不干預特區政府的日常施政行為。即使從穩定角度來考慮，這種改革只會緩解經濟改革候出現的社會矛盾，增加社會的穩定性。

中共黨的民主改革，十五大江澤民報告並未提及，這與不提重評“六四”一樣，錯失時機，實在為中共可惜。十五大中共新的政治局、常委，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班子，是權位平衡的產物，有利於江澤民“核心”地位的鞏固。這樣一個“一元化”，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班子，制約“核心”的力量是單薄的，在“核心”威信不固，尚須人擁護之際，“核心”可能民主會多一些，當“核心”感覺“威信”已固，不再在乎別人是否擁護之際，便容易“一人化”獨裁起來了。中共早有教訓。江澤民當政八年的施政實際，是不斷搖擺的實際。“一元化”的“核心”體制是一個容易“一人化”獨裁的體制。加之江澤民的搖擺性格，能保證今後不再“左”起來，獨裁起來，引發黨內和社會矛盾不激化起來？

黨政不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都是鄧小平文革後復出要進行政制民主改革的部分，鄧小平後來卻未予實施，十四大還實行倒退，恢復了“一元化”體制。和“六四”一樣，是鄧小平思想理論和實踐的錯誤部分。江澤民十五大的政治報告，標榜高舉鄧小

平理論旗幟，基本上沒有能超越鄧小平理論有所創新（說基本上，指在經濟改革上跨了步），更沒有擺脫鄧小平錯誤實踐，走向進步。比起鄧小平在文革後復出時，批判華國鋒“兩個凡是”錯誤、修正毛澤東理論、路線錯誤，如以階級鬥爭為綱等，相差太大了。正因為鄧小平復出後反對“兩個凡是”，修正了毛澤東思想和實踐中錯誤部分，才有今天大陸經濟比較發展，社會比較穩定的局面。江澤民今天對鄧小平政治上的保守、倒退，卻採取了凡是“鄧政治囑託”一律遵行的新“凡是”路線，延續鄧小平的錯誤，不須多久，將見其害。亡羊補牢，在實施十五大路線過程中，修改這條保守的政治改革路線，是中共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新的領導集體的責任。愈早愈主動，趁形勢較順利時修正，對大局愈有利。人們希望他們有勇氣、有智慧，進行修正，真正走上“繼往開來”的大道。

許家屯

## 說的與做的： 江澤民不許下屬批條子

江澤民在前不久全國政法會議上講話，“領導幹部不要給執法部門批條子，‘打招呼’，讓他們做違背法律的事。不允許給違法者說情。要努力為執法部門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話是好話，但有語病。似乎不違背法律的事，就可以批條子，“打招呼”。

這使筆者記起一件事，江澤民當了總書記，立即給中共香港工委“打招呼”，筆者在《香港回憶錄》中已作記載，現在不妨重複一遍：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正式當了總書記，要中央辦公廳告訴新華分社辦公廳，每日報送香港報刊及內部編刊的有關香港及大陸的反映材料，副社長兼秘書長余孟孝告訴我，他已照辦。總書記關心外界反映，關心香港工作，我與余孟孝都認為對香港工作來說，是好事。但余反映，江澤民在上海當市委書記時，也向新華社香港分社辦公廳副主任許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許某竟在沒有請示秘書長的情況下，私自辦理了。事實上，工委是主動將香港及外界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給內地部、

委及省、市負責人參閱的，新華分社專門為此編印了各種“參考”。許某是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任部長時，副部長曹維廉的秘書，後來曹維廉來新華社香港分社任副社長時，許又隨同任秘書。曹逝世後，升任辦公廳副主任。江澤民當時通過這樣的關係，要工委的材料，我們感到意外和吃驚。這種做法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但事已過去，而且江澤民又當了總書記，余孟孝反映之後，我們相視苦笑，搖搖頭，沒再說什麼。

不久，中央辦公廳又向新華分社組織部下達指示，鄭華在工委會議上告訴我和幾位副社長，江澤民指名要新華分社提許某為辦公廳主任。大家十分詫異，有位副社長感嘆：“總書記真是管得太細了，關心到一個辦公廳主任的職務！”大家不以為然，也不肯表態，我為了“維護”總書記威信，作了和事佬，對鄭華說：“劉林（辦公廳主任）正好要辭職，就讓許某做吧！”

往事大概不屬“江核心”在全國政法會議上所指批條子“打招呼”範圍，因為不屬“違背法律的事”，但從中共黨的組織原則上說，卻是違背了中共中央幹部管理規定！一個省屬辦公廳主任的任免，是工委的職權，只須在任免後，向中央組織部報告備案。“江核心”這一打招呼“批條子”行為，違背了這一規定，是越權行為。

筆者當“和事佬”，明知不對，又執行了，不管是屬於維護總書記威信，或是怕得罪總書記，也都是錯誤的。

中共的體制，是黨領導一切。黨政不分，政府的政法部門根本沒有獨立性。在建國之初，還批判過政法部門的“獨立性”。同級黨委，上級黨委的領導幹部，批條子，“打招呼”，是這種體制的產



物，“給違法者說情”，是必然的副產品，甚至還有公報私仇、搞冤獄的。這種體制上帶來的毛病，不是“核心”告誡不許幹，就可以根除的。“江核心”這次在政法會議上的告誡，是在中共目前人治體制下很難避免的遲來的教訓。江澤民不圖根治，進行黨政體制的民主改革，而是告誡下屬不要打招呼“批條子”、做壞事，是緣木求魚，是連他自己也很難做到的事。

許家屯

## 趙紫陽的公開信

最近，據海外傳媒所報導的趙紫陽致中共政治局函件中指出：六四事件時，“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採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情是可以平息下去的。”我認為，無論此信真偽，或可靠到何種程度，就其對六四事件的這一分析，無疑是符合事實的。

“六四”已過去八年了。大量事實擺明，尤其是由大陸逃逸海外的當事人的追述，都說明當時學生的行動確實是出於對共產黨的愛護，並未想推翻共產黨。當然，許多學生後來自己認為犯有行為過火的錯誤，最令人痛惜的就是不懂得“見好就收”。但千錯萬錯，主要錯誤在於當時的主政者，絕不應該出動軍隊去對待學生。當時，真正耐心與學生接觸，完全有可能用民主法制的方法和平解決問題。

六四事件屬於歷史冤案之一。歷史上沒有一件冤案是可以不了了之的，遲早總是會還以公道的。拖得越久，理虧的一方在青史上越無翻身之餘地。因此，所傳趙紫陽公開信中所云：“早解決比

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這實在是忠心耿耿、珍惜大好形勢之言，是從顧全共產黨前途出發的，是語重心長的。我深信，一切真正為共產黨的事業操心的人，凡是有良心的共產黨員都會是這樣考慮問題的。因此，我個人完全同意上述信中意見，衷心支持。

中共黨代表大會發言人徐光春表示沒有看到這封信，但並未否認有這樣一封信，這使我相信確有此信。至於他說“六四問題早已解決”，這話說錯不錯，說對不對，因為所謂的“解決”是黨內解決，是“江核心”解決，而問題並不曾真正解決。即使在黨內，也一直有人對此不平；軍隊中也始終有人反對。為此事件，黨的名譽蒙羞，軍隊名譽蒙羞，很多人為此揷了黑鍋，甚至直到今天有人在出使美國時還為此而灰頭土臉。發言人一口咬定早已解決，基本上就是要在這個問題上封住人的口，不讓人講話。

毛澤東講過“誰鎮壓學生沒有好下場”，這話還是有道理的。現在，六四事件早已不是對待少數幾個學生的問題，而是對待群眾



許家屯追思會場醒目的位置，擺放著趙紫陽、梁伯琪夫婦的全體後人敬獻的花牌。（高伐林攝）

的態度。當權者硬要把這筆賬掛著是可以的，你現在憑著權勢不解決它當然也辦得到，但總有一天要解決的。真到了形勢不妙，在城下之盟的狀況下被迫來解決時，那就不堪設想了。

其實，現在仍沒有失去最佳形勢，因為人們並未失去理性，也沒什麼人在一心一意討還血債，而是仍在擁護改革開放，擁護共產黨的基本道義、基本理論。若為“江核心”計，即使趙紫陽不寫這封信，“江核心”也應主動提出，這才真正顯出其魄力和遠見，顯示其具備化劣勢為優勢的經世大才。

許家屯

## 中共的民主改革

中共要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首先有一個從領導革命開國的政黨，改造為領導建設的執政黨的任務。共產黨用開國的老方法來治國、來搞建設，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不改革行不通。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改革，筆者以過來人的身份，試論之。

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根據當前實際，需要澄清：中共在建國初期，提出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黨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對於知識分子，周恩來在社會主義改造後，曾宣佈“脫帽”，從資產階級的屬性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毛澤東也說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資產階級的“皮”已不存在了，哪還有什麼“毛”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後來的“反右”鬥爭，劃的面廣量大，實際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認定。鄧小平復出後，又認定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如今，實行改革開放，社會族群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只要改革開放繼續下去，也還會繼續變化），不論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工人，都有一部分先富裕起來了，其中還有一部分高薪者，如香港所謂的“打工皇帝”。在世界進入

資訊革命時期，智慧勞動的報酬，與體力勞動的報酬扯大差距，“中產階層”的大量出現，以及少量很富裕的“打工皇帝”的出現，中共是否視他們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並代表其利益？中國共產黨要根據發展了的實際，明確自己的屬性。黨政要分開。黨政不分，實際形成以黨代政，這是打天下，革命“造反”時做法的延續和發展。即使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以及論述新民主主義時，提出過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都較後來的實際發展民主得多。後來的工人階級專政也好，人民民主專政也好，實際上是共產黨說了算，共產黨的領導“核心”說了算。這種民主云乎者，名有實無。黨政不分，“一元化”的領導模式，是黨缺乏民主，國家缺乏民主的模式。權力高度集中，容易走向專制化。從革命黨向建設黨轉變，首先要改革的是黨政不分。

黨政不分，權力過分集中，“一元化”，容易形成個人專斷，不僅容易壓制黨內民主，而且限制了國家行政系統的獨立和功能，限制了司法獨立和監督的功能。將黨和國家命運繫於一人之身，不利長治久安。十四大的體制，很多人都稱之為“江李體制”，筆者不以為然。那是名符其實的“江核心”體制：不僅黨政軍的最高職務集於一身，總書記的書記處，對黨政軍群（群眾團體）的一切事務，都由與政府及有關部門相應的書記，在總書記的統一領導下實行分工領導。尚有不能包括的，如外交和台灣事務等方面，總書記也兼領導組長。這種高度集權模式，似乎還感不足，還要“大樹特樹”，要求全黨全國人民一致擁戴“核心”。文化大革命的殷鑒不遠，能不叫人居安思危嗎？

“一元化”領導，是黨政群不分的突出表現。“一元化”在革命時期是起了作用的，但弊病也很大，把權威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天下沒有哪個人是一切正確的，像毛澤東在革命時期確實做出了許多正確的決定，把蔣介石打敗。但共和國成立後就錯誤不斷，像批評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批評鄧子恢小腳女人，批評周恩來“反冒進”等等，以致發展到後來的搞文化大革命，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說明什麼呢？說明黨內沒有民主。“一元化”消極面比積極面大，因為它很難制約，利於個人專斷，也利於犯錯誤。

黨政分開，並不意味著取消和削弱黨的領導。作為執政黨，對自己的主張，應有信心，是能代表和體現自己的階級及全國人民的利益的。黨的領導，不是靠下命令，做決定，而是將自己的路線政策，訴之全階級及全體人民的代表機構，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獲得它們的同意和批准，制定成憲法和法規，通過憲法和法規實現領導。同時，向人代推薦候選人，通過選舉，擔任政府首腦。

黨政分開，拋棄“一元化”領導模式，是黨的民主改革和國家政體民主改革的前提。

其實，毛澤東自己也多次講過，黨內要民主。這不是什麼門面套語，因為他本人在掌權以前也是曾經深受不民主之害的。但後來由於發展太順利了，即使理論上，口頭也講要民主，而實際中卻逐步拋開了民主，最後發展到“一句頂一萬句”。這雖然是別人弄的鬼，但這是在實際生活中沒有民主，在意識形態上“大樹特樹”神化的必然結果，造成了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極大災難，教訓是非常

非常深刻的。

鄧小平復出後，強調黨要民主改革，政權要民主改革，這是鄧小平接受了文革前，特別是文革的教訓。可是後來猶豫不前，甚至在十四大恢復了“一元化”，後退了。

現在是重新認識和接受這個教訓的時候了，還是要堅持民主改革。不接受這個教訓，對中華民族不利，共產黨自己也是要受害的。

毛澤東對民主原有很好的設想。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延安時期，民主人士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國千百年來歷史上總是脫不開那個輪迴圈子，歷朝歷代開國登基時總是好的，勵精圖治，後來腐化，腐化就失敗，這樣周而復始，循環不已。共產黨現在也很好，欣欣向上，今後能不能保證不重複這個歷史上的老圈子呢？毛澤東回答他說：我們找到了跳出這個老輪迴規律的辦法，辦法就是民主。（非原話，大意如此。）

毛澤東講得很對。他還提出了民主的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任何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都應該從群眾中來，再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不但黨的路線政策的形成要堅持這條群眾路線，各級黨的組織，從基層到中央的組成，也應“走”這條群眾路線。因為兩者是一致的，沒有組織上的從群眾中來，如何保證決策資源（群眾意見、要求）從群眾中來。這是將群眾意見，要求從下而上，集中起來，制定成路線政策，然後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進行驗證，再將執行中群眾的意見和經驗集中上來，完善或修改路線、方針、政策，再回到群眾中去；如是周而復始，不



斷堅持正確，修正錯誤的民主的決策路線。

這就是“民主集中制”。現在有人對此肯定，有人則持否定態度。其實，缺點是沒有將之法制化。意見紛紜，是民主的必然，要執行，總要集中起來。不集中的意見，如何執行呢？但集中要有序，必須規範化、法制化。

美國民主程序，共和黨、民主黨意見對立，最後的法案由國會議員投票通過，總統批准。它的集中是規範化、法制化的。

中共的“民主集中”在於沒有規範化，隨意性太大，缺少制度，未形成黨法。黨章有原則規定，但未規範化，只是籠統規定，“少數服從多數”。實際上，在中央，往往“總書記說了算”，在地方往往是書記說了算，民主形式都沒有，不論是舉手表決、口頭表決或是投票表決，一概沒有；從中央到地方，通用的“習慣”法是，書記作“結論”，然後是書記做“重要講話”，“政治報告”，大家跟著行動。這樣的民主集中，算民主集中制？

在這樣情況下，結論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有時非常錯誤，缺乏抵制機制。毛澤東的後期實踐，是十分悲痛的教訓。鄧小平亦有類似的情況。個人不論多麼有才有能，不可能是神聖，缺少了集體的制約和監督，不可能英明聖武到不犯錯誤。

中共要掌握當前的歷史機遇，從根本上整肅官僚化、腐化，關鍵問題是進行民主改革。按毛澤東的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民主集中制，在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上進行民主改革，予以規範化、制度化、透明化，使全體黨員共知共行，全國人民同知同監。

決策路線，民主集中制的改革，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使其規範化、法制化。決策必須經過表決。書記即使自認為意見正確，也須服從多數表決的結果。自認正確的少數只可保留意見，等待大家覺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決策少脫離群眾，少脫離實際，少犯錯誤。

組織路線的民主改革，是改革選舉制度，使之規範化、法制化。地方的縣、市、省和中央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權力機構。“全黨服從中央”，是服從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決定的路線、政策、任務。中央委員會是執行機構，政治局、常委也都是如此。“全黨服從中共”，是服從全國代表大會，不是服從中央委員會，更不是政治局、常委。這應是民主集中制的第一法則。黨的代表大會的代表、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常委、書記以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候選人的提名，要改變現在由各級組織部門提名，上級批准，而後交由黨代會或委員會“選舉”不民主的做法；採取自下而上，由黨員或基層黨組織經表決舉薦。上級組織提名，也只能是少量的。提名須有差額。選前要有“競選”過程，讓投票人了解候選人的競選綱領，有所選擇。選舉須無記名投票，一人一票。這些，都要列入黨章。

縣、市以至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或總書記，明訂任期，如連選連任，不能超過兩任。如此接班危機可以免除，“核心”不必大樹特樹，自然形成。黨和國家，增加了長治久安因素。

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要有獨立監督黨員和黨的委員會的職能、職責。它的委員和常委書記的選舉規範和黨委相同，由各級黨

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其權位與同級黨委平行。其負責人，書記不在同級黨委兼任何職位，不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或指導，直接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接受任務和報告執行情況。這樣，才有可能使黨的負責人，特別是最高負責人，有人監督；一旦違紀違章，得到應有的公平處理，不致只打蒼蠅，不打老虎，使他們成為“無法無天”的化外魔王！

是時候了，眼前的穩定是暫時的，機遇與危機同在，因循苟且不得。但願中共今日有志改革者能有勇氣，有智慧，不失機遇，敢於改革，創建新的局面，名實相符地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黨政不分，黨不管黨，第一書記一把抓，這在中共黨內，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是較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中共打天下過程中，黨領導一切，“外行領導內行”制度的必然。

打天下，奪取政權，是“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打天下，從一開始，就一無所有，更無什麼政權。把一個有天有法的舊世界、舊政權，“無法無天”化，先破它，而後另立一套。黨的建設本身也是這樣，邊幹邊建。本來就沒有政權，哪來什麼黨政可分，“一把抓”是自然，天經地義的。後來有了部分政權或曰地方政權，還是因打天下的需要，為打天下服務的，也沒有多少事要分。形成黨的第一書記一把抓，則多在第一書記已成權威，或自覺是權威之時，這是黨內民主集中制缺乏規範，沒有法制化的必然現象。

中共這種體制，成為中共黨內時而出現個人專制，時而出現領導分裂的根源。它沒有一套具約束性的民主規範，隨意性大，多為



許家屯追思會後，家人放飛百隻白鴿，祈願百歲老人的靈魂自由翱翔。（高伐林攝）

個人好惡所左右，便於個人意願凌駕於組織決策之上行事。歷來的中共黨內鬥爭，總是落得“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結局。從陳獨秀起，到毛澤東、鄧小平，基本上都沒有超越這個體制的內在規律。他們或先專制，後被棄；或因反專制被棄，而後再起，自己又專制，反覆出現是必然的。

“一元化”的“核心”體制，是中共打天下體制的老版本，它不僅容易產生專制獨裁者，也不能適應建設階段政體民主化的要求。鄧小平文革後復出，曾深刻地批判這一體制給中共帶來的禍害，但在“六四”後，又重搞“一元化”體制，犧牲政體民主改革，維護共產黨領導。短期內維持了政局暫時穩定，長期而言，後患無窮。

黨政不分，黨的民主都未規範化、法制化，政體民主還能做什麼改革，以黨代政不改，無法實現政權體制的獨立性，不能實行“人

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體。

黨忙於“領導一切”，哪來精力管黨？“黨不管黨”，是中共黨政不分，包攬一切，黨的體制不健全的必然，同時也必然會出現第一書記一把抓，在中央是總書記一把抓。“一元化”更使這體制“合法化”，導致專權以至獨裁。

國家早已進入建設時期，中共早就應該改革這種打天下的體制，進入建設國家的體制，實行黨政分開、體制民主化，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以黨代政，以黨代民，“為民作主”。人們大都同意中共的政改，步驟可循序、穩步前進，但要拿出“序”來。十五大奢言政改，但不見實施的具體要求、步驟，所謂政改便可能淪為空論。談原則，是中共所長，原則如何具體詮釋，形成舉措，則隨意性很大，往往成了總書記的“專利”。原則必須具體化，必須先依法定規範立法，改變“先破後立”，先立新法，後破舊規，從打天下黨，向建設、執政黨轉變的一個主要方面。

十五大江澤民政治報告，對政體民主改革，只見“諾”，不見“序”。黨的民主改革根本沒觸及，是一個供欣賞性多、實踐性少的報告。讓內外有識之士失望事小，經濟改革中出現的種種不安因素無法消除，因而為社會帶來隱憂以至動亂事大。中共亡羊補牢未晚，急起直追，方顯有膽有識。

許家屯

## 編後瑣記

編輯一本關於許家屯的書，難度比我們預料的，要大。

“全”是“好”的對頭。

一度期望，盡可能將關於這位期頤老人的資料搜集起來、完整編入，以全面翔實地向後人展現他的思想與人格、貢獻與遺憾；沒有想到，這卻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在他主政多年的江蘇，他施展才幹的香港，他“旅行休息”的美國……那麼多人要抒發對他的印象和感悟，許多朋友發來他們的文章和照片，香港、台灣和西方的媒體那麼踴躍地報導，就連嚴密文網下的中國大陸，也有財新網敏銳而大膽地發出報道，被騰訊等多個網站迅速轉載。雖然隨即被刪，但他的名字，在博客、論壇、電子郵件和自媒體上卻不脛而走。

人往往是在離去之後，才顯出他的份量和影響。

面對浩瀚篇什，我們只好放棄奢望，擇要而錄之。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察覺，本書中不同來源的文字，對同

一事件的記述並不盡一致。這可能源於講述者本人記憶的錯漏——任何人的記憶，即便超群如許家屯、即便是回憶剛剛發生、尚未冷卻的事件，都難以避免這種錯漏；可能應歸咎記錄者由於口音、知識結構等方面的欠缺，甚至因“為尊者諱”的人為誤區而致失準。

口述歷史是值得珍視的，口述歷史又是需要十分謹慎地對待的。

作為編者，我們注意到了這種出入，盡力做了核實校正；但還有一些彼此抵牾之處，只能各自保持原貌。殷切祈盼讀者留意並惠於指教！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許家屯何等幸運，他的人生，自然而然地就“滿”了“百”，直達世紀人瑞之列。

但人的精神視野，永遠大於他的生理制約。在許家屯生命的最後十年，也就是在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九旬以後，他孜孜不倦地鑽研闡發的，是關於如何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彼此並存共融、如何給人類開闢“和平演進”大道——課題之宏偉深遠，何止“千歲憂”！就在他駕鶴西去的前四天，從彌留昏迷中醒來片刻，除了仍然掛心資助家鄉的學校，對何頻等年輕朋友扔下的一句話竟是“等我半個月一個月好起來了再仔細討論”……

許家屯已經永遠沉默了。然而本書，接續他的回憶、反思，加入更多人的思考、詰問。這一人生和思考之藤繼續延伸，能結出什麼樣的果實、播下什麼樣的種籽，誰又能說得定呢？

高伐林

2016年8月13日







此頁空白



明鏡電子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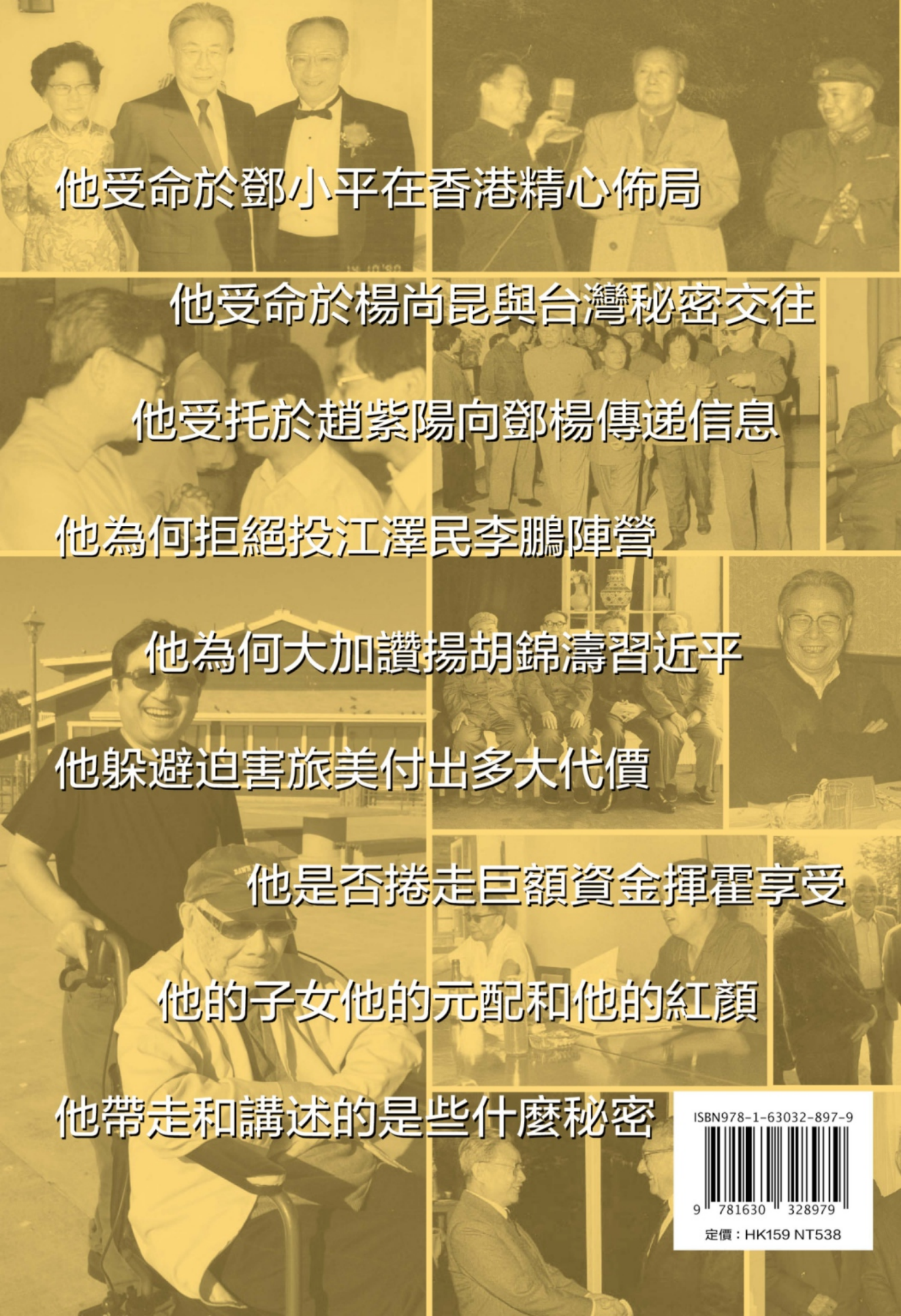
# 中國看不到的書刊 海關查不出的秘密

將100本書刊下載到你的手機中

Mingjing ibook Mingjing ibook



封面設計：紐約客設計所



他受命於鄧小平在香港精心佈局

他受命於楊尚昆與台灣秘密交往

他受托於趙紫陽向鄧楊傳遞信息

他為何拒絕投江澤民李鵬陣營

他為何大加讚揚胡錦濤習近平

他躲避迫害旅美付出多大代價

他是否捲走巨額資金揮霍享受

他的子女他的元配和他的紅顏

他帶走和講述的是些什麼秘密

ISBN978-1-63032-897-9



9 781630 328979

定價：HK159 NT538